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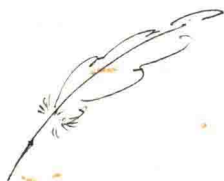
CAMBRID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德意志古典法学丛编

黄涛 吴彦◎主编



[以]阿维纳瑞 (Avineri S.)◎著

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张东辉 / 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德意志古典法学丛编

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

自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被发现以来，关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围绕“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的所谓裂隙进行的，它们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一位人道主义思想家，而老年马克思则是极少关注其狭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外的任何东西的决定论者。阿维纳瑞先生却主张，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的这样一种裂隙并不存在。他通过详尽地研究马克思全集关于社会与政治思想的论述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该书思路明晰，行文简洁，是驾轻就熟的英语能力和高超的分析技艺的结晶。”

——*Tribune*

“阿维纳瑞的杰作是精华读物。”

——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The Guardian*

“阿维纳瑞的清晰而客观的天才评论，对文本引文的有效运用，完好契合马克思学说的复杂性的有序处理，使得该书成为一部值得列入任何语种的马克思研究的上乘之作行列的著作。”

——*Review of Politic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ISBN 978-7-5130-1219-5



9 787513 012195 >

定价：38.00元

责任编辑 倪江云



CAMBRID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德意志古典法学丛编

黄涛 吴彦◎主编



[以]阿维纳瑞 (Avineri S.)◎著

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张东辉 / 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 (以) 阿维纳瑞 (Avineri, S.) 著; 张东辉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3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德意志古典法学丛编)

原书名: The Social &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ISBN 978-7-5130-1219-5

I. ①马… II. ①阿… ②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0843 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ISBN - 13: 9780521096195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is publication is in copyright. Subject to statutory exception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collective licensing agreements,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2013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倪江云

装帧设计: 张 冀

责任校对: 董志英

责任出版: 刘译文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德意志古典法学丛编

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

[以] 阿维纳瑞 (Avineri, S.) 著

张东辉 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责任编辑: 010-82000860 转 8541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276 千字

ISBN 978-7-5130-1219-5

京权图字: 01-2012-0182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1

责编邮箱: wangyumao@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10.375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是宙斯和迈亚之子，奥林波斯众神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尔墨斯（Hermes）之名。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乎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译现代西方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然成风，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仅务竞新奇，仅限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方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德意志古典法学丛编” 出版说明

19 世纪下半期以降，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催生了法学的专业化和技术化，法学视野日趋狭窄。在 20 世纪的法律思想中，实证法学、社会法学、经济分析法学占据了法学的大半江山，现代法学十分“自觉地”排除有关制度与德行的思考，规范主义振振有辞，鄙夷有关法理之学的哲理思考，法学最终沦为律师的技艺。

德意志古典法学有关政法之理的思考极其深刻，其对共同体秩序的反思，对制度之品质的思考，足以令专业化的法律人汗颜。德意志古典法学想要揭示一切社会现象的本质，揭示人类的本真的政治存在，它将制度设计与共同体的美好生活关联起来，为反思社会现象提供基本尺度和范式。不仅如此，现代法学中的大部分观念及概念，早已在德意志古典作品中埋下伏笔。

德意志古典法学哲学化色彩成分极重，而非当今有板有眼之学术论文。凡此种种，均给阅读和理解带来了巨大困难。长期以来，对于隐藏在德意志古典大家作品中的政治法理，学人们仅停留于引证片段字句，未能有深入细致之钻研。本丛编不从意识形

态的宏大叙事入手，亦不从流行的概念体系入手，而从德意志古典作品中政治法理的疏释入手，讲述政法学问和道理，引导有关政治法理之独立思考。

政法之理如人生之理，离不开深刻的哲学反思，诚如个人向往美好的人生，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亦会向往美好的共同体生活。尤其是在亟亟于变革的当下中国，我们完全有必要反顾德意志古典政法思想的印迹。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丁组

2012年9月

英文版序言

[vii] 目前任何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探讨都仍缺乏全面的和考订的版本。在东柏林得到完善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尽管有缺点，但已尽最大努力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这部著作集偶尔也必须通过参考其他版本来加以增补，尤其是参考在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被迫中断的李阿扎诺夫（Riazanov）的杰出全集版本。

本书已尽一切努力参考了马克思著作的英译本。在缺乏这样的译本的情况下，我就提供了我自己的翻译，并提请读者参阅我使用的德文版。遗憾的是，伊斯顿（Lloyd D. Easton）和古达特（Kurt H. Guddat）的《青年马克思的哲学与社会文集》^①到我手中时已经太晚，因而未能在这本书中得到使用。

任何增加另一卷书到研究马克思的已经汗牛充栋的文献中的人，都可能被指责为重复性的或不谦虚的。假如不深信关于马克思政治与社会思想的探讨已经遭到一种双重的扭曲——这种扭曲

①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Carden City, 1967.

是由研究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学术史造成的——我本来是不打算写这本书的。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很少成功地摆脱或明或暗的政治目标；而且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新发现已经造成关于马克思思想本质的各种流俗观点的失衡。本书的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从他的信徒和敌人中解放出来，用一种试图恢复作为政治理论的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平衡的眼光进行讨论。一个显得不言自明、却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根据列宁或斯大林的政策来评价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就像根据格莱斯顿（Gladstone）的政绩来评价密尔（Mill）一样。毕竟，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必须依据理论的先天自主的理智加以判定。本书的目标在于将西方的马克思探讨从一直留存于许多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的冷战余殃中解脱出来。[viii] 希望在东方也出现类似的解放也许很天真，但我仍然想要为之呐喊。实际上，各种迹象表明，这种解放至少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正在缓慢进行。

我在塔尔蒙（J. L. Talmon）教授的指导下获得殊荣准备这一研究的最初版本，这个版本最终变成了这本书。他的鼓励、博学、理解和耐心构成我所深深珍爱的彼此友谊的成分。我将自己对马克思与黑格尔遗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意识归功于罗滕施特赖希（Nathan Rotenstreich，现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校长）的启蒙，他的友善建议是无价的帮助。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在我工作的困难时期鼓励我，成为我进行自我批判的恒久动力。

我在耶鲁大学准备这本书的最后定稿的一年，通过与一些在不同层面对黑格尔、马克思和社会变化感兴趣的同事的讨论获益匪浅；我确定，达夫（Kenley Dove）、麦克布莱德（William McBride）、马斯特斯（Roger Masters）、塔罗（Sidney Tarrow）仍然完全不同意这本书的许多观点。但我真的感谢他们，甚于他们自己所意识到的。

在研究和旅行方面，我非常感谢希伯来大学、英国议会和以

色列劳动联盟学术研究委员会。关于重要的图书资源和研究设施，我要感谢耶路撒冷的国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英国博物馆阅览室、伦敦经济学院的英国政治学与经济学图书馆、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波恩的黑格尔档案馆、米兰的吉安贾科莫·弗尔特里奈利研究所（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我对我的妻子德沃拉（Dvora）的亏欠更大更深，甚于言语所能表达。

阿维纳瑞（Avineri S.）

1967年10月

中译本说明

《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是当代以色列哲学家阿维纳瑞的代表作之一，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至今已再版15次。本书自首次出版以来，几乎成了西方研究马克思的学者必读的重要参考书目。作者凭借翔实的文献资料，从学理的层面深入独到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阶级与革命、理论与现实、异化与财产等主题的思想。

本书的核心主张在于，马克思的学说是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哲学的综合产物，是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转变性方法”——从叙事方式上讲，是把黑格尔哲学的主词与谓词加以颠倒，从存在论上讲，则是把黑格尔哲学的唯心论与唯物论加以颠倒——再次创造性地运用于黑格尔思辨体系以批判和改造社会现实的结果。作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立场从早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直到晚期的《资本论》都是贯彻始终的，从未改变，只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和完善。因此，作者旗帜鲜明地主张，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具有系统的“结构性”，马克思只有一个，不存在“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

思”的严格区分。本书还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各自的著作）区别对待，认为“他们在家庭背景、教育和生活态度方面存在种种差别”，以努力塑造或还原一位哲学家的马克思，而不是革命家的马克思。

作者的学术见解未必能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同，但作者对马克思经典文献和生平资料的熟稔，对马克思思想体系高屋建瓴的系统把握和鞭辟入里的透彻剖析是无可否认的。作者擅长纵横捭阖的宏大叙事，却又时时紧扣文本，对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信手拈来，驾轻就熟，体现了深厚的哲学素养和渊博的学术积累。此外，作者文风简洁明快，畅快淋漓，读起来实在是一种享受，反觉得翻译败坏了原始文本的美感。也许正是这些不可或缺的因素成就了这样一部经典吧。

最后，在术语的翻译方面，根据作者要把西方的马克思研究从“冷战余殃中解脱出来”的宗旨，译者原本打算将 materialism 的通常译法“唯物主义”或“唯物论”改译为“物质主义”或“物质论”，并将 idealism 的通常译法“唯心主义”或“唯心论”改译为“观念主义”或“观念论”，但这一改动还将涉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重要概念的改译，如此一来，新添的混乱或许会比业已造成的、又约定俗成的混乱更多，遂作罢。此外，在引文的翻译方面，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引文均主要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和 1986 年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引文略有改动，且个别地方与作者提供的英译文有所出入，但不构成重要的理解偏差。特此说明并真诚致谢！

本书的翻译与出版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的有关指导和鼎力相助，特此致以由衷的谢意。本书的问世凝结了倪江云和王玉茂两位编辑以及丛书主编黄涛博士的辛勤汗水，特此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译作的纰漏和讹误必定不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东辉

2015年8月17日

于上海财经大学同新楼

目 录

- 缘起 / *i*
- “德意志古典法学丛编”出版说明 / *i*
- 英文版序言 / *i*
- 中译本说明 / *i*
- 导 论 / 1
- 第一章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再思考 / 8
- 1.1 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影响 / 8
- 1.2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前提 / 14
- 1.3 国家与市民社会 / 18
- 1.4 阶级结构与现代社会 / 24
- 1.5 财 产 / 29
- 1.6 无产阶级的社会：“真正的民主制”与共产主义 / 34
- 第二章 无产阶级：普遍的阶级 / 45
- 2.1 作为异化的国家 / 47
- 2.2 官僚阶级：虚假的普遍性 / 53
- 2.3 无 产 阶 级 / 59

第三章	劳 动 人 / 73
3.1	意识与社会 / 73
3.2	劳动、历史与政治经济学 / 88
3.3	社会人 / 98
第四章	异化与财产 / 108
4.1	唯物论前提 / 108
4.2	异化与财产形式 / 119
4.3	商品拜物教与劳动分工 / 132
第五章	实践与革命 / 140
5.1	先 驱 / 140
5.2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 152
第六章	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辩证法 / 170
6.1	历史起源和理论模式 / 170
6.2	资本主义的普遍性 / 183
6.3	变革的辩证法：股份公司与合作社 / 197
第七章	法国革命和恐怖：政治革命的成就与局限 / 208
第八章	新的社会 / 228
8.1	普选制与“国家的扬弃” / 228
8.2	社会主义阶段 / 248
8.3	巴黎公社：必然的失败 / 270
结 语	当前的末世论 / 280
参 考 文 献	/ 290
索 引	/ 300

导 论

[1] 马克思的一些最重要的理论作品仅仅在几十年前才被发现和出版。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出版于 1927 年；《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 的完整文本首次在 1932 年付印，同一年也发现了《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资本论》草稿，即为人熟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Grundrisse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在 1939 年才首次付印。

因此，马克思所激起的兴趣和讨论与他的作品和理论所获得的真正熟识之间有着巨大的裂隙。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多数争议的盛行都是在争论者们不了解马克思本人关于相关主题的观点的情况下进行的：普列汉诺夫撰写《一元论的历史观》(*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 时，并未意识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已涉及诸多同样的问题，尽管是以不同的方

式；列宁写他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Materialism and Empirio - Criticism*），并不知道《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存在。有时候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传统看法是直接和马克思本人的一些作品相抵牾的。

最近马克思早期作品的发现，转移了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探讨的一些重点。在这种发现以前，关于马克思的讨论大都局限于社会主义者的各种流派之间，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争论。自马克思早期作品的发现以来，这些讨论就将注意力引向了马克思哲学思辨的丰富性上，牵涉进一些迄今为止并不关心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群体。马克思研究在学术上已然硕果累累。

对青年马克思感兴趣这种复兴带来的结果之一是，马克思如今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一些人认为他要对人类经历的一种最坏的极权主义政体负责，另一些人则把他看作是最后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些人把他视为 [2] 狭隘的唯物论者和决定论者，另一些人则指出他早期作品在根本上的人本主义思想；还有另一些人把他视为现代社会科学之父，也有一些人将他视为现代存在主义思想的先驱。当有人把他看作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时，另一些人则在他思想的某些方面与佛教禅宗之间找到相似之处。如果说 40 年前“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术语中最流行的，现在“异化”就是最流行的。^①

这种混乱主要来自两个原因：首先，对马克思产生兴趣的最

① 关于马克思的诠释历史，参见蒂尔（E. Thier）：“马克思诠释的诸阶段”（*Etappen der Marxinterpretation*），载《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usstudien*）第 1 辑（Tübingen, 1954），页 1 - 38；利希特海姆（G. Lichtheim）：“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Western Marxist Literature*），载《综览》（*Survey*），第 50 期（1964 年 1 月），页 119 - 128；“马克思主义的来源”（*The Origins of Marxism*），载《哲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第 3 辑第 1 期（1965 年 4 月），页 96 - 105。也可参见格雷戈尔（A. James Gregor）：《马克思主义综览》（*A Survey of Marxism*）（New York, 1965）。

近复兴几乎全都集中于他的早期作品；他后来的著作几乎没有按照新的发现重新加以思考和审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的裂隙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其次，许多被传统地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以比较流行的恩格斯晚期作品为基础的。如果说恩格斯的晚期作品显得是与青年马克思的那些作品普遍不同的，那么，通常从这种不一致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存在差别。

第一，本书的研究力图克服这些困难中的某些困难。我们的方法论目标是要将马克思思想研究从那些我们由以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历史环境中解放出来。我不是要将马克思的成熟作品视为其早期作品必定与之对立的封闭体系，而是偏向于将其毕生著作视为一个整体。任何内部的区分——不论是编年史区分还是其他区分——都必须遵循对马克思整个思想的一种结构性分析。即使这种探究将表明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分析和视角的兴趣与重点的转移，这也并不是说，那些根据自己的偏好对“青年”马克思或“老年”马克思加以取舍的人的完全不能让人接受的态度是全然无所谓的。

第二，我们遵守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一种严格区分，[3] 党派宣传所设计的集体人格形象要被丢弃。无论他们两人有多少类同、亲密、毕生友谊和学术合作，他们仍是两个不同的人，推想他们在家庭背景、教育和生活态度方面存在种种差别，但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同样的想法，是不理性的，甚至怪诞的。来自一个非常敏感的犹太血统家庭的马克思，接受大学教育，最初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哲学；恩格斯则来自一个具有强烈虔信派倾向的正直的德国工业家庭，为了进入商界而接受教育，主要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这些不同的背景可以轻易地在他们的作品，甚至他们的风格中被追索到，而且鉴于著作者的个性也应当给予尊重。因此，本书是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恩格斯的作品将被附带提到，并

且只是为了提供参考。^① 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详细研究将成为本书研究的自然推论，但不可能成为主题。当然，这样做可能得不偿失。^②

第三，本书研究的进一步目的是要从马克思学术来源的背景出发来看待其思想的各个方面。我们将详细讨论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背景。由于马克思的第一部系统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 的批判，所以这种关系既有系统性的意义，也有传记性的意义。在这个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体系的受惠和讨伐都十分明显；并且，可以表明，马克思后期思想的主要成就和困境（例如私有制、异化和国家的废除）全都来自这本书。马克思对这些术语的使用，如果与他运用它们的具体语境以及运用它们的方式方法分离开来，就是无意义的。

[4] 从这种观点看，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成就似乎在于他将历史的东西融进了一个哲学性的体系。对黑格尔而言，历史不同于其在其他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不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也不只是实现哲学理念的领域。在这方面，黑格尔将历史视为“神在地上的行进”的观点似乎是在犹太教—基督教世界的神学传统与启蒙运动的思想成就之间的一种独特综合。因此，马克思思想中的末世论因素不能被追溯到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本身的直接影响，也并非来源于马克思的祖籍犹太人背景。^③ 它是马克思的黑格尔传统的结果。

① 这当然也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著的问题，例如《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既然这些著作的最终定稿全都是马克思确定下来的，为了这里探讨的目的，它们就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作品。

② 最近霍奇斯 (Donald C. Hodges) 的文章“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Engels'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在这方面作了一项有益的尝试，载《社会主义名册》(*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1965), 页 297-310。

③ 这个问题最近被孔策利 (A. Künzli) 的《卡尔·马克思：一种心理描述法》(*Karl Marx: Eine Psychographie*, Wien, 1966) 提了出来。孔策利通过完全无视马克思自己对那些影响他的观点的具体的犹太人传统有多少意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诡辩。

在将历史视为一种由各个富有意义的事件组成的精细形态，而必须根据一种宇宙论加以破译和说明方面，黑格尔的历史观与主流的基督教神学是类似的。然而，由于神学在其历史观上受到原罪教义的阻碍，人的历史总是被神学家归于上帝的超历史的神意指引。在奥古斯丁传统的范围内，历史的存在正好证实了恩宠的丧失，历史学最终依然是神学的婢女。另外，法国启蒙运动尽管试图将历史综合进哲学的整体之中，结果却远未成功地发展出一种连贯的历史观。孔多塞（Condorcet）关于人类可完善性和历史进步的观点几乎不能适合 18 世纪关于过去历史的普遍观点。不止一位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无法调和进步的信念与将中世纪视为一种倒退的观点之间的矛盾，而将卑贱和黑暗的东西归因于迷信的力量。弗格森（Adam Ferguson）如果没有考虑到价格社会正在为物质进步和精神进步买单，就不会将他称之为“市民社会”的东西看做是第一个黎明。从古典世界的高地向“黑暗时代”的倒退，使任何关于历史进 [5] 步的线型观点变得毫无意义，现代化的模棱两可在卢梭关于历史发展的性质的观点中得到模棱两可的反思。

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试图将这些不同的因素统一到一个思辨的总体中。通过把理性的狡计（List der Vernunft）拟设为历史发展的媒介，黑格尔就可以将历史中的主观因素与历史进步的客观意义分离开来。虽然这种方法有它自身的困难和内在的张力，但黑格尔可以把历史固定在一个哲学体系中而不用遭遇他的前辈们遇到的困难。结果，哲学的这样一种历史化导致任何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探讨都暗含着关于历史现实的探讨。如果理性的东西是现实的东西，如果哲学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它自己的时代”，那么，任何哲学批判都同时变成对历史性当前的一种内在的社会批判。哲学探讨变成一种社会争论，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学术和思辨成就的一个直接成果。

的确可以表明，马克思在最初面对黑格尔时是如何能够从黑格尔体系本身中建构起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的。马克思的后期作品仅仅阐明了他在漫漫思想求索的这一早期阶段所达到的结论。马克思所从事的各种经济、社会和历史研究，也无非是他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内在批判得出的结论的一种推论。

马克思的探讨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品相比如此出色并在学术上鼓舞人心的地方在于，他试图根据自己的体系标准衡量黑格尔。用这个标准，黑格尔得到评判，并被发现存在不足。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序言中，当提到传统的“Hic Rhodus, hic saltus”[这里就是罗陀斯岛，就在这里跳吧]时，拟设了哲学思辨的现世性（this-worldness）。在这方面，马克思相信黑格尔的话是真的，并试图用政治的历史现实对峙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指出虽然黑格尔总是强调他的国家理念绝不能与任何特殊的历史性国家相等同，但它仍应当成为[6]现代政治生活的奠基性原则。因此，马克思说道，如果黑格尔政治哲学所拟设的普遍性可以被证明已被现代政治国家所否定和阉割，黑格尔哲学就将没有资格号称是现实世界的一种确切的、理想的表达。

黑格尔把他的体系看作哲学的神化和完结。以悖谬的方式可以说，马克思试图支持这种观点，尽管他是以一种可能会让黑格尔大为吃惊和烦扰的方式来这样做的。因为黑格尔哲学独一无二的成就使得它自身的颠覆成为可能。

一旦黑格尔通过拟设物质是精神的显现——尽管是一种低级的显现——来解决隐含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张力中的问题，西方哲学的传统二元论就得到了解决。而一旦物质的精神性实体得到认识，也就是说，一旦物质被表明无非是自我异化的精神，那么，物质就以一种比迄今为止西方哲学所熟知的任何东西都更加深远的方式被重新复原。连18世纪法国唯物论也没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从黑格尔开始，物质不再被设想为精神的绝对否定或精神的完全缺失。可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以在不止一

种意义上真正地成为哲学的顶峰。因为精神的奥秘被解开了，只有物质的运动，即物质的历史显现仍有意义。关于物理世界或物质世界的探讨，自此以后就不会像在传统唯物论中那样是对精神的否定，而恰恰是对精神的确证。在这里，以18世纪机械论传统为基础的恩格斯的唯物论，明显地不同于马克思的主流思想。

另外，对马克思而言，物质不是通过传统的唯物论流派，而是通过德国唯心论哲学的原则本身的转变性沉思获得自身的合法性的。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可以被称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一个辩证结果。这也将意味着，黑格尔思想的某些内部张力同样被带进马克思的理论中，因为用黑格尔的[7]话说：“哲学也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它自己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①

本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寻马克思的这种归因于黑格尔传统的矛盾情结。

① 黑格尔：《法哲学》（Oxford, 1942），诺克斯（T. M. Knox）译，页11。

第一章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再思考

1.1 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影响

[8] 马克思 1837 年 11 月 10 日在写给他父亲的规划性的书信中告诉我们，他在 19 岁时与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相遇是通过他与柏林大学博士俱乐部的结识而发生的。在这封袒露心扉的信中，马克思对他在柏林的学习作了综合性的阐述，试图向他的父亲解释他从法学转向哲学的理由。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在这一早期阶段就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一种用于改变现实的强大工具。他采用这种论证也许是料想到他的父亲对他改换学科可能表示的反对意见：他的父亲，自己是律师，觉得自己儿子的选择是不切实际的

和不成熟的。马克思写道，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困扰他的东西是“‘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对立”。但这时，自从他了解了黑格尔，这位年轻的学子就感到自己在现实本身中有了想法：“如果诸神直到现在都栖居在地球之上”，他告诉他的父亲，“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地球的中心”。^①

马克思与黑格尔传统相遇的这个最初证据，似乎预示着他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黑格尔的方式。这种方式既非黑格尔学说的吸引马克思的惯常结论，也非它的哲学前提 *per se* [本身]。对马克思而言，黑格尔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其哲学具备的能够成为唯心论 (*idealism*) 在现实中获得实现的关键点的显著能力，[9] 因而在于消除康德给德国哲学传统遗留下来的二元对立。结合这一点，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体系的内在批判。他认为，虽然黑格尔哲学要求搭起理性东西与现实东西之间裂隙的桥梁，但它经不起检验；二元对立虽然在哲学上得到消除，但仍潜藏在黑格尔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理论的内在矛盾中。因此，在马克思面对黑格尔哲学时，社会制度领域就成了关键。马克思这一时期的通信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体现出他对黑格尔哲学的鉴赏力的逐步发展。

1842年初，当卢格 (Arnold Ruge) 请求马克思为他即将出版的文集撰写一篇文章时，马克思答应提供一篇关于黑格尔的评论，而且补充说，他将集中于对《法哲学》的批判，因为“主要的事情是反对君主立宪制，它作为混合的产物，充满内在的矛盾，注定要自我毁灭”。在后来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回到同样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 Engels Gesamtausgabe, Berlin, 1929) 第1辑，第1卷第2部分，页218。马克思似乎记得黑格尔关于启蒙运动说的话：“直接性是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两个世界是相调和的，并且天堂被移植到在它之下的地球中”（《精神现象学》，贝利 (Baillie) 版，页598）。这种指向当前现实的强烈倾向在马克思同一年的一句格言中也是很明显的：“康德和费希特要达到超俗的高地，在那里寻求一个遥远的国度，而我只想试图理解在街上发现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辑，第1卷第2部分，页42。）

主题上来，只是为了给自己没有写出文章寻找借口。^①

马克思在作为激进的《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正式职员开始从事编辑工作时，可能被阻止撰写关于黑格尔的评论文章。但他写给卢格的第二封信间接暗示了超越当时事态的单纯影响的一些推论：就一种回顾性的评判现在能建立在批判基础之上——就像它最终被写成的那样——而言，马克思在1842年仍缺乏这样一种方法论的策略，这种策略使他能够掌握黑格尔哲学的惯常意义而无须同时摧毁黑格尔体系的整座大厦。

马克思似乎在一年以后有了自己的套路；1843年年初，卢格寄给他一份自己的文集《晚近德国哲学与传播的轶事》(*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第二卷。这一卷包括马克思撰写的一篇简短的匿名文章。这篇文章断然声明，哲学的解放除了通过费尔巴哈式的涤罪，别无他法。^② [10]这一卷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费尔巴哈自己的文章“关于哲学革新的暂时主题”(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为感谢卢格的赠书，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革新的暂时主题”作了评论：“我赞同费尔巴哈的格言，除了一点：他自己太多地指向自然，太少地指向政治。但正是政治，成为当代哲学能够变成现实的唯一连接点。”^③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兴趣，具有像他对黑格尔的最初迷恋一样的系统性质。费尔巴哈的思想允诺“实现”哲学。马克思认为，以黑格尔为前提，这种实现现在可以通过将费尔巴哈的方法运用于黑格尔政治哲学所表明的问题而加以落实。

① 马克思1842年3月5日和20日至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Berlin, 1963],第XII卷,页397,页401)。关于德国君主立宪制的颇有价值的当代论述,参见阿雷丁(J. C. v. Aretin)《君主立宪的国家法》(*Staatsrecht der constitutionellen Monarchie*)第2版(Leipzig, 1838)。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7。

③ 马克思1843年3月13日写给卢格的信(《著作集》,第27卷,页417)。

这种推论既是出于传记的考虑，也是出于思想的考虑。马克思在他写这封信给卢格六天后就离开了《莱茵报》。^① 在六年后的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前言中提到他生命中的这段时期，称他的退出是“从公共舞台向研究领域”的撤退。^② 他的确撤退到了研究领域。在1843年春天至夏天期间，他把自己关在克罗伊茨纳赫的一个小镇上，专注于研读黑格尔《法哲学》和撰写关于它的长篇而细致的评论。这一研究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普遍批判运用到政治学中。在这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转变性批判的不同运用需要对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革新的暂时主题”作一些评论。^③

费尔巴哈在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看到了一种把人从宗教固有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尝试。这是与他把宗教看作[11]是人类对幻想的上帝形象的欲求的一种投射的普遍观点相一致的；因此，上帝的特性对费尔巴哈而言就是在当前的人身上显得缺乏的人类特性。上帝是异化的人。^④

费尔巴哈认为，思辨哲学毕竟没有超越异化。“就像神学将人加以分离和异化，以便随后把他等同于那位异化出来的存在者一样，黑格尔把本来是同一体的自然和人的简单本质加以复制和

① 马克思签发的一则日期为1853年3月17日的短筒，刊登在第二天3月18日的《莱茵报》中。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oscow, 1962）第1辑，页362。

③ 对这个问题的更为详尽的研究，参见舒芬豪尔（W. Schuffenhauer）的《费尔巴哈与青年马克思》（*Feuerbach und der junge Marx*, Berlin, 1965），尤其是页36-51。也可参见卢卡奇（G. Lukács）“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发展过程”（*Zur philosophischen Entwicklung des jungen Marx*），载《德国哲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第2辑，第2期（1954年），页288及以下。

④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Leipzig, 1909），施密特（H. Schmidt）编，页7-20。

分离，以便强行地将这个起初被强行分裂开的同一体重新统一起来。”^① 对黑格尔而言，自然和人是两个独特而分离的实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看来黑格尔对人与自然的居间调和是错误的。同样，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使自身显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的陈述，通过他先前将艺术与人类对艺术的感觉分离，将宗教与人类情感分离，将哲学与人类思维进程分离的方式而成为可能。黑格尔的确承认绝对精神最终是在人类主体中得到实现的，但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把绝对精神设定为不同于现象主体的本质。另外，费尔巴哈是从作为主体的具体个体开始的，他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思想中看到的主观意识的被扭曲的自我，它作为自身的幽灵在行进。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外在于人的“人”的本质，是外在于思想活动的思想的本质。

本质与实存的这种分裂，在费尔巴哈看来成了黑格尔颠倒认识论过程的主要支撑点。他断言，黑格尔把思想假定为主词，把实存假定作为一种单纯的谓词。结果，黑格尔的主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但费尔巴哈着重地强调指出：“空间和时间是实存的方式……无时间的感觉、无时间的意志、无时间的思想都是虚无，都是怪兽（Undinge）。”^② 伴随这种唯物论立场的是对黑格尔的难点和成就的一种承认：费尔巴哈评论说，黑格尔认识到思考自身的精神必须从抽象概念中出现并被对象化。但在费尔巴哈看来，当黑格尔 [12] 把自然拟设为精神的这种对象化时，他就在抽象概念中达到了极致：自然就这样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并不表现为一种主词，而是表现为思想的一种单纯谓词。因此，具体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总是被异化，所以黑格尔克服这些二元对立

① 费尔巴哈，“关于哲学革新的暂时主题”，载《晚近德国哲学与传播的轶事》（Zürich and Winterthur, 1843），第2卷，页65。

② 费尔巴哈，“关于哲学革新的暂时主题”，页71。

的过往往是从谓词的起点开始的。

由于黑格尔的唯心论哲学对费尔巴哈而言似乎是建立在一种误导性观念之上的，费尔巴哈就断言它无法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中摆脱出来：它注定要作为一个谜团而终结。在这一点上，费尔巴哈开始形成他自己的唯物论哲学。作为对黑格尔主义的一种颠倒，他把唯心论哲学的传统主词、即思想转变为一种谓词，而把传统的谓词、即人转变为一种主词。费尔巴哈的这种转变性方法，为哲学拟设了一个以倒转黑格尔哲学为基础的崭新起点：如果起点开始于人，开始于具体的东西，人就能够从黑格尔所强加给人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只有对对象和经验的客观现实的知觉，才能使人摆脱一切偏见。这种从理想东西向现实东西的转变只有在 praxis [实践] 哲学中才会发生。”^②

费尔巴哈在他的文章“关于哲学革新的暂时主题”中建议进行这种哲学改革：他提议重读能够用谓词替代主词而且反之亦然的传统哲学，倡导通过这种使人成为哲学讨论的起点的方法进行的哲学转变。这样，人就将从他自己的精神造物所加之于他的异化力量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在政治哲学的领域实行了这种转变，用费尔巴哈的这种语言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且使之完全建立在这种转变性的方法基础之上。马克思的唯物论就是从对黑格尔的这种内在批判开始的。

① 费尔巴哈，“关于哲学革新的暂时主题”，页 71。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最后一章中沿用了同样的立场，参见马克思《早期作品集》（*Early Writings*, London, 1963），博托摩尔（T. B. Bottomore）编，页 195-219。

② 费尔巴哈：“关于哲学革新的暂时主题”，页 71。参见拜尔（W. R. Beyer），“黑格尔的实践概念”（*Hegels Begriff der Praxis*），载《德国哲学杂志》第 5 期（1958 年）；里德尔（M. Riedel），《黑格尔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im Denken Hegels*, Stuttgart, 1965）。

1.2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前提

[13]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保存在39页的手稿里,记载了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第261~313节的评论。马克思首先在探讨中复述黑格尔书中的章节,然后添加他自己的评论。无疑,这部手稿从它当时的形式看不是意在出版的:它就像是一名拔尖的学生完成一篇高难度文章的努力。手稿最初是由李阿扎诺夫在1927年出版的,甚至到现在都仍鲜为人知。它几乎没有被人翻译,在关于青年马克思的各种研究中也鲜有详尽的探讨。^① 这部《批判》可以表明,马克思后来思想的显著样态在这部著作中攻击黑格尔时就已经成形。

马克思的探讨与书写的技巧符合他的方法论:他在整体上接受黑格尔的概念和他的体系,然后使二者接受费尔巴哈的转变性批判。于是,他在同一时期为恩格斯撰写的一个评论作了这样的辩护:黑格尔的体系,是那样广博而强势,只有从内部通过那些本身就是黑格尔主义者的思想家才能加以颠覆。^② 马克思接受和使用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或“所有权”这样的概念,就像它们在黑格尔体系中出现的一样,但他把它们置于一种与国家概念的革命关系之中。结果,这个概念发生了意义

^① 参见伊波利特(J. Hyppolite),“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与马克思的批判”(La conception hégélienne de l'état et sa critique par Karl Marx),载《国际社会学学刊》(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第2辑(1947年),页142-143;巴里翁(J. Barion),《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Hegel und die marxistische Staatslehre)(Bonn, 1963)。

^② 恩格斯,“大陆社会改革的进程:II. 德国与瑞士”(The Proces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 II. Germany and Switzerland),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辑,第1卷第2部分,页446。

的重大变化。对黑格尔的所有权、市民社会、国家等概念的批判性分析使马克思走向了对黑格尔哲学前提的一种根本性批判；但正是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马克思走向了黑格尔体系的根基，而不是其他的迂回路径。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的社会—政治含义开始的，然后他才进而对整个黑格尔体系作出评论。

[14] 毕竟，这种做法是与本章前文提到的在马克思写给卢格的信中关于哲学规划的暗示相一致的。马克思首先攻击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并且是通过使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惯常结论服从费尔巴哈的转变性方法开始的。在这里，马克思一下子就超越了其他被拘囿在黑格尔体系中的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主张，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这样一种转变性批判能够轻易地揭示出如下情况，即对黑格尔而言只是表现为一个抽象概念的单纯谓词的个体、即真实的主词被实体化（hypostatized）为一种独立的、无所不包的主体。马克思试图证明，黑格尔的颠倒的出发点使得他要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理论是不可能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通过将实存性的意义归于由人类的活动和经验所组成的各个概念，黑格尔承认现象世界总是表现为躲在它背后的理念的一件外衣。现实（Wirklichkeit）总是表现得不同于它在现象中的显现。马克思在这种转变性方法中看到了能够使他破译黑格尔思想中隐藏的真理的暗码。^①

马克思是通过将这种方法运用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三个主题即君主制、主权和普遍意识开始的。他认为，黑格尔赋予经验现实以一种哲学的光环，于是本应作为一种评判现实的标准的理念（the Idea），结果成了一种单纯的理性化。这种假定的实体（hypostasis）导致一种将社会—政治状况如其所是地加以接受的寂静主义立场，任意地将历史的当下阶段提升为哲学上的一种标准。

① “黑格尔国家法批判”（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著作集》第1卷，页240-241。

对待君主的立场是一个关键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第275节，他通过指出君主制以一种理想的形式体现出如下原则，即主体性和自我决定是客观规范和国家制度的根本来源，从而来为君主制辩护。通过指出“le Roi le veut”[国王对此同意]，君主制体现了个体的自我决定，而这种自我决定在黑格尔看来体现了现代世界的政治制度化。对马克思而言，这是一种必须加以揭穿的理性化。君主的意志仅仅在形式上代表着[15]个体的自我决定的体现；它的真实内容却是一个人的独自的、任意的意志，是与共同的社会意识的普遍性相割裂的。它几乎不能成为理性的自我决定的一种范式，因为它的排他的和特殊的立场使得自身完全是任意的，就像黑格尔本人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只有普遍的东西才能是理性的，君主的意志无疑是否定普遍性的。

马克思看到，隐藏在黑格尔的套路背后和把君主意志拔高为普遍意识的做法背后的是，黑格尔所感受的特定历史状况应当被看作它真实地所是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普遍样态的发生方式。一个人应当真实地说：“在19世纪早期的历史背景中，君主的意志起最终的决定作用。”黑格尔没有作这种分析性的陈述，而是将这种陈述实体化为：“意志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君主。”^① 马克思指出，主词已经成为一个谓词，谓词已经成为一个主词，历史事实已经成为普遍有效性的一种形而上学前提。通过把被人格化的主权的各种属性归于作为一种政府原则的君主制，黑格尔从主权和政治意识中排除了政治团体的所有其他成员。于是，主权一旦被人格化为君主的意志，就成了毫无规定的任意性这顶空洞的皇冠。所有的 *raison d'état* [存在根据]、所有的政治意识，都被变成取决于一个经验性个体的任意意志。理性成了一种任意的“我希求”(I will) 这个抽象物：*L'état c'est moi* [朕即国家]。

马克思主张，如果黑格尔从现实的主体这个国家的根本原则

① “黑格尔国家法批判”，《著作集》第1卷，页200，页225-227。

出发，而不是从一种被称为“主权”的想象主体出发的话，国家被归于一个人这种做法原本是可以得到阻止的。马克思批判背后的费尔巴哈背景非常明确地贯穿在文本中：

如果黑格尔从作为国家基础的现实主体出发，就不会需要国家的这种神秘的主体化。……黑格尔把谓词、对象变成独立的存在物，但他使它们的独立性脱离了它们的现实独立性、它们的主体。后来现实主体表现为神秘主体化的一个结果，而一个人是必须从现实主体和它的对象化开始的。……

所以，主权——国家的本质——在这里首先被 [16] 设想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物，被设想为被对象化的 (*vergegenständlicht*)。不是说这种客观的方面表现为主权的自我体现，而是说主权不过是国家的各个主体的被对象化的精神。^①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的直接指向共同东西和普遍东西的国家主张以及要成为普遍意识的对象的国家要求，只有在纯粹形式的层面上才能得到实现。黑格尔不应当因确切地描述在他当时的世界所盛行的各种政治安排而受到指责，但他错在将 19 世纪的政治制度看作国家的本质 *sub specie aeternitatis* [在永恒的方面] 的潜在含义。这种体系化只有以一个谜团——这个谜团将各种经验事实呈现为躲在它们背后的一个隐藏的主词的谓词——为代价才会变成可能的。

一旦马克思在他的哲学论证中达到这一点，他对黑格尔的探讨就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它不再是一种纯粹哲学的探讨，而是变成了社会批判。因为如果说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对现代国

① 《著作集》第 1 卷，页 224 - 225。马克思在这种背景中对“subject”（主词、主体）的双重含义的娴熟运用，使他的评论更加敏锐。

家的理论辩护，那么，对它的批判必然就是对现代政治制度的一种批判。自此以后，马克思的论证总是在这两条平行的路线上进行的，但有时候要捋清针对当时国家的论证与针对黑格尔关于当时国家的辩护的普遍论证是很困难的。

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与隐含在他写给卢格的信里的批判对象是一样的：黑格尔的国家观仅仅反映的是现代君主立宪制；这样的君主立宪制本身并没有实行它自身的理论标准。它包含种种矛盾，并且除了将自身的经验性实存的合法性膨胀为一种普遍的有效性标准外，缺乏任何合法性。

既然黑格尔政治哲学给一个在根本上有缺陷的和被扭曲的现实盖上了同意的印章，黑格尔哲学就不可能无须改造现实本身而得到改造。马克思三年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论题的著名言论中持同样的观点。^①当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通过转变性的批判显露出来时，探查社会生活 [17] 条件的需要就是这些矛盾的一个直接结果。^②

1.3 国家与市民社会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它试图建构作为一种从在经验现实中创造和决定国家的社会与历史力量中抽象出来的实体国家的尝试。黑格尔是通过把市民社会描绘为各种社会力量的交锋，并且要被国家的普遍性超越来这样做的。如果能够表明市民

^① 《选集》第2卷，页405：“哲学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是要改变世界。”

^② 赫斯（Moses Hess）在大概同一时期得出非常相似的结论，但缺乏马克思的哲学严格性；参见赫斯《哲学与社会主义文集》（*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Berlin, 1961），科努（A. Cornu）和门克（W. Mönke）编，页201-216。

社会与国家的这种分裂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如果能够通过分析证明国家的客观任务不过是如此众多的特殊利益打着共同东西和普遍东西的幌子在行事，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整个巍峨大厦就将轰然倒塌。

这正是马克思着手进行的工作。他表明，黑格尔关于国家的探讨在将实存的社会组织理性化的同时，忽视了人的关系的社会背景。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国家被描述为好像无须同时涉及各个其角色由国家加以组织的个体，就可以得到探讨。结果，个体在黑格尔哲学中仅仅在国家的建构已被完成和完善以后才出现，好像“国家”与“个体”可以分开加以探讨似的。马克思指出，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被迫在国家与个体之间进行调解以便弥合两者之间的裂隙；但这种调解在马克思看来就像最初的裂隙一样，既是错误的，又是多余的。马克思断言，个体不能从概念上脱离他的社会背景：任何关于个体的有意义的句子无疑都必须同时关涉他的环境，个体的原子模式在哲学上是靠不住的。^①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在个体中仅仅看到个体的物理特征，“他的胡须 [18] 和血液”，却忽视了个体本身的社会含义。因此，政治国家正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一种生存方式。马克思以黑格尔以前反对自然法的同样类型的批判来攻击黑格尔。^②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对政治生活结构的阐述揭示出的所有紧张关系都来自于人与他的社会本质的这种分裂；马克思认为，这种理论前提产生了一种被划分为私人领域和普遍领域的人：私人领域主要包括经济活动，而在普遍领域中人应当克服他的自私自利，追求公共之善。于是在马克思的话语中，黑格尔将作为“唯物论”领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唯心论”或“灵魂论”对立起来。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是生活分化为这两个领

①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式的批判源自于同样的哲学前提；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oscow, 日期不详），页33-46。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22。

域的结果。^① 19世纪的君主立宪制以及黑格尔对它的颂扬，就是试图通过政治代议制——这种代议制在普遍的政治结构内寻求私人利益的合法化——来弥合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裂隙。但马克思主张，有局限性的代表会议（或政治团体、Stände [阶层]，就像它们在当时的德意志仍被称呼的那样）是自相矛盾的：在一个代表团体中集会的市民社会的代表，仅仅因为他们是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而不是因为他们将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合法化才享有他们的地位。阶层似乎代表的是人口数，但由于代表们并不被强制命令所束缚，绝不附属于他们的投票者，所以他们完全从他们应当代表的人那里异化出来。投票者的特殊利益和阶层的政治地位是各不相同的。推选代表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普遍利益，但相反，他们实际上逐渐变成他们的特殊利益的无耻代言人，特殊东西与普遍东西之间的调解从未真正发生。^②

[19] 于是，物质生活条件与政治领域处于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黑格尔的理论表明物质生活条件是外在于政治结构的，而马克思指出，它们实际上贯穿政治领域的每个角落和缝隙之中。政治制度，尽管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主张，却仅仅掩盖了市民社会的特殊的、利己的利益。正是普鲁士与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差别，尽管在两个社会有几乎同样的财产法，帮助马克思证明有多少假象可以被用于掩藏政治权力的经济现实状况。^③

如果黑格尔将这样的任务，即把普遍东西的观念运用到实

① 参见《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载《早期作品集》，页15-31。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67-268。就马克思后期关于议会制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具有不同的语言措辞，却是明显相似的——而言，参见《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载《选集》第1卷，页516-522。关于19世纪早期德意志思想中的代议制原则，参见康策(W. Conze)《德意志三月革命前的国家与社会》(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deutschen Vormärz, Stuttgart, 1962)，页207-269。

③ 《著作集》第1卷，页273。关于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这种不一致的看法，参见《哥达纲领批判》(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入《选集》第2卷，页32。

践中去，分摊给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不过是一具空壳，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过着物质生活的经院哲学”，那么，政府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别就失去了自身的重要性。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差别只会模糊它们的共同根据，也就是说，两种政府形式都无法克服普遍东西与特殊东西的异化：“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最完全的体现，共和制是在其自身范围内对这种异化的否定。”^①于是，共和主义仅仅强调的是各种经济利益与共同福利之间的裂隙。

马克思在他论证的这一阶段，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里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变动关系。他的论述在基本的概念假设以及划分阶段的标准方面源自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②但马克思将重点从概念的发展转移到社会—政治组织的具体领域，于是用一种社会发展研究取代了黑格尔对各种形式的意识的考察。

黑格尔把古希腊—罗马世界看作是一种毫无区分的实体生活 (substantiality)，而马克思把古典城邦描述为缺乏对社会东西与政治东西的区分。在这里，市民社会是 [20] 全然被纳入国家的；没有任何政治结构本身是与现实的、物质的社会，与人类生活的现实内容相分离和区分的。当政治国家仅仅是社会—经济生活、物质性国家的一种形式时，*re publica* [国家] 就意味着公共生活是个体生活的真实内容。因此，任何私人生活缺乏政治地位的人都是奴隶：政治的不自由意味着社会奴役。政治的东西贯穿所有的私人领域，社会与国家之间、私人自我与公共自我之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33。

② 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霍夫迈斯特 (J. Hoffmeister) 编 (Hamburg, 1955)，页242-257。

间、个体领域与共同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①

另外，中世纪提供了这种关系的反面：在这里，私人领域、市民社会要求政治地位。财产、商业、社会关系与社会分层，甚至私人，都变成政治性的。马克思说，在封建时代财产权之所以是至高无上的，仅仅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分配是一种政治安排。只有在中世纪，政治才是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自动反映；所有其他的政治体制都见证了两个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政治东西与社会东西的这种整合也出现在语言的使用中：术语“stände”既指社会分层，也指政治组织。

马克思对中世纪欧洲的描述反映了在当时德国盛行的一些浪漫主义思想：他觉得中世纪产生了一种合而为一的生活方式，在其中“人们的生活与国家的生活是等同的”；但他补充说，这是因为中世纪的人是一种全然不自由的个体。如果中世纪是一种“民主制”，“它就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制”。^②

马克思继续说道，在现代，市民社会和国家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和有区别的，于是异化的意识被形式化和制度化：在早期仅仅潜存的东西在现时代变成明显的。市民社会彻底地从政治局限中解放出来；私人生活，包括经济活动，变得完全独立于任何[21]与共同体相关的考虑；所有关于财产和经济活动的政治限制都被废除。经济的个体主义和放任自流体现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这种二分，同时人类社会如今也完全意识到自身的异化，意识到人类生活被划分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经济生活变成目的本身，这既是人的对自身存在的普遍内容的异化的证明，也是这种异化的条件。

马克思从这种历史的论述中得出两点结论：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34。比较这种城邦观点与黑格尔在其早期著作中对城邦的描述是颇有趣味的；参见：《黑格尔青年时期的神学著作》（*Hegels theologische Jugendschriften*），诺尔（H. Nohl）编（Tübingen, 1907），页219—229。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75—276。

(1) 原则上由黑格尔阐明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是一种发生在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这种分裂的原因可以很容易分析得出，并且必然是短暂的。

(2) 然而，由于黑格尔没有注意到这些历史因素，所以他就没有意识到中世纪的理想的、合而为一的统一在现代已经消失，并被个人的私人地位与政治领域的对立所取代。他没有注意到这种历史变化，仍通过恢复阶层来努力重新创造这种统一，这种策略是注定要失败的。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自动地影响他的政治身份，至少这是 1789 年以后的社会理论；国家对私人领域的侵犯被认为是对现代国家观的否定。因此，在一种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统一的情形中寻求各个阶层的调解是过时的做法。19 世纪的疾病并不能用 15 世纪的处方加以治愈。^①

于是，马克思表明，将政治性团体变成非政治性阶层的重点的转移发生在绝对主义（absolutism）年代，那时传统的团体被剥夺它们的政治性权力和含义，成了单纯的社会阶层。这个过程是由在政治领域彻底废除社会分层的正式意义的法国革命完成的。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现代国家的诞生是与异化的极端化同时发生的。阶层差别现在已经变得极不固定，界定 [22] 阶层的原则是完全任意的，即金钱和教育的获得。^②

当马克思在他给卢格的信中将现代立宪制国家称作一种“混合体”（hybrid）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解决理论的问题；这一表述指的是黑格尔试图使用中世纪阶层的设计来克服一个社会的恰恰源于阶层本身的败坏而造成的内在矛盾的解决办法。

① 《著作集》第 1 卷，页 283 - 285。

② 《著作集》第 1 卷，页 276。

1.4 阶级结构与现代社会

从马克思的结论，即现代国家就像黑格尔所设想的那样是对政治领域与现实社会领域的异化的神化，可以得出一些关于现代社会的洞见。如果说现代国家表现了形式东西与内容东西之间，作为个体主义的抽象概念的人与作为 *zoon politikon* [政治动物] 的人之间的极端分离，那么黑格尔试图重新结合和调和的意愿仅仅使得这种不一致更加尖锐。

于是，例如在《法哲学》第302节，黑格尔提出，阶层体现的既是国家的意识，也是特殊社会阶层的意识。在黑格尔看来，阶层似乎要在市民社会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与国家的普遍性之间实现一种综合。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绝不会实现这种调解，因为没有经验内容可以更多地以一种抽象的意义上克服这些对立关系。困难在于，黑格尔想要使现代的社会阶级行使中世纪政治团体所特有的职能。而且，他想要颠倒因果关系：如果说中世纪政治团体的私人性质决定了它们的公共的政治地位，那么现在，黑格尔想要用公共的政治领域决定一个人的私人身份。^① 既然如此，等级会议所代表的这种存在、即市民社会就给各种特殊利益提供了一种具有虚假的和误导性的政治普遍性的合法性。因此，黑格尔的国家就不过是市民社会的利益的一种合理化。市民社会的制度仅仅具有一种形式的现实性，它们掩盖了一种充满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的状况。

[23] 马克思注意到如下的显著悖论，即现代国家本身意识到政治团体会议的不可解决的冲突：任何试图赋予代表会议以真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95。

正政治权力的尝试都会造成政府与统治者之间的持续紧张。结果，政府总是小心翼翼地剥夺掉代表会议的任何真正的决定权。针对各种矛盾提出的解决办法表明是一种羞耻和恶作剧，黑格尔必须承认他将之当作现代社会的前提的主观自由纯粹是形式上的。作为一种试验，以矛盾的解决方案开始的东西，通过政治国家的作用而以个体的完全统治地位告终，而政治国家绝不可能从它的市民社会背景中分离出来：“阶层因素是市民社会的政治假象。”^①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黑格尔对待官僚阶级的立场中无法解决矛盾和由此导致的适得其反是显然的。黑格尔认为官僚阶级是普遍的阶级（《法哲学》第205节）。一方面它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它的事务旨在获得普遍利益，并且以普遍利益为动机。总之，官僚阶级是特殊东西与普遍东西之间、亦即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达成调解的范式。然而，马克思主张官僚阶级仅仅利用共同福利之名进一步攫取它自身的利益。官僚阶级表现出现代政治生活的普遍性在现实中的假象，据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意义上将它称为“神学的”。根据他的观点，现代官僚阶级是为阶层利益颁发的一张制度性许可证。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论述意味着官僚阶级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利用委托给它的共同体事务；国家事务变成了私人的世袭产业，向局外人呈现为一个谜团。官僚阶级表面上为社会的普遍福利做贡献的理想主义，只不过是一张掩盖它自身粗俗的物质主义目的的面具。马克思对官僚阶级的评论无疑是对现代官僚阶级的各种问题作出的最早理论质疑之一：

官僚阶级负责国家事务和社会的精神存在，它将它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加以占有。官僚阶级的普遍精神 [24]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65。

是官方秘密、神秘东西。……所以，公开地从事国家事务，甚至政治意识，对官僚阶级来说都表现为对它的神秘性的高度背叛。因此，权威是官僚阶级的知识原则，极权主义的神化是它的信条。但在它自身内，这种灵魂论变成一种粗俗的物质论，沉默服从的物质论。……只要涉及个体的官僚，国家目标就成为他的私人目标：升迁和发迹。……因此，官僚阶级不得不尽可能使生活变成物质主义的。……于是官僚就必须总是以一种虚伪的方式对待真实的国家，不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官僚把世界看作一个由他掌管的单纯对象。^①

通过把自己从手段颠倒为目的，官僚阶级就虚构出一种想象的国家，并借助现实的国家逐步表现为政治团体作出完美的官僚主义奉献的吐火女妖（chimera）：“官僚阶级是根据现实国家得出的虚假国家，它是国家的灵魂论。因此，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双重的意义：现实的意义和官僚主义的意义。”^② 由于官僚主义将现代国家——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在那里任何事物看起来都不同于它们的真实特性——颠倒的性质制度化，它就只有在国家变成真正的利益，而不是表面的普遍利益时才能被废除。在当前的状况下，“官僚阶级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国家利益与特殊的私人目标等同起来，即把国家利益变成与一种其他私人目标相反的特殊的私人目标”。^③ 于是，国家被降格为一种与其他同类人共有的私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49-250。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49；参见阿克塞罗斯（K. Axelos）：《马克思：思想家的技艺》（*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Paris, 1961），页97-101。

③ 《著作集》第1卷，页250。应当记住，虽然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把官僚阶级当作“普遍阶级”的描述，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术语本身在分析上的用途。马克思第一次在《德法年鉴》（*Deutsch - 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中提到无产阶级时，就指出无产阶级具有普遍阶级的属性。因此，黑格尔的术语决定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最初兴趣。参见《早期作品集》，页55-59。

人利益，它对普遍性的要求被剥夺了正当资格。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的社会阶级观发生了激烈的转向。由于《批判》在整体上仍是一个粗糙的手稿，所以在马克思将这个主题的各种观点具体化的过程中，按照不同的阶段进行是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根据黑格尔的观点，阶层 [25] 意在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进行调解；实际上，他却使个人的私人立场来决定他的政治地位。甚至 Stand [阶层] 这个术语的词源学背景，在社会—经济含义与政治含义重叠时，也强调经济考虑对政治领域的决定作用。阶级区分对马克思而言成为在政治团体形成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尽管黑格尔认为财产关系在面对政治领域时应当保持中立。^①

当一个人的私人地位在现代社会中被他的财产关系决定时，这些财产关系就不再像法国革命和黑格尔的前提所主张的本来应当是的那样是私人的了。私有财产领域，即市民社会现在决定政治，政治成了财产关系的一种理性化：“因此，私人地位可以在政治领域仅仅表现为市民社会的阶级差别。市民社会的阶级差别又变成政治差别。”^②

通过这些考虑，马克思在财产安排和政治结构之间寻求连接点，他的观点的黑格尔背景可以在他关于这个主题的后期作品中找到。马克思其实从未说过国家本身反映的是财产关系：他的观点是，国家表现为普遍利益的要求这一点可能被表明是阶级利益的一种掩饰。不是现实存在的国家，而是黑格尔式的渴望成为的国家——以普遍东西和共同东西为取向——是市民社会的一面扭曲的镜子。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政治理论的核心绝不是它看起来所是的东西。

鉴于阶级差别对政治结构的这种决定作用，马克思在面临市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74。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75。

民社会所空缺的社会阶级时就遇到了困境。根据《法哲学》第243节，马克思把这种阶级称为“处于工作的直接需要中的阶级”，但他超出了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关于阶级说过的东西。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已经明确预先考虑到他的格言，即无产阶级是“一个在市民社会中却不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阶级的阶级”^①，当他说：[26]“具有特色的事情仅仅是这样的事情：财产的缺乏和处于劳动的直接需要中的阶级，即具体劳动的阶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的阶级，不如说是市民社会依赖和得到推动的基础。”^②

这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劳动的阶级”并不只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空缺现象。它的存在是市民社会本身得以运转的条件；因此，对现代社会的理解预设了一种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这里，在1843年，马克思终生事业的核心已然清晰可见。

于是，圆圈完成了：既然黑格尔学说忽视人的主体，它最终就必定达到一种将人的主体组成的整个阶层都从中排除出去的制度化。相应地，现代国家要被归为脱离自己社会背景的私人个体就不过是自然的事情。经验的人在现实社会的各种矛盾要求与政治理想主义的主张之间被撕成碎片：

市民社会与国家彼此被割裂开来。国家的公民与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是分离的。人不得不与他自身造成一种本质的分裂。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位现实成员，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双重的组织中：官僚组织（即所谓国家、政府这种外部的、形

① 《早期作品集》，页58。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84。将这种表述与黑格尔在《法哲学》第243~245节中所运用的自己的语言加以比较是很有趣的。马克思仍使用传统的术语 Stand 指代“具体劳动的阶级”，而黑格尔几乎在25年前就用现代术语“Klasse”指称这个阶级。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似乎在于黑格尔对如下事实的承认，即在他自己的学说范围内，用“Stand”指称一个在社会上没有制度性地位的阶级缺乏逻辑连贯性。马克思在设法解析整个黑格尔的阶层理论时，欣喜若狂而没有指明这一点。

式上的决定因素，这种因素不对他和他的独立现实造成冲击) 和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组织。但在后者中，他作为一个私人是被拒于国家之外的；作为这样的组织，它并不冲击政治国家。……为了作为一个现实的公民事行，获得政治意义与现实，他必须走出市民社会，摆脱他的自我，从整个组织中退出而进入他的个体性。……他的作为一位公民的实存是居于他的共同实存之外的，因而是纯粹个体性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裂隙必然表现为政治的人即公民与市民社会，即与他现实的、经验的 [27] 现实之间的裂隙，因为他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唯心论者 (Staatsidealist)，完全是与他的外在的、有区别的和相反的现实相分离的。^①

马克思指出，如果情况是这样，现代社会就不会根据人们的内在属性，而是根据他们与社会阶级的外在关联来看待他们。因此，人被当作“地主”“工人”等，而不是被当作只是碰巧拥有土地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且，谓词成了主词：“人 [在现代社会] 不是一个主词，而是被等同于他的谓词，即阶级。……批判态度的这种缺乏、这种迷惑是现代宪法的谜团……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也是如此。”^②

马克思就这样纯粹通过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一种费尔巴哈式的转变性批判来进行社会阶级和财产的探讨。

1.5 财 产

马克思继续用费尔巴哈的方法表明，财产本身赋予人的主体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81。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86-287。

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财产在黑格尔手中从意志的对象被转变为意志的主人。说一个人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实际上是说人成了他的财产的一个谓词。换言之，马克思关于财产的最初探讨是借鉴费尔巴哈的方法进行的。

由于马克思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如果说不是以烦人和迂腐的方式的话——得出这个结论的，可能会有人认为他将极其微小的事件夸张到荒谬的程度。尽管如此，他把转变性的方法运用于财产仍是出类拔萃的，从概念上得出的结果也非常有趣。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三节（第 305 ~ 307 节）讨论了约 40 页，这可以给论证的性质和范围提供一些说明。

在这三节，黑格尔讨论了拥有限定继承的地产（entailed estate）的土地新贵的立场。在普鲁士，像在英国一样，长子继承权 [28] 一旦被运用到新贵的土地财产（majoratsherrlicher Grundbesitz）中，就保证了家庭地产 in toto [全部] 被从父亲传给长子；长子既继承头衔，也继承全部的地产，所有其他的子女都被排除在与土地财产相关的继承之外。这种安排通过不使贵族和新贵们的地产实际上以买卖的方式进行转让，就防止了贵族地产的瓦解并确保它们不会受损。

黑格尔不仅非常赞同这种安排，而且把这看作是新贵的高尚伦理行为的一种表现和一种保障。他主张，限定继承的地产不是将贵族的财产归于任意的个体，而是归于家庭。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家庭就是真正伦理生活的储藏库；因而任何使其财产依附于家庭的社会团体，都把市民社会对自身成员造成的任意影响最小化了。占有了那种既不可能受到国家干涉，也不可能受到不可预料的市场波动的实质影响的财产，贵族就非常适合从事文职机关和政治领导的职务。在黑格尔看来，可以期待这个团体的成员比任何其他社会部门的成员都更能摆脱在自己作为共同体的公仆履职时掺杂利己之心的恶习。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偏爱那种摆脱了诸如市民社会和国家之类

的压力的财产是与他早期关于财产的界定相矛盾的，从而来攻击这种观点。黑格尔表明，通过保护贵族地产不处于国家权力和社会需要的依附地位，纯粹的财产概念，就像他在限定继承的地产中所主张的，是与社会背景相隔离的。虽然黑格尔最初把财产界定为一种由它的所有者自由地加以处置的对象，但现在他似乎又说财产是完全与个人意志相割裂的。^①

更有甚者，限定继承的地产的这种与社会组织的隔绝产生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黑格尔的国家最初被表现为一种调解各种特殊利益的普遍性；现在，最适合统治国家的阶级似乎 [29] 占有这样一种财产，“这种财产的社会之髓已被砍断和撕裂，它与市民社会变得完全隔绝”。^② 于是，要求贵族身份的伦理内容就受到了攻击。黑格尔说贵族对家庭的必然依赖使得贵族的生活更有伦理，马克思却指出，就贵族地产而言事实恰恰相反。最终，限定继承的地产使家庭团结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任何子女（除了长子）都分不到丁点儿地产。在第 157 节，黑格尔把家庭设想为“伦理精神的天然而直接的阶段”，现在他却剥夺了这种团结的任何现实意义：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 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阶级 [即贵族] 缺乏家庭生活的基础——作为现实的、积极的和决定性的原则的爱。这是没有精神的家庭生活，是家庭生活的假象。在它发展的最高形式中，私有财产原则是与家庭原则相矛盾的。……可见，这就是私有财产、土地财产的至高无上的庄严与优越性，在现代有人对它发出许许多多的伤感叹息，为它流过许许多多五彩斑斓的鳄鱼眼泪。^③

① 《著作集》第 1 卷，页 303。

② 《著作集》第 1 卷，页 303。

③ 《著作集》第 1 卷，页 303 - 304；参见《经济学—哲学手稿》，入《早期作品集》，页 114 - 115。

通过将黑格尔在《法哲学》第 65 ~ 66 节关于私有财产可以由它的所有者转让和自由处置的界定与他后来的评论作对比，马克思表明这些陈述是不一致的。限定继承的财产决定自我意识和人格的本质。如果财产是不可转让的，人的所有其他财产（例如人格、自我意识、伦理生活和宗教）就都变成可转让的：“财产的非让渡性等于自由意志和伦理的可让渡性。”^①

马克思也从私法与公法的关系角度思考黑格尔的限定继承的财产思想。在第 71 节，在私法的背景下，黑格尔用财产的可让渡性及其对社会意志和共同意志的依赖性来界定财产。这一界定隐含的意思是国家可以调节财产并制定与财产相关的法律。然而，一旦进入公法领域 [30]，黑格尔就不能再维护财产的这种“真正的唯心论”了。通过规定哪怕财产的所有者也不可从事转让，限定继承的财产就变成绝对的，财产变成一种真正的主体。财产实际上根本不再是财产了：财产的所有者本身被转变成财产的财产。马克思将在《资本论》中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的东西，在这里第一次表现出来，尽管这里还缺乏后来的分析性的经济和历史背景。^②

马克思认为，限定继承的地产不再是人所制定的一种合法的专有制度。人本身成了财产的一个对象，因为限定继承的地产的绝对性将财产转变成一种独立的主词，而将人降格为财产的谓词。马克思又恢复了整个《批判》的主题，恢复了费尔巴哈的转变性方法：

我们已经指出，土地财产的社会神经是如何由于它的不可转让而被砍断的。通过使整个任意意志的领域从一种普遍的人变成私有财产的一个具体的任意意志，私有财产（土地

① 《著作集》第 1 卷，页 305。

② 马克思：《资本论》（Moscow，日期不详）第 1 卷，页 71 - 83。

财产) 被免于所有者自己的任意意志; 私有财产成了意志的主词, 而意志成了私有财产的一个单纯谓词。私有财产不再是一个由意志决定的主词: 意志是由私有财产决定的谓词。……

任何长子都是不可转让的土地财产的遗产、财产, 都是它的意志和活动的预定物质。主词是物, 谓词是人。意志成了财产的财产。……限定继承的地产的所有者成了土地财产的农奴。……日耳曼的主观性的深邃在任何地方都表现为无精神的客观性的粗俗。^①

马克思需要这种复杂的推理来表明财产已经成了人的主人。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通过一种纯粹的哲学论证, 而没有参考社会批评或经济分析, 这种极端的结论揭示出黑格尔的整个政治结构。限定继承的地产的作用对黑格尔而言本来应当是一个将政治从市民社会和财产的主张中分离出来的可能性范例, *per contra* [相反], 这个避难所却证明了人相对于隔绝一切社会关系的财产的从属地位。黑格尔想要将其表明为一种起决定性因素的东西, [31] 却表现成了被决定的, 反之亦然。国家甚至不是处于财产所有者的支配之下,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自己财产的奴隶。*Maxima libertas, maxima servitude* [最大的自由即最大的奴役]。

于是, 国家是自我决定的假象, 是必须加以破译的神秘东西。^② 因此, 国家和财产不容置疑地被表明是彼此紧密相扣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远不是免于财产和市民社会的要求与压力而受到保护, 国家反映的是财产关系和阶级差别, 只不过是以一种扭曲、变形和虚假的方式。国家要求忽视这些权力的主张仅仅使得现实晦暗不明:

① 《著作集》第1卷, 页305, 页311。

② 《著作集》第1卷, 页304。

私有财产的重要性在政治国家是本质的东西，是真正的重要性。……政治国家是具体国家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真正反映。国家在其极致之处变成一种私有财产。……黑格尔不是使私有财产变成公民权的一种特性，而是使公民权变成财产具有的一种特性。^①

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国家中看到物质现实的一种理性化，如果用他后来的语言表述，就是看到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如果坚持他在《批判》中的说法，这种国家就是现实生活的“唯物论”的“唯心论”或“唯灵论”。黑格尔在面临这样的事实，即一个人——作为另一个人的长子——的自然而偶然的出生使得他有资格合法地担任政治事务时，就达到了这种矛盾的极致。^②黑格尔没能使自己摆脱这种矛盾，他所做的每一种用自由精神的实现为国家奠定基础的尝试都是以将国家归结为偶发事件而告终的。国家是并且始终是一种颠倒的现实、一种神秘东西。

1.6 无阶级的社会：“真正的民主制”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思想的裁定也构成他对现代国家的历史经验总结。探究马克思是否有比现存安排更好的积极选择，肯定是当然之事。像《批判》这样的批判性论文几乎无法系统地[32]展示一种积极的解决之道，但马克思的确对未来图景作了探讨的少数几个事例，揭示了他的思想方向。马克思的论述的辩

① 《著作集》第1卷，页312-316。

② 《著作集》第1卷，页310。

证法也表明，批判性的称颂极容易变成一种建构性的前提。既然黑格尔的现代国家已被界定为一种颠倒的现实，现实就必须通过转变性方法再次加以颠倒：人必须重新被变成一个主词。^①

在马克思同一时期的一篇草稿概要中，他表明了自己所想的的东西。当他 1843 年 7 月待在克洛伊茨纳赫期间为《批判》收集材料时，他总结了兰克（Leopold Ranke）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他评价说，黑格尔将谓词变成主词的方式也是复辟派历史学家的一个普遍特征，他们必须总是把偶然的历史事件抬高为最终现实的一个标准：

黑格尔将国家理念的各个环节变成一个主词并将旧的政治安排变成一个谓词，而在历史现实中事情总是背道而驰：国家理念始终是这些政治安排的一个谓词。因此，黑格尔表达的只是那个时期的普遍政治情形、它的政治目的论。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同样如此。于是，所有非理性的形式都成了理性的形式……这种形而上学是把反动东西、旧世界当作新世界观的真理的形而上学体现。^②

因此，将转变性批判运用于一种具体的历史现象中就赋予这种批判以直接的现实性。这样一种运用能够使费尔巴哈的哲学拟设在历史的范围内变成现实。当马克思说：“可以一般地指出，主词变成一个谓词和谓词变成一个主词，决定性的东西与被决定的东西的颠倒，总是预示着下一场革命”^③ 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

因此，使马克思能够批判黑格尔的方法 *ipso facto* [事实上] 是革命的方法，革命的社会意义准确地讲在于这样的事实，即社

① 《著作集》第 1 卷，页 28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辑，第 1 卷第 1 部分，页 lxxiv - lxxv。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辑，第 1 卷第 1 部分，页 lxxiv。

会意识模式的转变造成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本质的变化。被压抑的主词一旦被降格到单纯谓词的地位，就想重新成为主词或主体，成为一个自由的人。〔33〕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旦被颠倒过来，就提供了改变世界的钥匙。这种变化唯有通过一场革命才能得到实行，这场革命将从意识领域开始，也就是说，始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但将直接指向社会世界。这种转变性革命的社会内容在于这样的前提，即人的社会不是一种给定的材料，而是人的效用的一种结果。由于社会是一个主词，所以它要求人的主词的活动；以前处于必然王国的东西，将成为自由领地。这场革命设想人与他的社会活动是同一个东西。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被解放的社会是与被解放的自我等同的。这种自我被马克思称为“人的共产主义存在者”（das kommunistische Wesen des Menschen）或“社会化的人”。^①

马克思的逻辑学、人类学和政治社会学在这里合流。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存在者”既是衡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个标准，也是未来社会的一个范式。在他看来，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市民社会侵犯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人。个体主义在这种意义上隐含着作为实体的人的一种方式，即他的社会关系仅仅是达到他自己私人目的的手段；它把个体的实存看作人的至高目的，把社会与个体当作某种外在的和形式的东西加以并列：“结果，当代市民社会就是业已实现的个体主义原则；个体的实存是最终目标：活动、工作、内容等都仅仅是手段。”^② 这样一种社会，鉴于其性质，不可能形成人的一种社会化模式。

马克思把将要克服这种“原子化”^③ 的社会称为“民主制”，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83，页231。这两个术语都可以追溯到费尔巴哈，但他没有将它们放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参见费尔巴哈：《哲学小集》（*Klein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Leipzig 1950），页169，页196。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85。

③ 《著作集》第1卷，页283。

有时候称为“真正的民主制”，他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使人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马克思在1843年写作《批判》期间是一个极端的雅各宾民主派。^① 根据 [34] 这种说法，马克思的政治方案在那个时候是民主制的，只有到了后来共产主义才在他的著作中出现。

对马克思在《批判》中关于“真正的民主制”的性质实际所说的东西的详尽考察，使得上述看法的维持变得非常困难。可以明确表明的是，马克思称之为“民主制”的东西在根本上与他后来称作“人的共产主义存在者”的东西并无不同，而且无论如何，这种“民主制”都是以“人的共产主义存在者”为基础的。也可以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决定性转变不是从激进的民主制到共产主义，而是从唯心论到唯物论。马克思从对黑格尔体系的接受转向了对它的内在批判，因为费尔巴哈的方法必然引领马克思指向社会批判。《批判》包含的丰富内容表明马克思在1843年设想了一个以私有财产的废除和国家的消亡为基础的社会。简言之，《共产党宣言》是内在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

“真正的民主制”对马克思而言是个体在其中不再与社会并驾齐驱的社会状态。他首次在这一背景下使用“共产主义团体”（communist essence）这一术语：市民社会被自身的政治行为所驱向的原子化状态必然由这样的事实导致，即个体生存于其中的共同体（Gemeinwesen）、共产主义团体、市民社会正在被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或者说，因为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单纯抽象物。^②

① 参见利希特海姆：《马克思主义》（*Marxism*）（London, 1961），第2部分；刘易斯（J. Lewis）：《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Karl Marx*, London, 1965），页31及以下诸页；拉平（N. Lapine）：La première critique approfondie de la philosophie de Hegel par Marx，载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Cahier 第19期。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83。

当马克思在这一背景下使用德语词汇“Gemeinwesen”来揭示人的普遍本性时，就不会漏掉该词被赋予的诸多含义。而且，他的原稿也表明，他最初用的是“Kommune”，后来才删去该词而用“Gemeinwesen”替代。^①“Gemeinwesen”既是指“res publica”的双重意义上的共同体（commonwealth），也是指狭义上的共和国（republic）以及人的[35]共同的、普遍的本性和“公社”（commune）。这个词既可以在政治团体的层面，也可以在个体的层面加以陈述，它本身就强烈地表明马克思关于一个业已克服公共东西与私人东西的二元对立的得到整合的人类的观念。马克思相信人与社会不应当对立地加以感知，所以他选择了恰当的词汇指称这种信念。

马克思关于“真正的民主制”的哲学立场，在他将其设立为人与政治结构之间没有任何异化的社会状态时变得很明显。结果，他就将“民主制”描述为一切形式的政府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中形式和内容是同一的。他的语境使这样的情形变得很明确，即任何激进的、惯常的民主制观念都将不足以表达他所赋予“真正的民主制”的含义：

黑格尔开始于国家，把人转变为一种被主观化的国家（versubjektivierter Staat）；民主制开始于人，把国家转变为被客观化的人（verobjektivierter Mensch）。正如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宪法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宪法。在某个方面，就像基督教涉及的是所有其他形式的宗教一样，民主制涉及的是所有其他的宪法。基督教是

^① 关于词语的使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辑，第1卷第1部分，页496。马克思似乎在同一个句子中偏爱用德语词汇“Gemein-wesen”重复罗曼语“Kommune”。可将这与恩格斯1875年给倍倍尔（Bebel）的建议加以比较：“因此，我们应该建议在任何地方都用‘Gemeinwesen’，这个能够很好地代表法语词‘commune’的极好的古德语词，代替‘state’”（《选集》第2卷，页42）。

par excellence [最卓越的] 宗教，作为一种分离的宗教，宗教的本质就是成了上帝的人。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宪法，民主制也构成一切形式的政治宪法的本质，社会化的人（das sozialisierten Menschen）的本质。就像种属涉及的是它的种类一样，民主制涉及的是一切其他的政治宪法。……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则也是与内容的原则相同一的。所以，民主制是普遍东西与特殊东西的真正统一。^①

费尔巴哈在作为宗教的一种范式的基督教与作为政治宪法的一种范式的民主制之间所作的类比，对整个论证是关键性的。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如果说基督教借助它的历史显现消除了对宗教的需要，因而是自我毁灭的，那么，民主制就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造成了如下问题：是否民主制并不同时是政治宪法、[36] 即国家的顶峰和扬弃（Aufhebung）。在方法论上，这是马克思在基督教与民主制之间作出的辩证类比的结果；他也明确陈述了这一点：

例如，在君主制中，[或] 在作为一种单纯政治宪法的共和制中，政治的人在非政治的人之外仍具有一种单独的实存，即私人个体。财产、契约、婚姻、市民社会在这里表现为……政治国家之外各种单独的实存方式，表现为政治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所涉及的内容；这才真正是一种决定性的、限定性的、推论性的存在，时而说‘是’时而说‘否’，没有它自己的任何内容。在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在紧接着这个内容确立自身并使自身与它区分开时，就既是一种特殊的内容，也是民族的一种特殊生存方式。在君主制中，政治宪法这个单独的实体具有普遍东西的意义，控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31。

制和决定所有其他单独的要素。在民主制中，国家作为一个单独的要素完全只是普遍东西，这是真正的普遍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一种汇集其他内容的被决定的东西。现代法国曾这样设想民主制，即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会消亡。^①

不仅国家会消亡，作为一个汇集各种私人利益的领域的市民社会也会消亡。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普选制造成的，这种普选制将政治从它对财产和市民社会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市民社会一旦被抽空它的政治含义，事实上就不再存在：

投票是现实的市民社会与具有立法权的市民社会、与代议制的现实关系。换言之，投票是直接的、直率的东西，不仅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想象关系，而且是积极关系。并不是说，投票权就是现实市民社会的主要政治利益。在普选制中，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市民社会其实都已第一次将自己上升到自己的一种抽象物，上升到政治存在，作为它的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但这种抽象物的完善同时也是这种抽象物的扬弃。市民社会通过把它的政治存在设定为它的真正存在，也已表明它的市民性的、非政治性的存在是非本质的。……因此，在抽象的政治国家内，选举权的改革是 [37] 扬弃政治国家，也是扬弃市民社会的一项要求。^②

这一分析只有在黑格尔对术语 *Aufhebung* [扬弃] 的具体使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30-231。

② 《著作集》第1卷，页326-327。在1845年，马克思概述了一本他大概想写的关于现代国家的书。最后一章被称为“普选制：为扬弃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著作集》第3卷，页537）。

用中才有意义。在方法论上，既然 *Aufhebung* 意味着取消、超越和保留，它就是辩证体系的焦点。市民社会在一种双重意义上被扬弃：它被取消和超越，但它的内容同时又在它被提高到的更高层面上得到保留。国家亦然。国家的扬弃对马克思来说以前始终是指一旦国家的普遍性质得到实行，国家作为一个单独的组织就成了多余的。于是，马克思的普选制要求并不是从一种民主制或共和制的激进主义论证得来的。如上所述，他并没有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看出任何根本的差别。对他而言，普选制的要求是一种辩证的武器，注定要造成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同时消除，这正是因为它以极端的方式维护了这两者。承认普选制的国家行为将是国家作为国家的最后行为。

因此，黑格尔关于国家的普遍性拟设在他政治哲学的一种系统转变——可以说是扬弃——内得到实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黑格尔的社会中阶级处于人与社会团体的普遍性之间；如果是这样，人必须把自己从阶级中解放出来以在政治上作为一种共同体实现自己。黑格尔认为，官僚阶级作为一个普遍的阶级必将实现这种局面；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普遍性只有在它适用于全体、而不是一个特殊阶级时才有意义。^① 对他而言，一个阶级除非是每个人的阶级，或者换言之，除非阶级差别消除，否则就不可能是真正普遍的。在两种情况下，这都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目的。由于阶级是以财产为基础的，而财产在本性上是有差别的，所以阶级差别的消除依赖于作为地位的决定因素的财产的消除。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拟设普选制的原因。他主张，[38] 财产一旦不再决定地位，就是无意义的并且不再存在。一旦财产从这种观点看变成无效的，它就成了空洞的和无关的。正如普选制所隐含的意思，如果差别不再存在，差别的标准也就不再存在。^②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88，页250。

② 《著作集》第1卷，页253。

“真正的民主制”意味着以同样的方式消除阶级差别和财产，而不是意味着形式的、政治的民主制。另外，根据马克思的看法，雅各宾派的极端民主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它要消除自己要求实现的东西，而没有意识到其中涉及的辩证关系。既然国家的存在恰恰是人的异化的一种惯常表现，这种异化就不可能在国家范围内得到克服。马克思的这个关键立场使得将他的《批判》诠释为一部极端民主或共和的作品成为不可能。辩证地看，马克思发现的解决方法在于国家之外。实现国家的普遍性的拟设的努力使国家本身成为多余，因此国家将被扬弃。共和主义不过是克服异化的一种欠完善的、形式化的方式。由于它在异化的范围内消除异化，所以它不可能是马克思的终极目标。

“真正的民主制”，正如马克思在《批判》中对它的设想那样，是处于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两个有差别的领域之外的，它的实现隐含的是人的“共产主义存在者”。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实现已经被发展到消除它本身的两个支柱，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层面。人的“共产主义存在者”显然是与市民社会和国家不相容的。^①确切地说，以理性的狡计的方式，伴随黑格尔各个拟设的实现的恰恰是它们的消除。

对《批判》的详尽考察表明，马克思实际上很早——在1843年夏天——就已得出他关于扬弃国家的终极结论。马克思，只有在他对黑格尔的诠释已经证明经济领域最终决定政治并使黑格尔关于政治生活的普遍性的拟设变成一场单纯的梦之后，才转向经济和历史的研究。他不是通过一种经济或历史的研究，而是通过将费尔巴哈的方法运用于黑格尔得出这个结论的。因此，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必须被看作是一位唯物论者，[39]至于“人文主义的”、“唯心论的”青年马克思与“决定论的”、“唯物论的”老年马克思的二分，无论如何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中是找不

① 《著作集》第1卷，页232。

到根据的。青年马克思的人文主义是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

在恩格斯 1843 年 11 月在欧文组织（Owenite）的报纸《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大陆社会改革的进步”（*Progre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中，黑格尔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这种关联得到了非常确切的阐述。恩格斯将“马克思先生”称作所谓的“理论共产主义者”之一，他说：“黑格尔体系从外面是非常难以攻破的，所以只有从内部通过本身就是黑格尔主义者的人才被颠覆了。……我们的党必须证明，德意志民族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所有哲学努力要么都是无用的，甚至比无用更糟，要么必须在共产主义中终结。”^①这也是马克思在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在《批判》中所看到的理路，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在他后来著作里的提到这种理路的两个事例中得到说明。

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前言中说道：

我所写的第一部用于解答攻击我的各种质疑的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一种批判性回顾，这部著作的导言 1844 年发表于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考查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的合法关系以及各种形式既不能从它们本身加以把握，也不能从人的心灵的所谓普遍发展加以把握，而是在物质生活条件中具有自身的根源，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将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统称为‘市民社会’，然而，市民社会的解剖学必须在政治经济学中才能找到。^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辑，第 2 卷，页 446，页 448。

② 《选集》第 1 卷，页 362。

1873年马克思甚至更加直接地提及他在《批判》中运用的转变性方法，他在《资本论》德文第2版第一卷后记中说道：

我的辩证方法不仅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与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 [40] 将其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造物主，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外部的表现形式。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无非是通过人的心灵加以反映并被转变为思维形式的物质世界。

近30年前，我在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就批判过它的神秘方面。……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的神秘化，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阐述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要想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就必须把它再倒过来。^①

于是，马克思在他后来的岁月里维护了自己25岁时针对黑格尔所写的《批判》的效用和意义。不仅在青年黑格尔和老年黑格尔之间不存在任何“间隙”（caesura），而且马克思本人已经提供了连续性的保障。

^① 《选集》第1卷，页456。关于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神秘”因素的另一种描述，见马克思1868年3月9日写给狄慈根（Dietzgen）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XXXII卷，页547）。

第二章 无产阶级：普遍的阶级

[41]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尽管安排混乱，但仍是他的著作中关于政治学说的最系统的著作。正如我们可以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序言开篇看到的，马克思总是希望返回到这个主题。在那里，他说，他的全面研究的第四部分将用于探讨现代国家：“我按以下次序考察资产阶级的经济体制：资本、土地财产、有偿劳动；国家、外贸、世界市场。”^①但由于马克思最初打算仅仅在第一部分加以阐述的内容的不相称的扩充即《资本论》，而并未进展到第四部分。

尽管如此，马克思后来关于政治结构的一些评论还是重新论述了他 1843 年在对黑格尔政治理论的早期审视中就已得出的结论。这层关系在他对待经济学

^① 《选集》第 1 卷，页 361；也可参见马克思 1858 年 2 月 22 日写给拉萨尔（Lassalle）的信（《书信集》[*Selected Correspondence*]，页 125）和他 1858 年 4 月 2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同上书，页 126）。

与政治学的辩证关系中尤其明显。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就像在他的《批判》中一样，政治的东西从未表现为经济的东西的一种单纯机械或自动的反映。

好些事例都揭示出这两个领域的动态关系，尽管马克思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并未系统地对待这个主题，从而导致读者忽视了它的各种表现。1862年，马克思告诉库格尔曼（Kugelmann），虽然他的《资本论》的第一章包含以下所有章节的“精华”，但“不同的国家形式与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并不能轻易地从这一章推导出来。^①《哥达纲领批判》持同样的观点，在语言上明显使人想到针对黑格尔的《批判》：

“当今社会”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 [42] 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历史发展而有所改变，或多或少有所发展。另外，“当今国家”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与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与在美国不一样。所以，“当今国家”是一种虚构。^②

政治结构并不必然和自动地反映社会—经济条件、反而要求一种更加复杂的分析的思想，在经验上由马克思在考察不列颠时得到了验证。在这里，他必须认真处理在一种仍大体上属于前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内运行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疑难现象。马克思在1855年发表于《新奥得报》（*Neue Oder Zeitung*）的一篇文章中，非常接近白芝浩（Bagehot）后来对真正的不列颠宪法与表面的不列颠宪法所作的区分：“什么是不列颠宪法？……事实上，不列颠宪法不过是非官方地但实际地统治整个市民社会领

① 见马克思1862年12月28日写给库格尔曼的信（《写给库格尔曼的信》（*Letters to Kugelmann*, London, 1936），页23。

② 《选集》第2卷，页32。

域的资产阶级与官方地实施统治的土地贵族之间的一种陈旧、过时和老套的妥协。”^①

社会—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这种不一致再次说明马克思在他较早的作品中就已形成的论点：在现代社会，人必定过一种双重的生活并遵循两种相互冲突的行为标准。马克思在 1848 年之后仍认为这些早期的作品非常重要，这一点可以从他想要将自己在《德法年鉴》发表的两篇文章收入他的一个本应由出版商赫贝克尔（Herman Becker）1850 年在科伦出版的著作集的意图中推测出来。但由于贝克尔是“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所以整个计划随着科伦审判（Cologne trial）之后同盟的瓦解而付诸东流。

马克思未曾以一种系统的方式界定他的政治理论，这促使我们努力从他卷帙浩繁的分析性的和争辩性的作品的零散证据中推测出他的理论。这样 [43] 一种探究也将有利于在其思想的整个框架内整合他的无产阶级概念。

2.1 作为异化的国家

马克思使用的是术语“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因为这个术语是在带有基督教新教含意的传统德国哲学范围内形成的。他将现代国家的出现设想为世俗化——由“政治解放”体现出

^① 《著作集》第 11 卷，页 9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不列颠》（*On Britain*, Moscow, 1962）页 423；也可见马克思 1861 年 7 月 22 日写给拉萨尔的信（《著作集》第 30 卷，页 614 - 615）和 1852 年 4 月 24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Briefwechsel*）第 1 卷，页 377 - 378）。马克思坚持自己关于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与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资本主义社会] 的区分，这在决定其思想的连续性中具有重要意义。

来，亦即政治与宗教、神学因素的分离以及惯常的宗教向一个单独而有限的领域的降格——的自然结果。马克思认为这个过程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并在法国革命中达到顶峰。^① 明显让人联想到康德的是，他在1842年与哥白尼革命作了一个类比，因为国家如今已经根植于人的意识和理性之中：

大约在哥白尼对真正太阳系的伟大发现的同时，国家的万有引力定律被发现。国家的焦点被发现存在于国家之内，欧洲各个政府凭最初对实践的浅薄认识，开始将这个结论运用于权力平衡体系。同样地，马基雅维利和康帕内拉，后来是霍布斯、斯宾诺莎、格劳修斯，最后是卢梭、费希特和黑格尔这些人开始用人的眼睛察看国家并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神学中阐发国家的自然法则，就像哥白尼没有铭记约书亚关于太阳静止在基甸和月亮停留在亚雅仑山谷的告白一样。^②

这一类比促使马克思从人的理性能力推出现代的法律概念，并将之看作是人类自由的一种体现和对任意性的一种限制。^③ 因此，他以极度的焦虑看待任何试图在政治领域重建宗教的企图。这样一些倾向，正如政治浪漫派、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或鲍威尔（Bruno Bauer）对待犹太人解放的态度所体现的，对马克思而言都是对世俗国家的冒犯，[44] 也与基督教的说法相矛盾，因为基督的王国毕竟不涉及这个世界。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宗教与国家分离的程度对他来说充当着国家的现代性的一个指标，犹太人解放的程度则充当着一个便捷的衡量尺度。“还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的国家，必须通过与完善的政治国家的比

① 《论犹太人问题》，入《早期作品集》页27-31；《神圣家族》（Moscow, 1956），迪克逊（R. Dixon）译，页149-159。

② 1841年7月14日《莱茵报》（《著作集》第1卷，页103）。

③ 1842年3月12日《莱茵报》（《著作集》第1卷，页58）。

较而加以评价，并且必定被认为是欠发达的。”^①

马克思使用现代国家的这种界定作为评价其他政府形式的一个标准和一种自我参考的参数。他用现代国家自身的标准去衡量现代国家，发现这个标准并不存在。在一封写给卢格的日期标为1843年9月并在《德法年鉴》发表的纲领性信件中，马克思说道：

理性总是存在的，但并不总是以理性的形式存在。……至于现实的生活，政治国家（甚至在它还没有被有意识地灌输社会主义的需要的地方）以它所有的现代形式包含理性的所有要求。但它并没有停留于此。它把理性设想为普遍地得到实现的。因此，它发现自己理想的决定地位总是挑战着自己真正的前提条件。^②

马克思主张，现代国家的各种拟设的实现在社会中受到挫败。黑格尔的本来应当使政治生活变得理性的调解观念，正好选择了那些有能力进行调解的内容，例如意识。但宣称财产处于政治范围之外并没有消除人对财产的依附地位。结果，政治没有真正从财产中解放出来。像宗教的政治中立并没有消除人对宗教的需要一样，政治与财产的分离也没有真正使人类生活对财产变得漠不关心。^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人被分成两种不同的人，即“市民”（citoyen）和“资产阶级”（bourgeois）。在国

① 《神圣家族》，页149。参见魏尔（E. Weil）：“现代政治与政治思维的世俗化”（Die Säkularisierung der Politik und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in der Neuzeit），载《马克思主义研究》（Tübingen, 1962）第4卷，页153-157。

② 《著作集》第1卷，页345；参见马克思关于离婚法的文章，载1842年9月19日《莱茵报》（《著作集》第1卷，页149-151）。

③ 《论犹太人问题》，入《早期作品集》，页11-13；《神圣家族》，页128-129。

家中，人被期望达到普遍的标准；在市民社会中，人应该根据他的自私需要和利益行事。因此，本来与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合并起来的国家，表现为市民社会的其他强大利益之中的一个 [45] 片面性组织。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得到系统阐述的论证是内在于 1843 年的《批判》的。它最初的表现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写的一篇文章。在那里，马克思痛斥莱茵省议会（Rheinish Diet）的一位自治城镇成员不是从普遍的政治立场，而是从自身阶级利益的狭隘观点出发看待出版自由：“我们这里拥有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反面，而不是市民。”^①

这种将资产阶级与市民对立起来的做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他同时代的一些人，在像他一样汲取黑格尔遗产时，也使用了这种做法。例如，施蒂纳（Max Stirner）就作了同样的术语区分，但他的结论与马克思的完全相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中，施蒂纳谈到法国革命：

不是个人——人唯有作为个人，才是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的——已被解放，仅仅是公民（citizen、citoyen）、政治的人已被解放；他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人类的一个样品，更准确地说，是公民物种的一个样品。仅仅是作为这样的样本，而不是作为人，他才是被解放的。……在法国革命中，不是个体，而仅仅是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是积极的。^②

施蒂纳认为，法国革命将现实的个人归摄到普遍性的特性之下。他打算消除这种归摄并主张个体（*der Einzige*）的不受束缚

① 1842 年 3 月 15 日《莱茵报》（《著作集》第 1 卷，页 65）。像在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中一样，马克思这里在原稿中使用的是法文。

② 《黑格尔左派》（*Die Hegelsche Linke*），洛维特（K. Löwith）编（Stuttgart, 1962），页 69。

的自由。当然，施蒂纳的个体主义前提与马克思的恰好相反。对马克思而言，并不是个体主义的缺乏，而是个体主义的扩散，困扰着现代国家。^① 两种互相抵牾的观点却采用了共同的术语，这一现象更加强烈地强调了青年黑格尔派最终要在黑格尔传统生而具有的个体主义选择与社会主义选择之间作出抉择的需要。

马克思运用经济学和宗教学来表明人 [46] 被划分为“公民”和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指出，国家与宗教和经济生活的分离（这在历史上是同时发生的）将国家从宗教和经济中解放出来，但并没有将人从它们的影响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作出的区分；于是，现代国家的最大成就被表明成了它的主要局限：

人分解成犹太人和公民，基督新教徒和公民，宗教的人和公民，这不是被实行以反对政治体制的骗局，也不是对政治解放的逃避。这就是政治解放本身，是脱离宗教的政治解放方式。……

一门特殊宗教的拥护者在与自身公民权的关系中发现自己所置于其中的矛盾，仅仅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普遍世俗矛盾的一个方面。……

因此，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被解放出来，他获得了宗教自由。他并没有从财产中被解放出来，他获得了拥有财产的自由。他并没有从事务的利己主义中被解放出来，他获得了经营生意的自由。^②

由于现代国家不能承认这种内部的矛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就制造出自由的假象、有学问的谬见，即指出实际上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London, 1965），页 259 - 260。参见摩西·赫斯 1840 年 1 月 17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载赫斯：《书信集》（*Briefwechsel*），西尔伯纳（E. Silberner）编（Haag, 1959），页 455。

② 《论犹太人问题》，入《早期作品集》，页 16，页 21，页 29。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成了人的意识的一种调解，本质上是奴隶制的东西成了自由：

民主代议制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公共共同体与奴隶社会之间的典型矛盾的绝好展现。在现代世界，每个人都既是奴隶社会的成员，也是公共共同体的成员。准确地说，市民社会的奴隶制在表面上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在表面上是个体的完美独立性。的确，个体将关于他的业已异化的生活要素例如财产、工业、宗教等的运动看作他自己的自由，不再束缚或拘囿于一根共同的绳索或共同的人；在现实中，这是他的奴隶制和非人性的绝好展现。^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指出人的行为总是不同于各种规范似乎要求的东西来概括这种矛盾。理性东西[47]与现实东西的二分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不断被强化。^②国家理应具有的普遍性和脱离任意个人统治的解放，变成由各种需要组成的系统具有的任意性，在根本上取决于摆脱有意识的指导的生产方式。个人的任意性已被匿名的任意性、被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所取代。^③私有的东西和自私的东西，在一种变相的普遍主义的掩盖下仿佛使混乱和无序成了理性的本质。^④国家如其所是地成了现实共同体的一个替身。^⑤

政治民主制对马克思而言在这个论证中表现为对这种含糊其词的美化；既然他把民主制看作政治组织的最高可能形式，他就

① 《神圣家族》，页 157。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93。

③ 《哲学的贫困》，页 93。

④ 参见马克思关于出版审查的文章，载 1842 年 10 月 27 日《莱茵报》（《著作集》第 1 卷，页 116），关于林木盗窃法，载 1842 年 10 月 30 日《莱茵报》（同上书，页 130），《神圣家族》，页 158。

⑤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90 - 92。

必须把他的解决之道移交给单独的政治结构之外的层次。^①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国家的实存作为各种普遍属性构成的一个单独领域，表明所有其他领域都已被置于特殊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境地。这一论证的自然结果在马克思的旨趣中必将成为从国家的唯心论向市民社会的现实的转变，我们已经看到这也是马克思 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序言中作回顾时的观点。

马克思在后来的岁月里始终坚信这个观点，这一点也可以在他 1871 年所做的一次批评马志尼（Mazzini）的社会行动观点的演说中发现。政治东西和社会东西的相对优越性的问题为他评判马志尼的方法提供了标准：“事实上，马志尼从未用他过时的共和主义理解任何东西，也从未用它取得任何成就。通过叫喊民族性，他仅仅给意大利人套上了军事独裁的重负。对他来说，他在自己的想象中缔造的国家就是一切，而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却是虚无。”^②

2.2 官僚阶级：虚假的普遍性

[48]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官僚阶级看作是政治异化的惯常化身。他把官僚阶级看作国家实现人的普遍性这一假象的体现。如果说对黑格尔而言臣民的“普遍阶级”证明国家的社会内容是与国家在概念上的决定地位相适合的，那么，另一方面对马克思而言，官僚阶级的虚假普遍性和实际自私性就揭示出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与其现实存在分离开来的鸿沟。

马克思讨论官僚阶级的路径与韦伯关于官僚主义“理想类

^① 《论犹太人问题》，入《早期作品集》，页 20。

^② 1871 年 6 月 6 日在国际总委员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会议上的讲话（《著作集》，第 17 卷，页 639）。

型”的探讨非常相似。^① 像韦伯一样，马克思通过职能分工和等级来描述官僚阶级的特征。^② 官僚阶级是公共生活的异化，这在马克思看来隐含着两个后果：一方面国家的扬弃通常将通过摧毁官僚阶级的设置而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政治现实的官僚主义维度为评估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提供了一个标准。

早在 1847 年马克思就把德意志各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刻画为官僚主义的，因而产生了德意志公共生活的这个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冒险地忽视掉的核心特征。^③ 1868 年，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阶级的官僚主义传统中看到了一个可能阻碍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在德意志产生的主要困难。这又是对各种发展的一种预测，只有在多年以后他才用这样的方式普遍地加以解释。^④

[49] 大多数研究马克思的成果都忽略了他对官僚阶级的关注，有些研究甚至指责马克思完全忽视了官僚阶级作为现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之一这一事实。但强调理解官僚阶级的重要性的主张，不论是在官僚阶级的历史还是职能方面都遍及马克思 1843 年以后的所有作品。对他而言，官僚阶级对于理解现代国家是关键性的。因为它是劳动分工的政治体现，它不仅必须在职能上而且必须在结构上得到阐释。远远不是忽视官

① 韦伯 (M. Weber):《社会学文集》，格斯 (H. H. Gerth)、米尔斯 (C. Wright Mills) 编 (New York, 1946)，页 196 - 239。

② 《选集》第 1 卷，页 332 - 333；《法兰西内战》初稿，载于《著作集》第 17 卷，页 539。列宁的官僚阶级观点不同于此，他没有将等级纳入官僚阶级的特征之中：甚至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列宁也从未提及消除等级，尽管他明确提到官僚阶级的要加以消除的其他特征（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State und Revolution) [Moscow, 日期不详]，页 171)。列宁在这里可能沿用的是恩格斯在其文章“论权威” (On Authority) (《选集》第 1 卷，页 636 - 639) 中阐发的观点。

③ 1847 年 9 月 12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 (《著作集》第 4 卷，页 193)。恩格斯同一年在他的文章“德国的现状” (Der Status Quo in Deutschland) (《著作集》第 4 卷，页 40 - 57) 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篇文章，作为恩格斯所写的比较睿智的文章之一，在 1929 年才得以出版。它如此鲜为人知令人遗憾。

④ 马克思在 1868 年 10 月 13 日写给施魏策尔 (J. B. von Schweitzer) 的信 (《通信选集》(Selected Correspondence, 页 259)。

僚阶级的发展和意义，马克思甚至使任何特殊社会的官僚化程度决定无产阶级在颠覆这个社会时所需要的暴力程度。在他看来，英国、美国，可能还有荷兰，这些还没有被官僚化的国家为和平接管提供了更好的机会。然而，在大陆的官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只有通过一场直指官僚主义组织本身的暴力革命才能转让。^①

多年里，在马克思关于官僚阶级的历史形成的分析中发生一些变化无疑也是事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把官僚阶级看作德意志各个小国的败坏现状的典型：在这里，当没有任何单独的阶级强大得足以将它的规则施加给社会时，官僚阶级就作为各种阶级关系的僵局的结果出现了。在这种政治真空中，绝对主义的官僚主义设置就在社会中冒称领导角色，并将它的各种政治主张发展到独立于社会力量的地位。^②

六年以后在《雾月18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中，马克思断言，法兰西而不是德意志，是官僚阶级的典型居所。他甚至暗示了费尔巴哈的转变性批判，指出在官僚阶级之下人的主体变成操控的单纯对象。“商品拜物教”是对经济而言的，官僚阶级是对政治而言的。这就是马克思如何描述在绝对主义、雅各宾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影响下三度得到完善的法国官僚阶级的：

[50] 任何共同利益都是全然与社会相分裂的，与作为一种更高的、普遍的利益的利益相对立的，被从社会成员自身的活动那里抢走，变成政府活动的一个对象，从乡村公社的桥梁、校舍和公社财产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富和国立大学。……然而，它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为统治阶级自身争取

① 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写给库格尔曼的信（《写给库格尔曼的信》，页123）；1872年的阿姆斯特丹讲话（《著作集》第18卷，页160）。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208。

权力。^①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扼要地重述了同样的观点：

国家权力，在表面上高耸于社会之上，可自身同时就是这个社会的最大丑闻并且正是它的所有腐化的温床。……同时，帝国主义〔即波拿巴主义〕是国家权力最淫乱和最终的形式，初生的中产阶级社会已经开始把它设计成使自己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手段，成年的资产阶级社会最终把它转变为用资本奴役劳动的手段。^②

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中，马克思要比出版的版本（直到1934年才付梓）更加广泛地长篇论述了这个观点。这与他在1843年《批判》中的论证的相似之处十分明显：

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种细小的个别利益，与社会本身相分离，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独立于社会而且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由担任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理想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充分发展。……但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拥有常备军的无所不管的官僚阶级，从事愚民勾当的教会、唯命是从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已完全脱离社会，甚至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平庸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

① 《选集》第1卷，页333。关于一项涉及“共同的”（common）与“普遍的”（general）之间差别的含意极有趣味的研究，参见梅萨罗什（I. Mézaros）：“集体与异化”（Collettività e alienazione），载《新的存在》（*Nuova Presenza*），第5期（1962年）。

② 《选集》第1卷，页518。

操纵它。……它甚至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国家政权在第二帝国得到它的最后的、最高的表现。表面上是这个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最后胜利，[51] 实际上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成分的大泛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只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治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用这种统治形式加以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屈辱，也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屈辱。^①

马克思的官僚阶级分析的社会学意义在于他的如下主张，即官僚主义结构并不自动地反映各种盛行的社会力量关系，而是误导和损毁它们。官僚阶级是被其普遍性主张所歪曲的盛行的社会力量的形象。因此，拿破仑三世的政府并不能轻易地用阶级的说法加以解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评价说：

使国家变成自由，绝不是业已摆脱狭隘臣民见识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几乎与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构变成完全服从社会的机构。……德国工人党……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一样）当作现存国家（对未来社会而言是未来国家）的基础，而是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道德和自由基础的独立存在物。^②

^① 关于这个草稿的最初英文版本，见《马克思、恩格斯档案》（*Archiv Marksas i Engelsa*, Moscow, 1934），第3辑（第8卷），页320-322。

^② 《选集》，页31-32。

马克思也看到在资本主义当局的范围内各个独立的官僚阶级的发展。这种分析对他关于资本主义的内部变革的观点具有的意义，将会在具体的背景下加以探讨。眼下我们只需说出这样的看法就足够了，即这些见解表明，马克思不是由于它有损于他的理论而忽视或回避了“经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而是预料到了它。^①

这一见解或许可以成为马克思不愿意 [52] 将其现代国家观点系统化的一个线索。虽然他从未把国家或官僚主义结构设想为社会—经济力量的单纯反映，但他仍认为它是社会—经济力量及其理想要求的一种投射，尽管是一种扭曲的投射。现代国家置身于其中的基本矛盾揭示出，国家要达到自己的期望和标准，就必须在物质世界抛弃自己的起源。国家注定要表现得不同于它实际所是的样子，它的异化恰恰就在于它的本质之中。像宗教将人所缺乏的东西投射到神那里一样，国家也将本来应当是每个作为主体的人的一部分的属性归于自身（和官僚阶级）。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研究这面变形的镜子，而不是透过它去看隐藏在它后面的现实呢？为什么不是分析市民社会的现实和它的经济形式，而是还探讨国家的假想任务呢？这就是马克思 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序言中总结他自己的纲领性立场的方式。这也就触及了马克思针对那些他认为仍然是黑格尔观点——国家独立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囚徒的

^① 《资本论》（Moscow, 1959）第 3 卷，页 426 - 432。参见马克思对东印度公司结构的评价：“那么，谁在管理层的名义下进行着实际的统治呢？在印度议院全体众多的不负责任的部长、检察官和办事员中，只有一个个体在印度存在，并且他也只是偶然在印度存在。……管理者的真正法庭和印度的真正议院政府是永恒的和不负责任的官僚阶级，‘桌子的创造者和宠爱的创造者’存在于利德贺街”（“印度政府”（The Government of India），载 1853 年月 2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

“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论战的根源。^①

2.3 无产阶级

只有在这最后阶段，无产阶级才在马克思的思想和社会批判中表现出来。在这个关键点，无产阶级的出现具有系统的意义，因为它的出现在这一思想的理论框架内说明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兴趣。正如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看到的，无产阶级对马克思而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遭遇和非人性化在他看来是人类状况的一般范式。主要使马克思感兴趣的不是无产者的具体生活条件，而是他们与人在人类学上的决定地位的关系。因此，虽然马克思肯定不是第一个探讨无产阶级及其在工业社会的立场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将无产阶级与各种主要源自于黑格尔遗产和传统的普遍见解结合起来的人。

[53] 马克思完全知晓他受惠于他的前辈，尽管在他对法国复辟派历史学家的很容易获得认可的受惠与他对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的更加纠结的承认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观点正在成形的关键的1843年夏天，他的大多数读书笔记都在探讨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的历史论述，他的大多数材料当然都是法文；马克思甚至根据大革命的不同宪法文件的社会背景，对他的各类笔记编排了一个索引。^② 1852年马克思告诉魏德迈尔（Weydemeyer），“资产阶级的历史

^① 《论犹太人问题》，入《早期作品集》，页14-15；《神圣家族》，页154-15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辑，第1卷第2部分，页118-136；索引在页122-123。

学家”发现了各个阶级在现代社会的决定性发展中所起的作用。^①两年后，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具体地提到蒂瑞(Thierry)的贡献，但也指出，蒂瑞像其他复辟派历史学家一样忽视了社会斗争不会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和霸权而终结这一事实。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真正的、最后的斗争发生在资产阶级胜利的关头，那时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不再是依傍僧侣和贵族的 tiers état [第三等级]。^②

马克思与施泰因的关系更加复杂并且存在争议。图克(Robert Tucker)最近指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描述有多少取自施泰因的《当今法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Der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在这样做时，图克承袭的是好些早期作者的观点，他们主张马克思是通过施泰因的书了解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只是到了后来他才读到法国著作者们本人的作品。^③然而，其他人主张，由于各位作者的探讨和观念的不同层次，施泰因对马克思的影响毋宁说应当被降至最小化。[54] 设想马克思可能深受施泰因的多少有些素朴的论证的影

① 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写给魏德迈尔的信(《书信选集》，页 86)。

② 马克思 1854 年 7 月 27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选集》，页 105)。

③ 图克：《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1961)，页 114 - 116；参见阿德勒(G. Adler)：“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开端及其受到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施泰因和普鲁东的影响”(Die Anfänge der Marx'schen Sozialtheorie und ihre Beeinflussung durch Hegel, Feuerbach, Stein und Proudhon)，载《致瓦格纳的献礼》(*Festgabe für Adolf Wagner*, Leipzig, 1905)，页 16 - 17；福格尔(P. Vogel)：《黑格尔的社会概念及其通过施泰因、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历史发展》(*Hegels Gesellschaftsbegriff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 Fortbildung durch Lorenz Stein, Marx, Engels und Lassalle*, Berlin, 1925)；弗尔德斯(B. Földers)：《马克思—施泰因的问题》(*Das Problem Karl Marx - Lorenz Stein*, Jena, 1927)。

响，似乎的确是很困难的。^①

如果已经造成了这样的问题，即好像施泰因是马克思的唯一可以设想的来源，那么对这些论证进行争辩就很困难。施泰因的书在马克思 1842 年的书单中并没有出现，马克思这一年的笔记只包括艺术和神话方面的书，但他肯定也读过历史方面的书，所以可以想到这些留存下来的笔记是不全面的。马克思对施泰因的评价绝不是非常明确的。在《神圣家族》中，他指责鲍威尔仅仅由于施泰因没有研究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就只专注于探讨法国的社会主义，而丝毫没有留意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马克思觉得这是施泰因的书的一个严重缺陷。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又以非常赞赏的态度将施泰因的研究与格林（Karl Grün）关于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的书作比较，指出格林的书不过是施泰因著作的杂乱无章的改写。^②

相反，马克思是在施泰因的书出版后不久的 1842 年秋天，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度提到“一个无财产的阶级”（a propertyless class），其问题“在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的大街上已经引人注目”。虽然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在探讨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的一本书，但马克思这里指的是勒鲁（Leroux）、康德拉（Considérant）、普鲁东和傅立叶（Fourier）的作品。这些作品根本没有被魏特林提到，马克思当时也不可能读到这些作品的原文。他可能是从施泰因的书中获得这些作品的

① 梅林（F. Mehring）：《遗著》（*Nachlass*）第 1 卷，页 186；胡克（S. Hook）：《从黑格尔到马克思》（*From Hegel to Marx*）（新版）（Ann Arbor, 1962），页 199。但胡克把施泰因的书的出版年代弄错了，不是 1845 年而是 1842 年。关于最近一些有价值的施泰因研究，见门格尔贝格（K. Mengerberg）：“施泰因及其对历史社会学的贡献”（Lorenz v. Stein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Sociology），载《观念的历史学报》（*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 22 卷，第 2 期（1961）；韦斯（J. Weiss）：“辩证观念论与施泰因的著作”（Dialectical Idealism and the Work of Lorenz v. Stein），载《社会历史的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第 7 卷，第 1 期（1963）。

② 《神圣家族》，页 180；《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534 - 535。恩格斯在 1843 年称施泰因的书为“乏味的苦差事”（《著作集》第 1 卷，页 477）。

信息的。但毕竟，问题不是传记方面的，而是方法论上的。集中研究施泰因对马克思可能——甚至很有可能——产生的影响，就要求回答这样的问题，即设想施泰因的书可能是马克思接触法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观念或接触工业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学描述的唯一关联点。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尽管有些证据总是没有考虑到。[55] 施泰因的书在德国并没有引起多大轰动，主要是由于它的编排的奇特状况；但他明显不是第一个提出无产阶级问题的德国著作者。罗特克（Rotteck）和韦尔克（Welcker）在1842年出版的《政治学辞典》（*Lexik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第13卷，就在“革命”词条中包括了以下论述：

但这是历史的内容：除非出现新的对抗，否则主要的历史对抗不会消失或灭绝。因此，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普遍对抗近来已被极端化为一方面资本家和劳动主与另一方面各种类型的产业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种紧张关系中产生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立的范围随着工业人口的成比例增长而变得越来越构成威胁。

而且，在德国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探讨在德国自身存在这一问题之前许多年就已开始，这个探讨不是由激进派或社会主义者发起的，而是由保守的浪漫派发起的，他们将它作为反对放任自流自由主义的一种论证。两个最反对变革的德国浪漫派米勒（Adam Müller）和巴德尔（Franz Baader），在像罗特克和韦尔克类型的激进派想到这个问题之前数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1815年以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米勒就以一种显得预示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的语言讨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在分析斯密的过程中，米勒得出了如下结论，

即政治经济学将应当是统一的生产过程分裂为资本和劳动。^① 在1816年的一部著作中，米勒主张劳动分工削弱了劳动者的个性：

人需要他的活动有一个多方面的，甚至全方位的领域，不论这种活动本身可能多么有限和受到束缚。……但如果劳动分工，正如它如今在大城市以及制造业地区和采矿地区正被实行的那样，将自由的人分割成轮子、齿轮、缸体和梭子，在他多方面地追求一个对象的过程中强加给他某个活动领域，一个人如何能够期待这种被分割的片段会充分享有充实而满足的生活或权利与法律呢？[56] 如何能够从活动的圆满中被分裂出来，并且彼此被分离的各个局部形式如何能够找到政治生活及其法则的圆满呢？这是私有工业的所有部门中劳动分工的可悲结果。^②

巴德尔在183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包括术语 *proletair* [无产阶级]。巴德尔说，有钱阶级将税收负担几乎全都强加给无产阶级，使得无产者参与政治生活并成为成熟的公民同时成为不可能的。根据他的观点，无产者为国家的维系支付费用，却又不属于国家。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资本主义竞争注定要在一种将工人置于比中世纪的农奴更加糟糕的地位的垄断那里终结：

实际上，可以说农奴制……要比如此多的公众在我们所谓文明的和启蒙的国家里所承受的这种鲁莽的、软弱的和更少福利的自由……少一分悲惨，多一分人性。任何看到这一

① 米勒：《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 München, 1839），第1卷，页275。

② 米勒：“当今国民经济学简述”（*Die heutige Wissenschaft der Nationalökonomie kurz und fasslich dargestellt*），载《论文选集》（*Ausgewählte Abhandlungen*, Jena, 1921），巴克萨（J. Baxa）编，页46。

点的人都将不得不承认，在所谓基督教的和已启蒙的欧洲，少数人的文明普遍地是通过多数人文明的缺乏甚至野蛮而成为可能的。我们远比中世纪更接近于古代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国家。^①

米勒和巴德尔通过向新封建的、合作的和浪漫主义的制度安排的回归来设法避免这一结论，这并不会减损如下论证，即施泰因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关于工业无产阶级特征的描述的唯一来源，尽管马克思也可能从他的书中获取了一些关于个别法国著作者的信息。马克思获得了当时在德国学界的激进派和保守主义浪漫派之流中盛行的一种情绪和普遍的隐忧。要选择一位著作家并使他为塑造马克思的思想负责，肯定是很困难的，并且最终是错误的。马克思是在回应一种 *Zeitgeist* [时代精神]，[57] 与其说他是从个别的著作者那里，不如说他是从共同的积淀中获得思想和灵感的。

这个共同的背景也凸显出了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的探讨的具体贡献，凸显出了他的主张，即无产阶级的状况不应当在它所出现的狭隘的历史环境内得到思考。马克思的思想 *tour de force* [杰作] 必须通过使他对无产阶级的描述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的拟设相对峙才能加以把握。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批判》中意识到“直接劳动”的阶级既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结构的关心，也没有被整合进社会的普遍结构之中，尽管它对市民社会的功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在一些报刊文章中讨论莱茵兰乡村穷人的状况之前几个月，就从经验上研究过这个现象。他评论说，非理性的农村习俗

① 巴德尔：“论目前社会的无产阶级或无产者与有产阶级的失衡”（*Ueber das dormalige Misverhältnis der Vermögenlosen, oder Proletairs, zu den Vermögen besitzenden Klassen der Sozietät*），载《社会哲学文集》（*Schriften zur Gesellschaftsphilosophie*），索特（J. Sauter）编（Jena, 1925），页 325。

与传统对待乡村穷人远比通常的现代国家的理性安排更好，这显得是与黑格尔政治哲学不一致的：如果国家不能顾及这部分人口的话，国家的某些东西就必定是错的。

在《莱茵报》和《批判》中，马克思仍明显地在按“穷人”（the poor）的传统说法来思考问题。这个未加区分的术语，表明问题还没有通过哲学的思辨和洞见加以切近。而这只有等到马克思完成了他关于黑格尔的官僚阶级观念的阐述以后才发生。

马克思关于官僚阶级的所有讨论都得出如下结论，即黑格尔“普遍阶级”的拟设是黑格尔颠倒的政治世界的一个假象。官僚阶级并没有体现普遍性，而仅仅是僭越普遍性，用共同体的借口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这些特殊利益与其他阶级利益并无不同。如果说马克思不接受黑格尔将官僚阶级与普遍性等同起来的观点，他就仍保留了“普遍阶级”这个辩证的概念，即一个部分性的社会阶层，然而这个部分性的社会阶层又是共同体的普遍概念的一个理想主体。

如果说黑格尔的“普遍阶级”将一个给定的历史现象 [58] 实体化为一种自足的超历史规范，那么，马克思的用法则有所不同。对马克思而言，历史进程的辩证运动总是开放的。他并没有赋予任何一个阶级以普遍性的属性：任何一代人、任何历史状况对他来说都会产生一个渴望成为社会普遍意识的主体的阶级。历史的发展现实地允许这个阶级暂时代表 *re publica* [国家]，代表一般的社会，但一段时期以后随着社会力量的分配和普遍状况的变化，这种对普遍性的要求整体上就不再符合社会的利益。迄今为止代表社会的阶级必须让位给一个从今以后要求自己来代表社会的新的阶级。“上升的”阶级是那些对普遍性的要求在特定的时刻代表社会的普遍意志并实现社会发展的潜在性的阶级。“下降的”阶级则是对普遍性的要求不再有效和现实的阶级。他们坚守过去的荣光，坚守从这份荣光中得到的当前的特权。按照这样的说法，马克思看到封建贵族制的上升和下降，并将同样的

分析运用到资产阶级上来。黑格尔“普遍阶级”的观念，一旦被剥离出它的实体，对马克思而言就成了解释历史的媒介。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论述了这个观点：

任何一个阶级在市民社会中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只有在社会普遍利益的名义下，特殊阶级才能够要求普遍的统治。……它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不敢对敌人高声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应当是一切。^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因为任何使自己取代自己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仅仅为了执行自己的目标，才被迫使 [59] 自己的利益代表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用理想的形式表达就是：它必须赋予自己的理念以普遍性的形式。……革命的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表现出来。^②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一个阶级表现为普遍意志的主角与它寻求其自身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马克思看来，随

① 《早期作品集》，页 55 - 56。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61 - 62。

着现代无产阶级的诞生而达到极致。这只有通过同时取消作为一个单独阶级的无产阶级和普遍地消除阶级差别才能得到克服。马克思没有拟设阶级对抗的废除，因为任何经济机制都指向这个方向。经济分析不是先于他的废除阶级的言论的；阶级将被扬弃，因为历史的发展已经使普遍东西与特殊东西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紧张关系如今是极其普遍的。它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不可能被转变成只是统治阶级的又一场变革。唯有辩证扬弃，才会产生出在普遍东西与特殊东西之间没有任何二分对立的人性。

仅仅因为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中看到普遍性在当代的最终实现，他才赋予无产阶级以一种历史意义和使命。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最后部分，亦即上文引述的关于“普遍阶级”的作用的段落之后不久，第一次提到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提出暗含着它作为终极的“普遍阶级”的职能：

一个拥有共同锁链的阶级必定被塑造出来，这个阶级是一个在市民社会中却不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阶级的阶级，是一个消除所有阶级的阶级，它是一个具有普遍特征的社会领域，因为它的遭遇是普遍的，它是一个不要求特殊修正的社会领域，因为对它所犯的 error 不是特殊的 error，而是普遍的 error。在那里，一个不是要求传统地位而只是要求人的地位的社会领域必定被塑造出来，这个领域不是与 [60] 德国政治体系的特殊结论相反的，而是完全与它的各种设准相反的；这个领域最终不把自己从所有其他领域中解放出来，因而不解放所有其他领域，就不可能解放自己，简言之，这个领域有着人性的一种整体缺失，只有通过人性的一种整体救赎，才能救赎自己。社会的这种消除力量，作为一个特殊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当无产阶级宣称消除现存的社会秩序时，它不过是在宣

告它自己的生存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一秩序的有效消除力量。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时，它不过是在把社会已经为无产阶级制定的原则，把这一原则已经使其不知不觉地体现为社会的否定结果的东西，设定为社会的原则。^①

私有财产的扬弃不过是对无产阶级已经在社会上经历的状况的普遍化。共产主义在它从哲学原则中诞生出来时，并不是讨论的起点，而是讨论的结果。由于无产阶级始终处于全然的异化之中，在社会框架内改变力量的平衡时，政治革命是行不通的。^②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在人性的解放基础上加以阐明，因为无产阶级的奴役状态对人类所有形式的不自由而言都是示范性的：

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之中也可表明，社会从私有制、从奴役中的解放采用的政治形式是工人的解放；但这并不是说其中仅仅涉及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在整体上包含人性的解放。因为人的所有奴役状态都涵括在工人与生产的关系之中，所有的奴役类型都仅仅是这种关系的变种或结果。^③

无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单独阶级的消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同于其他阶级，因为这些阶级一旦获得胜利，仍依赖于它们的对立阶级和辅助阶级的继续存在。封建贵族需要农奴，以便成为贵族；资产阶级需要无产者，以便成为资产阶级；只有 [61] 无产阶级作为真正的“普

① 《早期作品集》，页 58 - 59；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86 - 87。

② 这是马克思反对政治革命的狭隘观点的关键所在；见他在 1844 年 8 月 8 日《前进报》（*Vorwärts*）上发表的文章（《著作集》第 1 卷，页 408）。

③ 《早期作品集》，页 132 - 133。

遍阶级”，才真正不需要自己的对立面来确保自身存在。因此，无产阶级能够通过扬弃作为一个单独阶级的自身并成为与社会的普遍性同步的，而扬弃所有的阶级。甚至无产阶级与哲学之间在规划上的必然联系也成为可能的，因为两者都是普遍的，而且无产阶级执行的就是哲学的普遍性拟设：“正如哲学在无产阶级中找到自己的物质武器一样，无产阶级在哲学中找到自己的思想武器。……哲学是这种解放的头脑，无产阶级则是这种解放的心脏。哲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扬弃才能得到实现，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哲学的实现才能得到扬弃。”^①

无产阶级的普遍主义本性，在马克思后期作品中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无产阶级诞生的历史原因时，也并没有消失。在一开始作为一种哲学假说的东西，现在通过历史的经验和观察得到证实：无产阶级的普遍主义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状况的自然结果，这种性质必定也会在地理层面争取普遍性。^②

细读《共产党宣言》就会明白从普遍性的角度作出的论证。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普遍的”（universal）、“共同的”（general）、“民族的”阶级，只能普遍地加以解放；它的存在抗拒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准则：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中，旧社会的生活状况已被消灭。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与妻子儿女的关系，与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低阶层，如果不炸毁构成

① 《早期作品集》，页 59。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75 - 76。

官方社会的整个最高阶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共产党人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1) 在 [62] 不同国家的无产者的民族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2) 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工人没有祖国。绝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尽管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状况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①

这种对于无产阶级的普遍方面的极力强调，再次出现在1864年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 Men's Association）中。^② 这种强调也隐藏在他反对普鲁东互助论（mutualism）的立场背后，他把这种互助论看作是对这种普遍主义的规避。同样地，当马克思在1870年总结不列颠劳动阶级的不足时，他把它不能将自身的经验加以普遍化看作是它的主要弱点。^③

无产阶级的这种普遍主义因素也可以解释马克思40年代与鲍威尔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关于解放斗争中“群众”的作用的争论具有的系统性质。鲍威尔和他的学生们对群众的这种蔑

① 《选集》第1卷，页44，页46，页51。

② 《选集》第1卷，页386。

③ 《著作集》第1卷，页415。

视以及他们避免与无产阶级合流的倾向是基于如下担忧，即唯恐普遍的自由视野会被一个特殊阶级受到的拥护和它的事业受到的支持所取代。然而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特殊阶级，而是黑格尔“普遍阶级”的储藏库。关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和意义的争论，重又在黑格尔遗产的概念性传统内进行。^①

[63] 然而，由于马克思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思辨的思考达到的，所以他并没有表露多少对工人阶级成员的感同身受或精神情感。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构想和实现它自己的目标而无须外界知识分子帮助的能力的怀疑，通常是有据可查的。革命绝不是始于“群众”，而是源于精英组织，这是符合他的评价的。^② 虽然马克思总是反对那些明确试图脱离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仍是他对如下情形的不确定态度，即如果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成员上彻底变成无产阶级的，它将会是怎样的。马克思在同盟内的对手甚至控诉他试图将知识分子的纪律强加给无产阶级运动；魏特林有时被马克思揶揄为裁缝们的国王。^③

这一探究使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产阶级诞生的条件对于克服这些条件本身提供了保障。他把这个结论与如下见解结合起来，即同样的力量在社会内产生了贫穷和财富：

① 参见赫兹-艾兴罗德 (D. Hertz - Eichenrode): “青年黑格尔派的群众心理学” (Massenpsychologie bei den Junghegelianer), 载《社会历史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第7卷, 第2期 (1962年), 页231-259。但这一出色的研究没有建立起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与他的黑格尔背景之间的关联。

② 见马克思的文章“印度的暴动”(The Indian Revolt) (载1857年9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向法国君主制打出第一拳的是贵族, 而不是农民。印度的暴动并不是开始于受英国人折磨、鄙视和被剥夺得赤身裸体的 ryots [印度佃农], 而是开始于受英国人赐予衣食和宠爱纵容的 sepoy [印度雇佣兵]。”

③ 参见《著作集》第8卷, 页598-600。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1852年7月20日)中, 马克思这样说道德国工人阶级的一群人: “没有比这些德国工人更加蠢的驴子了。”(《著作集》第28卷, 页93)。

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被迫维持自身的存在，因而私有财产的对立者，无产阶级，也被迫维持自身的存在。这是矛盾的积极方面，即自足的私有财产。……

另外，无产阶级被迫作为无产阶级扬弃自身，因而扬弃自身的对立者，即使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的存在条件，亦即私有财产。这是矛盾的消极方面，即矛盾在自身内的不安息，被消解和自我消解的私有财产。^①

于是，贫穷并不存在于财富之外：它是财富的源泉。两者都是人的行为的结果。这一推理 [64] 使马克思拒绝从分配的角度看待共产主义的立场变得很清晰。正如他看到的，问题不是现有财富的再分配，无论是更加公正还是更加平等。对他来说，共产主义就是创造新的财富，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条件。因此，理解和改变现实的关键，存在于把人刻画为创造性存在者的经济体制之中。至于贫穷是否是客观环境的结果，这个问题已无关紧要：客观环境本身就是人的能动性的一种结果。

因此，人类活动的本性就成为马克思探究的下一个主题。探究无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条件表明，哲学提出的各种传统问题在历史发展的范围内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① 《神圣家族》，页 51。

第三章 劳动人

3.1 意识与社会

[65] 虽然马克思的世界观被广泛地称为唯物主义的，但他本人从未系统地探讨过唯物主义。这种忽视造成了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路径的确切内容的一些臆测^①，并导致学者们主要依据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的后期作品来进行解释。许多广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东西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撰写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马克思过世之后由恩格斯撰写

^① 阿克顿 (H. B. Acton): 《时代的假象》(*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 London, 1955); 莱夫 (G. Leff): 《概念的专制》(*The Tyranny of Concepts*) (London, 1961)。也可参见马萨雷克 (T. G. Masaryk):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社会学基础》(*Die philosophischen und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Wien, 1899)。

的。研究者们有时候忘了马克思本人从未针对自己的系统方法采用过“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的术语。^①

必须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我解放的最终可能性的拟设与他关于人最初创造世界的哲学前提结合起来。^②从哲学上看，这种看法是黑格尔如下观点的世俗版本，即现实不是一种外在的、客观的事实，而是由人塑造的。^③对黑格尔而言，这种塑造是由意识进行的；马克思使黑格尔学说的能动因素摆脱了它的形而上学背景，并把它与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④

即便是在马克思进行探究的这个早期阶段，这种唯物主义也明显不同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中阐述的机械唯物主义。恩格斯通过将辩证法运用于自然而把自然从它与意识的调解中分离出来。严格地讲，这种观点根本就不能被称为辩证的。虽然黑格尔在其辩证体系中包含有无生命的自然，但对他来说，自然就是自我外化的精神。[66]因此，他没有排除意识，而是泛逻辑主义地重新维护意识。恩格斯并不是这样，他把无生命的自然仅仅看作是晦暗的物质。而且，他在《自然辩证法》中不仅说物质历史地看先于精神，而且说物质是意识进化的原因和源泉。认为马克思持这样一种将精神看作物质的单纯生物学的副产品的观点，是通常的和流行的说法。^⑤恩格斯又试图留个余地，即“意识形态领域”又可以作用于它们自身的社会—经济原因；但这种表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物质作为发起者

① 马克思唯一一次接近诸如此类的表述是在他的文章“交换物”（*Quid pro Quo*）中，载1859年8月6日《人民报》（*Das Volk*）（《著作集》第8卷，页454—455）。

② 《选集》第2卷，页403。

③ 《黑格尔左派》，洛维特编，页7。

④ 关于德国观念论对马克思的影响的全面探讨，见罗腾施特赖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Basic Problems of Marx's Philosophy*, Indianapolis/New York, 1965），页27—63。

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oscow, 1954），杜特（C. Dutt）编，页274—275。

的系统作用。^①

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一种高度机械的物质观的同一化。由于列宁把意识看作客观世界的单纯反映，所以有些作者仍将这种观点归于马克思本人。即使在《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以后，巴曾（Jacques Barzun）在1944年仍写道：“我们全体——或者几乎全都——向马克思的教条投降了，即经济事实产生观念。……马克思将思想和行为归为物质事实。……意识对马克思来说是一种尴尬的假象。”^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列宁关于这个主题的许多观点都是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中批判的机械唯物主义相同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评论，预示着他对于机械认识论的社会后果的意识。这些评论将认识论问题置于马克思自己观点的中心位置。马克思在这里与如下观点进行争辩，即意识无非是人在物质与环境方面的生存条件的反映。在他看来，意识的反映论的内在矛盾是非常简单的：不论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67] 还是费尔巴哈，都把一种关于人的生存的消极观点（人是由客观—物质条件决定的）与一种暗示固有的和必然的人类历史进程的乐观主义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这两种观点是不兼容的，它们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最终寂静主义的、非政治的和保守的社会哲学。如果人是物质条件的产

① 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写给梅林的信（《通信选集》，页541—542）。

② 巴曾：《达尔文、马克思、瓦格纳》（*Darwin, Marx, Wagner*, Boston, 1946），页142，页212。关于对列宁观点的一种清楚解释，见保罗（G. A. Paul）：“列宁的感知理论”（*Lenin's Theory of Perception*），载《分析》（*Analysis*），第5卷，第5期（1938），页65—73。也可参见霍伊泽尔（A. Heusel）：《马克思关于认识客体的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Erkenntnisobjekt bei Marx*, Jena, 1925），页3—17；弗里斯（J. de Vries）：《辩证唯物主义的认知理论》（*Die Erkenntnistheorie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Salzburg/München, 1958）；康福思（M. Cornforth）：《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 London, 1954），第2卷，页11—68。

物，他就绝不可能将自己从物质条件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如果世界不是人自己的创造物，他怎么能够改变它呢？^① 这种意识的反映论在恩格斯的影响下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采纳，这种说法或许可以在至少一个层面上解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的保守主义和寂静主义，尽管它也存在公然的激进主义。

马克思承认“旧的唯物论”为这种潜在的保守主义提供了一种选择，但他指出，旧的唯物论对一个理想世界的创造否认了它的唯物论前提。

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养的产物，因而被改变的人是其他环境和被改变的教养的产物的唯物主义学说，忘了正是在人改变环境，教育者本人需要教育。因此，这种学说必然要将社会划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于另一部分。^②

但这种从保守主义的逃避又返回到现实东西与理想东西之间旧的二分上来，只不过这一次是用社会阶级的说法加以表述的。费尔巴哈也提供了一个确切的例子，所谓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一样。马克思认为，要使社会变革成为可能，他们就必须拟设社会的一部分不是由物质经济条件决定的，然后赋予这个阶级以普遍解放者的角色。可是，这样一种对在物质和经济上被决定的人和摆脱这种决定因素的人的划分，恰恰使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教育者本人也需要教育”。

马克思对待这种基本的认识论困境的方法，承袭了他曾受其教育的哲学传统遗产。虽然他承认 18 世纪法国和英国的唯物论在早期 [68]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产生过程中具有的重要地位^③，但他注意到，在这种社会主义中乌托邦色彩是它的认识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58。

②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Ⅲ，入《选集》第 2 卷，页 403 - 404。

③ 《神圣家族》，页 178。

论前提的一个直接结果。相反，马克思认识论的来源深深地镶嵌在德国唯心论传统中，他对这个传统的依赖使他能够在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层次上解决社会行为与变革的困境。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深深依恋从来不包括对他的认识论的不加批判的接受，费尔巴哈吸引马克思的地方在于他的转变性方法具有的潜能。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哪些方面感到费尔巴哈错在没有将自己的分析延伸至社会世界。费尔巴哈哲学的这种方法论弱点源于它的机械唯物主义观念。从一开始就感到这个缺点的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后来转而反对自己老师的费尔巴哈主义者。他从一开始就承认费尔巴哈的成就及其局限。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获得他的观点，即现实不是单纯客观的事实，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人通过意识塑造的。正如将在第四章得到表明的，黑格尔和唯心主义者认为人类意识的对象本身是虚假的，是人类意识创造出来的，而马克思主张，在对象那里始终存在一种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必要条件的“天然基质”。^①从这种主张中，马克思总结说，人类意识的建构本性不可能仅仅被局限于认知行为。他把认知行为看作是现实的发展与进化的整个进程：了解现实就包括塑造和改变现实。认识论不再是一种单纯反思性的认知理论，而是成为塑造现实的媒介：

当今所有唯物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主要缺点是对象、现实、感性生活仅仅以对象或感知 [直观] 的形式被人设想，而不是被设想为可感的 [69] 人类活动，

^① 《早期作品集》，页 122 - 123。这使接受对马克思进行的新天主教诠释成为不可能的，而这种诠释在其他方面是非常有趣的，它承袭早期卢卡奇（Lukács）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根本就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参见卡维斯（J. - Y. Calvez）：《卡尔·马克思的思想》（*La Pensée de Karl Marx*, Paris, 1956），页 380；霍梅斯（J. Hommes）：《技术性的厄洛斯》（*Der technische Eros*, Freiburg, 1955），页 84。

即实践，不是主观地被人设想。因此，能动的方面被与唯物论相反的唯心论抽象地加以发展，这种唯心论在本性上并不知道现实可感的活动本身。费尔巴哈推进了可感活动与思维对象之间的现实区分，但他没有将人类活动本身设想为一种客观的活动。^①

马克思的认识论居于古典唯物论与古典唯心论之间的中间地位。历史地看，它吸收了两种传统；由于它综合了两种传统，所以超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古老的对立二分。这种综合间接地解决了康德在认知领域与道德领域之间的二律背反。但马克思认为，当前的状况使得要实践这种新的、确切的认识论仍是不可能的；异化表明主体与客体之间对立二分的继续存在，这是作为仍被扭曲的认知过程的一个结果。

因此，马克思的认识论揭示了一种内在的紧张状态。它试图解决传统的认识论问题，但默认人的意识只有当阻拦它的障碍在当前社会中被清除时，才会根据新的认识论来运作。于是，马克思的认识论有时候违背自身而被划分为：既是关于意识的描述，也是关于未来的视角。因此，马克思从未完全否认各种传统机械唯物主义意识方式的有效性，因为它们乃是现存社会的异化生活的各种表现。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继续存在，这些不完善的意识方式就会存在。至少，这似乎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X 的结论。

这一结论当然会产生如下问题：马克思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专门地涉及社会—历史领域，并且这些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也能被延伸到自然科学领域？马克思的观点不可能与《反杜林论》或《自然辩证法》中所描述的恩格斯的理论相一致：卢卡奇和他的信徒们完全正确地主张，自然的辩证法——在恩格斯使用这个术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I，我这里采用的是罗滕施特赖希的翻译（同上书，页23），他的翻译远远优于《选集》的标准翻译。关于马克思对机械物质论的批判，参见《资本论》第1卷，页372-373。

语的意义上一——与马克思 [70] 理解唯物论的方式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恩格斯观点的来源必须在达尔文主义和生物学的庸俗化中加以寻求，同时黑格尔的术语只不过充当了一种外在的、甚至浅薄的外表。^① 施密特 (Alfred Schmidt) 非常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用他的辩证建构方法 *pari passu* [同步地] 建立了他的体系，而恩格斯不过是将一种辩证的机制运用到一系列给定的自然科学事实中，好像辩证的机制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的方法，而不是主体—物质的固有内容。不同的路径会导致不同的结果。^②

列宁本人最终放弃了他起初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形成的机械论方法。他的 1914 ~ 1916 年《哲学笔记》(*Philosophical Notebooks*) 包含了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全面摘录，并强烈地指出如下结论，即在这种反对他以前几乎从未研究过的黑格尔的思潮的冲击下，他逐渐欣赏起马克思认识论的非机械论特征及其对德国唯心论传统的情怀。正统的列宁主义可能发现面对以下的结论是有点尴尬的：“认知是思维向对象的永恒而无限的接近。自然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不能‘僵死地’、‘抽象地’被理解为没有运动，没有矛盾，而是必须被理解为处于永恒的运动进程之中，处于矛盾的产生和矛盾的解决之中。”^③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然不可能被看作好像是与人的行为割裂的，因为自然作为人的认知的潜在对象，已经受到前人的行为或接触的影响。因此，自然绝不是一种晦暗的事实。“人化自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页 17；莱夫：同上书，页 22 - 90；科拉考斯基 (Kolakowski)：“马克思与真理的古典定义” (Karl Marx and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Truth)，载《修正主义》(*Revisionism*)，拉贝兹 (L. Labedz) 编 (London, 1962)，页 179 - 188。

② 施密特：《马克思学说中的自然概念》(*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 1962)，页 42。

③ 列宁：《选集》(*Collected Works*, Moscow, 1961) 第 38 卷，页 195。这些笔记实际上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极度盛行的斯大林统治时期是不为人知的。

然”和“人类主义（humanism）等同于自然主义”的短语再次出现在马克思的作品中，他所指的“自然主义”实际上是这个被普遍运用到传统哲学探讨中的术语的反面。

[71] 人的意识与人所塑造的现实的实践进程的统一，是马克思的认识论与历史哲学的成就。对他而言，现实始终是人的现实，这不是在人存在于自然之内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在人塑造自然的意义上说的。这一活动也塑造了人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这是一个总体性的进程，隐含着主体与客体之间持续的交互关系：

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还是通过生育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都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我与我的环境的关系就是我的意识。……对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在总体上存在，它就总是这种产物。^①

另一方面，古典唯物论从未认为人的活动具有任何这样的哲学意义。它将人的活动归结为像“人的本质”这样的抽象拟设，这些抽象拟设所做的探讨使作为人的自我发展过程的历史不可能建立在它自身的前提之上。在马克思看来，普鲁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下开始探讨人的本性本身时，面临的的就是同样的困境，他忽视了如下事实，即人的本性自身是人的活动，即历史的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41-42。马克思在1835年的毕业考试的文章“一个男孩对职业选择的反思”中写下了下面的话：“正是本性本身决定了动物的活动范围，动物平静而温顺地实现它的本性，不会冲出它的局限性之外，甚至不会意识到可能存在的其他活动范围。神也赋予人以一种普遍的目的——人的人性的高贵——但要留待人自己去寻找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辑，第1卷第2部分，页163）。

不断变化的产物。^① 另一种选择，即把人的本性看作是所有人的最小公分母的观点，在此背景下可能并非特别有启发意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经典地加以总结的这种针对古典唯物论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更加详细的重述：

[费尔巴哈] 没有看到，他周围的可感世界不是一种直接从所有永恒中给定的事物，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工业和社会状态的产物；的确，在这样的意义上，[72] 即这个世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整个世世代代的人的活动的结果，每个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都在发展这个世界的工业和交往，都在根据变化的需要修改这个世界的社会体制。甚至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仅仅是通过社会发展、工业和商业交往被给予他的。众所周知，樱桃树，像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不过是一个世纪以前通过商业被移植到我们地区的，因此，只有通过一个确定的社会在一个确定的时期的这种活动，它才对费尔巴哈成了“感性确定性”。^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东西，在这里成了探究人类历史性质的大前提。按照他的观点，世界是由人塑造的这个结论回答了传统思辨哲学提出的问题，因为人与自然的统一的哲学拟设是通过人的现实的、经济的活动日常地得到实行的。而且，甚至自然科学仅仅就它们对人的需要做出反应，而不是由于它们关涉一个给定的前人类的世界，才成为人类探究的对象。这又是完全不同于恩格斯的论证的：马克思试图发现自然科学的人类意义，而恩格斯寻找一种适合人类世界的自

① 《哲学的贫困》，页 164 - 165。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57。

然科学方法论。

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差别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加以陈述。当费尔巴哈看到人与自然的统一通过人的存在体现为一部分自然时，马克思把人看作是塑造自然的，并且反过来，人的存在也是自然塑造的。费尔巴哈把人自然化，而马克思则把自然人化：

客观世界的实践建造、无机自然的操控，都是对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的证实，即一种将类看作人自己的存在或将人自己看作类存在的存在。当然，动物也有生产。它们建造巢穴、居所，例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它们只是生产对它们自身或幼崽绝对必需的东西。它们仅仅片面地进行生产，而人普遍地进行生产。它们仅仅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强迫下进行生产，而人在他摆脱肉体需要时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摆脱 [73] 肉体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动物生产的产品直接属于它们的肉体，而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仅仅按照它们所属种属的标准和需要进行建造，而人知道如何按照任何种属的标准进行生产，并且知道如何将恰当的标准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法则进行建造。

正是在建造客观世界的劳作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的类存在。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表现为人的世界和人的现实。因此，劳动对象是人类的存在对象化。^①

人的这种自我起源不仅意味着人通过自己与自然的接触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意味着这种活动创造着新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可能性。因此，人的需要是历史性的，不是自然性的，

① 《早期作品集》，页 127 - 128。

创造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永无止境的辩证追求构成了历史的发展：

[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时——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人自身就开始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这种生产方式不能仅仅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体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与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与他们生产什么一致，也与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①

马克思从未改变他对这个主题的观点，这可以在写于1857～1858年、初版于1939年的《资本论》的初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的一段话中看出来：

这种再生产必然地同时是新的生产和旧形式的摧毁。……

不仅再生产的行为本身改变客观条件 [74]——即把乡村变成城镇，把荒野变成农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通过在生产中改变和发展自身，通过形成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而随之改变。^②

1880年，即马克思去世前三年，他对瓦格纳（Adolph Wag-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31-32。

^② 《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Pre - 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1964），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编，页92-93。

ner) 的《政治经济学教材》(*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一书草拟了一篇评论。在这里,早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强劲已经让路给一种比较散漫的风格,但他的人类历史观仍是如一的:

根据这位职业教师的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不是实践的,亦即不是由行为造成的,而是理论的。……

人与外部世界的对象的关系是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手段。但人绝不是始于“存在于与外部世界的对象的关系之中”。人像任何其他动物一样,始于吃、喝,等等,也就是说,不是“始于”存在于一种关系中,而是始于是能动的,始于试图通过需要将外部世界的某些对象归于自身,因而试图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人始于生产。通过这个过程的重叠,那些作为“满足人自身需要”的对象具有的属性就灌输到人的思想中;人像动物一样,也“在理论上”学会将那些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外部对象从所有其他对象中区分开来。在发展的某个阶段,当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活动都得到扩大和增加以后,人就用他们的语言称谓这个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已经很熟悉的范畴。^①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Ⅱ的这一重述,强调了马克思的建立在其认识论观点基础之上的历史哲学。但这种关系有时导致对其立场的误解:人类活动(实践)的可证实性在马克思看来导致有些学者不加批判地将马克思与实用主义等量齐观。^②正如罗滕施特赖希最近所指出的,这种等量齐观忽视了两个理论的明显差别。

① 《著作集》,页 362-363。

② 胡克(S. Hook):《从黑格尔到马克思》(*From Hegel to Marx*),页 117; 维纳布尔(V. Venable):《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Human Nature: The Marxian View*, London, 1946),页 26。

实用主义始于人会适应一种给定的、[75] 先前存在的环境的前提，而马克思则将人看作是塑造人的世界的。马克思的观点也是与詹姆士（William James）关于外部世界在根本上具有非理性的其他前提不兼容的。相反，他总是认为世界对理性的认知是开放的，因为世界最终是由人自身塑造的，并且人能够对他的历史活动达到一种恰当的理解。^①

外部世界的各种属性由于是由能动的人类意识决定的，所以也就使各种各样的人类认知方式成为可能：认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导致认识论本身的历史化。对象的属性源于对象处于人类社会背景之中，对象的意义源于与之相关的具体人类意识的方式：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主观的方面。人的乐感仅仅是由音乐唤起的。最美的音乐对没有乐感的耳朵也是没有意义的，对它就不是一个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对我自己的能力的确证。它对我而言只能是在我的能力作为一种主观能力对它存在的范围内的那个样子。……对一个行将饿死的人来说，食物的人类形式是不存在的，而是只有食物的作为食物的抽象特征存在。这时食物也只会以最粗陋的形式存在，要说这种进食的能力如何不同于动物的是不可能的。贫困交加的人为生计所累，没有心情欣赏美丽的风景。矿工主也只会看到商业价值，而不是矿石的美或独特的性状；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②

现实在古典唯物论看来好像是一种单纯消极的感知对象，对马克思而言则是人的现实，这不仅是因为现实是由人塑造的，而

① 罗滕施特赖希：同上书，页 52。

② 《早期作品集》，页 161 - 162。

且是因为它反作用于人自身。活动不仅在与对象的关系中是动态的，而且在与主体的关系中也是动态的。因此，马克思从未将社会经验归于线型因果关系，因为这种表述会忽视具体的人类—历史经验。这也是他的名言“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而是相反，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① 的含义。“社会存在” [76] 无疑包括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这句广为引用却知之甚少的话所作的最糟糕的评价，莫过于认为它是同义反复的。如果“社会存在”是有意的行为，是对外部对象的塑造，这种行为就意味着一种与这些外部对象发生关系的意识。无论如何，马克思从未说过“存在决定意识”，而是说“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陈述。

这一分析也有助于澄清马克思区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② 以及所谓的“生产的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所产生的困难。已有人认为，这种区分设定了从社会关系背景中抽取出现在其中发生的生产力是可能的。一些批评也正当地指出，个体不可能像生产力是石头或金属一样的物质对象那样，探讨生产力，因为社会的物质生活——它在马克思看来决定社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形式——已经包含了一些具有非物质内容的形式。这种观点是有效的，但基本上与马克思的论证无关。假如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是不需要人类意识对其出现和存在加以中介的客观经济“事实”，那么问题真的就会很严重。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并不是外在于人类意识的客观事实。生产力代表的是人类意识与人类活动的组织化：尼亚加拉大瀑布是否构成一种“生产力”不是由于它的天然的、“客观的”属性本身，而是由于周围的社会是否把它看作是一种生产力，是否能够驾驭它，使之服从于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因此，“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

① 《选集》第1卷，页363。

② 参见阿克顿：同上书，页142-165；莱夫：同上书，页110-135。

的区分不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区分（恩格斯在其后期作品中就是这样区分的），而是有意识的人类活动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区分；有意识的人类活动旨在创造和维护人类生活的条件，而人类意识为人类活动所具有的具体形式提供理性、理性化以及合法化与道德辩护的方式。

因此，社会关系的结构被马克思视为 [77] 人类活动的本质所在，人类活动在认识人类世界时不断创造和改变它。结果，对社会关系的批判就是最具体的、人性的批判，对人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探讨人的活动，因为“人不是一种蹲踞在世界之外的抽象存在。人是人类世界、国家、社会。”^① 具有自身社会背景的意识建构特性，在马克思的术语中也是明显的。他将形容词 *wirklich*（真正的、现实的）与动词 *wirken*（作用、影响）联系起来：“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特定个体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的个体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个体，而是现实中的个体，也就是说，这些个体是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wie sie wirklich sind, d. h. wie sie wirken* [他们是如何实现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发挥影响的]）。”^②

这种人类活动的具体体现就是劳作，即创造将自身的影响施加给世界的人类活动的工具。既然马克思将劳作称为人的具体属性，他就把历史设想为劳作方式世代代的继续。马克思关于经济活动的探讨的卓越之处不是源于物质经济价值的卓越，而是源于他把人看作是 *homo faber* [劳动人] 的观点。劳动得以显现的各种条件，提供了理解人类历史及其最终的和固有的可证性的钥匙。

① 《早期作品集》，页 43。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36-37。

3.2 劳动、历史与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并不认为自己是第一个主张人通过自己的劳作创造人本身的人。他的一些评论表明他受到了维柯（Vico）的影响，并且他在一个关于技术发展的事例中提到了维科，他把技术看作是最有特色的人类科学。^①于是，马克思将这一观点与一种更加完备的方法联系起来：如果人是通过他的劳动而具有人的特征的，那么现代资本主义时代，[78]由于工业的普遍运用这一特征，就将人的创造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工业正如在它的运动、即资本中被揭示的，不同于先前所有的财富形式。直到现在，财富从未被认为是内在于自然对象如土地、黄金等之中的，而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被设想为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形式。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把斯密称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因为他是第一个不把财产看作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的主体的表现的人。^②

马克思在一个有趣的旁白中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活动方面所表述的东西，黑格尔早已从哲学上作过阐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黑格尔站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因为他在劳动中看到了人的自我实现的本质。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创造性本性，却没有察觉在当前社会伴随劳动出现的异化状况。尽管如

① 《资本论》第1卷，页372。我们从至少两个来源知道，马克思在1862年，即他写《资本论》第1卷初稿时，正在读维科的书。见马克思1862年4月2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77）和同一天写给拉萨尔的信（《著作集》第30卷，页228）。关于维科的人通过自身“诗意的”理性创造世界和自身的观点，见维柯：《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New York, 1961），伯金（T. G. Bergin）、费舍（M. H. Fisch）译，页332，页336，页376，页520，页692。

② 《早期作品集》，页147-148。

此，马克思在黑格尔那里看到一种清晰的实现，即人的创造性属性使人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有能力进行普遍的创造。^①

这就使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看作不仅是将异化普遍化的最极端的社会系统，而且是最终废除旧对立的新状况的源泉。^②这是与他在《批判》中的主张相似的，即民主制由于是人类惯常活动的范式，将为废除使国家成为必需的各种条件铺平道路。

马克思有关劳动过程的描述使他再次陈述了自己关于古典唯心论和古典唯物论的立场。如果说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人类意识的建构性因素，那么他对黑格尔仍是持批判立场的，因为黑格尔将人类活动的对象仅仅看作是人的自身意识的投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在自身意识中的这种自我封闭绝不会克服客体与主体的对立二分。对他来说，劳动过程是现实和客观的，发生在外部世界中，而不只是发生在人的自我意识中。劳动只有在它给 [79] 一个外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的世界留下印记时，才成为历史的过程。我们说人要求客观现实性，仅仅因为他的对象是外在于他的。马克思对他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辩证性质提供了一种深刻的洞见：

人直接是一种自然性的存在。一方面，人作为一种自然性的存在，作为一种有生命的自然性存在，被赋予自然的力量和才能，这些力量和才能在人身上作为倾向和能力、作为欲望存在。另一方面，人作为一种自然的、有躯体和有知觉的客观存在，也是受苦的、受限制和有限的存在。他的欲望对象作为独立于他的对象存在于他自身之外，但它们是人的需要的对象、本质性的对象，是人的才能的锻炼与证实必不

① 《早期作品集》，页 125 - 126，页 202 - 203。

② 马克思 1868 年 3 月 17 日写给库格尔曼的信（《写给库格尔曼的信》，页 65 - 66）。

可少的。人是一种具有自然力量的有躯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的、有知觉的客观存在，这个事实意味着人将现实的、可感的对象当作他存在的对象，或者说，他只能在现实的、可感的对象中表现他的存在。……

饥饿是一种自然需求；因此，饥饿需要一种在它自身之外的自然、一种在它自身之外的对象，以便得到满足和平静。饥饿是躯体对一种对象的客观需求，这种对象存在于躯体自身之外，对躯体的完整和躯体性质的表现是本质性的。太阳是一个对象、一个对植物而言必需的和确保生命的对象，正如植物是一个对太阳而言的对象，是太阳的赋予生命能力和客观本质的能力的一种表现。……

一个无对象的存在是一种非存在。……^①

这对马克思的历史学说是一个关键点，因为这个过程也在人类活动的主观方面，即人的需要的创造中进行着。历史不仅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也是人的需要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动物的需要是持续性的和由自然决定的，而人的需要则是社会性的和历史性的，也就是说，最终是由人自身决定的。^② 马克思否认，具有自身需要的每一代人的意识都是人类意识对单纯物质性刺激的机械的、自动的反应。人的具有自身需要的意识是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前辈人取得的文化价值的证明。需要将与物质对象相关联，但那种将对这些特殊对象的需要看 [80] 做是人的需要的意识，本身就是具体历史状况的产物，不可能是 a priori [先天] 决定的。^③

马克思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持同样的观点。在《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 Labour and Capital*, 1849) 的一段著名的话中，他

① 《早期作品集》，页 206 - 207。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39。

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41 - 42。

给出了一座小房子的例子，这座小房子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时，显得适合房子主人的需要。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它就从小房子缩小成茅舍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它们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由于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性质”^①。在《纲要》中，马克思斥责普鲁东想象一种基于固定的人类需要的人类行为模式；他指出，由于古代人的基本需要是少量的和原始的，关于物物交换的发展的历史解释不可能充当现代复杂社会的模式。既然历史的发展丰富了人的欲求，人的欲求就不可能在不关涉创造它们的生产方式时得到衡量。从这种观点看，阶级斗争残酷地演证，欲求的满足总是落后于从社会组织中萌发的期望。由于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形式，这些受到挫败的期望现在就比以往任何社会都繁多和有力。^②

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未来的展望中反映出来。不仅生产条件构成比单纯的经济“事实”更多的事实，而且所有形式的人际关系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因此，它们可以有意识地加以掌握和引导。人的欲求不是自然性的事实，这隐含地保证了一种人类秩序能够恰当地提供和满足的需要。如果人类社会可以产生某种层次的需要，一个人要满足需要，就只需某种恰当的社会组织就够了。如果社会还没有达到潜在满足的层次，感到需要的层次就不会达到同样的程度。这是隐藏在马克思的格言——即人类只为自己确立他能够解决的任务^③——背后的含义。一种需要只有当它是一种人类需要，也就是说，当它 [81] 通过意识加以中介时，才能得到满足。因此，经济学是解开人的奴役与救赎之谜的

① 《选集》第1卷，页93-94。

② 《纲要》，页506。

③ 《选集》第1卷，页363。

钥匙。^①

如果人的需要是通过人的意识和活动加以中介的，人的心灵就必须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有一种意向能力，而这种能力本身并不是这些需要的产物。人们有时批评马克思没有顾及对一种自律性的意向能力的需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赋予人的心灵以发展一种先于产物本身的有形存在的终极产物模式的能力。马克思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强烈地表明，他并没有忽视其中涉及的哲学困境，尽管他也没有阐明理想模式借以在人的心灵中先于物质生产被创造出来的过程。但他的确对有意的人类劳动与任何相似的动物活动作了重要的区分：

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参与其中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当人通过这种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量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性本能的劳动形式。……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

^① 参见林赛 (A. D. Lindsay)：《马克思的〈资本论〉》(Karl Marx's Capital, London, 1925)，在该书中作者反对现代工业，认为它与其说是靠满足需求过活，不如说是靠创造需求过活；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工业中看到历史已经懂得在一种前所未闻的层次上满足需求的最大机会。加尔布雷思 (J. K. Galbraith) 在《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London, 1958) 中运用同样的论证反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有些批评家已经指出在加尔布雷思的论证中隐含有加尔文派的残余。

中存在了。……^①

[82] 从劳动与历史过程的关系中，马克思得出财产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如果需要是历史的和社会的事实，而不是客观的事实，组织和调节这些需要的概念和制度也就必定是历史的。因此，任何特殊的财产概念都是相对的、历史地被决定的和短暂的。马克思意识到没有人可以真正挑战这样一种观点，但他批判诸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理论，这些理论有时候认为各种经济范畴和概念的存在不可归结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这一立场看，他对普鲁东的强烈攻击是与他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一的。马克思在 1865 年的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Wages, Price and Profit）的演说中强调：只有在社会背景下产品才会变成商品，为了自身的需要进行生产的人不会生产商品。他的产品不会满足跨主体的人类需要，因而没有价值。生产正是在其本性上关涉到人际的联系方式。^②

这种推理意味着马克思不能在原则上接受任何一种始于人的存在或行为的个体主义模式的经济理论。这样的模式是从为了自身的需要进行生产的个体生产者开始的。在观念上，他的生产是独立的和鲁宾逊式的；交换仅仅是伴随着生产的更大发展才出现的。马克思对这个理论的反对没有局限于驳斥它是一种与业已发生的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的历史解释。这种理论是社会契约论的一个变种，像社会契约论一样，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作出历史的解释，而是提供一种分析性的、解说性的行为模式。马克思认为，“鲁宾逊”作为一种解说性模式是谬误的和误导性的，因为它预设私有财产的存在先于任何人类关系的存在，而财产显然是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

① 《资本论》第 1 卷，页 177 - 178。在苏联出版的英译本完全漏掉了这段话接下来的总结性短语：“即已经以观念的方式存在（also schon ideel vorhanden war）”。

② 《选集》第 1 卷，页 416 - 417。

更有甚者，个体主义模式探讨的也是未经区分的人类实体，这种实体是从个体的具体身份和状况中抽象出来的。这种模式不是探讨那些出现在现实的人类关系中的现实个体，而是去除掉个体身上 [83] 使个体的存在变得现实的一切属性。一旦探讨涉及的不是抽象的、无属性的个体，而是一个工人、农民或资本家，有关个体的界定就隐含着他人的存在，这种探讨处理的就不是原子式的个体，而是一种社会背景中的现实个体，因为它预设了劳动分工。^① 就像语言只能作为跨主体的媒介存在一样，财产也不可能在人的情境之外加以探讨。马克思将普鲁东的名言“一切财产都是偷窃”看作这种谬误的顶峰。一种行为只有在一种财产体制先于财产的发生而存在时，才能被称为“偷窃”。因此，普鲁东的格言要么隐含着无穷倒退，要么就是一种 *petitio principii* [预期理由]。普鲁东似乎是通过假定财产的合法存在来使财产的合法性无效的。当时社会主义几乎没能找到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理论基础。^②

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社会主义信徒们，在马克思看来已被诱导入这种恶性循环，因为他们将财产的特殊历史形式抬高为绝对的标准。结果之一就是无法设想一种仍必须发展现存财产关系的状况。马克思对普鲁东展开的一些绝少暴风骤雨的反驳，虽然肯定不会得到原谅，但或许可以得到解释，因为他对普鲁东完全没能把握这个基本的逻辑问题感到沮丧。普鲁东同样也将资产阶级财产——它毕竟只是财产的一种历史形式——看作财产的最卓越的范式。关于没有考虑自身历史背景的资产阶级财产的任何探讨，都不可能为废除资产阶级财产提供建议。^③ 在《哲学的贫困》中写下这个观点后的第三年，马克思将同样的批判指向德国社会

① 《哲学的贫困》，页 113。

② 马克思 1865 年 1 月 24 日写给施魏策尔的信（《选集》第 1 卷，页 391）。

③ 马克思 1846 年 9 月 28 日写给安瑟科夫（Annenkov）的信（《书信选集》页 39-40）。

民主党人，他们将自身从财产和社会的历史形式中抽象出来，从而对他们而言，要想为废除财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塑造历史工具就变得不可能了。^①

由于适用于财产的东西普遍地适用于社会范畴，马克思针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论战就获得了广泛的意义。他觉得这些范畴，[84] 作为给定的历史—社会背景的产物，必然受到它们旨在解释的东西的限制；因而，它们的用于解说的恰当性内在地是有冲突的。然而，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并没有使马克思通向单纯的相对主义。准确地说，因为范畴反映的是一种历史性的现实，所以被反映的现实越发达和越复杂，与之相关的范畴就越真实和适宜。黑格尔的历史观在这里显而易见：每个历史范畴都与以往世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相结合，每一代都是站在自己前辈的肩膀上的。扬弃的辩证法确保人经历和解释世界的能力有一种进步的和扩展的连续性，但这不是因为世界是一种给定的客观事实，而是相反，因为世界是被人有意识地创造的。解说性的范畴本身有助于人对他的世界的塑造。在《纲要》的非常明确的一段话中，黑格尔作为反思（Nachdenken）的哲学观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

劳动这个事例清楚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就这种抽象概念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仅仅对它们所处的条件而言并在它们所处的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解释市民社会的条件和市民社会的结构关系的范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洞察所有那

① 《哥达纲领批判》，载于《选集》第2卷，页19。

些业已消失、而市民社会就建立在其废墟之上的社会形式的结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但绝不能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①

这一陈述可能造成如下问题，即通过将人归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是否使得探讨人的超越自身具体可感形式的模式变成不可能的。但在批判人的当前实存是对作为类存在的人的违背时，马克思采用了一些看似规范性的标准。[85]认为这并不代表其早期作品与后期作品之间的一种对立二分的观点，使问题更加复杂了：把人归于他的历史条件和拟设人最终作为类存在而出现，两种看法同时出现在1843~1846年的作品中。

有关这个困境的解答可能要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去寻求。马克思把历史看作塑造人的、同时人将自己印在世界上的观点，使得将任何先天的本质归给人都是非常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人塑造世界的功能本身变成人类实存的经验内容。这个过程把人变成人，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把人的根本能力归结为创造和改变人的生活条件。这种连续创造的内容是动态和变化的，提供了历史过程的内容。永不变化和永不变更的东西是历史性的创造，作为持续的人类起源，这源自于人的创造对象的能力，人在对象中实现自己的主体性。

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特的，即人的作为人的形象超越了人的具体历史情境，但这种形象不是源于任何形而上学的前提，而是源于对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投射的人类历史的分

① 《纲要》，页25-26。

析。这种分析将马克思与实证主义和古典唯心论分离开来。人的创造能力造成劳动的历史性的出场。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感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将劳动拟设为人类生活的目的时忽视了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劳动就是人类历史生活的源泉和日常内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寻求的在遥远的将来出现的东西，就发生的他们眼前，就发生在每个人类社会中，尽管是以扭曲和异化的形式。^①

人类活动的这种非规范性的标准导致马克思感觉到，人的自我创造需要的条件在当前社会是失败的。劳动应当是人的自我生成过程，因为它是人的具体属性。在当前社会，劳动没有发展人，而是弱化人。当前社会的劳动过程不是增加人的创造性维度和拓展人的 [86] 人性，而是使人沦落为商品，人的劳动产品，在本性上即人的将自身印在外部世界的能动意识在现象中的实现产物，成了人的主人。^② 用蒂利希 (Paul Tillich) 的话说，人的生存条件使人与人的本质功能分离开来。^③ 因此，异化的观念是不可分离地与马克思所表明的作为人的独特属性的参与性的、建构性的和非反思的意识特征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转变性的方法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纯粹的哲学论证中帮助了他。通过异化的分析，在人类状况中出现了极端革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将使人能够获得他的自我创造性的充分潜能。人作为自己和自己世界的创造者，也为分析他当时的历史生存条件提供了一种标准。假如马克思缺乏这样一种标准，他可能就没法将自己从侵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列宁作品中的相对主义的实证主义中解放出来。当然，这样一种实证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501 - 502；“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入《选集》第 1 卷，页 386。

② 《早期作品集》，页 138。

③ 蒂利希：《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中的人》(*Der Mensch im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Stuttgart, 1952), 页 3 - 7。

主义观点肯定会在历史与哲学之间、无产阶级与革命——作为劳动人的潜能的实现——之间造成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

3.3 社会人

既然生产不可能独自完成，马克思就从人的作为创造对象的存在者的特性中推演出人的社会性和跨主体性。因此，人与其同类成员的关系不仅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而且决定着人的生存内容。因此，人的客观存在和他的关涉他人与社会交往的属性，充当着评价经济理论和社会结构的标准。

这种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1843 年的《批判》，在那里马克思拟设了“人的共产主义存在者”，反对那种最终将人归于自我毁灭的享乐主义的个体主义。〔87〕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将人的这种形象称为类本质，将人称为一种类存在。人类实存的这种模式不可能来源于人的作为一种原子主义或个体主义生物的实存，而是预先假定人的相互的、跨主体的活动和取向。

马克思对个体主义模式所持观点的广泛意义是明显的。个体主义——假设它建立在自然法或斯密的 *homo economicus* [经济人] 基础上——认为，可以设想人类活动的一种完全地和排他地属于个体的领域。这样一种假说遇到的主要困难在于，个体之间根据这种模式进行的唯一可能的行为交往是对立性的。旨在达成团结的任何人类行为都不可能最终内在地从这种模式中得出来。即使从这种模式中得出的人际关系不会是明显对立的，人们仍会将他人当作手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态度使他们像类存在那样、亦即按照他们的人类基本规定行事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以这种人类学的方式重述了康德的绝对命令，意味着人只有把他人当

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才会像一个类存在那样行事。^① 克服这种缺乏团结的状况——这种状况是个体主义模式的运用导致的自然结果——的唯一方式，是给它添加一种调节性的因素。但正如康德的二律背反所表明的，这种因素必定是外在的和他律的。它只会加重最初模式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试图通过把所有人类活动看作社会性的和指向他人的来克服这个障碍；这些活动要么依赖、要么影响他人的经验。这是作为人类行为的 *differentia specifica* [类别差别] 的对象化的直接结果，甚至对科学来说也是这样：虽然科学可以不必然地直接涉及任何人，除了科学家本人，但至少他的活动中介——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科学发现将最终逃离发现者的个人掌握范围而被其他人利用。而且，马克思感到“社会”和“个体”并不是两个彼此排斥的实体：对他来说，每个概念在自身之内都包含着另一个概念的某些环节。[88] 存在与意识的对立二分可以通过个体与社会相统一的激进观点加以弥合：

尤其必要的是避免再次把“社会”拟设为一种与个体相对立的抽象物。个体是社会存在。因此，个体生活的显现——甚至当个体生活没有直接以一种共同显现的方式，即在与他人的联合中表现出来——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显现和肯定。个体生活和类生活并非不同的事物，即便要么个体生活的生存方式必然是一种更加具体的方式，要么类生活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更加普遍的方式。……

在人的类意识中，人证实自己现实的社会生活，并在思想中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虽然人是一种独特的个体——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一个真正个体性的共同存在——但他同样地是全体，即理想的全体，作为思

① 《早期作品集》，页 52。

维和经验的主观性社会实存。人在现实中生存，作为社会实存的代表和现实心灵，作为人类生活的各种显现的总和。

思维和存在的确是不同的，但它们也形成一个统一体。^①

如果思维和存在是相同的本质具有的两种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个领域的传统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那种把人看作自足性原子的市民社会的观点，预设了跨主体的领域没有任何内容，并没有什么用处。它也预设了个体的自我意识与各种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组成的外部系统之间的一种断裂。^②

马克思得出了如下结论，个体只有在一种承认人的社会性和与他者相关的属性（Other directedness）的背景中，即在一种被界定为与“人是类存在”相称的唯一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有意义地达成一种关系。在这种社会中，对他人的需要作为人类生存的根源，上升到意识。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人才会察觉到人的需要不可能被归于肉体实存的方式。这种社会必须认识到，人对其同类存在者的需要对他的人性而言是根本性的。这样一种人学观的有效性是由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提供的，这种经济结构不容[89]置疑地证明了人对人的普遍依赖。这种依赖源自于人的本性的固有展现，马克思通向社会主义的方式与其说是一种将个体归摄于抽象整体之下的集体主义，毋宁说是一种试图打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壁垒并寻找重新统一人的实存的这两个方面的关键点的尝试。^③

① 《早期作品集》，页158。

② 《神圣家族》，页162-163。

③ 《早期作品集》，页164：“从这一点会看到，我们是怎样拥有富人和大量的人类需要的，而不是谈论政治经济学的富裕和贫困。富人同时就是需要人类生活的形形色色的显现的人，他的自我实现是作为一种内在的必要性、一种需要而存在的。”巴曾指出：“在马克思身上，个体重又什么也不算，没有了他自己的任何原初意图”（《达尔文、马克思、瓦格纳》，页14），这种评价是很不正确的。

在这个情境内，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类生活的最终倾向，看作是人与生活环境的同一。他把共产主义界定为“对私有财产、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 [并且] 因而是人向作为社会存在，即真正人性的存在的自我的回归，一种吸收先前发展的所有财富的彻底而有意识的回归”^①。马克思在社会的实存——社会的实存就是由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各个生活部门在当前组织起来的——中为这个命题找到了方法论的证明。

奇怪的是，马克思是在家庭中，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在异性之间的关系中发现未来的这种范式的。按照他的观点，这些关系的独特样态具有系统的意义，即有可能将这些关系反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的普遍模式。性关系既是必要的，也是自发的，它也是典型地关涉他人的。人在性关系中对同伴的需要使得他自己的满足依赖于对方的满足。性关系无疑是相互性的。如果性关系是单方面的，它就不再是一种关系，而是将对方降格为一个单纯对象的地位，而不是一个对等的主体。《经济学—哲学手稿》探讨共产主义社会的章节对性关系有长篇的专论，在那里马克思说道：

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 [90] 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直接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直接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而，从这种关系出发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

① 《早期作品集》，页 155。

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①

这些考虑也有助于解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家庭的带有恶意的——如果不是粗俗的话——的攻击。《手稿》的文本揭示了马克思对于他认为乃是性关系的极大歪曲的东西怀有的感受。按照他的看法，19世纪资产阶级世界甚至使家庭生活的有限相互性都成为不可能的，并且把女性变成一种单纯的对象：

资产阶级把他们的妻子看作一种单纯的生产工具。……当前的家庭，即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资本，私人获利。……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与子女的神圣的相互关系的噱头全都是令人厌恶的，越是令人厌恶，就越是出现如下情形，通过现代工业的行为，无产者之间的所有家庭关系都被撕碎，他们的子女变成简单的商业物品和劳动工具。^②

在这一探讨中有明确的黑格尔含义，尽管马克思的这些建构是高度原创的。黑格尔在《法哲学》的第158节把家庭看作“天然伦理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相互性基础上的。对黑格尔来说，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废除了这种相互性，仅仅在内部家庭关系的有限领域使它完好无损。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甚至使这种

① 《早期作品集》，页154。

② 《选集》第1卷，页50-51。

“伦理”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也成为不可能的。只 [91] 要市民社会存在，它就会挫败家庭生活的相互性内容。解决之道不是建立一个位居家庭模式之上的社会：这是浪漫主义 *pars pro toto* [以偏概全] 的谬误。对马克思来说，家庭和性关系只有在它们指向关涉他人的关系的可能性时才能够成为一种范式。整个问题是要避免将家庭（或性）浪漫化，同时达到一种将性关系的基本结构原则变成社会组织的普遍原则的解决之道。一种可能的答案是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引起人对人的普遍依赖并使这种普遍依赖变成人类行为的有意识的原则。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对生产体制的正确理解和转变基础之上的。

将私有财产看作私人生活的特殊领域的观点不可能接受人的一种关涉他人的社会形象。马克思承认财产的社会属性，但现代的财产理论采用的是罗马人的 *plenum dominium* [完全所有权] 观念，使个体的 *ius utendi et abutendi* [使用和滥用的权利] 变成相互排斥的绝对概念。这一理论没有给互助或团结留下空间。从逻辑上讲，个体主义的财产观是一种谬误。^① 它是基于同意和社会团结的（“社会契约”），但它又否认它们。如果它们公然遭到否认，它们就不可能充当财产的基础。

《共产党宣言》中唯一直接探讨未来社会的段落重述了共产主义关涉他人的本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分化的个体主义的并驾齐驱：“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当然，这可能是一种空洞的 *cliché* [陈词滥调]，除非读者意识到它是马克思的理论前提的一个直接结论。

① 《纲要》，页 74：“经济学家们通过指出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私人利益并且只关心他的私人利益，并以这种方式无意识地符合公共之善，从而表达了这种观点。……但关键是私人利益已经是一种被界定的社会利益，它只有在社会所确立的条件内和通过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获得。”

② 《选集》第 1 卷，页 54。

这个“联合体”不单单是组织或经济方面的，[92] 它涉及人的以人类生产与实存方式加以体现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把在越来越复杂的现代工业生产的条件下对合作、社会化和团结的日益增强的需要看作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一种在其核心体现人的社会性质的结构的内在证据。尽管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个体主义模式，但复杂的生产要求关涉他人。因此，当资本主义原则无法应付这种局势时，更加强烈地需要社会交往和关涉他人的暗示就会得到不断增强。

这种使终极自由建立在对人与人相互依存的普遍承认（“联合体”）基础上的观点，是黑格尔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观点的一种世俗版本。但在1843年的《批判》之后，马克思赋予这个观点以一种新颖的含义。不像黑格尔的观点，他的观点不是将人归于一种对不可改变和不可挑战的环境的消极接受和顺从，相反，正是环境的改变（通过与其他人的合作来完成）给予了在黑格尔那里仍属于路德内在自由的一种世俗版本、而无力改变外在现实并将人自己的印记加于外在现实的东西以一种能动的和革命的含义。

这也使得个体的变化是否会造成环境的变化或者相反的问题变得毫无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由于作为一种不同于“个体”的实体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所以个体的变化事实上就是社会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就是个体的变化。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将要克服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传统裂隙；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同样错误的。^①

未来社会的模式意味着团结也是社会主义活动获得成功的一个条件。马克思认为，目的不能与实现目的的历史手段相脱离。目的不能通过否定目的的手段有意识地加以实现——这不是由于道德的原因，而是由于单纯经验的原因。通过[93] 否定目标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525-526。

的手段达到的目标，必将不同于最初想象的目标，因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它自身历史的总和。因此，马克思在1864年解释无产阶级的弱点时，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说道，工人之间的团结和相互依存感的缺失成了工人阶级失败的主要原因。^①考虑到马克思的理论前提，这并非单纯的训诫。1870年他在给共产国际全体会议的一次特殊报告中同样地说明，英国工人所在的国家客观上享有达到一个新社会的最先进的条件，但他们仍缺乏使他们从自身的优势地位中获得普遍而共同的社会意识的意识。^②

人的社会性质是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培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主要取自1844年《手稿》的一些段落的语言提到这一点：

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③

1880年马克思在其关于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评论中采用了同样的语言。他主张，不能抽象地对待人，而是必须在任

① 《选集》第1卷，页387。

② 《文选》(Recueil)第2卷，页135。

③ 《资本论》第1卷，页79-80。马克思在这里和在上文引述的《共产党宣言》的段落中把“自由的”和“联合体”结合起来。因此，自由对他来说不论是其早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中都有一种具体的含义。自由并非一种单纯的“资产阶级偏见”，而独断的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之流本来就喜欢带有这种偏见。

何情况下都指出具体的背景。具体的背景可以免于这样的断言，即对一个人有所知，却对他所处社会的一些信息毫无所知，这同样地不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产物”（这样一种非辩证的思想不同于马克思，尽管也不同于恩格斯），而是因为人与社会是同一个东西，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环节。^① 马克思 [94] 在同一时期写给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的信件的第二稿中评论说，原始的公有生产与其说标志着生产资料的有意识的社会化，毋宁说验证了孤立个体的不足。正如他在《纲要》中所言，个体只有通过历史过程才能与自然的普遍性区分开来——这是一种偶然地相距黑格尔较近的观点。^②

这个论证的许多地方已经在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提纲IX中得到了拟设：“玄想的唯物论，亦即没有将可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论，达到的最高点是市民社会中单个个体的玄想。”^③ 因此，费尔巴哈被认为是在使用人的一种抽象物，因为他不能通过历史理解人。

从这些立场出发，尽管马克思关于普鲁东从未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局限的判定可能是严厉的，但却是有有效的。他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主要论证是，普鲁东的个体主义经济模式忽视了人的关涉他人的面向，预设劳动分工却疏漏了劳动分工的历史意义。结果，普鲁东必定提出他的二律背反，这些二律背反将私人之善与公共之善并列起来，好像二者是相互排斥的实体一样。马克思也指出，这样一来普鲁东会如何毁掉自己的整个模式，因为他在纯粹个体主义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是“共同的”、“普遍的”和“社会的”东西应当占统治地位，而这个结果与他的最初前提彻底矛盾。最重要的是，普鲁东把人性或社会看作是“最终的

① 《著作集》第19卷，页363。

② 《马克思—恩格斯档案》（*Marx - Engels Archiv*）第1卷，页321；《纲要》，页395 - 396。

③ 《选集》第2卷，页405。

主体”；而对马克思来说，这意味着现实个体向单纯对象地位的降格。普鲁东的个体主义使他通向一种野蛮的集体主义；马克思则努力避免从一边滑向另一边的极端化。^①

马克思意识到他自己最终会使、或者显得会使社会居于个体之上。但对他来说，对于他的理论的这种诠释本身仍是在专注于[95]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或者个体与社会的想象中的二律背反。对他而言，在任何社会都绝不会有、也从未有过“社会”高于“个体”的情况。如此得到描述的现象其实是一些个体通过另一些个体占据统治地位，而“个体”又是在“公共之善”的意识形态的协助和唆使下抬高“社会”的。“理论共产主义”，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称呼自己的理论，把历史看作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一场对话。各个概念是相互结合的，因为它们的辩证关系使它们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会存在：

理论共产主义者，作为唯一有时间献身历史研究的人，之所以是卓越的，正是因为唯独他们发现在整个历史上‘普遍利益’都是由那些被界定为‘私人’的个体创造的。他们知道，这种矛盾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矛盾，因为矛盾的一方、所谓的‘普遍利益’正在不断被另一方、私人利益所创造，前者绝不反对后者是一支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但这种矛盾在实践上总是在被破坏和复制。因此，这不是黑格尔的矛盾双方‘否定统一’的问题，而是先前由物质决定的个体生活方式的现在由物质决定的毁灭的问题，随着个体生活方式的消失，这种矛盾连同矛盾的统一也消失了。^②

① 《哲学的贫困》，页35-42，页100-110，页129-135。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267。苏联的英译本把 *theoretische Kommunisten* [理论的共产主义者] 译为“communist theoreticians”（共产主义理论家）。这显然是有意的误导。

第四章 异化与财产

4.1 唯物论前提

[96] 马克思通过反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异化（Entfremdung）观形成了自己的异化思想。因此，马克思的探讨涉及普遍的哲学意义的问题，而关于异化劳动的比较有限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更加广泛的背景下才是有意义的。马克思对黑格尔探讨异化问题的方式所作的批判重申了他对唯心论哲学的普遍批判，并且他的唯物论就是从异化问题的这种讨论中诞生的。因而，他的异化观和他的唯物论是不可分离的。

马克思作品中的异化主题第一次是由卢卡奇在他的不朽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1923) 中提出来的。在不知道《经济学—哲学手稿》存在的情况下, 卢卡奇成功地在马克思的后期作品中解读出黑格爾的异化问题, 因而确立了马克思理论中异化的重要地位。这是一项出色的理论功绩, 《手稿》在随后的发现证实了卢卡奇的大部分洞见。但卢卡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出了错, 对于他在 1923 年出版的这部划时代的著作, 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仍然有必要有所保留。^①

既然异化在黑格爾的著作里出现在一种认识论背景中, 马克思就在同样的探讨层次上反对它。他最终是这样做的, 但大多数人忽视了被冠以“黑格爾辩证法与哲学的普遍批判”之名的 1844 年《手稿》。异化对黑格爾来讲是意识在了解外部的、客观的、现象的世界时的状态。在这个阶段, 对象对人表现为外部的和异己的, 意识感觉 [97] 自身在这种他在 (*Anderssein*) 中是疏远和异己的。按照黑格爾的观点, 意识通过认识到那种表现为外部对象、因而否认意识的权威地位的东西不过是意识自身的一种投射, 也就是说, 通过认识到意识在根本上始终是一种“自我意识”, 在其中意识仅仅感知自身, 从而把自己从这种异化中解放出来。显得外在于意识而存在的对象, 终究不过是意识在现象上的一种体现。意识的最终目标是达到这样的认识: 用黑格爾的话说, 意识由此回到自身。这个著名的“否定之否定”——对否定意识的对象具有的实存进行的否定——认识到, 对象仅仅是被异化的意识。当意识认识到这种关系时, 它就在这种被对象化和异化的他在中认识了自己。因此, 不存在外在于意识自身的可

① 在卢卡奇将 *Vergegenständlichung* (objectification) [对象化、物化] 与 *Entfremdung* (alienation) [异化] 等同起来时, 尤其凸显出了他的差错。这不仅是误导, 而且彻底模糊了马克思对黑格爾的批判。在卢卡奇后期的著作例如《青年黑格爾》(*Der junge Hegel*, Zürich and Wien, 1948) 中, 他考虑到了《手稿》的文本依据。卢卡奇个人的生活沧桑, 主要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出版造成的后果, 参见沃特尼克 (M. Watnik): “相对主义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 (*Relativism and Class-Consciousness*; Georg Lukács), 载《修正主义》, 拉佩茨 (L. L. Labedz) 编, 页 142-165。

认识的对象，这显然就是唯心论哲学的精华所在。

马克思在一个关键点上攻击这个理论：它将对象的实存与异化等同了起来。由于对象被归结为一种单纯的幻想和意识的一个谓词，马克思再次运用了转变性的方法。既然这种否定客观世界的实存外在于意识的观点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就要重新思考对象化与异化的等同性。他区分了对象化与异化，将对象化看作物质实存的前提，而将异化看作是由人与对象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方法导致的意识状态。^①

马克思主张，黑格尔用通过克服对象和否定对象的自动实存去克服异化的方法，实际上把人归结为人的内在自我，因为黑格尔认为一切对象无非是意识的投射。这样一种归结在马克思看来相当于把人归结为一种内在的自足，而这种自足并不是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结果。可见，黑格尔拟设人就是人使自己成为的那种东西，但他却赋予人一种给定的实体性，而这种实体性并不是[98]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结果。而且，这样一种把人归结为他的内在自我的做法将人的形象当作孤立于他的同类众人的加以接受。黑格尔在反对古典个体主义——这对马克思而言显得是建立在合理根据基础之上的——时，重新将这种个体主义从后门引了进来。因此，黑格尔——不管他本人如何看——是站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但不是在他将人的真实谓词实体化为一种抽象的主词以前。^②

黑格尔的观点存在另一个方面：如果对象化是意识的一种虚假投射，而这种投射最终将返回意识自身，那么人塑造自己和世界的全部努力都是纯然幻想的。因此，异化本身也是虚假的。既然马克思把异化看作是处于人与他的产物之间的一种具体关系之中，这样一种关系就不可能是虚假的，假如产物像马克思所主张

① 参见残篇短文“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Hegel's Construction of the Phenomenology)，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附论刊印，页654。

② 《早期作品集》，页204-205，页209。

的那样是真实的话。对马克思而言，人类劳动总是预设了一种不同于意识和不同于人类努力的物质基础，即一种“自然基质”（natural substratum）。当然，这就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差别，但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复杂程度揭示了他在何种程度上在黑格尔思想的内在矛盾之外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既然马克思认识到对象的自动实存，他就不可能满足于对异化的单纯认知性的克服，而是必须在创造对象的实践中寻求解答。对黑格尔而言，异化是意识的一种状态，要通过意识的另一种状态加以消除；对马克思而言，异化涉及的是现实、实存的对象，只有在涉及对象活动的现实领域中才能加以消除。这种立场就给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既然黑格尔把一切东西都归结为没有任何现实实存的精神图像，他就极其正当地将自己的理论称为现象学：现象之外，别无他物——提供了特殊的意义。^① 正如在黑格尔那里总是存在的情况，主体在此变成了客体。因此，黑格尔的人是一种没有对象的存在，马克思沿用费尔巴哈的观点说道，没有对象的存在是非存在。^②

马克思对黑格尔异化观的批判与他对他看来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神秘因素的东西的普遍分歧之间的关联，极其强烈地 [99] 体现在以下取自《手稿》最后部分的段落中：

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承担者、一个主体，但主体最初是作为一个结果出现的。因此，这个结果，即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上帝、绝对精神、自我认识和自我显现的理念。真实的人和真实的自然成了单纯的谓词，成了这个隐匿的不真实的人和不真实的自然的象征。因此，主词和谓词具有一种彼此颠倒的关系，成了一种神秘的主体

① 《早期作品集》，页 204。

② 《早期作品集》，页 207。

—客体，或一种达到客体之外的主体性，作为自我异化的过程和从异化中返回到自身之内的过程，同时重新抽象这种异化过程的绝对主体，这个在自身内纯粹的、永不停息的周而复始过程的主体。^①

马克思继续表明，黑格尔的思想轨迹不可避免地通向一些影响深远的结果。首先，历史被归结为思想的活动，历史不再探讨具体的事件，而是局限于与具体事件产生矛盾关系的各种思辨。历史从具体事件中抽象出来，但仅仅将具体事件看作精神的显现。^②其次，这样一种观点导致寂静主义和保守主义，马克思使黑格尔政治保守主义的内在矛盾变得非常清晰。但黑格尔并没有从他对当时事件的反应中表现出他的保守主义，在这个层面上他有时候反而令人吃惊地表达出激进的观点。他的保守主义源于他的最终使思想依赖于实存的历史现实的认识论的内在矛盾，尽管他的认识论否认这样做。

在探讨黑格尔的认识论与它造成的政治结果之间的这种关联时，马克思说道，在单纯意识的层面消除异化使人认识到消除现实的异化的内在不可能性。^③因此，意识仅仅赞同它不能改变的现实。这种单纯精神性的解放迫使人将自己的锁链合法化。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异化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重现：扬弃只是保留异化，而非消除异化，因为黑格尔以这种方式使用异化这个术语，即异化绝不会真正 [100] 得到克服。因此，黑格尔哲学尽管有自身的理智力量，仍温顺地把异化合法化了：

异化活动对否认与保留、否定与肯定连结起来的地方起

① 《早期作品集》，页 214。

② 《哲学的贫困》，页 122 - 123；《神圣家族》，页 114 - 115。

③ 《早期作品集》，页 210 - 216。

着一种奇怪的作用。因此，例如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取代私法的是道德，取代道德的是家庭，取代家庭的是市民社会，取代市民社会的是国家，取代国家的是世界历史。但在现实生活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仍然存在；它们仅仅成了一些“环节”，成了人的生存方式，孤立起来就没有了有效性，相互消融并产生另一个。^①

因此，马克思出于同样的理由批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一旦接受他们的导师关于对象不真实的观点，他们的社会批判就在他们自己的前提之下成了毫不相干的。他们一旦接受了黑格尔的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思想，他们最终就不能认真处理社会现实。马克思《神圣家族》开篇就开宗明义：“在德国，真正的人道主义没有比那种用‘自我意识’或‘精神’取代真实个体的唯灵论或思辨的唯心论更加危险的敌人了。”^②对青年黑格尔派而言，解放问题被归结为一个纯粹灵魂性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为意识创造客观环境：

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只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思想的斗争。^③

因此，鲍威尔的批判派局限于解放意识，好像意识就是真正

① 《早期作品集》，页211。

② 《神圣家族》，页15。

③ 《神圣家族》，页15。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页23-24。

的主体，人就是意识的单纯谓词。在社会领域，这种立场也由于限定于一个 literati [文人] 小团体而限制了批判派的重要性，阻止了 [101] 它与人类的任何普遍性拟设本身的同一性。批判派也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普遍性。

鲍威尔的这种批判在马克思 1844 年夏天写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里得到了这样的总结：

这个《文学报》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变成了某种先验的存在物。这些柏林人认为自己不是从事批判的人，而是由于偶尔的不幸才成为人的批判家。因此他们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进行理论批判的需要。因此，像普鲁东这样的一些人遭到非难，被指责是从某种“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但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唯一的人的本质。例如，爱情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情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对象”。打倒对象！因此这种批判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面才有意义。因此，对批判家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感情或情欲——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嘲和凜若冰霜的哲人。……我将出版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堕落。^①

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感到批判派不可能抓住现实的、历史的人民遇到的具体问题，而是局限于抽象事物，无法面对现实。两年后他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同样的批判，他们由于自身的认识论立场而无法将异化看作植根于历史状况及其结果

^① 马克思 1844 年 8 月 11 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著作集》第 27 卷，页 427）。信中提到的“小册子”最后变成大部头的《神圣家族》。

之中。^① 马克思在他的论证中间接地使用这种概念性的语言反对普鲁东及其对范畴的运用，通过继承古典经济学而把各种问题看作好像是处于概念中、而不是处于现实中。结果，普鲁东几乎专门地试图克服概念的对立二分。^②

[102] 马克思自己的立场与传统黑格尔唯心论之间的区分促使他提出，也可以在现存社会与未来社会之间作出区分。于是，他说道，在当前社会，对象的创造（对象化，即生产），而不是帮助人自我实现导致异化；而在未来社会，对象化将促使人的所有潜能得到发掘。异化和对象化，从现象学上看在当前社会是重叠的，但从存在论上看又是不同的；二者将来在异化消失的时候，就会彻底区分开来。^③

关于对象化与异化的这种区分至少在马克思的两部主要作品中详细地得到探讨。这两部作品也重要地涵盖了马克思早期和后期的成熟时期：首先是1844年的《手稿》，其次是1857~1858年的《资本论》初稿，即《纲要》。这一点再次表明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并证明他对异化主题的潜心关注在他的经济学研究期间得到了持续。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这样说：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是在使人的创造性活动，即对象化变成一种去人化过程的异化环境中进行的：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514：“在这里，‘生活分离’的原因被表明是理论。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全都这样论及社会，好像他们和哲学家相信所有真实的分离都是由概念的分离引起的。”

^② 《哲学的贫困》，页112；也可参见《早期作品集》，页15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IV，入《选集》第2卷，页404。

^③ 关于异化问题的最近一些研究似乎忽视了马克思在对象化和异化之间作出的区分，例如贝尔（D. Bell）：“异化的争论”（The Debate on Alienation），载《修正主义》，页195。对涉及的一些哲学问题的非常有趣的论述，参见罗滕施特赖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页144及以下。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与劳动相对立。劳动产品是在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对象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对象化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103]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与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对立的和相异的东西与他对立。^①

“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中”是对象化的特殊条件、而不是对象化本身的本性，使这种活动变成异己的。结果，对象变成人的主人，因为异化颠倒了主体—客体关系。

在《纲要》中，马克思在三个不同的情景中讨论了这个问题。首先，他说道财产和财富是作为创造对象的存在者的人的属性，因为人的活动为了自身的实现而需要现实对象。因此，财富的资产阶级形式必须从它的异化形式中被解放出来，把它的现实

① 《早期作品集》，页122。

特性恢复为创造对象的活动。^① 马克思继续说道，以往在财富仍被认为处于自然对象中、而不是处于作为人类劳动产物的商品中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异化，因为异化只可能涉及人类活动的一种颠倒形式。但异化的不存在也意味着人的对象化的不存在。因此，这段原始天真的时期无法施展人的潜能的充分性和丰富性。原始共产主义也因而绝不可能成为预设异化且消除异化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一种模式。^②

其次，马克思在同一问题的一个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在这里，他接受了斯密的论点，即人的劳作时间应当被看作是一种从人的正常存在状态，即闲暇中扣除的代价。闲暇，根据斯密的观点，必须被看作是人的理想状态。因此，政治经济学把人类活动分为强制的活动（劳动）[104]和自发而自由的活动（闲暇）。对马克思而言，这一论证再次证明了政治经济学对人类活动的本性的基本误解。可见，政治经济学成了人的异化的一种单纯理论性的表达。马克思否认劳动在本性上是强制性的。相反，他断言劳动实现人的自发性。使劳动变成强制的东西并不是劳动的本性本身，而是实施劳动所处的历史条件。因此，斯密的分类无意间批评了注定要把人的劳动分为强制与自发这种二元论的市民社会。一个要消除异化的社会，不会消除劳动，而会消除劳动的异化条件。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即使未被异化的劳动也可能是很艰难的。他明确提到艺术创作，艺术创作对他而言符合未被异化的劳动的一种范式，虽然它可能确实是非常辛苦的劳作。任何特殊类型的劳作在肉体上体现的安逸或艰难都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劳作是充当一种单纯的生存手段还是成为人的生活内容。^③

最后，马克思在《纲要》中关于异化的详细探讨无疑是最

① 《纲要》，页 391。

② 《纲要》，页 375。

③ 《纲要》，页 505 - 506。

复杂的。虽然文本的段落是以不甚得体的语言写成的，英文词汇和表达极其令人吃惊地出现在德文文本中，但它在体现 1844 年《手稿》和《资本论》的思维的强烈连续性方面至关重要：

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劳动的客观条件，即对象化的劳动，与活劳动相比必然增长，——这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无非是使用较少的直接劳动创造较多的产品，从而社会财富越来越表现为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条件——这一事实，从资本的观点看来，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对象化的劳动）成为另一个要素（主体的、活的劳动）的越来越庞大的躯体，而是（这对雇佣劳动是重要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 [105] 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客观躯体的创造是在与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这一点来说，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绝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这种过程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与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

开的。但是随着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单纯内部的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变成作为单个人的个人，不过是作为社会的单个人的个人借以再生产自身的财产，即有机的社会躯体。^①

4.2 异化与财产形式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异化有三个方面：在现代社会，人异于自然，异于自身，异于人性。这些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因为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异化中看到人与人塑造自身世界的才能的异化。异化的这个方面相应地体现在人所塑造的世界表现为人的主人、决定人的生活条 [106] 件方面。人的创造活动也仅仅表现为保存肉体实存的一种手段。因此，异化概念预设了人的一种作为对象创造者的本质形象，并且正是这种形象的获得在现存社会中正在受到挫败。人的这种形象与其说是物质条件本身创造的，毋宁说是才能使人能够成为自己物质条件的主人。虽然物质条件是实现人的创造和生产潜能的前提条件，但它们也可以限制人的潜能。^② 因此，黑格尔对生活（Dasein）与现实（Wirklichkeit）作出的区分在马克思的作品中重新出现，并且表明黑格尔试图弥合

① 《纲要》，页 715 - 717。虽然这个文本 1939 年以来就有了，但胡克在 1962 年仍说道：“除‘商品拜物教’的特殊社会学学说之外，……‘自我异化’的核心观点是与马克思的历史的、自然的人道主义相异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平装本）的新导论，页 5）。

② 《选集》第 1 卷，页 363。

两者裂隙的努力是无法令人满意的。^①

异化在现象上最显著的体现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拥有自己劳动的产品。当马克思说道现存的生产条件使工人去人化时，他指的是一旦工人的创造性的、自我实现的活动的产品被从工人那里夺走，工人就只保留着自己的生物性的、动物性的功能：

劳动的异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性；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②

① 《法哲学》，页10；《哲学科学全书》（*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Hamburg, 1959），尼可林-珀格勒（Nicolin-Pöggeler）编，页38-39。马克思甚至在后期作品中也保留了这种区分，见《资本论》第3卷，页205，页797-798。

② 《早期作品集》，页124-125。应当记住的是，异化在这里被马克思具体地与工人，而不是与人的一种未经区分的条件联系起来。

[107] 在1849年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回溯到劳动的这些方面，虽然纯粹经济的考虑更多地出现在关键章节，但哲学因素依然是明确的：

但是，劳动力的表现，即劳动是工人自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自身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对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来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①

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异化也反映在社会意识中，

① 《选集》第1卷，页82-83。

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适用于这个社会的概念体系本身体现出异化。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政治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异化的生活，正如政治经济学的主张所表明的，它的概念具有客观的、存在论上的现实性，并且获得一种外在于具体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组织原则是它试图加以体现和系统化的——的有效性。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由商品生产造成的，而是——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由商品生产的从对象化的人类活动向独立地调节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的转变造成的。人类主体成了他自己产品的客体，政治经济学的规律 [108] 不过是这种颠倒的意识——即把人变成人自己产品的谓词，因而把人的现实性神秘化——的一种最终的、极端的表达。^①

马克思运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证明这种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的观点。他认为，发现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直接涉及从商品的物质内容中获取的效用。在努力发现交换价值的过程中，问题变得比较复杂了。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相互交换的比率，也就是说，它是使用价值的一种相互衡量。然而，问题在于衡量的标准。古典政治经济学回答，这种标准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②，主张使用价值与商品的自然的、物质的基质相关联（盐的使用价值是由我们对矿物质的需要决定的），而交换价值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功能。但衡量生产给定的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量，要求一种被人接受的标准。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劳动的量是由支付给劳动的东西决定的。交换价值和商品本身的存在变得可能，因为劳动被当作一种商品。政治经济学把劳动当作所有商品的价值源泉，但它也预设了商品的价值和存在。马

① 这些在《资本论》的第一章（“商品”）中探讨的问题，总是被恩格斯忽视。在恩格斯对《资本论》作的摘要中，颇有特色地对这些问题讲了两页，尽管他觉得马克思对商品流通所讲的同样两页篇幅值得讲六页。

② 《著作集》第13卷，页15-21，页29-31；《资本论》第1卷，页35-46。

克思认为，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神秘性就在于，它再次表现为某种不同于它真正所是的东西。^①

商品具有取决于劳动的交换价值，这体现了异化。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这种极端分析使马克思得出结论，异化不可能得到克服，因为生产关系把人际关系疏离为对象关系，经济学家忘了[109]商品的本质是人的对象化劳动：“最后，赋予劳动以决定交换价值的地位的东西是这样的事实，即人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以颠倒的形式表现为物的社会关系。……因此，如果交换价值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就应当补充说：是一种隐藏在实物化的面具之下的关系。”^②

这种把资本当作人的异化自我的观点要回溯到1844年的《手稿》，尽管马克思在那里有时候将“资本”和“金钱”互换使用。几乎不用怀疑，这种描述受到了赫斯同一时期作品的影响，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将资本区分得非常清楚，而这种区分并非是赫斯做过的。^③而且，不论他承袭了赫斯的多少思想，他都补充了对黑格尔财产观的反对，因而达到了一种高度原创性的阐述。

黑格尔主张，财产在人通过在外在现象世界的对象化来决定自己时，实现人的人格。对他来说，这种外在化之所以构成实现过程和权利要求，正是因为所有对象最终都是想象的，唯一的现实性就是作为创造活动和生产的根源的人类精神。因此，财产对黑格尔来说就是在现象世界实现自己的人的自由，而财产的缺乏

① 《共产党宣言》，入《选集》第1卷，页40；《雇佣工人与资本》，入《选集》第1卷，页79-84。

② 《著作集》第13卷，页21；参见《资本论》第1卷，页36-37。

③ 关于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承袭了赫斯，参见西尔伯讷（E. E. Silberman）：“赫斯1841-1843年文学与政治活动文集”（*Beiträge zur literarischen und politischen Tätigkeit von Moses Hess, 1841-1843*），载《费尔特内利研究所年鉴》（*Annali dell' 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第6辑（1963），页387-437。

则阻止人参与这种普遍性。^①

马克思关于财产和异化的探讨试图颠覆黑格尔将财产与人格等同起来的观点。对他而言，财产不是人格的实现，而是人格的否定：不论无财产的人，还是有财产的人，都是被异化的。一个人占有财产必然要使另一个人失去财产——这是黑格尔所没有的一种辩证关系。因此，问题不是确保所有人拥有财产——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一种固有的不可能性和内在的矛盾——而是废除所有的财产关系本身。

[110] 马克思通过转变性方法的另一种运用实现了财产与人格的这种极端分离。在1844年《手稿》中，他认为金钱是人的被异化的自我，因为它将人的所有属性都还原为没有任何具体价值的量的、可交换的价值。而且，金钱的积累降低了人对外在化和自我体现的真实能力。由于储蓄金钱是延缓消费，金钱内在的价值就被保存在自身之中，因为这些价值没有通过人实现出来：

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异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存在也积累得越多。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那里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场，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和政治权力，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

^① 《法哲学》，第243~246节。参见里特：“人格与财产”（Person und Eigentum），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卷，页196-228。

能力。^①

结果，毫不奇怪的是马克思赋予资本主义以“实践的”禁欲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典型地是韦伯后来探究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意味着资本主义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恰恰由资本主义活动本身创造的价值。然而，只有对这种文化精神的广泛社会接受，才会创造资本主义的诞生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因此，马克思在刚刚引用的段落中说道，政治经济学，“尽管存在其世俗和寻求快适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并且是所有科学中最道德的。它的原则性主题是对生命和人类需要的否弃”。这种禁欲主义是异化最终的意识形态表现，它的顶峰是将人类繁殖本身视为浪费的马尔萨斯理论。^②

[111]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金钱的倒转力量源自于它有一种能力，能够赋予它的占有者以迷失于其中的属性。金钱的占有者现在可以重新通过资本的力量获得他们的属性。在这种倒转的世界里，人的才能是由他的金钱决定的。他的个人特性成了他的购买力的一个函数，而不是他的内在自我的一个函数。在援引莎士比亚的泰门和歌德的浮士德之后，马克思说道：

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付钱的东西（货币能购买的东西），就是我——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

① 《早期作品集》，页 171。

② 资本主义伦理学的禁欲性质被马克思多次提到，例如：“因此，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主义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但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但进行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存入储蓄所的工人。”《早期作品集》，页 171）。参见洛维特：“韦伯与马克思”（Max Weber und Karl Marx），载《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档案》（*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第 117 期（1932 年）。

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绝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子。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既然我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东西，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①

既然只有金钱的占有才会创造有效的需求，就只有占有金钱和能够实现自身需求的人才拥有有效的需要。没有金钱的人就没有有效的需要，没有客观的现实。所以，财产不是人格的实现，而是人格的否定。^②

马克思后期的作品没有探讨财产本身或金钱本身。这里出现了一种差别较大的方法，虽然他早期在《手稿》中的评价的确含有一种历史的分析，但他在《神圣家族》和《哲学的贫困》中更加仔细地研究了历史的分析方法。^③ 普鲁东的非历史方法也促使他在1865年写给施魏策尔的一封信中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即普鲁东的著名问题“什么是财产？”根本就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回答。^④

因此，马克思必须对[112]财产形式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探究。这种探讨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纲要》中。根据他的看法，财产的第一种形式是部落财产，这是由先于永久定居点和农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⑤ 一旦农业开始发展，原始共有

① 《早期作品集》，页191。

② 《神圣家族》，页59-69；《哲学的贫困》，页173及以下。

③ 《神圣家族》，页59-69；《哲学的贫困》，页173及以下。

④ 《选集》第1卷，页390-391。

⑤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33。

制的这种类型就逐渐消失了。在基于农业的古典 polis [城邦] 中，两种财产并列存在。从理论上讲，财产归国家所有，个人只享有占用和使用的权利。

在《纲要》中，马克思在他关于古代部落财产的讨论中补充了一种思辨的因素。^① 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这个阶段（1857 ~ 1858 年），这种因素的出现对他的理论追求的连续性又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因为它非常接近马克思在 1843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具有洞见。马克思表明，财产的最初出现必定是部落性质的，因为它源于人类群体获得土地占用的能力。这种行为取决于群体凝聚力、亦即某种社会性和部落性的组织的先前存在。即使这种共同占有获得的直接结果应当是这种土地被划分为个体的、私人的所有，也是部落财产的在先存在才使这样一种划分成为可能。因此，个人财产的根源在于共有财产，财产不是先于社会，而是源于社会。马克思推测个体在部落中的实存是历史上最早的财产，他反复说道他的信念，即不可能将历史性的个体从他的社会背景中分离开来。在这个讨论中术语是相同的，马克思使用术语“Gemeinwesen”意指共有的、部落的财产和部落组织的成员资格。既然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财产的关系是以群体的成员资格为中介的，财产就表现为一种标志着社会认同的关系，即一种没有异化因素的财产形式。财产实现了人与他的部落同伴的实定关系。因此，部落财产由于 [113] 其公有和合作的形式，是一种在社会中起限定作用的因素。它阻止个体的力量脱离社会的普遍性和确立一种有别于社会普遍利益的自我利益。当然，在这个阶段没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然而，马克思从未想过所有人类都曾经历过部落财产的一种统一的或共同的形式；他详细地表明部落财产的诸多现存形式不能归结为生产方式的一个变量。按照他的观点，多种多样的原因决定着部落财产的多样化：气

① 《纲要》的这些章节现在以题为《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的英译本出版。

候、土壤质量、邻近部落和民族的性质、部落自身的历史，等等。^①

个体与社会的这种原始的、素朴的和没有区分的统一，在与共同财产的关系的中介之下，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主要通过两种设置在更加复杂的社会中保存下来：东方的专制和古典的城邦。在东方的专制制度中，财产属于象征着社会总体的一个人。专制者是社会的化身，所有的财产最终都属于他。^②另一方面，在城邦中定居点的形式是社会的形式。私有财产确实发展起来，但正如马克思在另一部著作中指出的，私有财产是在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之外，通过商业或战争发展起来的。至少在社会意识中，它相对于原初的共同财产是边缘的和次要的。^③财产的基本形式仍然是公共的；政治权利取决于共同的土地所有权的分享，相应地取决于私有财产的占有。因此，一种辩证关系在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发展起来。经济活动取决于以共同体为取向的考虑。马克思指出，至少在城邦的公共意识中，农业的不同形式——正如在罗马那样——在它们的政治优势上得到探讨。公民生产得越好、似乎就越爱国的农业政策形式，得到推荐。既然经济考虑是从属性的，农业就在道德上得到考虑，因而在公共领域优越于商业。^④

[114] 既然城邦的经济活动靠政治考虑来判定，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异化。而且，国家通过经济活动和以同样的标准加以评估的政治参与使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性和以共同体为取向的本性。因此，Homo economicus [经济人] 与 homo politicus [政治人] 是同一个

① 《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页 80 - 84。

② 《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页 69 - 70。

③ 《著作集》第 13 卷，页 35 - 36。

④ 《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页 84。

东西。^①

如果说这种同一没有使马克思指向城邦的一种浪漫主义理想化，指向一种可能恢复古代共和制的妄念，那么，这是因为他的标准隐含着历史的变化与转变。像所有其他的历史现象一样，古代城邦蕴含着自我解体的种子。这种田园牧歌般的社会形式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的一种模式，尽管它摆脱了异化。这种社会形式的天真的、没有区分的结构限制了它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任何要使这种形式不朽的企图都在加速它的最终瓦解。因此，要保存 *ager publicus* [公地] 的公共性质的某些东西的企图，仅仅促进了作为商业阶级的 *equites* [特权阶级] 的出现，阿吉斯 (Agis) 和克里奥米尼 (Cleomenes) 的改革仅仅恶化了斯巴达共同体的危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由于古代的财产形式仅仅取决于自然物质 (土地)，这些古典形式以及马克思顺便探讨的封建形式是以各种特殊原则为基础的。基于自然物质的古代财产的基础，总是具体的和有局限的；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一种普遍、抽象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只有资本是普遍的。^②

马克思描述资本的历史性出现的方式，强调了资本的内在矛盾。资本的普遍性作为对象化的人类劳动，表明那些在他看来将最终产生某种生产形式——生产过程通过这种生产形式将提高劳动人的能力的行使——的隐秘潜能。另一方面，资本的人的来源导致资本历史地表现为伴随着异化环节的。

[115] 资本主义的各个异化方面通过如下事实得到揭示，即资本在其历史的产生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摆脱所有社会限制与考虑的财产。相反，既然资本将生产者与他的生产资料和工具分离开，资本主义也就悖谬地终结了个体的私有财产，而关于个体的私有财产，传统认为生产者就拥有他的生产资料。我们在第一章

① 《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页 72 - 73。

② 《早期作品集》，页 138；《共产党宣言》，入《选集》第 1 卷，页 34 - 42。

已经看到，马克思批评一种具体形式的土地财产，即限定继承的地产是一种其“社会神经已被斩断”的财产：现在资本主义财产对马克思来说变成了脱离任何具有共同体取向的考虑的财产形式。具有共同体取向的财产向从对共同体的所有社会性依附中解放出来的财产的这种发展过程的最终产物，当然就是完全所有权，它排他性地受财产所有者的支配。但马克思指出了如下悖论，即资本主义社会越少发展，这种形式的财产就越是稀少，因为复杂的生产现在要求各种联合起来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是不可能通过个人财产得到满足的。现在，圆圈似乎完成了。

而且，以前所有的财产形式已经形成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融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在市民社会从国家的普遍性拟设中解放出来的影响下，变得完全以自然性的必需和无限制的任意为基础。^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资本看作是给了残留下来的社会凝聚与团结观念以致命一击，并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同样的暗示，他说道：资产阶级社会把财产从以前关于财产的主张和幻想中剥离出来。^②

个体的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到废除，这对马克思而言构成了他论证未来社会的财产性质的一个出发点。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的非凡特征不是要一般地废除财产，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财产”^③。他在《资本论》中暗示未被异化的财产的新形式，这种财产将意味着财产重新将个体与 [116] 共同体结合起来。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个体的私有财产遭到否定，个体作为一个个体的实存也遭到了否定：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
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

① 《早期作品集》，页 29 - 30。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77；《选集》第 1 卷，页 36。

③ 《选集》第 1 卷，页 47。

的形式变换，它就只是意味着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面，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①

这不是单纯反对资本主义的一场论战，以试图证明资本主义与它自身在方法论上的大前提，即私有财产相抵牾。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性和集体性，马克思才发现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所固有的潜能。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独特性构成它的超出私有财产之外的运动，尽管它并不总是承认这一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再次主张：

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回复到小规模的手工生产，因为马克思总是对那些试图忽视工业发展及其潜力的社会主义流派持批评态度。他从未真正详细描述这样一种新型的个人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的组织。^③但他可能已经想到的东西可以在他关于财产的早期描述中被察觉到：只有在现代社会，所有制才变成一种单纯的

① 《资本论》第1卷，页761。

② 《选集》第1卷，页523。

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后资本主义所有制将保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性内容，但不会保留它的异化方面（《资本论》第3卷，页427-428）。

经济 [117] 关系，筑起 Eigentum [财产] 与共同体之间的障碍。马克思曾试图克服这种对立二分并剥离所有制的占有性质：

但事实上，当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被剥去时，什么是财富，如果没有需要、能力、享乐、生产力等的普遍性，没有个体的普遍性，没有它们在普遍的交流中被产生出来的话？什么是财富，如果没有人对本性或自然（nature）强力——包括人自身本性的强力和所谓“自然”的强力——的控制的充分发展的话？什么是财富，如果没有人的创造性气质的绝对设计，没有任何前提条件而只有这样一种前代的、历史的进化（这种进化在自身使这样的进化——所有人类力量本身的进化，不用任何先前确立的标准加以衡量——的总体成为一个目的）的话？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并且在与其相应的生产时代——处于人之内的东西的这种全盘设计，表现为总体的异化。^①

4.3 商品拜物教与劳动分工

马克思从两个方面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商品，即人的产品成为人的主人，而人作为劳动者成为一种没有对象的存在。这两个方面不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们的相互依存是通过转变性方法确立起来的。一旦对象不再是人类活动的对象而变成独立的存在物，主体对主体自身、人本身依然是缺乏对象和实现的。

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把商品的交换价值看作是最终以对象

① 《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页 84 - 85。

化的劳动为基础的。因此，交换价值是一个与社会相关联的概念，取自于人的涉他性（Other-directedness）和社会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部分的开篇说“商品最初是我们之外的对象”时，间接地提到这一点。“最初”意味着商品最终可能成为别的东西：最终，商品成为主体间关系的一种客观化的体现。一旦这种关系得到把握，[118]支配经济过程的规律就再也不能这样加以探讨了，即好像它们的规律存在于人之外一样。

商品中的这种主观因素被实物化，就将隐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关系变成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马克思把这种颠倒称为“商品拜物教”：人的创造活动体现为一种自然对象。^①这种颠倒也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中，即资本家在社会关系中无法表现为一个人，而是表现为资本的一个谓词；不仅工人，而且资本家也被剥夺了人性。^②人被降格到对象的地位，而对象获得人的属性。社会不再是由人际关系组成的一个组织，而是表现为一个依赖于对象和对象规律的系统。马克思为了把他的论证阐述清楚，有时候用短语 *Monsieur le Capital* [资本先生]^③来指这个过程的结果。

从这种观点看，《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宣称的对资本主义过程的经济方面的一种详细研究：1844年在哲学上拟设的东西，现在通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工具进行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分析得到检验和辩护。因此，当马克思在以下常被引用的名句中讨论商品拜物教时，奠定他的转变性方法的运用之基础的考虑在《资本论》里再次出现：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91；《著作集》第13卷，页21；《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Berlin, 1962）第3卷，页265。

② “除了作为人化的资本，资本家没有任何历史价值”（《资本论》第1卷，页592）。“但是，每个个别的资本都只会形成累积的社会资本的一个个别的部分，一个由个别生命——就像它真的是个别生命一样——赋予的部分”（《资本论》第2卷，页351）。

③ 《资本论》第3卷，页809。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 [119]，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假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①

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中说明这一论证的经济内容：由于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是客观性的、客观化的人类劳动，所以他说道，资本家从商品中获取的任何利润都是在生产商品的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资本凝结着业已付出的劳动。“资本在当今社会支配着劳动”的陈述是另一个陈述

① 《资本论》第1卷，页72-74。

“已凝结的和对象化的劳动，即过去的劳动在当今社会，正如它在资本中体现出来的，支配着生活和仍然活跃的劳动”的简缩说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悖论：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①

[120] 这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历史对立的意义，而有财产与无财产之间所有以前的对立都缺乏任何系统的原则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中才揭示出财产的神秘性：财产无非就是人类劳动。因此，有财产与无财产之间的对立本身是人类活动的两种模式之间的对立。由于这个原因，以前所有的阶级对立都没有为阶级对立本身提供解答。只有现在这种对立得到明晰地理解时，才出现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可能性。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援引了古罗马（和现代土耳其）的极端阶级冲突以阐述他的主题，即在提出任何解答之前必须抓住系统问题。^②

① 《共产党宣言》，入《选集》第1卷，页48。参见《雇佣劳动与资本》，同上书，页91：“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② 《早期作品集》，页152。

对马克思来说，紧接着这些考虑的是另一个结果：技术变革不断扩大活劳动与“死”劳动之间的裂隙。我们已经看到，在本章开头引用的《纲要》的长段原文中，生产过程的不断发展是以直接劳动为代价的。这是“机器取代工人”的陈述的理论背景：机器的发展促进机器对剩余价值的贡献，而工人的直接劳动获得的利润却在不断减少。^① 马克思指出，这并不像一些过分乐观的社会改革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机器的发展减少和逐步消除“剥削”。相反 [121]，由于机器及其进一步的扩张取决于资本投资，而资本相应地取决于工人的机器生产，所以技术的不断复杂化最终又取决于人类劳动，尽管机器为资本家增加了这种剩余价值的有用性和持久性。如果说机器以前可以被用于解雇更多的工人，那么现在资本被用于购买新的机器。对象化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稳定地增强。可见，机器放大了异化：由于机器在不断的生产中前所未闻地支配着人的生活，人的才能变得对象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② 他的产品成为他的真正主人。^③

在这些前提下，消除资本就是消除异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既然资本对马克思来说确定无疑地造成异化，则只要资本继续存在，劳动条件的任何改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处境。虽然马克思总是承认这样的可能性，即从心理学和经济学上讲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处境是可以得到改善的，但他并没有找到一条解

① 《资本论》第1卷，页645：“促进生产发展的所有手段都将自己转变为支配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它们将工人肢解为人的一个片段，将人降格为机器的一个附属品的层次，毁掉人的劳动的任何残存魅力而将它变成令人憎恶的辛劳；它们使人疏远劳动过程的智识潜能，这种疏远的比例与科学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被融合进劳动过程中的比例是等同的；它们扭曲人的劳动条件，使人在劳动过程中服从一种由于其吝啬而更加令人厌恶的专制。……因此，结果全体工人，不论他们的工资高还是低，都必定以资本积累的同等比例每况愈下。”也可参见《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选集》第1卷的，页93-94；《哥达纲领批判》，载《选集》第2卷，页28-29。

② 《共产党宣言》，载《选集》第1卷，页40。

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81。

决工人的只要资本与劳动保持当前的状态就必然存在的基本人类学状况的途径。既然马克思的关注点不是工人本身的生活标准，而是以工人为缩影的人类生活的质，量的因素就只有次要的地位。因此，马克思对工会活动的态度总是具有两个方面：他敦促工会活动，因为它为工人的社会性的、关涉他人的行为创造了核心，鼓励阶级意识，并且因为他坚持罢工等有助于工人获得更好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他绝不相信工会活动本身能够重新改变世界，因为它不可能在资本提供的条件下改变社会结构或人类劳动的质。^① 因此，他反对拉萨尔和其他人鼓吹的“工资铁律”的思想 [122]，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思想的寂静主义和消极主义的含意，而且是因为它用关于资本的机械阐释取代了关于资本运作的辩证理解。他绝不相信工会活动除了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比较刺眼的残暴行为，还能做什么更多的事情。^②

马克思进一步主张，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关系的颠倒使生产脱离原有的职能。生产在根本上拓宽和增大了人的机会和个人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经济生产在总体上缺乏人类活动的普遍性取向，各个个体不是通过生产活动发展彼此的潜能，而是彼此成为竞争者，致力于每个人——除了他们自己——的潜能的最小化。因此，经济活动和财产不是一种相互性的纽带，而是分离个体的强力，因为一个人的成就要以另一个人作为代价。个体成了自我封闭的原子，互助只有在竞争中才存在。^③

劳动分工从这些考虑中获得自身的历史意义。在 1844 年的《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分工是阶级和阶级对立诞生的历史性源泉。^④ 他也主张，劳动分工在不同的人类个体那里创造出不

① 《成立宣言》(Inaugural Address)，载《选集》第 1 卷，页 382-385。

② 《工资、价格和利润》，载《选集》第 1 卷，页 436-438；《哥达纲领批判》，入《选集》第 2 卷，页 19-20。

③ 《早期作品集》，页 31，页 168。

④ 《早期作品集》，页 120。

同的能力。劳动分工绝不应当被认为是人的才能先天差异造成的结果。^① 劳动分工不仅将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分离开，从而创造出人类实存的两大主要原型，它也毁灭人的发展普遍生产的能力。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是一种普遍性的生产者。劳动分工将人归结为一种单面的存在者，因为它把人的职业（例如赚取工资的农耕、劳作）变成人的主要特征（农民、工人）。这种特殊主义的出现造成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使基本的人际关系变成一种对立性而不是互助性。这意味着劳动分工否认人是一种普遍的存在者，把人关闭在他自己的部分自我之中。不是 [123] 出现人的一种普遍的人性，而是出现人的不同典型类型，他们彼此强烈地对立，从这种区分的恒久性中获得他们的 *raison d'être* [存在根据]。人的宇宙被归结为人的为自身获取维持生计的物质手段的努力。这个职能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目的。可见，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硬壳里，只能冒着丧失自己的整个实存的危险出现在这个硬壳里。^② 因此，不仅马克思在想象劳动分工的废除时考虑到技术方面，而且劳动分工的废除也促成了上述区分的废除，那种区分阻碍着达到一种普遍人性的努力。^③

有时候有人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及其术语“异化”的运用的严厉评价构成对他自己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的一种批判。先前的探讨应当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反驳这样的观点，即“后期的”、“老年的”马克思无视异化问题，而且《资本论》的论证分析如果不在异化的争论语境中加以理解，就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会有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强烈批评语言呢？有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共同使用了同样的术语“异化”，但却是在不同的含义上使用的。

① 《早期作品集》，页 181 - 188。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44 - 45。

③ 《选集》第 2 卷，页 24。

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以一种未加区分的方式 ad nauseam [可笑地] 使用了异化一词，标志着一种相当普遍的 Weltschmerz [厌世主义]，马克思必定已经想到他们对异化的毫无批判的使用可能会令他自己著作提出的哲学问题与经济现象的结合的分析性洞见黯然失色。《资本论》表明，异化在经验上是可证实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不是批判异化术语，而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它的笨拙使用：他从未抛弃异化术语，他自己的体系没有异化是不可理解的。

第五章 实践与革命

5.1 先 驱

[124] 在《法哲学》的序言中，黑格尔写下后来划分黑格尔派的名句：“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①

为这句话提供的不同注解是 19 世纪 30 年代黑格尔学派分裂的根源。那些强调导师这句名言的后半部分的人从中看到了对现存现实的一种哲学辩护，并在政治上从中得出了保守主义的结论。那些注重这句话

① 黑格尔：《法哲学》（Oxford, 1942），诺克斯（T. M. Knox）译，页 10。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中凭记忆不甚确切地引用了这句话，有时候这种不甚确切的引用为人熟知，但已远远超出了黑格尔的原初用意（《选集》第 2 卷，页 361）。

的前半部分的人主张，整句话表明任何能够在理性上有效的东西最终都将得到实现。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陈述意味着对要求他们根据理性塑造世界的激进而革命的拟设所作的一种影响深远的哲学辩护。^①

关于黑格尔体系的作为一种历史维度指向未来的开放性争论，最早是在1838年的一本名为《历史哲学导论》（*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phie*）的书中展开的。作者齐茨考斯基（Count August von Cieszkowski），一个来自波兹南地区、在柏林大学受教育的波兰贵族，是黑格尔学派边缘的一名比较原创——和有点怪异——的思想家。在被忽视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他最近才慢慢被从晦暗和遗忘中营救出来。由于研究还没有跟上齐茨考斯基的水准，关于《导论》与他在波兰出版的书《我们的天父》（*Ojciec Nasz*）^②的后期神秘天主教思想之间的关联的充分研究，仍完全缺乏^③。赫斯承认，他深受齐茨考斯基的影响^④，[125]他对待实践的立场如此令人想起马克思，以至最近有人提出不求助于齐茨考斯基就不能充分把握马克思。^⑤以下的论述不是自诩为齐茨

① 参见罗滕施特赖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页5及以下；格布哈特（J. Gebhardt）：《政治与末世论》（*Politik und Eschatologie*，München，1963）；施图克（H. Stuke）：《行为哲学》（*Philosophie der Tat*，Stuttgart，1963）。

② 《我们的天父》（*Notre Père*），法文版（Paris，1904）。

③ 关于齐茨考斯基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佐托斯基（A. Zoltowski）：《齐茨考斯基伯爵的行为哲学》（*Graf A. Cieszkowski's Philosophie der Tat*，Posen，1904）；洛斯基（N. O. Lossky）：《三个波兰弥赛亚信仰者：卡拉辛斯基、齐茨考斯基和卢托夫拉斯基》（*Three Polish Messianists: Sigmund Krasinski, August Cieszkowski, W. Lutoslawski*，Prague，1937）；屈内（W. Kühne）：《齐茨考斯基伯爵：黑格尔和德国精神的一个学生》（*Graf August Cieszkowski, ein Schüler Hegels and des deutschen Geistes*，Leipzig，1938）；赫普纳（B. P. Hepner）：“历史与未来：齐茨考斯基的想象”（*History and the Future: The Vision of August Cieszkowski*）载《政治学评论》（*Review of Politics*）第15辑，第3期（1953年7月）。还有格布哈特的上引书，页130-134，施图克的上引书，页83-122。

④ 参见赫斯：《哲学与社会主义文集》，页77，页79。

⑤ 罗布考维奇（N. Lobkowicz）：“末世论与青年黑格尔派”（*Eschatology and the Young Hegelians*），载《政治学评论》，第3期（1965年7月），页437。

考斯基思想的充分阐述，毋宁说是试图指出那些对理解马克思而言显得息息相关的方面。

少量试图追溯马克思与齐茨考斯基的相似性的研究已经正确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齐茨考斯基和赫斯都是从黑格尔回溯到费希特。卢卡奇说，齐茨考斯基试图通过用一种抽象的“应当”反对当前从而克服黑格尔对当前的绝对化。在卢卡奇看来，这种观点明确地否认黑格尔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尽管在政治上具有保守主义的含义，但始终指向马克思的唯物论。^① 尽管如此，正如下文将要表明的，这种偏向费希特的倾向——这是青年黑格尔派普遍具有的典型特征——在赫斯那里或许比在齐茨考斯基那里更加强烈，然而，后者在一封写给他的黑格尔派老师米歇尔莱特（Karl Ludwig Michelet）的规划性书信中明确提及自己受到了费希特的影响。^②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导论》，但我们知道他同齐茨考斯基有私交，并于1843~1844年在巴黎碰面，也许与马克思担任《德法年鉴》编辑的活动有关。马克思在大约40年后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这次碰面，我们很难知道马克思的评论有多少反映了这次碰面本身的气氛以及齐茨考斯基后期的波兰弥赛亚天主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又有多少。因为他的回忆是极带贬损的：“这个康特在我任职 [126] 《德法年鉴》期间与我在巴黎会过面，他使我的生活变得如此糟糕，以致我不想也不能研读他写下的所有东西。”^③

齐茨考斯基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值得关注。1838年他在海德堡大学拟定的博士论文题为 *De philosophiae ionicae ingenio* [爱

① 卢卡奇：《摩西·赫斯，等等》（*Moses Hess, etc.*），页3-8。

② 1837年3月18日写给米歇尔莱特的书信转引自屈内的上引书，页364-366。米歇尔莱特在1838年11月的《科学批判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中赞同性地评价《导论》一书。

③ 马克思1882年1月1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620）。

奥尼亚派哲学的特性]。不论是题目还是立场都使人想起马克思关于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齐茨考斯基把泰勒斯看作是唯物论之父，把阿纳克西曼德看作是唯心论之父，把阿纳克西美尼看作是思辨—具体的唯灵论的创始人。对待这个主题的这种厚重的辩证立场，明确地暗示齐茨考斯基自己的兴趣在于他称作“思辨—具体的唯灵论”的东西，他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这种唯灵论的最高的和最成熟的表达。

极具特色的是，齐茨考斯基恰好在黑格尔《历史哲学》收尾的地方，也就是未来那里开始自己的《导论》。根据齐茨考斯基的观点，黑格尔的体系现在必须被投射到未来去。黑格尔错在忽视了阐释未来的发展所固有的各种可能性。哲学的当前任务就是要找到未来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联。只有这样，人的自我意识才会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历史活动中得到实现。^①

黑格尔断然否认任何在未来成为当前或者过去之前就认识未来的可能性。齐茨考斯基意识到，这种否认对黑格尔的整个论证具有核心意义，并且在使黑格尔体系符合一种指向未来的视角方面存在固有的困难。他摆脱困境的方式可能并非全都令人满意，但我们也不要仅仅接受卢卡奇的论点：齐茨考斯基将一种费希特式的抽象“应当”突显为未来的标准。即便与自己老师的原初立场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齐茨考斯基可以说在路径上依然是一位黑格尔派。

齐茨考斯基通过有机体概念的类比在形式上证明了想象未来的可能性。他认为，就像可以从一块古代化石的一根牙齿的形式推导出[127]动物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一样，对待历史也可以这样做：已为我们所知的部分历史，即过去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整体的信息，整体的总体就包括未来。无疑，齐茨考斯基忽视了所有的有机体类比所固有的困难，也就是说，即使人类历史在有机体

① 齐茨考斯基：《历史哲学导论》，页8-9。

这个词的任何感性意义上都是一种有机体，世界上在两类有机体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一类有机体是同时存在的，另一类有机体在年代上是连续的，可能处于彼此的某种因果关系之中。但尽管如此，齐茨考斯基像他的论证可能存在的谬误一样，仍然没有先天地从一种抽象的“应当”中推演出未来，而是 a posteriori [后天地] 推演出未来，通过对历史性的过去做一种辩证的分析：“为什么我们也不在历史方面承认这种有机体？为什么我们不在业已发生的整个历史过程的各个部分之外建构它的理想总体，尤其是它的仍然缺乏的未来部分，哪个部分必定是与业已发生的部分相关联的并且可以与它整合起来形成唯一正确的历史观念？”^①

这促使齐茨考斯基在黑格尔所描述的历史性过去的对立与矛盾之外对未来进行综合的创造：过去是解决未来的钥匙，当前的对立期待着未来的综合和它们最终的“综合的综合”。根据齐茨考斯基的观点，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诠释，也包括对未来的展望，作为它的历史观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综合，这种展望不是与历史相分离的，而是从历史中推演出来的。这种强烈的“历史主义”因素逃脱了卢卡奇的注意。

黑格尔在历史中察觉到三个主要时期，每个时期都被赋予一种不同的意识模式；与他相一致，齐茨考斯基也看到认识未来的三种可能模式，每个模式对历史的三个时期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典型的。根据齐茨考斯基的观点，未来可以通过情感、思想或意志加以认识。第一种模式，即感觉模式在本性上是任意的和主观的：历史地看，它是通过古代预言表达出来的；第二种模式，即理论模式 [128] 是通过历史哲学赋予主体的客观态度：这是理性的时代；第三种模式，即意志模式综合了前两种模式，包含主观欲求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这就是实践。根据齐茨考斯基的观点，实践同时认识和创造历史现实；它通过有意识的变易的中介

① 齐茨考斯基：《历史哲学导论》，页 13。

成为实存与本质的统一：“第三个决定因素 [未来] 是能动—实践的、应用性的、得到解决的、自发的、有意志的、自由的因素——因而，它包括行动，事实及其意义，理论和实践，概念及其现实性——并且证实历史。”^①

三个历史时期是：（1）主观时期，具有不受制度限制的任意性的特征；（2）客观时期，以政治生活的制度演变为中介；（3）绝对时期，即实存与思维的统一。齐茨考斯基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历史化，通过把它投射到未来去而使它成为永恒的和跨时间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整个序言都旨在反对这种末世论的突破，但齐茨考斯基在他的杰作中在颠覆黑格尔庞大体系的同时，又试图微妙地保存这个体系。

这种关于未来的新观念导致齐茨考斯基暗示必须摒弃传统的唯物观。在他的体系中，物质不再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可以是精神在自我异化时的晦涩体现，即精神的对立性否定。齐茨考斯基对唯心论的历史实现的展望明确地预示着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思想，尽管他本人可能始终并未充分意识到自己思想的所有激进含意。他后期的神秘主义发展无疑指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根据齐茨考斯基的观点，这种“物质的复原”（rehabilitation of matter）将终结黑格尔留下的二元论：“这将成为真正的物质的复原以及现实东西与理想东西的绝对的、既合理又实际的调和。在这方面，关于未来的哲学将成为哲学的超出自身的一种超越。”^②

这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XI的显著相似性是 [129] 明显的。尽管如此，齐茨考斯基并没有解释物质的这种复原具有什么含义，但他的确对它的可能含义作过揭示。他在另一段中指

^① 齐茨考斯基：《历史哲学导论》，页16。参见页120，其中齐茨考斯基说道：“Nihil est in voluntate et actu, quod prius non fuerit in intellectu” [凡在理性中的，没有不能在感觉中]。

^② 齐茨考斯基：《历史哲学导论》，页127。

出，自我只有通过和外部对象相关联的行动才能成为一个具体的自我。在思想中，人与宇宙的关系始终是抽象的；他只有通过一种导致客观结果的能动关系才能体现自己的现实性。听起来可能会令人吃惊，这也可以用来说明齐茨考斯基对政治自由主义和基督教新教的批判。根据他的观点，两者只能给予人以理想的自由，而不是一种在业已实现的现实中得到保护的自由。未来的具体自由将客观地得到实现，而不像黑格尔的那种从未真正摆脱路德教派的内在性的含义的自由。^①

尽管这种“物质的复原”晦暗不明，但它的迷人之处在于齐茨考斯基将它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他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第一个明确和有意识地这样做的人。按照他的观点，关于未来的哲学必须定位于社会。哲学向实践的转化将通过面对社会问题而得到实现：

因此，哲学必须使自己主要成为应用哲学；正如艺术诗要转化为思想诗一样，哲学也必须从理论的高地下降到实践中去。实践哲学，或者更加正确地说是关于实践的哲学（它对生活和社会条件的具体影响相当于两者在具体活动中的运用）——这是哲学普遍的未来命运。……正如思想和反思克服纯艺术一样，行为和社会活动现在将克服哲学。^②

齐茨考斯基对于社会活动的含意也是不明确的。在另一个语境中，他说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著作家总是抓不到要点，因为他们试图从外部洞察现实并将外在的“应当”强加给现实，而不

① 齐茨考斯基：《历史哲学导论》，页142。他在一部后期著作中，当他主张法国革命仅仅给予人以形式的和抽象的、而不是真实的自由时，也是这样说的（齐茨考斯基：《贵族爵位与现代贵族》（*De la pairie et de l'aristocratie moderne*, Paris, 1844），页154。

② 齐茨考斯基：《历史哲学导论》，页129-130。

是尝试从现存的条件内部塑造新的现实。^① 这个观点再次鲜明地使人想到马克思对乌托邦的批判，[130] 尽管像齐茨考斯基后来的社会天主教思想所表明的，它并不必然地导致同样的结论。

除了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这种普遍批判，齐茨考斯基也直接与傅里叶争论。他认为，傅里叶把未来看作历史的调节性维度，在没有对当前作分析之前就探讨未来社会。齐茨考斯基承认，任何对未来的展望都不能准确断言未来的细节。这种展望只能满足于对未来发展的主流作一种普遍的概述。就像在马克思著作中一样，黑格尔的保留立场在这里是明显的。^②

如果说社会问题的历史内容几乎没有被提及，它的思辨内容则详细地得到精心设计。齐茨考斯基说，未来社会的主要目的是使人回归他的社会本质，使人从他的抽象性中解放出来并消除政治结构的分离特性：

[在未来社会，] 人将从他的抽象性中被带回去，重新成为一种最卓越的社会个体。赤裸的自我将离开自身的普遍性，作为具体的人自我决定，具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国家也将离开自身的抽象分离性，使自身成为人性的一员和由各民族组成的具体家庭。各民族之间的自然状态将被一种社会状态所取代。^③

这些关于齐茨考斯基思想的主要方面的评论表明，尽管将他

① 齐茨考斯基：《历史哲学导论》，页 147。

② 齐茨考斯基：《历史哲学导论》，页 148；参见《贵族爵位与现代贵族》，页 152 - 156。

③ 齐茨考斯基：《历史哲学导论》，页 17。齐茨考斯基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也保留了他的异化概念，但这个概念具有一种强烈的基督教内涵：理想东西与现实东西的分离被认为是人永恒地趋向上帝的旅途的一种迹象（《我们的天父》，页 96）。齐茨考斯基在晚期把社会天主教看作是低等阶级的救赎，并成为利奥十三世（Leo XIII）的通谕 *Rerum Novarum* [《新事》] 所阐述的社会学说的忠实追随者。

与马克思分离开的方面处处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强烈相似性依然存在，并超越了术语“实践”的使用。然而，齐茨考斯基并没有设想一种能够实施他的激进变革的拟设的历史主体，因而终究不可能形成一种社会行动理论。尽管如此，他仍主张，未来是处于社会问题的庇护之下的。变革的历史性（historicity）——在马克思那里非常明显——已经在齐茨考斯基的作品中被预想到。

[131] 如果说齐茨考斯基在发展实践方面与马克思有着共同的兴趣，他承认这是所有采用这个术语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迷人之处。实践哲学的根源深深地切入到黑格尔体系本身之中，尽管黑格尔本人可能几乎没有预见到它的所有含义。

理论与实践的传统对立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theoria* [理论]，即普遍的观点，力图用知识本身这个唯一的目标来认识和理解世界；在这种意义上，理论的反面是实践或实践知识，它不争取终极的、普遍的真理，而是满足于工具性的、应用性的知识。可见，理论知识更加全面和真实：任何特殊的知识越是与原则和普遍法则相关联，就越是理论性的，亦即旨在达到普遍的真理并以知识本身为自身的唯一目标。另一方面，实践知识由于自身的应用性，无疑具有较少的普遍性和更多的特殊性。理论知识是持久的和永恒的，而实践知识是瞬间的和暂时的。关键在于理论和实践都是知识的不同方式。

洛维特合理地指出，如果说青年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试图把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理论转变为对实存的批判，以实现实存的（实践）变革，那么概念从其含义向产生现实结果的转变，已经蕴含在黑格尔的著作里。^① 即使“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合黑格尔自己哲学的意愿，他也使它在哲学上成为可能的。

在严格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完全

① 洛维特：《黑格尔左派》，页33-37。参见里德尔：《黑格尔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

没有意义的。由于这两个概念被界定为相互排斥的，所以没有任何知识可以同时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可应用的又是不可应用的。但黑格尔把这两个术语的传统含义扭在一起：永恒的东西、理论对象，亦即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作为各种潜在东西的总体的本性（Nature），在黑格尔那里是由人类意识塑造出来的。一旦宇宙变成 *Weltgeschichte* [世界历史]，理论的东西就变成关于实践的东西或可应用的东西的一种普遍观点。[132] 如果普遍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能够通过思想有意识地创造出来，那么理论的东西就只有在与实践的东西的关系中才能存在。因此，黑格尔《法哲学》序言中如谜一般的结束语（“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尽管带有明显的寂静主义，仍是根据理论塑造世界的一次关键尝试。

试图把握这种可能性的早期青年黑格尔派的人物之一是卢格。184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成为批判当今事件的一种方法。他也在黑格尔哲学内拟设了一种从绝对—理论的唯心论（absolute – theoretical idealism）向他所称作的“实践的唯心论”（practical idealism）的转换。根据卢格的观点，这种实践唯心论的直接表现可能将是政治反对派在德国的出现，这个反对派会按照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理论标准批判现存的政治结构。可见，他把从哲学向政治的转换看作是内在于黑格尔体系本身的。^① 一年之后，卢格再次论及这个观点，指出黑格尔有关哲学与历史现实的结合之根源就在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②

这种根据黑格尔哲学使政治反对派合法化的倾向，同时可以在鲍威尔写给马克思的一些信件中发现，在那里哲学相对于政治的实践性的、工具性的性质得到了有力的强调。^③ 在不到一年的

① 《哈勒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1840），页1930–1931。

② 《德意志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1841），页594。

③ 鲍威尔1840年3月1日写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辑，第1卷第2部分，页237）。

时间里，在鲍威尔那里就可以注意到某种理想破灭的迹象，他试图劝阻马克思从事政治活动并劝说他尝试进行学术事业。但甚至这种否认政治的立场，也是关于实践的争论的一种表达：“假如你想投身政治事业，这将是愚蠢的。如今，理论是最强的实践，我们仍不能预见长远地看理论有多少能最终变成实践的。”^①如果说这意味着撤离政治，它就还不是意味着撤离这样的观点：理论与实践最终可以获得统一。

[133] 也许一些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从政治的快速撤离并非偶然，因为他们基本上以纯粹政治的方式看待自身的实践，而忽视社会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疏忽可能是黑格尔政治哲学最终必然失败的原因。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毕竟不能使自己脱离政治制度的首要地位，他们不得不承认自身的政治活动绝不能沦为那些为数极少的必定属于某个有局限的、被谴责为政治无能的哲学流派的活动。他们的实践——用马克思的话说——仍然太重理论了。赫斯是第一个把握这一点的人。早在1841年的《欧洲的头三头政治》中他就说道，通过把哲学称为实践，鲍威尔和他的弟子们并没有保证哲学从理论中获得解放。根据赫斯的看法，革命不能是单纯理论批判的结果，它必须显现在社会行为中。在这一点上，赫斯作为齐茨考斯基的弟子是领先于青年黑格尔派的主流的。^②他用一种已然接近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的语言，回到四年前的主题：青年黑格尔派解决异化问题的所有尝试从理论上讲都失败了，他说，因为问题——以及问题的解答——涉及社会实践。^③

实践的新含义与社会领域之间的这种结合，几乎在同一时期

① 鲍威尔1841年3月31日写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辑，第1卷第2部分，页250）。

② 赫斯：《欧洲的头三头政治》（*Die europäische Triarchie*, Leipzig, 1841），页12。

③ 赫斯：“最后的哲学家们”（*Die letzten Philosophen*），载《哲学与社会主义文集》，页381-382。

由卢格和费尔巴哈非常清楚地阐发出来。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的阐述看来至少出自这两个源头。在1843年的一篇文章中，卢格谈到黑格尔哲学：

理论解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德国一样进行得彻底。……真正的、实践的自由的诞生存在于向群众的自由要求的过渡之中。这种要求只是以下事实的一个症候，即理论已被很好地消化，已经成功地突破进实存中。……理论解放的最终目的是实践解放。但另一方面，实践无非是具有理论精神的群众运动。^①

[134] 齐茨考斯基的“物质的复原”，本来缺乏一个社会主体，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社会内容，尽管仍是未经区分的。正是费尔巴哈，带来质量（mass）与群众（masses）的结合（在德语中，两者是同一个词“Masse”），亦即物质与政治运动的社会背景之间的结合：可见，他将实践与群众所固有的物质力量等同起来。在一封写给卢格的年代标明为1843年、并发表在《德法年鉴》的信中，费尔巴哈写道：

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实践？它们的区别在哪里？理论的东西是仅仅藏在我头脑里的东西，实践的东西是在许多头脑里诡异出没的东西。统一许多头脑的东西，创造一种质量，延伸到世界中并因而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为新的原则创造一种新的官能是可能的，那么这个官能就是绝不应当被错失地实践。^②

① 卢格：《著作集》第4卷（*Werke*, Mannheim, 1847），页254。

② 费尔巴哈：《书信集》（*Briefwechsel*），许芬豪尔（W. Schuffenhauer）编（Leipzig, 1963），页177。

正是青年黑格尔派，塑造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新的和革命的关系。马克思赋予这种新的关系以具体的历史内容。当他阐发自己时代的精神时，就使时代精神上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

5.2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自然观和哲学领域的复杂态度，出现在他最早的作品中，在那里他似乎是要结合哲学就是“它自己的在思想中加以把握的时代”的观点与一种赋予哲学以塑造人的发展的建构性角色的观点。马克思在他完成于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评价说，从一个哲学体系中解放出来的理论成为转而反对现存现实的实践动力。但他补充说：“哲学的实践仍是理论的。批判根据本质对任何单个的实存加以评判，根据理念对任何分离的现实加以评判。但哲学的这种直接实现在其本性上包含各种矛盾。”^①

对于这些困难的认识，促使马克思多年以后 [135] 在一篇关于出版审查制度的报纸文章中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的时候采取了一种不再那么激进的途径。黑格尔《法哲学》序言的背景是明显的：

然而，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辑，第1卷第2部分，页64。

外一样。^①

对黑格尔关于哲学用途的观点的这种接受，也暗含着批判。哲学总是与历史现实相关联的，但哲学媒介本身有时充当现实与对现实的哲学反思之间的连接点。这在马克思看来可能造成哲学的对象就是哲学本身的假象。按照他的观点，单纯沉思的态度包含哲学沉思的哲学对象，因而是无对象的。这种态度危及所有不将哲学沉思转化为一种客观语言，即关涉对象的语言——实践——的哲学思辨。

这种转变也内在于黑格尔的将哲学视为历史现实的反思的观点中。自黑格尔以来，人们就不再在两种分离的层面上构想观念与现实。两者之间总是存在距离，但这种距离变成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可见，激进的转变可以设法达到现实与哲学观念的契合。在上文引用的 1842 年的报纸文章中，马克思总结说道：

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是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②

[136] 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XI 中以警句的风格概括的东西，早在 1842 年——在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广泛了解之前——的这里就已清晰可辨。从哲学向现实的突破不需要通

① 1842 年 7 月 14 日《莱茵报》（《著作集》第 1 卷，页 97）。

② 1842 年 7 月 14 日《莱茵报》（《著作集》第 1 卷，页 97-98）。

过费尔巴哈，尽管费尔巴哈在揭示这种突破能够实现的方法时是非常有帮助的；突破的需要内在于黑格尔。这种突破通过使黑格尔的体系与其自身的前提相对峙而成为可能。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唯心论哲学的关键标准是它的自我实现的能力；我们已经在第一章看到这种思想是如何成为马克思最初倾向于黑格尔哲学的根源的。^①

这决定着哲学理解世界与哲学改变世界的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理论在能够改变世界之前，必须对世界形成一种确切的解释。哲学史就是对这种描述世界的确切图像的不断追寻。这种图像一旦形成，就辩证地扬弃了作为现实的反映的自身，开始在塑造新的现实中发挥决定作用。

正如马克思的认识论所主张的，认识现实的过程既改变被观察的对象，也改变观察的主体，哲学一旦在为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真实图像时达到顶峰，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哲学。传统哲学在现实与对现实的哲学解释之间预设了一段恒久的、尽管不断变化的距离。一旦这段距离被哲学自身的成就所克服，哲学就不再是一种理论的反思，而是变成作用于现实的实践动力。这就是马克思如下评论的意义，即哲学不扬弃自身就不能实现自身，不实现自身就不能扬弃自身。已经达到确切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扬弃自身并变成现实。事情的辩证难题在于，哲学的扬弃 [137] 预设了一种对充分理解现实来说足够明智的哲学的先前发展。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就是黑格尔的体系；因此，在马克思进到实践以前，就不得不完善哲学——仅仅为了超越哲学。^②

关于现实的确切知识是改变现实的哲学前提，这也是马克思

^① 也可参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给他未来岳父威斯特法伦（Ludwig von Westphalen）的献辞：“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总是对我成为一个鲜活的范例，表明唯心论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种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辑，第1卷第2部分，页1）。

^② 《早期作品集》，页50-51。

反对费尔巴哈的主要论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费尔巴哈错误地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提供一种关于世界的确切意识，因而忽视了真正的问题，即哲学的最终问题不是单纯理解现实，而是改变现实。能动的、实践的因素的这种缺乏，在马克思看来是所有传统唯物论的特征。但悖谬的是，仅仅因为哲学家迄今已经解释世界，现在对世界发动革命才是可能的。对世界发动革命依赖于对世界的充分理解。这也是他花费毕生时间于《资本论》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有利点出发，马克思批判了德国唯心论。虽然德国唯心论具有必要的概念工具，但它停留于缺乏渗入现实以便改变现实的状态。马克思将这种论证与对德国自由主义——如今看起来它或许要比它在1848年前夕（和1833年前夕）的德国情况更加深刻和公正——的批判结合起来。在评价康德留给德国自由主义的遗产时，马克思说道：

我们必须明确地抗议那些认为自己通过把自由贬低到星满布的想象天空、而不是把自由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而赋予自由以荣誉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无止境的、朦胧的和不清楚的推论。正是这些进行幻想推论的大师、这些拥有感性热情的大师，担心惟恐他们的理想通过与世俗的现实接触而遭亵渎；正是他们，属于我们德国人自己，我们的情形就是，自由仍是一种想象和感性的东西。缺乏对各种观念的足够敬重，他们是不会得到理解的。^①

[138] 这种将哲学转变成社会行动的需要——它也意味着社会行动是由哲学考虑加以指导的——再次出现在马克思1843

① 1842年3月19日《莱茵报》（《著作集》第1卷，页68）。参见马克思1842年8月25日写给奥本海默（Dagobert Oppenheimer）的信：“真正的理论必须在具体条件和现存关系的背景下获得澄清与发展。”（《著作集》第27卷，页409）

年9月写给卢格的后来刊于《德法年鉴》的一封信中。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明确说道，社会行动的目标不是新的，只有实现目标的机会是新颖的和独特的：

意识的变革无非意味着我们用关于世界的意识了解世界，意味着我们把世界从它正在做着关于自己的迷梦的迷梦中唤醒，意味着我们向世界解释它自身活动的本性。

我们的口号必须是：意识的变革不是通过教条，而是通过分析对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意识——不论它是宗教意识，还是政治意识——进行的。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发现，世界很久以来都处于关于某种东西的迷梦之中，而这种东西一旦被世界意识到，就能被实现。……于是，我们最终将发现，人类并没有开始新任务，而是有意识地实现自己的旧任务。^①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反对黑格尔时作出了同样类型的论证。^②

在这样的语境下，实践对马克思来说就意味着既是改变历史进程的一种工具，也是历史评价的一个标准。实践意味着人的有意识地塑造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革命性的实践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黑格尔

① 《著作集》第1卷，页346。

② 《神圣家族》，页115。在黑格尔那里也存在将理论看作塑造未来发展的一种力量的方面：“我日益确信，理论的努力在这个世界上要比实践的劳作获得更多东西。一旦想象的王国被革命，现实就无法再维持下去”（Ist das Reich der Vorstellung revolutioniert, so hält die Wirklichkeit nicht aus）（黑格尔1808年10月28日写给尼特哈默 [Niethammer] 的信，《黑格尔的通信》（*Briefe von und an Hegel*）第1卷，霍夫迈斯特编 [Hamburg, 1952]，页253）。这种观点并没有将理论限制于单纯的“Nachdenken” [反思]，黑格尔思想中存在的这种倾向似乎普遍地被忽视了。但可参见考夫曼 (W. Kaufmann)：《黑格尔》（*Hegel*, New York, 1965），尤其是第六章。

的在客观世界缺乏真实对象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幽灵。相对于自身的对象被封存和埋葬在自身的意识中的德国批判，马克思赞扬法国和英国的社会批判：

法国和英国的批判没有外在于人类的一种抽象的、超自然的人格，它有能动的社会成员和作为人去遭受、感觉、思维和行动的个体的真实的人类活动。[139]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的批判同时是实践的，他们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提供实践而具体的措施并在其中他们不是思维而是行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因；而且，这种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现实的批判，是对‘腐朽’原因的发现。^①

这个评价又存在一种悖论。相对于德国的批判马克思更青睐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的评价标准，这源自德国唯心论的哲学传统：法国和英国思想家的实践方面的优越性来源于马克思对实践的革命特征的思辨考虑。因此，他对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表示青睐的理论原因并不意味着他采用它们的观点。马克思基本上对它们社会主义观点的浅薄思辨性保持怀疑。他所寻求的东西是德国哲学的理论洞见与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倾向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之所以得到辩护的理论原因则来自德国思辨哲学。

如果连贯地循着这条论证的思路，实践的社会背景就成了不证自明的：实践通过人类活动对现存的现实进行革命。这通过人的社会性和涉他性就可以获得实现。在这一章的前面部分引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一段强烈地使人想起费尔巴哈写给卢格的信的话中，马克思说道：“德国能不能实现 *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 [有原则高度的] 实践活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

① 《神圣家族》，页 205。

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①

这段话的另一种含义是，革命实践只有通过一种消极因素的中介才能把理论现代化。这种消极因素是由产生实现的可能性的需要提供的。需要通过其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它只使革命成为可能：“革命需要消极因素，即一种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 [140] 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②

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是这种恰好在黑格尔哲学的整个特征被彻底转变时保留其范畴的论证的一个必然结果。无产阶级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的物质需要，这些需要能够开始一种完全改变现实的普遍进程。它们也是最激进和最普遍的需要，因为它们确定无疑地涉及一种普遍的生产方式。这使马克思指出，这种解放的头脑是哲学，而这种解放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③ 当无产阶级的处境成为人类条件的一种范式时，它就获得了理论的意义和内涵。从这个观点看，无论 1843 年德国的无产阶级是构成人口的一小部分还是几乎不存在，它都是非物质性的。正如梅林曾指出的，马克思有时候将未来的计划看作好像它们就是当前的现实。^④

马克思通过陈述无产阶级不知道理论问题、只知道实践问题来追索这条论证的思路。^⑤ 这种表面上俗气的陈述必须从他对“实践的”一词的具体用法中重新加以转变，以便阐明它在常人

① 《早期作品集》，页 52。

② 《早期作品集》，页 53 - 54。思想的积极性与物质的消极性之间区分的起源可以在黑格尔的《历史中的理性》（页 55）中找到。

③ 《早期作品集》，页 59；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55 及以下。

④ 梅林：《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London, 1936），页 118 - 119。参见索雷尔（G. Sorel）：《对马克思主义诠释的各种争议》（Les polémiqu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u marxisme, Paris, 1900），页 22。

⑤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52。

的用法中的含义。马克思在这里表明，无产阶级只知道与现实世界中的外部对象相关联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取决于这种现实。因此，圆圈结束了：在从高度理论性的考虑中推演出无产阶级的意义以后，马克思能够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仅仅面对实践问题。

马克思早在 1844 年就探讨过无产阶级的这种实践取向的意义。在最近发现的一封信他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他建议费尔巴哈：

你应当出席一下法国工人举行的会议，以便你可以相信年轻的鲜活与高贵盛行在 [141] 这些辛劳疲惫的人们中间。英国的无产者也有着巨大的进步，但他们缺乏法国人的文化特征。我不应当忘记德国的工人在瑞士、伦敦和巴黎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但德国的工人过多地是手工工人 [也就是说，他们不运用他们的头脑]。

无论如何，正是在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中，历史为人的解放准备着实践的因素。^①

对马克思而言，工人联合起来就意味着他们在自身中间创造了新的纽带和关联，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他们的孤立和孤单。这种联合意味着一种社会连结的发展，意味着就它在现实中、在单纯的意识之外有一个现实对象的意义上是实践的：它不单纯是一种抽象的“批判性的批判”。工人在他们的集会和群体中的联合本身就是一种最具革命性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既改变了现实，也改变了工人自身。这种联合创造了涉他性和互助性，它使工人们能够重新成为一个共同体。联合的行动与过程，通过改变工人及其世界，使人窥见未来社会。马克思在 1844 年《手

① 马克思 1844 年 8 月 11 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著作集》第 27 卷，页 426）。

稿》中说，这种“实践的共产主义”是指活动为活动自身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教导、宣传等等首先就成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因而也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交往、聚会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现实，而且他们的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①

在写于同一年的另一段话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实践活动的客观性质。他指出，工人的联合克服了存在与意识的裂隙。《神圣家族》的相关段落也清楚地表明，存在与意 [142] 识、实践与理论、活动与改变等传统概念，在马克思讨论看起来通俗和散乱的工人联合问题时，如何吸引他的注意力：

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②

① 《早期作品集》，页 176。

② 《神圣家族》，页 73。

在这里，生活活动与生活目标是同一的，这些无产阶级联盟 in potentia [潜在地] 就是未来社会将在实践中成为的东西。需要自己同类的一种新型的人出现了；社会交往成了目的本身。在共产主义中既看到人类生活的形式，也看到人类生活的原则，这使马克思能够拟设存在与意识之间裂隙的弥合。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要坚持不懈地主张工人联合的原因。工人的联合并不具有一种狭隘政治的意义或者一种工会主义的意义：它是创造未来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的真正的建设性努力。悖谬的是，只有在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背景完全不同的以色列合作农场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才出现了一种对于社会—人类发展性质的类似洞见。但这种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背景也觉察到，当前社会组织的方式和形式将决定未来社会的结构。

同样的思想也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尽管使用的语言有些不同。马克思指出现存的各种无产阶级联盟的显著缺陷，但也同时探讨了它们在统一意识的主观方面与社会条件和组织的客观方面的重要性。这种联合产生了无产阶级意识所固有的实践力量，作为针对外部客观世界的实践动力。^①

[143] 我们已经注意到，马克思称赞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倾向。但他意识到，光有这种倾向还不够。而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暴动（至少在爆发时期）对他来说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意识和组织的一个新阶段。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类暴动有什么成功的机会，也不是因为他误将西里西亚家庭工业的衰败当作现代工业条件的一个范式，而是因为在这里工人对他们自身生活条件的明确意识被转变为社会行动的语言：“西里西亚暴动开始于法国和英国工人暴动结束的东西，即

① 《选集》第1卷，页41-44。

关于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①

可见，革命有着一种辩证的方面。客观地看，它是达到最终的人类解放所需的各种条件的组织；主观地看，它是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组织的自我发现实现的自我改变。通过自身的组织，无产阶级为它的自我解放准备条件。组织和联盟，以前被认为是与它们的直接目标相分离的，现在则构成工人解放的一个关键阶段。它们改变了工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关于自己和社会的意识。它们促使工人与他们的同类工人接触，向他们表明：他们的命运不是一种主观的、特殊的和偶然的事件，而是关于现实的普遍设计的一部分。它们使工人将自己的同类无产者不是看作争取工作和面包的竞争者，而是看作患难的并获取最终胜利的兄弟，不是看作手段，而是看作共同平等的目的。因此，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由革命的发生过程决定的。看起来至关重要的关于革命不可避免的问题，在这种语境下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在恩格斯后期作品影响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机械论和决定论主张，[144] 鉴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革命必然爆发。这种仅仅考虑历史发展的客观方面而不是其主观因素的观点，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所有批判所要攻击的对象。这种观点最终把人和人的意志仅仅看作外部环境的一个对象，*mutatis mutandis* [适当修改] 就是，看作政治操控的一个对象。布尔什维主义的残酷与严厉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荒芜都直接来自恩格斯所赋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扭曲的机械论，它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特殊的思想成就。

^① 1844年8月10日《前进报》（《著作集》第1卷，页404）。马克思继续说道：“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必须承认，德国对社会革命是最能胜任的，它对政治革命是最无能为力的。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无能就是德国政治上的无能。……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哲学观念才能找到自己的确切实践，正如同它只有在无产阶级中才能找到积极的自由因素一样。”（页405）

对马克思来说，革命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种同义反复。由于革命需要一种具有革命实践形式的有意识的推动和动力（无产者在争取革命目标的过程中同步地实现的一种自我改变），决定论和意志论的两难困境就被这种革命意识的辩证性质超越了。马克思绝没有提前保证革命的成功，或者视革命的成功为当然之事。他只是表明革命的成功在历史上的可能性。如果存在一种革命意识，革命就注定要发生。这种意识的能动的和实践的因素意味着，环境会随着无产者的自我改变而改变。换言之，在这些条件下，革命已经在发生。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一种意识，革命就缺乏主要的推动力，就要胎死腹中。如果无产者具有自我意识，他们就会维持革命。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是革命局势的主要成分。但如果无产者仍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如果他们不具备一种确切的世界观，光有客观条件本身是不会产生革命的，除非无产者领悟到：通过塑造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他们的世界观也改变他们自己。^①

光有客观条件是不够的，这个观点从马克思在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论战中的一次评论看是显然的。^② 这 [145] 也是他为国际的存在进行辩护的原因。他说，国际应当探索将工人组织起来以便改变他们并通过他们的活动产生他们的阶级意识。这些理论考虑在他 1871 年写给波尔特（Friedrich Bolte），即国际美国联盟委员会（the American Fed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书记的一封信中非常有力地、尽管是论战性地表达出来。宗派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对立，虽然在这里被马克思非常片面地加以阐述，但仍然应当在这种论证的业已表明普遍理论背景内加以

①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把握到这个辩证的方面；阿德勒：“什么是发展的必然性”（Was ist Notwendigkeit der Entwicklung），载《斗争》（*Der Kampf*, Vienna, 1915），页 175。参见迈尔（A. G. Meyer）：《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Marxism—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Mass., 1954），页 91-100。

② 《文选》第 2 卷，页 135。

理解：

成立国际是为了用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只要看一下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就会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宗派有其（历史的）存在的理由，工人阶级就还没有成熟得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现象。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对立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

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法国的九月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伙在英国直到今天还能够耍把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①

[146] 经济斗争，即工会活动、罢工等，从它们自身的辩证法中创造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诞生，这也是被 1871 年 9 月国际伦敦代表会议（the London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接受的决议的核心思想，决议由马克思起草，列入第 9 条：

无产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

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除阶级。

无产阶级通过经济斗争已经达到的自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的会员们注意，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②

马克思对待工人阶级组织的态度存在一种显著的连续性。他把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看作是通过工人阶级联盟实现的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组织的中心。他在《福格特先生》（*Herr Vogt*, 1860）中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从根本上不同于所有密谋集团的

① 马克思 1871 年 11 月 23 日写给波尔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写给美国人的信》（*Letters to Americans*, New York, 1953），页 90，页 93-94）。

② 《文选》第 2 卷，页 236。可见，马克思赞同工会活动不是基于它们的优势，而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创造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所必需的政治工具（参见《写给库格爾曼的信》，页 65-66）。这种思想也是马克思 1847 年反对普鲁东对工会活动的非难的主要论证的根源。经济条件客观地创造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主观地只有通过他们自己在工会、联盟等中的活动才会被创造出来（《哲学的贫困》，页 194-197）。

地方在于它想要为工人阶级提供一种关于自身的意识，而不是使工人阶级卷入密谋和诡计之中。马克思指出，同盟的分支机构建立图书馆，组织演讲和提供就学，试图从由欧洲的工业化造成的悲惨下层民众中创造一个阶级。同盟的地下性质不是源于它自身的目标，而是源于大陆的政治局势。同盟的主要据点在 1848 年 *débâcle* [分裂] 以后移到伦敦时，由地下转为公开。^① 莱斯纳 (Friedrich Lessner)，[147] 同盟的一位老前辈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在马克思的影响下 1847 年将正义者同盟 (the League of the Just) 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消除了密谋因素。^② 尼古拉夫斯基的研究也表明，在 1848 年期间马克思实际上由于激进派的“过度革命”倾向而遣散了同盟。^③ 同盟在 1848 年几乎完全没有行使职能，后来在伦敦才由沙佩尔 (Schapper) 和莫尔 (Moll) 振兴起来，而马克思同一时期在科伦的活动没有依赖任何以同盟为基础的组织。没有什么能够比马克思关于同盟和国际的作用的观点更不同于列宁的革命政党概念的了。同盟在 1950 年的最终分裂就集中于马克思将同盟当作长期社会变革的基地而不是短视的、短命的密谋策反的总部。

对于马克思看待革命实践在英国运用的方式的有趣洞见，可以从他在曼彻斯特写给 1854 年工人议会的信中获得：

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现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

① 《著作集》第 14 卷，页 438 - 439。

② 莱斯纳：“1848 年之前和之后” (Before 1848 and After)，载《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 (*Reminiscences about Marx and Engels*, Moscow, 日期不详)，页 152。

③ 尼古拉夫斯基 (B. Nicolawsky)、门辛 - 赫尔芬 (O. Maenchen - Helfen)：《马克思与斗士》 (*Karl Marx and Fighter*, London, 1936)，页 153 - 154；《卡尔·与燕妮》 (*Karl und Jenny Marx*, Berlin, 1933)，附论。

动变成高尚的副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

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

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①

马克思简洁地表明这种社会行动与传统密谋态度之间的差别，他在1870年这样写道：

国际在法国的成员向法国政府证明了，什么是密谋集团与真正的 [148] 工人阶级同盟之间的差别。因为警察刚刚逮捕巴黎、里昂、鲁昂和马赛委员会委员，成倍的委员会就立即在所有的报纸宣布自己是被捕成员的更加顽强的继续者。^②

当然，这种观点的理论背景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IX~XI中去寻找。马克思认为，迄今提出来的所有认识理论要么主张终极的现实是人类认知力无法探测的，要么表明意识是现实的一种单纯反映。因此，这两种理论，即古典唯心论和古典唯物论，都不能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卢卡奇正当地指出，马克思对这一探讨的主要贡献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看到意识的一种新形式。马克思看到一种意味着现实——在其中主体最终等同于客

① 《论不列颠》，页417。

② 马克思1870年5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396）。在1871年纪念国际成立7周年的会议上，马克思同样说道：“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信仰。它的目标就是组织劳动力量，联系和整合工人的不同运动。”（《著作集》第17卷，页432）

体——的直接变革的意识。当工人领会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下自己被降格到单纯客体的地位、商品的地位时，他们就不再是商品、客体，而是成了主体。达到对世界的充分理解，会最彻底地改变世界本身。^①当然，是否只有无产阶级有资格具备这类新的认识论是一个公开的问题，而马克思从未令人满意地作过讨论。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人的自我界定和自我认识会分析他生活的客观条件。反过来，这些条件中的变化当然就是构成无产阶级的人的变化。历史始终是从人的努力中产生出来的，但按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关系直到今天才得到充分把握。因此，人已被他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外在力量与对象所奴役。只有现在，人才能够把世界认识为他的领域，并为了自己而要求世界，领会到“人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处于世界之外。人是人的世界、[149]国家和社会”。^②革命实践是一种能动的和社会的认识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把人从强加给他的沉思的、异化的实存中解放出来。

这种实践观也使马克思能够评判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的适宜性。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认识论缺点。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社会主义仍必须幻想未来社会，因为它还没有把握的是，由于这样一种态度，未来将始终不会到来。但革命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凭借历史滚滚向前的举措，无产阶级的斗争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他们不再需要在他们的头脑中寻求科学；他们只需注意什么事情在他们眼前发生，只需成为它的传声筒。”^③

可见，革命体现出使生活条件服从已经创造出这些条件的人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页82。

② 《早期作品集》，页43。

③ 《哲学的贫困》，页140。参见《共产党宣言》，载《选集》第1卷，页61-62。然而，也可以这样认为，虽然这种批判能够用于大多数所谓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但它并不真正符合圣西门关于历史的分析和想象。

的有意识的力量的激进需要。革命也通过对人的生活环境的有意识的指引和掌控，将人与他的生活环境整合起来。黑格尔的同一理论这时获得一种末世论的维度，但这种同一不再是通过意识，而是通过为意识创造对象的行动体现出来的。

因此，对现存现实的理解是对它进行革命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正如将在下一章阐述的，只有对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理解才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可能。所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进行的理论分析无疑就是最卓越的革命实践。圆圈结束了。

第六章 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辩证法

6.1 历史起源和理论模式

[150] 马克思决定将他的大部分生命投入资本主义的系统研究，并满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的偶尔评论，这可以通过方法论的考虑加以解释。由于“乌托邦”社会主义无法把握现存现实的性质，也就不能认真对待未来，所以马克思的要求理解当前的主张为他提供了一条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掌握历史的最终趋势的线索。乌托邦主义形成了“只在思想家的头脑中”存在的“科学”理论，因为它不拥有作为自身对象的现实。^①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也提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501 - 503。

到同样的认识论论证，他说道，他不探讨一种先天的共产主义概念，而是探讨“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①

马克思的通往共产主义的路径表明他的信仰，即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具体化不能通过一种决定论的目的论来实现，而是要从现存社会力量的因果分析中产生出来。如果说共产主义只能被理解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的，舍此别无他途，那么资本主义的研究就为理解那种将最终带来共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佳的手段。而且，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子宫中的降生也引起人们对两个社会的辩证关系的关注。可见，在共产主义方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先前发展。正如本章接下来将要表明的，共产主义无非是资本主义的辩证扬弃，拟设那些在资本主义的有限条件下不能历史地实现的潜在性现在可以实现。[151]因此，资本主义创造出它自己所不能满意的推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它自己的掘墓人。

因此，马克思知道通向社会主义没有捷径。他在被问到那个将要第一个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名称时，有时候是犹豫不决的。有两次至少他似乎倾向于认为，革命将首先在那些具有不甚发达的工业结构的国家、而不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地区爆发。1847年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革命将首先在仍欠发达的德国爆发，而他1882年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前言中则提到如下可能性，即世界革命可能会被俄国的一场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的革命点燃。^②但即使在这两个事例中马克思选择较不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的（当然，

① 《选集》第2卷，页23-24。

② 《选集》第1卷，页65，页24。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前言中明确提到俄国的一种“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骗局和正在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页23）。参见马克思为《资本论》（1873）德文第2版写的“后记”（第1卷，页15-16）。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术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是因为他觉得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后来发展将同时促进两个必然的进程：精巧复杂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密集出现。如果这种双重的压力过于沉重，面临如此挑战的社会就可能无法承受。

这也可以解释马克思反复提出如下主张的原因，即他在《资本论》中对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论述不应当被解读为一条普遍的发展规律。在 1877 年一封写给俄国记者查皮斯基（Otechestvenniye Zapiski）的当时未出版、后来出版于日内瓦的信中，马克思主张：

关于原始积累的章节无非是要追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西欧从封建经济秩序的子宫里诞生的路径。

但这对我的批判来讲太狭小。他觉得他绝对地必须将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素描变形为一种描述每个民族——无论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怎样的——都注定要踏上的普遍路径的历史—哲学理论，[152] 以便每个民族都可以最终达到这样一种经济形式，这种形式在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极度发展的情况下，会确保人的最完整的发展。但我要请求他的原谅。他在给我荣耀，也在给我羞辱。让我举个例子。

在《资本论》的许多地方，我都间接地暗示压倒古罗马平民的命运。这些平民最初是自由的农民，每个人都独自地耕种自己的田地。在罗马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是被剥削的。将他们从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分离出来的同样的运动，包括大地产和大资本的形成。所以，有一天一方面出现了除劳动力之外被剥夺任何东西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就出现了那些占有所有必需的财富的人，以便剥削这种劳动。发生了什么事情？罗马无产阶级不是成了雇佣劳动者，而是成了比美国南方昔日的“贫穷白人”更可怜的游手好

闲的暴民，伴随着他们形成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可见，两个具有显著相似性、却发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事件，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通过分别研究这些演变形式中的每一种，然后对它们加以比较，可以轻易地发现这一现象的线索，但通过运用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理论——它的最高特性在于它是超历史的——作为关键钥匙永远不会达到那里。^①

可见，每当马克思探讨社会主义在那些没有经历成熟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成长起来的可能性时，就面临一种艰难的困境。如果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取决于先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那么任何缺乏资本主义传统的既存社会 *prima facie* [乍看起来] 都会排除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为了在这些国家设想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探究社会行为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来源是否有助于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对俄国乡村公社的兴趣不是出于历史的原因，而是因为它的当前的、有效的实存。他对一种 [153] 以乡村公社为基础的俄国社会主义的潜在性所抱的犹豫态度，涉及的是发达的腐朽阶段，即这种在俄国经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所有制形式。对马克思来说，乡村共产主义曾经在俄国存在是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不是乡村共产主义是否能够复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什么也不能复苏），而是它是否仍在当前存在并且真正地如何强大。因此，马克思写给查苏利奇的信和《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前言毕竟没有赞同民粹派关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的观点。对民粹派而言，乡村公社即便不再存在，也应当获得重建。马克思则觉得，乡村公社如果仅仅存在

^① 《通信选集》，页 378—379。参见马克思 1881 年 3 月 8 日写给查苏利奇的信（同上书，页 412），他说道：“因此，这种运动的‘历史的不可避免性’明确地局限在西欧国家。”见金德斯利（R. Kindersley）：《最早的俄国修正主义者》（*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Oxford, 1962），页 10—16，页 237—238。

于“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就是无效的，任何浪漫的理想化都没有用。^①

马克思从历史和思辨的角度考虑了资本主义对于充分理解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工业革命的技术方面并不是他真正关注的核心。在这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别是巨大的和显著的。只需要比较一下恩格斯1847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高度以技术为取向、死后以《共产主义原理》（*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为题出版的草稿和马克思的仅仅将技术当作一个方面的问题的《共产党宣言》定稿。^②只是因为技术在技术中看到人与其塑造世界的能力的关系的最必然发展，马克思才对技术感兴趣。因此，他把资本主义本身看作是人的创造能力的施展的一个高度发达阶段——这是恩格斯的思想所忽视的一个思辨因素。马克思当然也看到，机器的发展已经成为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成就。但技术也不过是人的创造力的一种表现。这种创造力，包括机器的发明和发展，如果不是由一种只有在具体历史环境下才能形成的人类需要造成的，如果没有实现出来——因为在[154]历史的关键点，有利的条件才使它的实现成为可能的——就绝不会形成。

可见，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必须通过研究各种使这些历史性的人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的原因才能得到解释。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强调的不是机器的发展，而是在中世纪后期商品需求的增长。需要尾随国际贸易的扩张而增长，通过新贸易路线和新大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最终导致机器的发展，作为确保在人的单纯体力没有机器的中介而能

^① 参见马克思写给查苏利奇的信的不同草稿（《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1卷，页318—341）。这也是他写给查皮斯基的的观点（《通信选集》，页377）：“我对这位作者的抱怨在哪里呢？他不是俄国，而是在哈克斯特豪森（Haxthausen）的书里发现了俄国公社。”

^② 《共产主义原理》，载《著作集》第4卷，页363—380。

够生产的東西之外也能同样发展生产的唯一有效途径。^①

这样一种解释仍在回避问题。通过人的创造性潜能的运用——正如在技术中所显现的——提高需求以实现自身的能力，仍依赖于某些先前的社会环境。毕竟，需求在通过现存的生产力得到满足时超出供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种增长的需求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而发生，而技术创新由于资本积累的存在而成为可能却是第一次。可见，工业革命对马克思而言不是资本主义进程的开端，而是它的高潮。资本主义先于工业化。工业化是通过原始资本积累进行的，而资本积累又是在需要研究的具体环境下进行的。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变成各种造成和促进原始资本积累的条件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的起源不能被归结为关于技术变革的一种讨论。另一方面，恩格斯在其《共产主义原理》中几乎没有看清任何其他的东西。

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已经变成一种对中世纪末期鼓励资本积累的因素的探寻。马克思在 1854 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长信中极其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道，先于 [155] 工业革命并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是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一种社会—政治革命：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即不受政治和宗教限制阻碍的经济活动的自治领域的出现。市民社会领域的存在意味着某种合法社会行为的存在，人们的这种行为受到各种从封建体制固有的政治性的和以公社为取向的要求中解放出来的考虑的激励。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的出现归因于中世纪末期的公社运动（communal movement），这个运动将城市的社团与公社从它们对封建结构的政治安排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公社运动创造了一个自治的经济活动领域，不受可能限制经济选择自由的政治与宗教监护的制约。市民的公社运动的斗争设法使财产从各种伦

① 《哲学的贫困》，页 153 - 156；《共产党宣言》，载《选集》第 1 卷，页 34 - 36；《资本论》第 1 卷，页 713 及以下。

理与社会限制中摆脱出来，而这些限制是将一切财产都看作一种信任的封建关系强加给财产的。这种封建关系以众多相似的和重叠的要求阻碍了任何财产对象的产生，使得密集的经济活动几乎成为不可能，并严重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中世纪末期的城镇才尾随公社运动形成了一种摆脱各种封建的、亦即政治的和以公社为取向的限制的财产概念。这种财产概念的形成不仅从道德上为财产的积累作了辩护，而且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分离开来，产生了各种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并获得社会接受的法律性和制度性安排。马克思进一步指出，capitalia [资本] 术语第一次出现在与公社运动的关联中。他也强调这种城市解放运动对封建秩序的深远的革命性特征。^① 马克思在后来的一封信写给拉萨尔的信中对这些评论作了补充，说到公社运动所提要求的最终获得承认 [156] 在英国通过 1660 年的财产法案被制度化，并且后来在光荣革命中也被制度化，当时对财产的政治限制被废除，继承自由最终得到确立。^②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诞生的必要条件包括土地和农业的商业化。^③ 在没有发生土地商业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没有发展市民社会的国家就无法形成资本主义。这种局面在那些其掌握的政治权力和矿产资源本应当可以实现一种高度资本积累的国家是最显著的。但必要的、在先的社会取向的缺乏意味着自然财富并没有被转变为资本。关键点不是自然财富本身，而是它的社会效用。葡萄牙是马克思的最显著事例。葡萄牙没有经历过公社运动，它的各个城市从未获得真正解放。发

① 马克思 1854 年 7 月 27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选集》，页 105 - 108）。马克思的理论非常清楚地区分了作为不受政治考虑限制的经济活动领域的“市民社会”与作为社会阶级的资产阶级。他在《神圣家族》中说道市民社会的原则通过资产阶级历史地得到实现时（页 165），也作了同样的区分。

② 马克思 1861 年 6 月 11 日写给拉萨尔的信（《著作集》第 30 卷，页 607）。

③ 《经济学—哲学手稿》，载《早期作品集》，页 110 - 119，页 140 - 144；《资本论》第 1 卷，页 717 - 733。

展市民社会的条件从未出现过。结果，葡萄牙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因为缺乏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基本社会条件。^①

探究马克思的分析是否能够被视为资本主义诞生的盖棺定论，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关于这个主题的当代研究肯定可以获取各类比马克思当时所能得到的多得多的材料，因而可以用复杂精巧得多的概念和技术处理问题。但马克思的路径至少在两点上仍然是见识广博的。

首先，这里的讨论悖谬地提出，马克思使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先前发展，而且取决于一种依赖使资本主义自身的诞生成为可能的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基础结构。可见，从一种独特的角度看，马克思把欧洲历史看作是一个总体。因此，他对在没有经历封建制度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的机会是持怀疑态度的。

[157] 其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诞生的阐述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不是由作为单纯自然性材料的现存“生产力”决定的。他的“生产力”概念包括体现某些物质性材料的历史条件。所以，中世纪末期的城镇结构不能被归结为它的物质要素。它必须包括那些使物质要素的效用成为可能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因素。可见，马克思的方法在这个主题上距离韦伯的思想并不远。认为马克思将任何东西都归结为物质生产条件，而韦伯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变革的看法（正如人们经常所做的）肯定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韦伯都寻求这样一种社会意识，这种意识通过摧毁窒息原始的积累与发展的教会—封建价值体系而使这种积累与发展成为可能。两个理论的差别在于它们关于这种新意识的起源的说法。韦伯使社会意识的这种转变依赖于基督教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派，而马克思将它的起源追溯到城市的公社运动。乍看起来，马克思的理论似乎为韦伯的一些

① 《资本论》第3卷，页327。

lacunae [空隙] (例如安特卫普的特例) 提供了更令人满意的答案, 尽管意大利的商业共和国对马克思就像对韦伯一样造成同样的困难。

这导致一个关键的方法问题, 这个问题是由韦伯本人在他探讨马克思的方法论时提出来的。阅读马克思有时候会使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即他是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已经在一些国家发挥职能的社会—经济结构, 还是在探讨一种充当大多数西方国家盛行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标准的资本主义模式、一种“理想类型”。韦伯批评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当作一种历史现实使用, 没有限定它为一个解释历史的范畴。如果韦伯是对的, 马克思就犯了根本的错误。既然这会普遍地与他普鲁东的范畴和唯心论哲学的批判相抵牾, 它就会构成马克思方法论的一个严重缺陷。^①

[158] 但对马克思的研究路径的更加细致的审视产生了一种比韦伯所认为的更加复杂和精巧的态度。虽然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既当作一种理论模式、也当作一种历史现实来探讨, 但可以表明这种观点并不是关键所在。马克思对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没有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看作是 19 世纪经济现实的单纯反映。我们已经看到, 普遍而言他并不认为这样一种照镜子似的反映在认识论上是可能的。对他来说, 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是描述现存的经济条件, 而是勾勒和预想一种潜在性、一种可能的组织原则。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没有恰当地描述现存的现实。他说, 这种理论作为一种拟设是对未来发展的预断, 这是它的方法论弱点。它主张普遍的有效性与现存的经济条件相结合, 但生来就始终只是装腔作势地提提要求, 建议最优化

① 韦伯: “社会学与社会政治学的认识的‘客观性’”(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se), 载《社会学与社会政治学档案》第 19 卷 (1904 年), 页 22-87。

的选择，却从未真正地描述现实本身。^①如果是这样，马克思针对这个学说的争论就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埋怨，而是对这种现实的未来发展的可能预断的一种异议。乍看起来，认为李嘉图的预断比马克思的更适宜是没有任何最终理由的。而且，马克思在他的论战著作中开始于这样的前提，即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被看作好像它们的拟设已经历史地得到实现和接受一样。这使得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无产阶级构成人口的大多数^②，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然而，假如政治经济学的预断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就将导致无产阶级成为大多数的局面。同样地，《共产党宣言》中极端阶级分化的理论不能有理由地宣称是对现存条件的确切描述，但它可以被认为是对将要来临的各个进程的一种公平阐述，如果未来的发展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预断的话。^③如果情况是这样，马克思就可以安全地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 [159] 那种根据《共产党宣言》的拟设在很久以前应当就已被“腐蚀”的小资产阶级的压倒性力量。一种是历史性阐述，另一种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预断。如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等同于“资本主义”，它对马克思来说就始终是一种模式，而绝不是一种现实。

虽然如此，但至少有一段话似乎意味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不是看作一种模式，而是看作现存的现实。在《资本论》（1867）第一版序言中，他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

① 参见马克思为1847年布鲁塞尔自由贸易会议所写的演讲辞草稿，刊于《著作集》第4卷，页305-308。马克思从未在这个会议上发表这次演讲，但被恩格斯发表在1847年8月9日的《北星报》（*The Northern Star*）。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85-86。

③ 《选集》第1卷，页38-39。

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

就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较不发达”国家（德国就是这样）的未来经济组织形式而言，他将术语“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理论模式来使用。然而，当他说英国是业已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家园时，情况却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们觉得韦伯对于马克思的术语的具体使用的反对是有效的。

对正在讨论的这段话的更加细致的研究指向另一个方向。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没有把英国描述为资本主义现存的历史模式，但整个序言都在追溯在英国内在地变革资本主义的那些政治—经济机制，这种变革是通过为经济制度引入资本主义以外的和反对 *laissez faire* [自由放任政策] 的因素实现的。这些因素颠覆了经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的纯粹性，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引导到其他形式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中去。马克思详细地（并且颇有兴味地）重述了这些后资本主义的因素：工厂法为工作时间设定法律限制，因而无疑侵犯了合同自由的自由放任模式；负责公共卫生和住房的皇家调查委员会使国家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的某些方面。所有这些因素都为自由市场引入了经济方面的以公社为取向的考虑，并 [160] 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变革。在总结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方面的这些变革的影响时，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绝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在英国，社会变革过程（*Umwälzungsprozess*）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某种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②

因此，历史地看，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不列颠工厂的立法侵犯到资本主义模式，并从资本主义内部改变了资本主义。从方法论上看，这段话提示，韦伯可能没有把握马克思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的辩证意味。英国这个业已实现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已经

① 《资本论》第1卷，页8-9。英译本将“*Umwälzungsprozess*”译为“社会分裂”（*social disintegration*），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② 《资本论》第1卷，页9。

超出这种模式之外。资本主义模式不可能最终作为一种历史现实存在。由于所有的历史现实都始终处于一种变易过程中，所以这种模式要么是现实向它发展的一种标准，要么如果模式与现实之间的契合被最大化，内在的环境就已经产生一种超越这种模式并进一步抛弃它的现实。

辩证的要点在于，新形式的出现是从这个模式自身的原初前提的内在逻辑中得出来的。意味着既实现又克服的扬弃，在这里像在马克思思想的其他地方一样提供了理解马克思的意思的关键。业已实现资本主义模式的英国，已经超出这种模式可以充当它的生产方式的一种确切说明的那个点。这种理性的狡计恰恰使写作《资本论》的行为变成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指标。这样一部著作没能写成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拟设，而是写成关于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的一种描述，意味着历史现实已经超越资本主义模式，正在靠近新的岸边。毕竟，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到来的时候才会展翅飞翔。

现实正在被认识，这清晰地表明现实正在被改变，但绝不是由认识行为本身改变的。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甚至在1848年以前就把谷物法的废除看作是资产阶级以高昂代价获得的胜利。^①这次废除为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废止了[161]重商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的最后障碍。现在，资本主义的毫无约束的扩张道路敞开了。这种发展必定导致无产阶级的密集诞生和针对市场的经济活动施加各种新奇的、革命性的制约。这似乎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中说任何社会秩序在它所提供的生产力的所有生产得到发展以前都不会消亡时，心里想到的东西。谷物

① 这是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就奥康纳 (Feargus O'Connor) 在诺丁汉成功反对霍布豪斯 (J. C. Hobhouse) 而给他的贺辞的基调，贺辞由马克思起草，1846年7月7日发出 (《著作集》第4卷，页24)；也可见马克思1847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以及他在1848年1月给布鲁塞尔民主联盟的讲话 (同上书，页444-458)。参见《法兰西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 in France)，载《选集》第1卷，页211。

法的废除是资产阶级对国家事务产生影响的高潮。这次废除的直接结果对资产阶级有利，对劳动者有害；但马克思仍然欢迎它，因为只有在这时，经济活动才会根据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模式得到调节。只有在这时，这种自由市场模式才会形成从内部变革它自身的力量。只要存在任何限制这种模式的自由运作的因素，这种模式就不可能向变革的方向发展。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严厉憎恶谷物法的废除时，却由衷地欢迎它。

马克思在国际的《成立宣言》（*Inaugural Address*, 1864）中重复了这个观点。在那里，他把在此期间制定的《十小时工作法案》（*Ten Hours Bill*）看作关于资本主义正在从内部发生变革的明确证明。严格地说，对马克思而言毫无束缚的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即至少在英国经济活动根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不论是前资本主义的限制，还是后资本主义的限制——的时期是短暂的：从谷物法的废除到《十小时工作法案》的采用。^① 在开幕辞中马克思竭力表明，以自由放任政策为根据反对《十小时工作法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能够理解，法案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辩证地看，马克思把《十小时工作法案》看作是谷物法的废除的一个直接结果。只有外部的障碍被废除以后，资本主义才可能向内部变革的方向发展。

如果这系统地证明了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内，那么对于作为 [162] 一个概念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和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历史现象的分析就是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以下的探讨将从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的宏富论著中仅仅拣选那些表明他的这一观点的方面，即资本主义的类型差别极大地有利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① 《选集》第1卷，页382。

6.2 资本主义的普遍性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具有三个特征：世界的理性化、人的行为的理性化和人际交往的普遍化。已有人指出这种观点与韦伯的资本主义“理想类型”之间存在相似性，并且认为马克思异化观点的某些方面与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所隐含的“现世的禁欲”（*this - worldly askesis*）之间存在平行关系。^①

世界的理性化和人的行为的理性化当然是相互依存的。马克思反复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纯粹的“理想类型”已经表明财产的真正本性在于劳动。根据他的观点，这已经揭示出世世代代围绕财产产生的谜团。财产的本质不再是在于珍贵金属或土地。马克思将这种从财产的外在因素转向其存在于人的主体性之中的真正来源的重点转变归功于斯密，并称他为“政治经济学的路德”。^②

因此，整个世界都脱离了神话。在资本主义下，人被迫面对这个世界的严酷现实。在《共产党宣言》中，世界的这种祛魅详细地得到描述，以下段落表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远不止是一种在单纯道义上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页 104 - 110。

② 《早期作品集》，页 147。

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 [163] 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

这个世界随着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剥夺它们的虚情假意并第一次在历史上被还原为它们的真正现实，也就成了人的总体异化的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两个观念是同时并存的：人的世界无非就是人的实践；人却无法根据实践的知识来行动。可见，祛魅和异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任何东西都变成交换的对象，甚至包括那些迄今为止被看作是人的不可让渡的财产的品格。^②但资本主义的确体现了人的存在的真理，尽管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由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即财产是对象化的劳动，所以资本主义的原则（虽然它的实践并非如此）是与人塑造和改变人自己

① 《选集》第1卷，页36-37。

② 《哲学的贫困》，页36。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alienation），与将动词“疏离”（to alienate, alienare, veräussern）与“买卖”（selling）联系起来的语言学传统之间的关联，现在正在由苏塞克斯大学的卢卡奇的弟子梅萨罗斯（István Mészáros）进行研究。

世界的能力相等同的。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在对它自身的生产方式进行革命，不断进步，充满活力。它最终将破坏它自身的存在条件，因为辩证地看，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祛魅使资产阶级能够参透人的存在所隐藏的秘密：资产阶级“最早揭示了人的活动可以产生的东西”。^①

资产阶级把人从他对他人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但它只是用人对 [164] 对象——而对象不过是人的异己的投射——的依附取代人对他人的依附。虽然如此，资产阶级仍能使人在自身中找到其根源。最终很明确，世界就是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的场所，尽管又是以一种扭曲和异化的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甚至人的个体主义的、自我满足的原子模式，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假象，也仍试图体现人从人身依附中的解放。即使这种解放是有限的和形式上的，它仍是最后的、真正的解放最终展现的一个必要前提。黑格尔把从人身一具体的依附向对普遍性观念的普遍依附的过渡看作是从任意性中的最后解放和自由的最终体现。马克思并不接受这种说法，而是在这种说法中看到在各种依附形式还是人身依附的时候，隐藏的潜在性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抽象的金钱关系是人的屈服^②的最后形式。

人身依附的消失使各种依附样式变得普遍。人际关系的这种失去人格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也有助于人际关系的进一步理性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依附关系是匿名的、普遍的和抽象的：不再是农奴 A 依附于爵士 B，而是一群人依附于另一群人，因而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群体依附于构成另一个阶级的群体；因此，阶级关系的日益重要性 per se [在本质上] 出现在现代。只有依附关系的这种普遍性才使马克思能够在方法论上探讨诸如“平均工资”的概念，并把社会平均水平看作是人际关系的调节器：

① 《选集》第1卷，页37。

② 参见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8-9）。

但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这个资本家阶级中间寻找一个买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这种最低工资额也像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千百万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与这个最低额相等的。^①

这也挫败了前资本主义试图赋予以前的各种人身依附形式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背景的尝试。奴役的状况绝不能够被看作是总体的人际关系的一种范式；奴役终究是一种人身的和偶然的事件。正是因为工人变成商品，达到贫困和人格解体的最低点，他们的地位才能够被赋予一种普遍的意义。只有异化才使工人普遍化。只有一种普遍的生产方式才能产生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阶级观点，导致一些政治结果：这种关系将作为一种普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与议会制度结合起来。就像特殊的、人身—具体的依附关系伴随着一种既专制又绝对的政府体制一样，普遍的依附关系即资本主义也伴随着作为一种反映抽象普遍性的政治体制的议会制度。^②

这种普遍性需要一种地理维度。马克思表明，市民社会如何创造一个普遍的市场所需要的需求满足。从需求的满足中出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世界范围的统一，并通过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每一步连续的扩张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

① 《雇佣工资与资本》，入《选集》第1卷，页83，页89。

② 《雾月十八日》，入《选集》第1卷，页287—288。

性，在马克思看来在于它的普遍化能力；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类社会发展了这种能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现代欧洲的这种独特气质将人的创造性力量发展到迄今无法知晓的极限。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文明化作用，它把所有的非欧洲民族都拽到自己的轨道上来：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166] 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

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

正如马克思看到的，这就是将历史变成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的现代工业的普遍本性。只有在人有意识地改变世界的地方，才有历史。由于资本主义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连续变迁，所以现在才首次出现唯一的普遍历史：

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 [167] 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②

这也是马克思的学说——作为这种普遍性的最终结果的共产主义，也必须普遍地加以实现，并且任何分离的、民族的共产主义都注定要失败——的理论背景：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

① 《共产党宣言》，载《选集》第1卷，页37-38。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75-76。也可参见马克思1848年12月15日在《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上的文章“资产阶级和反革命”（*Bourgeoisie and the Counter-Revolution*）（载《选集》第1卷，页66-69）。

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①

差不多在四十年以后的 1882 年，马克思在想象革命可能在俄国首先爆发的可能性时，使这种可能性取决于如下条件：“俄国革命是否变成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② 根据他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从概念和历史上看都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假说；很容易表明，这种信念也是马克思与拉萨尔争论的根源。

马克思主张，只要市场的这种普遍性没有达到它的地理极限，资本主义就还没有达到自身的顶峰。只有当这个过程随着日本和中国向西方贸易的开放以及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金的发现而达到它的高潮时，内部的解体和变革才有望开始发生。^③ 谷物法的废除与向普遍主义的最终 [168] 突破的短暂重叠，在马克思看来，表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从那时起，变革的道路才得以敞开。

这些考虑也决定了马克思对待欧洲殖民扩张的态度，他特别提到不列颠统治印度的意义。早在 1846 年，他就在《哲学的贫困》中强调不列颠工人的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只有以不列颠在印度支付的低廉工资为代价才能得到实现。^④ 但马克思没有把这个现象看作是他对殖民主义作出判定的唯一影响。十多年后，他明确指出，至少从印度暴动以来不列颠在印度的开支如此繁重，以致造成不列颠在印度的持续统治在经济上是费用高昂的：印度使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46 - 47。

② 《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入《选集》第 1 卷，页 24。

③ 马克思 1858 年 8 月 8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通信选集》，页 134）。马克思在信中提出自己的担忧，唯恐市民社会会在非欧洲世界达到充分的发展。他担心，欧洲革命结果可能“要在这个小角落里遭到镇压”。

④ 《哲学的贫困》，页 133。

不列颠的支出比印度给不列颠带来的收入更高。^①最后，马克思将他关于欧洲殖民主义的评价建立在具体不同的标准之上，并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的源于其普遍化能力的文明化性质的观点联系起来。

马克思在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两篇极其有趣的文章中探讨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篇题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另一篇题为“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The Future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在这两篇文章中研究印度社会的路径的特征在于，他强调印度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印度农村公社特有的落后、孤立、停滞和僵化：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服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169]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

① 马克思1859年4月9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通信集》第2卷，页462）。

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①

马克思以些许温和的方式回答了不列颠在印度的权利问题：印度的历史无非是外族侵略和外族统治的历史。印度从未真正被自己的子孙统治过。在19世纪，要在英国与俄国之间选择印度的潜在统治者。较之欠发达的、专制的俄国，马克思毫不含糊地偏向工业化的、自由的和资产阶级的不列颠，因为不列颠的经济发展水准会确保印度融入世界市场和欧洲文化的普遍化。^②虽然印度的农业在英国经济的影响下受到严重破坏，但在马克思看来，印度农业社会并没有多少值得保留的东西。欧洲统治的主要贡献在于向印度引入工业生产，这种工业生产终结了传统印度社会的社会停滞。在这种背景中的“停滞”，对马克思而言不是一个单纯经济的或技术的称号，而是一种人类学的规定：如果人的创造性能力是他的出众特质，那么停滞就是可用来描述任何社会的最糟糕的形容词。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不列颠人在印度创造的现代化的一个条件是将私有制引入一个对它一无所知的社会。私有制指向解放的道路，尽管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私有制为向共产主义的转型奠定基础，因为它除非得到充分的发展，否则是不能被废除的。印度在普遍历史中的融入也通过主 [170] 观意图与客观结果的辩证法得到显现。那些到印度进行剥削和最后征服印度的人变得依附于印度的发展和富足：

① 《选集》第1卷，页350-351。

② 《选集》第1卷，页352-353。见利希特海姆（G. Lichtheim）：“马克思与亚洲的生产方式”（Marx and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载《圣安东尼论文集》（*St. Antony's Papers*, London, 1963）第14卷，页86-112。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国入侵者就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印度当地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过去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兴趣。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往手段。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①

① 《选集》第1卷，页353-354。黑格尔关于主奴关系的辩证法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贝利版），页231-240。马克思的同时代的人很少对欧洲殖民主义的辩证变迁具有这种类似的洞见。列宁在写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时，似乎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这几篇文章。

可见，马克思对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作出的最终判定远远不是一种单纯道义上的反帝国主义态度。一股强烈的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的暗流可以在其论述中追踪到：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171]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

马克思关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论述清楚地表明这样的辩证地位，即资本主义是异化的顶峰，孕育着救赎的种子。在马克思看来，帝国主义的确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是因为像列宁所想的，帝国主义必定带来一场将最终毁灭资本主义并把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同样带入社会主义高地的世界战争，而是因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普遍主义的领导者，除非其基础建立在资本主义自身之上，否则既无希望，也无机会。列宁从未操心过这样一些奠定马克思关于印度的结论性评价之基础的理论思辨：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

① 《选集》第1卷，页351。参见我的文章“亚非和西方的政治传统”（Afro-Asia and the Western Political Tradition），载《议会事务》（Parliamentary Affairs），第15辑第1期（1962），页58-73。

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①

这种观点可以大量地从马克思早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革命的历史分析中获得。在那里，他指出，迄今为止的所有革命都仅仅转换了生产关系的内部分配，而没有改变生产关系本身；它们把生产方式与财产的控制权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但没有改造这种控制权的性质。由于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它意味着所有人都被纳入劳动分工之下——革命现在必须解放所有的人。由于解放取决于 [172] 生产力，并且由于以前所有的生产力都仅仅是特殊的，所以以前所有的革命都不能实行普遍性拟设。它们都半途而废，纠缠于阶级任务。^②

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存在于两个进一步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被看作是最終解放的主要杠杆。一方面，资本主义将雇佣劳动和资本两极化为人类劳动显现的两种现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加强和激化异化，就越是加强人对人的总体依赖。资本主义终结了生产的个别性的、分离性的形式，实行劳动的专门化和分工，作为人的普遍相互依存状态的异化形式。社会主义无非是人对人的这种普遍相互依存状态从其异化形态中的解放：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变为只能集体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

① 《选集》第1卷，页358。马克思在另一个语境里说道，正是通过历史发展的辩证本性，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旨在完善自身统治的工具最终导致自身的内在变革和腐朽（《雾月十八日》，载《选集》第1卷，页287）。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83-86。

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也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①

可见，资本主义的普遍性的展现内在于人际关系中，并非单纯地具有地理意义。从经济上看，工业的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意味着劳动需求的持续增长。因此，产业工人的工资的持续增长可能伴随着中、低阶级的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但由于资本与劳动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条件下的内在关联，工资的增长将总是小于资本收益率的增长。从经济和物质上看，即使工人的地位有所改善，他们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们与非工人的关系仍将恶化。他们的 [173] 生活标准可能增长，但资本的收益将会增长更快。在马克思看来理由很简单：机器被使用越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大。工人使用的机器越多，工人就为奴役他们的力量创造了更多的能力：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形，即使资本的尽快增加如何可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扩大了。^②

工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这种理论上的差别也可以使我们集中关注马克思在国际的《成立宣言》中的陈述，而这种陈

① 《资本论》第1卷，页763。

② 《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选集》第1卷，页98；参见《早期著作集》，页71-72。

述在别的地方可能显得粗野和薄弱：

……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还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目前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任何新的发展，都将不可避免地加深社会分裂、激化社会对抗。^①

这种陈述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如下明确显示，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旨在批判资本主义无力在物质上供养无产者。他从未作出过这样一种明显谬误的陈述，也从未暗示过工人的绝对地位会无止境地恶化下去。这样一种假设从他自己的前提出发看也是无稽之谈，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人自身就是在最佳的供给条件下用最少的价格买来的商品。这种价格虽然可能因社会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浮动，但仍具有绝对的最小值，即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计的维持。根本没有止境的东西，就是[174] 工人的生活标准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标准之间的差距比率。即使实际工资普遍增长，这种差距也可能扩大。马克思意图表明，甚至在资本主义可能达到的最有利条件下，这种差距也可能持续增长。不是一种单纯量的因素决定着社会的社会构造；量的因素不涉及工人的消费能力，而是涉及活劳动对“死”劳动，即资本的屈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没有任何经济繁荣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劳动与资本这一对概念的相互依存基础之上。

① 《选集》第1卷，页381（楷体字系作者所加）。

6.3 变革的辩证法：股份公司与合作社

我们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在好些地方都认为，那些将最终改变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是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共产党宣言》说道，大工业的发展恰恰破坏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基础：“因此，资产阶级首先产生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样的观念得到阐发，马克思说生产关系束缚生产本身，产生一种向新的生产形式转型的内在需求。^② 1874~1875年他在关于巴枯宁（Bakunin）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Étatism and Anarchy*）的评论中写道，巴枯宁忽视了社会主义必须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子宫中降生的事实^③；同样的表述也出现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哥达纲领批判》中。^④

由于无法澄清这些段落的这种内部发展，所以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最流行的说法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循环危机将最终导致它内部的总体瓦解。尽管马克思对这种偶然性在修辞上有一些可能的提示，但没有任何分析指向这个方向；他的观点绝不是更加机械的，而是将更多辩证的意义赋予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

切近主题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序言；在那里，马克思 [175] 将资本主义的这种内部发展与他关于资本主义是最后的对抗生产形式的假说结合起来：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

① 《选集》第1卷，页45。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76。

③ 《著作集》，第18卷，页630。

④ 《选集》第2卷，页23。

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①

当然，这又造成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尖锐的方法问题：他如何保证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如何确保未来的各种对抗不会像它们划分所有以前的社会那样划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任何方法论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内部变革的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得到实现以后就不应当再发挥效用？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每个阶级都通过主张普遍性来实现政治权力。无产阶级难道不会遇到同样的情形，即在它取得权力以后，它的普遍性就将证明是虚假的？

无须详述针对这一困境作出的各种不同的争论性回答，应当注意的是，针对这些问题给出的各种不同的机械论答案使诸如“非对抗性的矛盾”之类的术语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内变得毫无意义。切近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可以说是主张，假如术语“对抗”涉及的是人被纳入生产条件之下的状态，那么，已然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子宫里”的未来社会的因素就能够给未来社会的非对抗性提供某种线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就是指所有对抗的扬弃，因为这种扬弃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潜藏趋势得到实现。可见，他将这种实现看作是一种新的和革命的扬弃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觉得社会主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外并不需要在经济方面有自身的一种新方法论的原因。社会主义为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前提寻求一种最终的证实，而这种证实在资产阶级社会自身之内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176] 马克思在《纲要》中说道，由于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古

① 《选集》第1卷，页363-364。

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虽然它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意味着对生产过程的理解比所有以往的、局域性的经济理论体系都要更加广博和确切。^① 顺便提到，正是拉萨尔抓住了这一点，他告诉马克思说，马克思是“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李嘉图，变成经济学家的黑格尔”。^②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必然强调对社会团结的需要和生产过程的相互合作。这种陈述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所借助的个体主义模式相矛盾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对立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束缚它自身的发展。对立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得到解决。资本主义给未来社会的组织原则提供了局部的、扭曲的表述，这也是通过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的主要前提之一，即城镇与农村之间差别的消失，看作是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一个巨大贡献揭示出来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都市化不仅弥合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内强化社会互助。^③

但马克思的著作并不只是这种理论假说，他对那些将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的精确的物质条件，还有明确的提示。

第一个提示可以在他 1858 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找到，他在信中阐述了自己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的结构。他解释说，关于资本的章节将按四个标题加以探讨：（1）一般资本、（2）竞争、（3）信用和“（4）资本具有向共产主义 *überschlagend* [飞跃] 的最完善形式，以及资本的所有矛盾”。^④

在《资本论》第 1 卷的结尾处，马克思详细论述了自己

① 《纲要》，页 25 - 26。

② 拉萨尔：《遗著集》（*Nachlass*）第 3 卷，页 29。

③ 《选集》第 1 卷，页 38；《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40。

④ 马克思 1858 年 4 月 2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通信选集》，页 126）。英译本将“*überschlagend*”译为“通向”（*leading to*）是非常不恰当的。

[177] 的想法，他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精巧的形式已经在转变为共产主义。在那里，他拟设了一种将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且不同于所有以往所有制形式的新型的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体现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内部矛盾：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体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合作和对土地以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

这种神秘的黑格尔代码（“否定之否定”）通过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3卷结尾处得到破译。在并不显眼地被冠以“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标题的第27章，马克思论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最全面描述以及资本主义内部向一种社会化的生产体制的转变。这无疑是他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最重要的洞见之一。它的不为人知要归于它的晦涩的语境。马克思将他的分析概括如下：“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②

对这个过程的详细描述再次表明马克思的思维有多少是由扬弃的辩证意义决定的。《资本论》第1卷结尾的“否定之否定”，当然指向的是同样的方向。值得详尽地援引马克思的相关论述，

① 《资本论》第1卷，页763。

② 《资本论》第3卷，页431。

因为它表明马克思是如何把作出资本主义的选择看作是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表明大规模的工业如何将无法靠个体投资提供经费，而是 [178] 必须靠出售股份给无名的公众获得经费。根据他的观点，结果将会如下所述：

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者，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不再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从借入者获得的利润中理所当然地引出来的利息）表现为对别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

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显然表现为通往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①

[179] 这段话无须注解。但接下来可以得出的好些结论仍需加以明晰。首先，这段话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并不局限于将直接所有权与有效控制权统一起来的所谓的“原始”或早期资本主义。显然，认为马克思从未设想一种更加精巧的资本主义形式，即使合法所有权与有效控制权相分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他是首批把这种发展断言为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内部需要的必然结果的人。

其次，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经理革命理论使马克思的分析变得陈旧过时的主张，是无稽之谈。经理革命早在1864年就被马克思预见到。他在其中看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扬弃。

再次，仔细阅读这段话会表明，马克思试图将这里提出的理论与他的异化理论结合起来。所有权从控制权和管理权中的分离

^① 《资本论》第3卷，页427-429。根据恩格斯的观点（《资本论》第2卷，序言，页2-3），这些部分是马克思在1864-1865年写的。恩格斯对这段话的冗长评论（《资本论》第3卷，页428-429）清楚地表明，他没有领会马克思的分析的强烈的方法论意义。关于股东在股份公司的单纯形式的控制权的一些公共争论，在马克思写作这些段落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被察觉到，并且已经存在一些通过更为有效的立法加强股东控制权的公共压力。但即使探讨这个问题的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没有在其中看到任何超出行政与立法困境范围的东西。他没有在其中察觉到任何能够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构性变革的东西。参见密尔：《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61），皮尔普（People）版，页580-581。

也必须被看作是异化的高潮。不仅工人与他的劳动相疏离，而且资本家——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精巧的形式——与他的资本相疏离。

马克思关于股份公司的评论来自对他而言似乎是一种平行发展的东西：合作社运动。正是在大约同一时间，他写出《资本论》第3卷的这一章。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雇佣劳动、没有[180]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

同时，1848~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偶然的努力，就始终无法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无法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减轻他们的贫困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①

马克思的赞扬掺杂着批判，赞扬也并非只是对国际的合作社

① 《选集》第1卷，页383-384。

运动的假殷勤。正如《资本论》第3卷——其中，修辞学的考虑和内部工人阶级的政治学都没能起到任何作用——所清楚地表明的，合作社运动就像股份公司一样，对马克思而言表明治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趋势。像股份公司一样，合作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这种所有制虽然仍是在私有制的概念性框架内体现的，但实际上是一种新颖的和革命性的现象。这是非常清楚地从《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合作工厂的评价中得出来的：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 [181] 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①

于是，这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根源：社会主义实际上无非是资本主义潜在地所是的东西。未来社会的普遍主义从哲学上看无非是黑格尔国家概念的保留，是从各种使国家概念倾向于政治保守主义的历史形式中解放出来的。无论是否显现在生产方式中或历史主体即无产阶级中，这种普遍性最终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必须探讨的东西是共产主义社会，它恰恰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的”。

① 《资本论》第3卷，页431。

最后，这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发展的论述也可能提出一种摆脱困扰马克思主义者好几代的困境的方式，这种论述最近被朗格（Oscar Lange）重新提了出来。根据朗格的想法，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发生先于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的出现，而所有以往的革命都只不过是从政治上将业已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合法化。在社会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从政治上使这些条件成为可能。

这种解释与业已引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段落中的观点大为不同。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权力的诉求无非只是实现已然存在于社会—经济结构内的各种潜在性。政治权力在他看来绝不可能创造任何 *ex nihilo* [无中生有] 的东西。马克思专门将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称作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隐秘转型得以发生的进程的两个典范，这似乎是与朗格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正好在这个方面不同于以往革命的观点相矛盾的。政治权力对潜在性的实现可能是关键性的，但它并不会创造和实现新的结构。它完善现存现实，给予在现存社会里可能仍处于边缘的东西以支配地位，但它绝不可能是原动力。像列宁的其他拥护者一样，[182] 朗格分享了他的政治万能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不同于马克思的看法的。

与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的观点背后的那些考虑一样的考虑，也促使他早在1846年就支持美国宅地法运动（American Homestead Act Movement），反对美国的德国左翼移民中那些以怀疑态度看待私有制的社会基础的这种扩大化的人士。^① 相反，马克思认为，在不存在私有制的地方，通过普遍化对私有制的辩证扬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私有制的社会基础的进一步扩大应当受到欢迎，因为私有制的扬弃最终要将它以之为基础的原则

^① 参见马克思1846年5月起草的布鲁塞尔德国共产主义通讯协会（German Communist Corresponding Society of Brussels）的公告（《著作集》第4卷，页3-17）。

普遍化。

但是，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对朝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必要的，但他在此所指的并不是一种决定论的必然性概念。资本主义，就下一阶段辩证地展现其自身所固有的原则而言是必要的。为了实现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当前的经济与政治形式就必须加以克服。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固有的矛盾。

这再次表明，马克思对于他当时所处的世界的态度总是举棋不定的。很有可能像黑格尔一样，他最终觉得，只有当一种生活形式达到它的顶峰时，理想的东西才会表现出来反对现实的东西。社会主义前景对马克思而言从未表现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单纯反题：除非它能像凤凰一样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灰烬中涅槃，否则实际上无法得到实现——这是其他社会主义者从未真正分享过的马克思的一种洞见，而圣西门可能除外。

马克思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态度，也许可以更好地被理解为反对的是这些考虑的背景。有时候人们忽视了，所有被马克思严厉攻击的社会主义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普鲁东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全都对政治自由主义持更为怀疑的立场。这种怀疑论一旦变成激进的而无批判的憎恶，有时候就会导致他们直接或间接地 [183] 与旧政权的贵族政治和独裁政治结盟，反对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和政治自由主义。马克思总是用他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全部批判来支持政治自由主义反对传统右派，不是因为任何将历史看成不断“向左”推移的决定论态度，而是出于彻底不同的原因。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自由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像拉萨尔派社会主义一样会从与右派的结盟中——在两者都颠覆政治自由主义以后——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将必然沾有它的独裁主义同盟的某些特征。不仅因为同盟之间自然地彼此影响，而且因为资产阶级的瓦解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窒息，在右翼的协助下将过早地扼杀唯一能够为社会主义自身创

造经济和概念基础的力量。^①

马克思对这些学说的批判承认了如下危险，即所有社会主义流派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怀有的这种非批判的敌意，使它们对塑造现实的力量、对社会主义前景和实现这一前景的可能性都是半盲的。马克思最终主张，只有一种了解完全不同于私有制体制的社会主义，才能扬弃私有制，并代之以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人工制品之间的一种新的、非占用的关系；只有一种迎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个体与他的同类造物的总体分离进行的抽象的社会主义，才能反对这种抽象，选择个体与社会的一种本质统一；只有一种了解异化社会中——而且总体的异化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的人权是多么抽象和空洞的社会主义，才能尝试发展一种社会制度以实现这些权利的内容，而将权利的外部形式当作无非是异化的另一种体现加以扬弃。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不通过这种辩证的矛盾心理加以中介而向终极目的的突破，都注定要么终结在 Cloud Cuckoo Land [脱离现实的幻境] 中，要么终结在一种根本不能领会自由为何物的新的独裁主义中。[184] 无疑，马克思的许多反对巴枯宁的论证，抛开其鼓吹性、个人恶意和恐俄症，可以被归结为马克思这个意识到他的社会的局限与成就的西方文明之子对生活在另一个社会的从未经现代自由主义、因而要彻底废除自由主义而没有察觉到除非通过同时实现和毁灭自由主义，否则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人的怀疑态度。当马克思把拉萨尔称作“工人的独裁者”时，他心里所想的是同样的辩证法：一种将不得不依赖俾斯麦和普鲁士专制主义以毁灭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作为社会主义领域的另一个俾斯麦和普鲁士而终结。没有任何东西甚于自我毁灭。

① 参见鲁贝 (M. Rubel): “马克思的民主观念” (Marx's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载《新政治学》(New Politics) 第1辑, 第2期 (1962年), 页78-90。关于马克思与拉萨尔主义者, 见摩根 (R. P. Morgan): 《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一国际》(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ambridge, 1965), 页1-97。

第七章 法国革命和恐怖：政治革命的成就与局限

[185]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历史预测是如何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使这种社会变革成为可能的条件的先前存在的。这种历史解释的方法标准，也被他运用于两个其他的历史现象：法国革命和 1848 年革命。

马克思早在 1843 年就形成了关于法国革命的观点。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现代国家在法国革命中实现了它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解放和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所有政治性的、以共同体为取向的限制都在 1789 年被清扫掉了，市民社会开始独立于政治领域，而在中世纪它还是被套在政治领域之中的。这一成就标志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紧张关系的出现，它将人从人的普遍性中的异化制度化了。^①

① 《早期著作集》，页 27 - 29。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指出这种分离虽然在 1789 年从形式上得到宣布，但只有通过 1830 年的 7 月革命才得到充分确立，从而补充了这一论证。^①

马克思没有将他关于法国革命的解释局限于对其历史影响的分析。辩证地看，法国革命具有两个方面：主观地看，它无非是资产阶级意志要根据市民社会的原则塑造政治世界的体现，这些目标在马克思看来最终通过 Directoire [督政府] 和拿破仑得到了维护；但客观地看，资产阶级所倡导的社会秩序也意味着普遍的标准终究注定要破坏这种社会秩序本身。因此，法国革命孕育了它自身的毁灭。自封建主义和行会制度的废除以来，每个个体，包括无产阶级成员，[186] 都可以解放自己。社会发展得更加开放，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成为一名资产者来确认自己的自由。但个人作为资产者的存在无疑预设了作为非资产者的他人的存在。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为它的理论提供了居所：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名资产者，恰恰是因为并不是任何人都将成为一名资产者。资产阶级革命绝不可能涵括所有的人性，尽管它的正当性恰恰在于这个普遍性拟设。^②

因此，既然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它的原则，这些原则的证实就必须在市民社会之外加以获得。在这里，马克思在法国革命的普遍主义原则中看到一种超越资产阶级主观意图的意义。他把这些普遍主义原则看作是共产主义秩序的先驱，这些先驱将把这种普遍主义引向其逻辑结论。因此，共产主义就是 1789 年原则的真正扬弃：

并未被这种探讨所涉及的法国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 年在 Cercle social [社会小

① 《神圣家族》，页 167。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62。

组] 中开始、中途勒克莱尔克 (Leclerc) 和卢 (Roux) 为主要代表, 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 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 年革命以后, 在法国, 这种思想又以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 (Buonarroti) 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 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①

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内部矛盾的洞察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更加清晰, 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有些人, 像鲍威尔,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仅仅看到国家与宗教的分离, 而其他, 像布朗基 (Louis Blanc), 则把 1793 年看作是 1789 年全然不同的; 马克思看到 1789 年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并使 1789 年以后的历史符合一种确切的历史解释模式。^②

马克思在 1847 年的一篇报纸文章中再次确认了关于法国革命的这种分析, [187] 他说, 在清教徒革命和法国革命中, 共和主义必然导致一种共产主义观点:

真正的、积极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第一次表现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内, 发生在君主立宪制已被克服的时刻。最彻底的共和派、英国的平均主义者、法国的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等人都是第一批宣告这些“社会问题”的人。^③

共产主义的这种从共和主义出发的理论演绎, 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观念可以在法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内得到实现。相反, 根据

① 《神圣家族》, 页 161。

② 鲍威尔:《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Di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Berlin, 1849); 布朗基:《法国革命的历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866)。

③ 1847 年 11 月 11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马克思在 1868 年 3 月 25 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再次说道, 社会主义的倾向是对源自社会主义自身前提的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应(《通信选集》, 页 242)。

马克思的观点，任何试图通过法国革命——或清教徒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共产主义观念的存在先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所必需的条件，就像市民社会的观念先于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一样。马克思说道，条件绝不会产生观念，条件只是使观念的实现成为可能。毕竟，共产主义观念与柏拉图、中世纪的僧侣和莫尔（Thomas More）一样古老。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伴随这种关于法国革命对共产主义的意义的观点的，是可能被看作一种对待恐怖统治和雅各宾派独裁政权的令人吃惊的态度的内容。他对此的立场的独特性在于，虽然他自然同情雅各宾派，但他把他们看作是全然被误导的和糊涂的，认为他们的恐怖主义诉求内在于他们的基本谬见之中。马克思毫不含糊地谴责雅各宾派的恐怖，雅各宾派独裁政权对他而言无论如何都不会也不可能充当未来共产主义革命的一种模式。然而，他并没有基于道义的原因反对雅各宾恐怖。他的反对立场内在于他关于社会变革的性质的系统思想之中。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个问题从未得到透彻的考察，甚至考茨基—列宁关于政治恐怖的论战——两位主角都 [188] 自由地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著——也是在一种几乎无助于阐明马克思的分析本身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①

马克思把恐怖统治解释为源自雅各宾派试图实现一种政治秩序的企图，而这种政治秩序仍缺乏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先决条件。结果，雅各宾派越来越像准古典共和主义一样被迫运用单纯的政治措施，越来越脱离当时的世界。恐怖变成向雅各宾派开放的唯一途径，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带来渴望的变革。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恐怖的诉求是革命希望实现的目标在当前不能得到实现的最终证明。恐怖与其说是实现革命目标的手段，不如说

^① 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Terrorism and Communism*, London, 1920）；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入《选集》（*Selected Works*, London, 1946）第7卷，页113—217。

是失败的标志。

这种观点是马克思对待恐怖的态度典型特征，而这种态度贯穿他的整个一生，开始于他最早期的作品。罗伯斯庇尔的名字第一次就出现在他首次发表的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Notes about the New Prussian Censorship Regulations, 1842）中。马克思反对审查制度的主要论证在于，它针对的不是人的行动，而是人的思想。根据黑格尔《法哲学》的观点，这违背了法律的本性，即作为理性而客观的规范、而不是主观倾向的一种体现。因此，马克思将出版审查制度当作“恐怖主义的”加以反对，因为它试图威吓人的思想，而不是因他的行为而惩罚他。在这种背景下，罗伯斯庇尔的名字出现了：

这样一来，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在罗伯斯庇尔时期，国家在万不得已时所制定的法律就是这样的法律，在罗马各王朝时期，国家在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制定的法律也是这样的法律。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①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讨论法国革命时，针对这些考虑提供了进一步的洞见。法国革命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开来，但雅各宾派 [189] 政府的行事就好像这种分离没有发生一样，忘记了每个领域的存在都是通过它与其他领域的区分才成为可能的。从这个视角看，雅各宾派的恐怖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和分离出来的政治国家想要重新对市民社会施加影

① 《著作集》第1卷，页14。这再次证明那种认为早期马克思是一名“雅各宾派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乃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谬见。

响，想要压制在市民社会得到实现的私人利益和特殊利益的一种尝试。雅各宾派的独裁政权试图通过强力克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而这种尝试的失败是内在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二分不能通过市民社会的政治化，而只有通过认识到个体的普遍性带来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综合才会得到克服。不仅雅各宾派的杰作无法使政治国家影响市民社会，辩证地看，特殊主义战胜了国家并强迫国家屈从自己的目标，而且督政府所暗示的恢复，已经内在于雅各宾派恐怖的单面性和它的必然失败之中：

无疑，在政治国家自身以暴力的方式诞生于市民社会的时期，在人们争取通过政治解放而赋予自己以自由的时期，国家可以并且必须着手于废除和消灭宗教，但只有通过像国家着手于废除私有制一样的方式，即通过宣布最大限度，通过没收，通过累进税或者通过剥夺生命的方式，即通过断头台。在那些国家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时代，政治生活设法遏止它自身的前提——即市民社会及其因素——和设法将自身确立为人的真正的和和谐的类生活。但这种政治生活只有通过使自己处于与其自己存在的条件的暴力矛盾之中，通过宣布一种永久的革命，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可见，政治戏剧必然以宗教、私有制、市民社会的所有因素的恢复而告终，就像战争以和平条约告终一样。^①

雅各宾派的这种使国家凌驾于社会—经济条件之上因而指导它们符合国家的政治意志的尝试，[190]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① 《早期著作集》，页16。这种描述与黑格尔《现象学》（贝利版，页599 - 610）阐述恐怖的章节有强烈的相似性。马克思对雅各宾派将所有生活领域政治化的尝试作出的批判，出人意料地类似于塔尔蒙反对极权民主制的论证，这种极权民主制使政治无所不包，将人类生活纳入政治存在与活动中（塔尔蒙：《极权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52]）。

产生于雅各宾派对经济环境的不理解。雅各宾派把经济看作是一个单面的问题，要通过最终会体现一种政治意志的政治措施加以掌控。可见，雅各宾派将政治权力归结为偏好的主观体现，缺乏与社会—经济世界的客观现实的任何接触。他们将政治权力归结为纯粹的任意性。马克思在1844年的一篇报纸文章中以不同的方式说出了这个观点：

政治理性的经典时期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的英雄们远没有把国家的原则当成社会弊病的根源，而是认为社会弊病是政治问题的根源。因此罗伯斯庇尔认为大富大贫是纯粹民主的障碍。他于是企图建立斯巴达式节俭的普遍体系。政治的原则是意志。政治理解越是片面也就是说越完美，它就对意志的无所不能越有信心；它越是无视意志的自然的和精神的限度，它就越是不能发现社会罪恶的真正根源。^①

可见，恐怖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谬误，脱离真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因此，它绝不可能获得胜利。雅各宾派是脱离现实的，马克思也以不同的方式论述了这一点：由于古典城邦意味着经济领域被纳入到政治领域之下，所以它是雅各宾派共和主义的模式。但这种模式的时代错误使得雅各宾派的尝试彻底无望。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既然雅各宾派缺乏对历史的任何理解，他们也就忽视了经济进程的重要性。在雅典和罗马，社会—经济生活，即市民社会能够从属于政治的支配地位，因为在这个阶段，两个领域的区分还没有真正发生。在生活被划分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现代世界，这样一种归属是全然不可能的。对马克思而言，最终必将通过共产主义得到实现的普遍性是一种辩证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保留了市民社会的以往成就，而雅各宾派的普遍意志却是单

① 1844年8月7日《前进报》（《著作集》第1卷，页402）。

面性的。马克思的普遍性扬弃市民社会，罗伯斯庇尔的普遍性仅否定市民社会。用卢梭的话说，雅各宾派试图消灭 [191] *volonté des tous* [众意] 以便实现 *volonté générale* [公意]，而马克思看到，除非通过对众意进行一种辩证的合并与超越，否则就找不到任何其他达到公意的途径。雅各宾派试图复原城邦，而马克思主张绝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理论民主共和国和以业已解放的奴隶制，即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现代灵魂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

……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①

马克思在其后期的经济与历史研究的影响下，后来又根据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黑格尔的思辨重述了他对恐怖的评定，但他的观点基本上仍是一样的。在 1847 年，他警告无产阶级预防一种过早的、最终将不得不依赖于政治措施的起义：

只要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历史的“运动”中那些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消亡、因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的决定性垮台成为必然的物质条件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即使

① 《神圣家族》，页 164 - 165。

无产阶级打垮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它的胜利也不过是暂时的，仅仅是服务资产阶级的一个环节（就像公元1794年一样）。^①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同样的方式评判巴贝夫的密谋。他补充说，一种试图通过单纯的政治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共产主义革命，绝不会超出一种形式化的平等主义，这种形式化的平等主义是以无法意识到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巨大创造性潜能的禁欲主义为基础的：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192]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达，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②

马克思在1848年年末主张，这些过早的突破最终帮助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

在这两次革命（1648年和1789年）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

① 1847年11月1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著作集》第4卷，页338—339）。

② 《选集》第1卷，页61。马克思也以同样的形式批评了共产主义最初阶段的粗俗（《早期著作集》，页153—154）。

1793~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是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①

这也帮助马克思避免了对1793年与1848年的类比。雅各宾派绝不能激发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相反，更为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与雅各宾派分离开来的社会学含义：雅各宾派仍然相信由边缘的激进团体 sansculottes [长裤汉] 或 enragés [狂热者] 进行的突破，马克思则想到了不同的阶级组织。布朗基主义者对马克思来说就是既没有学会也没有忘记任何东西的雅各宾派的后裔。^②

同样的主题频繁重现在马克思的作品中。他在1853年反对巴枯宁时说，革命激情无法保证正确的思维，因为“革命感觉”阐明的是雅各宾派恐怖的 lois de suspects [嫌疑犯法]。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强烈的反主观主义路线，在此又是显而易见的。^③ 他在1865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评价说，罗伯斯庇尔对于废除1789年宣布工人阶级组织和工会非法的社团法毫无作为。[193] 在最终的悬而未决中，雅各宾派统治时期的任何东西都不具有真正反资产阶级的特性。^④

因此，不足为怪，马克思称赞1871年的巴黎公社拒绝建立恐怖统治。^⑤ 这种看法似乎甚至于他为巴黎公社所作的特殊辩护。

① “资产阶级与反革命”（Die Bourgeoisie und die Kontrerevolution），载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著作集》第6卷，页107）。

② 《著作集》第7卷，页276。

③ 《著作集》第9卷，页301。

④ 马克思1865年1月3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通信选集》，页193）；恩格斯在1870年非常恰当地评价说：“我们通常把[恐怖统治]看作激发恐怖的人的统治。相反，它是那些自身就是恐怖受害者的人的统治。恐怖意味着受惊的人做出的大多无用的残酷行为，以便重新确认他们自己”[恩格斯1870年9月4日写给马克思的信（《著作集》第9卷，页302-303）]。

⑤ 《选集》第1卷，页528-529。

对马克思而言，这是涉及原则的关键。如果可以革命，革命就不能采取恐怖。希望通过恐怖完成的东西，最终在特定的环境下不可能完成。从这个观点看，考茨基是对的，他把马克思的意思解读为：恐怖的诉求本身是软弱和受挫的标志。^① 马克思可能忽视的是如下可能性，即一个革命政权通过恐怖可以成功地掌握政治权力。虽然如此，但通过恐怖保留下来的政治权力无法使自己从恐怖主义的胎记中解放出来，肯定无法再去完成自己业已制定的目标。政治权力的保留在这样的环境下会成为自身的终结。

因此，雅各宾派的经验获得了一种更加宽广的意义：当马克思把雅各宾派的革命类型称为一种单纯的“政治”革命时，他马上提到两个方面。这种革命局限于获取政治权力，而不要求社会—经济条件是否会使这种权力的保留成为可行。然而，这种进程构成这样的企图，即政治权力通过政治领域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试图根据政治权力的原则组织市民社会。这意味着私人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纳入一种脱离私人生活具体条件的政治普遍性。

政治权力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这种裂隙所固有的危险，由马克思 1843 年在 [194]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加以强调。^② 他在次年的一篇报纸文章中说道，单纯的政治革命无非就是特殊东西与普遍东西之间的对立二分的最终极端化；它最终证明单纯的政治普遍性是虚假的，因为它表明国家只有通过无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内容和脱离市民社会，才能实现自己的普遍性。这种单面的普遍性不会构成一种整合与克服特殊性的综合。^③

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试图从政治上创造各种还没有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在地得到发展的条件的单纯的政治暴动，都注定要失败。因此，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坚决地反对工人阶

① 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页 38。参见卢森堡（R. Luxemburg）：《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n Arbor, 1961），沃尔夫（Bertram D. Wolfe）编。

② 《早期著作集》，页 55 - 56。

③ 1844 年 8 月 8 日《前进报》（《著作集》第 1 卷，页 401，页 407）。

级的政治 émeute [暴动]。根据他的看法，政治领域不能使自己强加给市民社会，除非市民社会已经在自身范围内形成了使这一杰作不再必要的因素。马克思关于政治安排在市民社会的条件中有其根源的普遍观点，已被规划进革命的策略中；政治本身是无能的。^①

这可以解释马克思 1848 年的立场。尽管他在这一年的政治起义中看到了创造社会主义革命的环境的机会，但他仍一贯地反对武装暴动的所有极端企图。政治革命不能推倒社会现实的墙体。马克思在 1848 年 6 月底通过将巴黎雅各宾—布朗基派暴动的失败称作不是无产阶级的败北，而是共和主义雅各宾派幻想——即骗取工人们认为 1793 年的失败可以成为 1848 年的成功——的败北，总结了他对这次失败的观察。^② 两年后，在对直接政治安慰的需要可能有所缓解的时候，马克思仍坚持同样的观点；在《法兰西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 in France*）中总结 1848 年尤其是当年六月暴动时，他说：

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 [195] 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③

马克思以同样的态度判定德国的激进暴动，尤其是受法国雅

① 《选集》第 1 卷，页 362。

② 1848 年 6 月 29 日《新莱茵报》（《著作集》第 5 卷，页 133-137）。

③ 《选集》第 1 卷，页 139。也可参见《新莱茵报》在关门停刊时提出的力劝工人们不要暴动的最后建议（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莱茵报》；《著作集》第 6 卷，页 519）。

各宾派重大影响的黑克尔（Friedrich Hecker）领导的巴登起义：

黑克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重大作用上，我们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由经济关系引起的冲突上。……在黑克尔看来，社会问题是由政治斗争产生的，在《新莱茵报》看来，政治斗争不过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黑克尔可能是个优秀的三色共和主义者，而《新莱茵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时代开始。^①

雅各宾派的最终主观主义也为马克思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朗基派因素提供了主要论证。在同盟分裂为马克思 - 恩格斯派系和维利希 - 沙佩尔（Willich - Schapper）派系的 1850 年 9 月 15 日的伦敦重要会议上，马克思将他的布朗基派对手描述如下：

他们用阿谀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论观点代替《共产党宣言》的唯物论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 15 年、20 年、50 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正像民主党人使用的：“人民”这个词是一句空话一样，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也是一句空话。……

说道热情，为了加入你认为眼看就会取得政权的党，这种热情需要的并不多。我一向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复无常的意见。我们献身 [196] 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

① 1848 年 10 月 29 日《新莱茵报》（《著作集》第 5 卷，页 443）。

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布朗基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①

马克思关于维利希（Willich）随后在暴动中的一些尝试的评论遵循这样的前提：这些尝试将由于政治意志与市民社会的客观条件之间的不一致而直接失败，或者导致政治恐怖主义。^②

这些考虑也可以解释马克思 1850 年 3 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Addres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League*）的复杂语气。这篇《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不断被人使用以证明马克思当时对待布朗基派的基本态度。然而，这种解释无法说明为什么马克思在 1850 年 3 月与 9 月间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此期间他恰恰由于反对布朗基主义因素才引起同盟的分裂。这种解释似乎也被马克思在《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采用的掩藏自己分析性洞见的修辞误导了。^③

这篇《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以有些暴力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因为任何其他语气都不足以激起被击败的德国共产主义者

① 《著作集》第 8 卷，页 598 - 601。参见伊斯顿（I. D. Easton）：“维利希、马克思和左翼黑格尔派的社会主义”（August Willich, Marx and Left - Hegelian Socialism），载《应用经济学研究所手册》（*Cahiers de l'ISEA*），第 9 期（1965 年 8 月），页 101 - 137；布卢门贝格（W. Blumenberg）：“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载《社会历史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第 9 期（1964 年），页 81 - 121；纳门（S. Na'aman）：“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其形成的第二阶段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in den zweiten Phase seines Bestehens*），载《社会历史档案》（*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第 5 期（1965 年），页 5 - 82。

②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载《著作集》第 8 卷，页 461，页 574 - 575；《高尚意识的骑士》（*Der Ritter vom edelmütigen Bewusstsein*），载《著作集》第 9 卷，页 514 - 515。

③ 梅林：《卡尔·马克思》，页 202 - 204；普拉门纳茨（J. Plamenatz）：《德国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共产主义》（*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1954），页 127。

同盟的残余力量的反应。马克思也不得不给仍是同盟成员的布朗基分子献点假殷勤。但在内容上，这篇《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绝不是关于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蓝图，而是意图在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开始激进暴动的情况下充当一种指导。马克思试图帮助德国的同盟，如果它处在一种不是它自己造成的困难中的话。对于这种紧急状况，[197]他发出指示表明，同盟成员如何避免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同一化，并且发展与现实环境相关的和免受主张暴动的革命主义（putschistic revolutionarism）伤害的革命活动。整篇《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都列举了一些建议，其目的是在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件中保护无产阶级活动的社会与组织基础。因此，马克思这样力劝无产阶级团体的组织，以便它们——如果在革命爆发时——能够成为真正的力量。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敦促共产主义者自身开始这样的革命。他没有为一次暴动、一场动乱或一次行动提供任何指令。《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的最后几段放弃了一贯的语气，强调阶级意识的出现与创造的重要性，并设想了一场漫长的革命斗争，极易让人想到他在几个月后即9月15日的演讲中提到的“15年、20年、50年”：

如果德国工人没有完全经历漫长的革命发展而不能取得政权并实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这一次至少肯定地知道，这场逼近的革命戏剧的第一次行动将与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的直接胜利相符合，并且将通过这场胜利极大地得到加速。

但他们自己必须通过敞开心扉阐明他们的阶级利益，通过尽可能地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站稳立场，通过片刻也不被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语所蛊惑，而竭尽全力争取他们

的最后胜利。……^①

这些考虑必定隐藏在马克思 50 年代与德国激进民主党政客福格特 (Karl Vogt) 展开的漫长而无趣的论战背后。否则, 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如此小题大做地致力于至少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福格特在流亡日内瓦期间的 1859 年出版了一本涉及他隐晦地中伤一份德国报纸的书。在这本书中, 他把马克思称为叛乱密谋的头领, 忙于颠覆政权和准备暴力推翻政权。^② 马克思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搜集 [198] 历史和法律资料以反驳这种控诉, 最终以名为《福格特先生》的多达数百页的书出版了他的考查结果。马克思的这种沉重报复只能被理解是他的更为宏大的目标的一部分, 这个目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旨在暴力颠覆政权的更加充满密谋的集团, 而且是一种新奇的现象。马克思在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称作“宣传团体”^③ 时, 可能以保守的态度谈过这种情况, 但他的用意基本上是同样有效的。他在同盟试图随后形成给政治和社会结构带来变革的组织与认知基础的尝试中, 看到了同盟的独特性。通过将同盟与在革命运动发育不全的情况下大行其道的众多密谋混为一谈, 福格特把马克思认为自己对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贡献, 即理解社会进程的深度, 以及在不产者中间传播这种理解, 看得无足轻重。^④ 马克思正当地理解, 福格特以这种毫无批判的方式将他与雅各宾派传统等同起来的成功做法, 是对他的理论的最坏打击。

工人阶级运动将自身从恐怖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中解放出来的

^① 《选集》第 1 卷, 页 116 - 117。

^② 参见福格特:《我反对〈共同报〉的过程》(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Genf, 1859), 页 136 和附录页 31 - 32。

^③ 《福格特先生》, 载《著作集》第 14 卷, 页 438。

^④ 参见业已引用的马克思 1844 年 8 月 11 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著作集》第 27 卷, 页 425 - 427)。

内部需要，也表现在马克思在国际的活动中。它可以解释马克思对皮阿（Félix Pyat）领导下的国际法国分部的激进布朗基派恐怖主义的反波拿巴活动的强烈谴责。^① 在国际的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总委员会的一份年度报告中，马克思 1868 年 9 月说道，法国的秘密警察把国际看作只是另一个密谋团体。他们忽视了国际对波拿巴政权造成的真正危险。^② 在 1870 年 3 月 3 日，总委员会再次使自身与密谋的趋势分离开，宣称无产阶级绝不真正需要密谋：它的密谋总是公开的。^③

[199] 这些态度决定了马克思试图在 1870 ~ 1871 年的关键时期指导国际的途径。1870 年 7 月 23 日的《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The First 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on the Franco - Prussian War*）重新确认了这种反对叛乱的态度。^④ 这种态度在拿破仑三世退位和梯也尔的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由马克思起草和经总委员会 1870 年 9 月 9 日同意的《第二篇宣言》中甚至更加强烈。马克思没有使用更加严厉和强烈的语言反对梯也尔政府，但他敦促工人们不要落入法国激进派的传统圈套，即想要到处重新上演 1793 年的惨败。他对工人阶级暴动的谴责再明确不过了：

我们像他们一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子。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成果，而是作为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

① 见马克思对就此事进行谴责的投票所给的示意，该示意得到了 1866 年 7 月 7 日总委员会的同意（《1866 ~ 1868 年的国际总委员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1866 - 1868*, Moscow, 日期不详]，页 224）。

② 《著作集》第 16 卷，页 319。

③ 《著作集》第 16 卷，页 422。

④ 《选集》第 1 卷，页 486 - 490。

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沾染了洗不清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样一些重要据点，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则只是分到了一些空谈的部门。这个政府的最初几个步骤中已经很明显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①

的确，在三年前的1870年9月6日，马克思试图阻止受到误导的巴黎布朗基派暴动的爆发；在这一天的一封信中，他告诉恩格斯：

我刚“坐下”准备给你写信，赛拉叶来了并告诉我，他明天离开伦敦去巴黎，但只待几天。主要目的是安排一下那里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事务。今天整个法国人支部都启程到巴黎去，要在那里用国际的名义干蠢事，所以这更有必要。“他们”想推翻临时政府，在巴黎建立公社，任命皮阿为法国驻伦敦公使，等等。^②

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在暴动已经爆发的情况下，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对巴黎公社的态度。然而，他从不相信公社能够成功和幸存，他也从未说过任何这类话，哪怕在是《法兰西内战》对公社的赞辞中。他始终相信，公社作为一种纯粹的政

① 《选集》第1卷，页496-498。

② 马克思1870年9月6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453）。此外，科林斯（H. Collins）和阿布拉斯基（C. Abramsky）的卓越研究成果《卡尔·马克思与英国劳动运动》（*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London, 1965）在第185页引用这封信时省略了这句话的一些重要从句。

治暴动绝不会有机会。在一次毫不留情的、尽管是私人性的交流，即1881年写给一位丹麦社会主义者的信中，马克思总结了这个观点：

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吓住凡尔赛分子，使他们不敢再自吹自擂，如此等等。^①

[201]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以前的书信，这段话可能看起来有些事后诸葛，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他来说，公社的大多数人事实上感兴趣的是政治权力本身，而不是社会。所以，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②

马克思在写于1850年，即他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争论期间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他对布朗基—雅各宾派 *conspirateurs* [密

① 马克思1881年2月22日写给多梅拉—纽文胡斯 (Ferdinand Domela - Nieuwenhuis) 的信 (《通信选集》，页410)。科林斯和阿布拉斯基再次省略了关键的从句“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卡尔·马克思与英国劳动运动》，页195)。

② 另一方面，恩格斯没有分享马克思对于公社的质疑。对恩格斯来说，情况简单得多。“只要巴黎公社多树立一点权威和中央集权，它就会战胜资产阶级” (恩格斯1872年1月14日写给特尔察吉 (Terzaghi) 的信，载《著作集》第32卷，页372)。

谋家] 的态度。他关于密谋家的描述有点意思：

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 *idées fixes* [固定观念]。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他们搞这些计划，只有一个最近的目标，这就是推翻现政府；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进行理论性质更多的教育。这说明他们对黑色燕尾服 (*habits noirs*)，即代表运动这一方面的多少有些教养的人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纯粹平民的；但是，因为后者是党派的正式代表，所以密谋家们始终不能完全不依赖他们。^①

可见，根据马克思的看法，雅各宾派的遗产是一种工人阶级必须从中解脱出来的创伤。

① 《著作集》第7卷，页273-274。

第八章 新的社会

8.1 普选制与“国家的扬弃”

[202] 理解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的拟设的主要困难是忽视术语“*Aufhebung*”的辩证含义造成的结果。应当对此加以补充的是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其更高的阶段，也至少在经济生产中要求指导和计划，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人的创造能力服从人的有意识的指导。^①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到一种由公社建立起来的“国家代表”（*national delegation*），并且他并未在任何地方暗示这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91 - 92；《雾月十八日》，载《选集》第 1 卷，页 340；《资本论》第 3 卷，页 798 - 799。

种新的团体应当最终消失。^① 这些陈述自然而然造成了一些惊愕。它们产生了如下思想，即严格地讲，国家的消灭终究可能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国家的所有目标都是旨在用社会权威的一种合法形式取代国家的强制权力。但有人认为，这种权威可能会比现存的、多半最小化的国家更多地干预个体的生活。这种社会权威与国家之间的差别，正如我们今天所知，在于新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内部的认同，而不是外部的强制。^② 可见，马克思似乎成了最后的路德派教徒。

通过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最终消失时所使用的各种术语的显著差别，可能会避免部分困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著名段落中谈到国家“消亡”（*der staat wird nicht “abgeschafft”, er stirbt [203] ab [国家不会被消灭，它会消亡]*），^③ 而马克思指的总是国家的消灭与超越（*Aufhebung*）。*Absterben des Staates [国家的消亡]* 和 *Aufhebung des Staates [国家的扬弃]* 明显是两个不同的起源于完全不同思想传统的术语：恩格斯的“*Absterben*”是一种生物学的比喻，马克思的“*Aufhebung*”则是一个具有明显辩证含义的哲学术语。

马克思首次提到国家的扬弃是在他 1843 年写的一些文章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把现代国家看作普遍性观念——从观念上看，它是抵制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利益的壁垒——与这些对立性利益本身之间的一种恒久的紧张关系。从这种观点看，马克思对国家的看法总是不同于恩格斯（以及多半沿袭恩格斯的考茨基和列宁）。对恩格斯而言，国家无非是由各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权

① 《选集》第 1 卷，页 376。另一方面，列宁认为这种“残留的国家”也将消失（《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页 64-71）。虽然这可能是列宁对马克思文本的一种有趣的注解，但绝非马克思本人明确说过的。

② 这是拉姆（Thilo Ramm）的最使人信服的主张，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建立的未来的社会形式”（*Die künftige Gesellschaftsform nach der Theorie von Marx und Engels*），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2 辑，页 77-119。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英文第 3 版（*Moscow, 1962*），页 385。

力机械地加以指导的一种用于强制的外部组织。^①对马克思而言，国家的存在证实的是现实东西与理想东西之间，现存的特殊性的、以利益为取向的社会力量与普遍性拟设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存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紧张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现代政治国家本身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片段，而所有其他生活领域都有可能存在市民社会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1844年《前进报》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说道，分离的政治领域的存在越是显著，社会就越是远离国家组织原则，即普遍主义的实现。在这方面，国家类似于宗教：国家越是强化，它试图弥合的裂隙就越深。^②马克思继续说，消除这种二元论的途径不可能在作为一种分离且片面的组织的国家的现存框架内找到，因为国家的片面性将始终挫败普遍主义的尝试。解决途径必须在国家之外寻找。个体的生活只有在作为一种孤立和狭隘的组织的国家的框架消失以后，才能实现普遍的内容，因为普遍领域的分离组织（=国家）是以特殊性的、以利益为取向的领域的存在为前提的。[204]只有普遍性的分离形式的消失才会使普遍性的实现成为可能。

我们已经在第一章看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作为一种孤立组织的国家的灭亡取决于普选制。在实现政治领域通过全体公众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普选制消除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差别，从而消除了作为一种特殊机构从整个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脱离出来的国家。马克思将普选制不是看作激进的民主政治观的单纯实现，而是看作国家的真正扬弃，这在他1845年为写一本关于现代国家的书所作的笔记中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被拟定为“普选，为扬弃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③

^① 参见米利班（R. Milliband）：“马克思与国家”（Marx and the State），载《1965年社会主义名册》，页278-296。

^② 1844年8月7日《前进报》（《著作集》第1卷，页402）；参见《早期著作集》，页11。

^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655。

可见，国家的扬弃只有在政治结构已经发挥它的所有潜在性以后，才成为可能。结果，国家的形式——它总是片面的——一旦变得与它的普遍内容同一，也就不再是单纯的形式。因此，奠定黑格尔政治哲学基础的普遍性，只有在国家本身被扬弃，即消灭、超越和保留时，才会得到实现。黑格尔哲学中的国家的实现，只有通过国家的灭亡才成为可能。^①

这种诠释可以为《共产党宣言》第二章详述无产阶级统治的末尾几段话提供系统的实质内容。马克思并没有在文本中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他在其一生中使用这个术语不超过两三次，而且还是基本在属于私人通信的情况下使用的。^② 在《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统治是与普选制联系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将无产阶级提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获得[205]民主斗争（die Erkämpfung der Demokratie）的胜利。”^③ 在列举无产阶级政权实施的各个步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些步骤粗暴地干预了所有制关系——之后，马克思总结说：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

导致这个结果的详细计划本身非常有趣，应当全部加以引

① 《哲学的贫困》，页197。

② 《哥达纲领批判》，载《选集》第2卷，页33；1852年3月5日写给魏德迈的信（《选集》第2卷，页452）；间接地还有1871年9月25日的演讲（《著作集》第17卷，页433）。

③ 《选集》第1卷，页53。

④ 《选集》第1卷，页54。

用，因为它是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政府实施的具体步骤方面所提供的一些思想的少数几个事例之一：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 (3) 废除继承权。
-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 (7) 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206]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 (10)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

等等。^①

尽管这个计划表现为一份旨在改变社会结构的随便的制度清单，但它仍是一份关于行动和立法精巧计划。它不仅是务实的和灵活的，而且其途径也是多元的，明确坚持政治安排将因不同的国家而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份计划最令人吃惊的特征在于，它没有包括工业本身的国有化：它提出的是土地的国有化，而不是工业的国有化。不能通过一种政治命令把生产方式从它们的私有者那里夺走，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这可能会导致经济混乱、直接的政治反对与破坏、严重的生产错乱。私有工业将围绕这样的经济与政治安排的气氛而被允许继续存在，即私有工业将必定缓慢地、以一种尽可能和平和有序的方式转变自身。高累进税制、遗产的废除、来自公共部门的竞争，这些部门无疑会得到银行业和交通业的国家垄断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将缓慢地去除私有工业。不是要通过单面的政治手段，而是要通过逐步创造将使私有工业的继续存在在经济上无法自我维持的经济条件。

这份包括十条制度的清单的特征还具有两个方面。首先，这套看似折中的方案具有一种奠定这里提出的所有步骤之基础的特质：所有步骤都涉及为达到普遍目标而动用国家权力。通过运用这种政策，无产阶级国家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为实现普遍目标而不是片面目标而运用政治权力的国家。可见，这个方案实现了[207]黑格尔关于国家普遍性的拟设。辩证地看，真正贯彻自身的普遍性潜能的国家必定在共产主义那里终结，并且结果会带来国家自身的灭亡，因为“公共权力将失去自身的政治特性”。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的国家作为普遍权力的观念的最终实现，意味着国家一旦成为真正普遍性的，就不再作为一种分化出

① 《选集》第1卷，页53-54。

来的社会组织而存在。

其次，马克思在此所提出的步骤没有一个是新奇的或革命性的。所有步骤都在强化和进一步发展已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发生作用并逐渐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趋势。因此，无产阶级统治将只是加速这种发展的步伐，并使现存社会中仍居于边缘或从属地位的特质占据支配地位。当然，地租的消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但即使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数年被引入英国的收入（而不是消费）累进税制，有时候也被认为是对私有财产权的危险侵犯；所以，遗产税、英格兰银行在纸钞流通上新近制造的垄断和对私有银行发行有价证券的禁止，都慢慢出现了。19世纪最具革命性的发展——铁路建设——只有以严重侵犯私有财产权为代价才能加以实行，既通过诉诸征收和强制购买修建铁路所必需的大量地皮，也通过铁路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公司债券的公共担保。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着它自身的转变所需的工具，因为它除非扬弃它自身的前提，否则就不能继续运转。正是这种辩证的发展，促使马克思反思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是内在地被决定的。《共产党宣言》的十条制度无非是已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进程的辩证的实现和消灭。但国家作为国家——即作为以普遍性为取向的组织——的第一个行动也将成为国家本身的最后一个行动。一旦无产者使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服从于国家的普遍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传统对立二分就将消失。

对待国家的这种辩证态度，即国家要同时得到实现和[208] 消灭，可以解释马克思关于各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国家理论的观点。对马克思而言，国家的扬弃实现了隐含在国家的观念中的内容，因为他的国家概念始终是与黑格尔渊源维系在一起的，因而总是有点摇摆不定。另一方面，其思想系谱可追溯到个体主义自然法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仅仅看到国家的强制和邪恶的一面。马克思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都从未忽视这种强制因素，

但他的论证隐含的意思是强制因素来源于各种使历史性国家依赖于市民社会的环境。一旦这种对市民社会的依赖随着市民社会自身的消失而消失，强制也就将自动地消失。只有通过先前使用国家权力以达到真正普遍的目的，市民社会的这种消失才能得到实现；内在于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潜在普遍性，会以这种方式成为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拟设。

这种态度从马克思 1870 年关于巴枯宁在里昂的功绩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一些：

至于里昂，我已收到了几封不宜发表的信。最初，一切都顺利。在国际支部的压力下，里昂在巴黎之先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立即建立了革命政府——公社，它的成员一部分是参加国际的工人，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但是，蠢驴巴枯宁和克吕泽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他们两人都是国际的成员，所以，不幸得很，他们有足够的把我们引入歧途。市政厅被短时间占领——颁布了愚蠢透顶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①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国家的“灭亡”是一种政治行为，直接通过法律和强力加以实行。对马克思而言，国家的扬弃是由政治权力进行和承担的经济与社会转变的漫长过程的最终结果。马克思把国家看作在国家的普遍内容已被实现时就是被扬弃的。巴枯宁希望国家被消灭，因为他在国家中仅仅看到强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扬弃是一种创造新的现实的社会实践的结果。对巴枯宁来说，扬弃是一种宣告性的行动（declaratory act）。马克思

^① 马克思 1870 年 10 月 19 日写给比斯利（Beesly）的信（《通信选集》，页 304）。

认为，这种国家观造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行动和工会活动的漠视。用 [209] 马克思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是与“tout movement d'ensemble”[全体人的运动]相疏离的。^①

这样看的话，巴黎公社对马克思而言就是一种试图用以真正的普遍性为取向的团体取代片面国家的虚假普遍性的尝试。以普选制为基础，公社接近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差别开始消失的阶段。传统的国家机器、虚假普遍性的制度化都被公社粉碎了。在《法兰西内战》的草稿中，马克思说道：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②

结果，公社的选举长官制对马克思来说就是某种完全不同于官僚制的东西。他称赞公仆们被选民选举和罢免并被支付工人一样的工资以及公社的所有这些安排，不是因为它们代表直接的民主或平等主义原则。对他而言，这种公共长官制的出现意味着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差别的逐步消失和对于一个处理普遍公共事务的新的分离领域的重新出现的防范。马克思同样提到向地方性的、亦即社会性的政府转变的公社，而这种政府以前曾是中央等级制政府的分离领域。可见，政府被抽空了那种将政府变成一种

① 《文选》第2卷，页284。

② 《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3辑，页326-328。

独立于社会的强力的权力类型。^①

[210] 因此，奠定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基础的原则是与他 1843 年《批判》探讨官僚主义、普选制和国家的辩证消亡时所暗示的结论相同的。在这两者中，扬弃都与普选制相关联，这种普选制的有效存在意味着国家作为一种明显的有机体的辩证克服和消失。但是，这种说法与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工人可以通过普选制实现他们目标的所谓“改良主义”传统并不相同。这种态度重又无法考虑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对马克思而言，普选制在本质上代表以往人们所知的政治国家的目的，并且要采纳那些没有保留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异化的新条件。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而言，普选制不过是获得特殊目标的一种手段。

这种差别也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关于议会制的最后争议是从一种不同于马克思的视角切近问题的。马克思从未将普选制与毋宁说标志着资产阶级有限的普选制的议会制等同起来；（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流行的）“议会民主”这一术语，从未出现在马克思的作品里。对马克思而言，议会制是 19 世纪中叶有限的议会统治，从社会和职能的角度看几乎都是与普选制中所隐含的普遍性完全相反的：因为从社会的角度看，财产资格使得议会民主成为阶级统治，即投票的权利是直接受各种来自市民社会的特定领域的考虑决定的；从职能的角度看，在权力分离（个体主

① 《选集》第 1 卷，页 520 - 521。关于马克思的正统解释无法把握其国家扬弃思想的辩证含义，出现在库诺（H. Cunow）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Die Marxi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erlin, 1920）的这一非常智慧的研究中，其中作者说道，公社废除了政治结构的强制因素，而保留了政治权力的其他因素，因而“创造了一种基于自我管治的新国家”（第 1 卷，页 334）。列宁也对涉及的辩证因素表示同样的漠视（《国家与革命》，页 103 - 104），他在书中仅仅沿袭了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 1875 年说：“只要无产者仍使用国家，他们就不会为了自由而使用国家，而是为了压制他们的对手而使用国家”（《选集》第 2 卷，页 42）。《共产党宣言》的十条制度明确表明，无产者为了完全不同的目标而使用国家。

义)学说的指导下,议会的单纯立法权使自己从决定性的行政权中疏离出来——马克思在1843年的《批判》中已经探讨过这一点。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普选制——注定使代表大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也将把自己从作为单纯立法机构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在已出版的[211]《法兰西内战》中,普选制的含义被描述如下: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权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①

普选制的跨政治性被马克思以另一种方式在一篇文章的草稿中加以强调:“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务员。”^②

普选制与国家的扬弃之间的这种联系,给予马克思著作中的

① 《选集》第1卷,页520-521。马克思进一步评价说,选举将成为间接的。拉姆在前引文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建立的未来的社会形式”中指出,马克思所赞同的这种间接选举方法同他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引入的间接选举制度之间存在相似性。直接选举的卢梭色彩在马克思关于公社的描述中是无法寻迹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3辑),页328。

那些他将西方社会主义的成就与普选制的采纳结合起来的段落以格外的分量。

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宣言》使无产阶级的胜利和民主斗争的获胜具有了同一种含义。隐含在十条制度中的国家的普遍性拟设将得到普遍的执行,因为现在已经以普遍的方式实现了政治决策,形式与内容是统一的。这十条制度被马克思明确地限制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些国家,现代国家才充分地与必须加以扬弃的其他生活领域区别开来。

这十条制度有一条实践的推论:[212]《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几周——在1848年革命爆发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为德国起草了一份关于共产主义者要求的清单。这份清单被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小册子出版,重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制度,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份清单的标题Ⅱ要求为每个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争取普选权,标题Ⅲ要求为所有当选的代表支付足够的工资。^①“资产阶级革命”——正如后来的专业术语所使用的——中不存在共产主义者的要求,因为所有这些要求都试图将(部分地或充分地得到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转变和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普选制,资产阶级社会超越了自身。这是建立一种以普遍性为取向的国家权力——辩证地看,它必定要探求自身的消失——的基本前提。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革命局势中普选制的废除意味着向一种片面的、虚假的普遍主义的倒退,这种普遍主义在于社会的一部分宣称自己代表整个社会的声音。对马克思而言,这种 *pars pro toto* [以部分代表整体] 的资产阶级分子或——就此事而言——列宁主义者,绝不能够执行内在于国家的普遍性拟设,并消灭国家。相反,这种狭隘的政治革命观只会倾向于使革命者变成一个新的“政治性的”即局域

^①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载《著作集》第5卷,页3。

性的集团或阶级。

马克思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以消极的方式表明，普选制通向共产主义和国家的扬弃。在那里，他分析了普选制在第二共和国发挥职能时产生的影响。他反对激进的共和主义者，这些人——漠视普选制的采纳所需的条件——事实上将普选制看作万能良药。马克思与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态度的差别是显著的。对后者而言，普选制代表政治组织最终的制度形式；对马克思而言，普选制只是取代和消灭政治本身的自我转变的媒介。其次，马克思指出，在第二共和国下普选制的采纳不是为了弘扬共产主义和国家的灭亡，毋宁说普选制的传播 [213] 源于马克思称作激进幻想的东西，这些激进幻想认为普选制可以与资产阶级社会共存。对马克思来说，两者是不可兼容的。如果两者在任何特殊的社会都同时存在，它们就会在政治宪法与现存社会权力之间制造一种永久的紧张关系。普选制通过自身最终通向共产主义。既然这不是法国立法者的意图，任何尝试都只会使这种立法的必然结论遭到失败。拿破仑三世是这种紧张关系的混合产物，他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即地方性的内战与暴乱写进法国宪法。资产阶级社会将竭尽全力——甚至俯伏在路易·波拿巴面前——阻止普选制实现它的目的：

但是，这部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正是它要永远保持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被它认可享受旧有社会权力的那个阶段，即资产阶级，却被它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对立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宪法要求一方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另一方不要从社会的复

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①

马克思在他反对拉萨尔因俾斯麦时期普鲁士的普选制感到兴奋的论证中使用了类似的标准。他关于拉萨尔的这些要求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如下论证，即在普鲁士当前的条件下，普选制只有得到容克贵族的君主政体的授权才能得到实现。普选制是不可能被用于建立共产主义的。只有普选制的社会背景才使它成为革命的媒介；马克思认为，毋庸置疑，为了这个目的而采用普选制的努力在保守的普鲁士将只会促成法院和贵族性的、反动派的机构的暴乱。随后的历史发展证实了他的担心，因为俾斯麦的 Sozialistengesetze [社会主义法] 表明这种政权 [214] 不愿意遵守游戏规则。普鲁士国家在感到受到威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采取普选制的精神所反对的措施。马克思断言，如果普选制是由皇家谕令授权的，相对软弱的德国无产阶级就会成为自身口号和普鲁士君主制的俘虏。像在法国一样，普选制也可能使保守的农民成为政治的最终裁决者。对此还应当补充如下事实，即普鲁士君主会允许普选制权仅仅废止自由资产阶级的议会权力，而后者的力量恰恰来自取决于财产资格的有限普选权。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德国的资产阶级和突然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这种削弱，挫败了资本主义向其自身的内部扬弃的发展。^②

在思考普选制可能错误地用于保守的目的之后，我们应当探讨马克思关于它在西方的合法运用的观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统治的普选制的明确陈述，最早出现在发表于1852年8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题为“宪章派”（The Chartists）的文章中。在指出大陆与不列颠的条件之间的差别之后，他说道：

① 《选集》第1卷，页172。

② 《哥达纲领批判》，载《选集》第1卷，页32-33。

现在我们来谈谈宪章派这个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积极性的部分。他们为之而斗争的宪章里有六条，所包括的内容不外是对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工人阶级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实行秘密投票、规定议员支薪、每年举行大选。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只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口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①

[215] 马克思明确地将在英国采用普选制的革命性后果与当时英国社会的社会—经济背景联系起来。我们已经看到，他认为英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通过采纳工厂法和其他指向后自由放任经济的社会立法而带来的深刻的内部变革：

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撇开较高尚的动机，现在的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也要求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

① 《论不列颠》，页361。

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①

这段话写于1867年，当时《第二改革法案》（*The Second Reform Bill*）将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引入议会投票中。马克思在同年的另一个场合也回溯到同样的主题上来。在1867年1月22日纪念波兰暴动四周年的演讲中，他说道：“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可能会比英国和法国的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少一些恐怖和血腥。我们希望如此。”^②

在1871年发表于一份美国刊物的访谈中，马克思再次说道，英国工人阶级不需要暴力革命以取得政治权力：“例如在英国，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力的道路对工人阶级是开放的。在一个可以通过和平宣传更[216]快和更安全地实现自己目标的地方，暴动乃是愚蠢之举。”^③

在不到一年以后，马克思再次设想不列颠劳动者阶级可能通过普选制获得权力的可能性。这一次他将美国——并试验性地将荷兰——补充到那些可以实现这种转变的国家名单里。1872年9月18日他在阿姆斯特丹总结国际海牙会议的讲话中说道：

工人必将征服最高地位以建立新的劳动组织。……但我们不能断言这个目的的获得需要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

① 《资本论》第1卷，页9-10。

② 这篇演说发表于1867年2月2日波兰的流亡者报纸《自由之声》（*Głos Wolny*）（《著作集》第16卷，页204）。

③ 1871年8月12日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 Claflin's Weekly*）。约一个月以后，马克思说道，英国是唯一足够发达以允许工人阶级将普选制转向它们的真实目的的国家（见《新政治学》第2辑，第3期，页131）。

考虑不同国家的制度、习俗和传统，我们也不能否认存在像英国、美国和——如果我熟悉你们的制度的话——荷兰这些国家，它们的劳动者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①

这一陈述的谨慎也需要我们探讨的谨慎。既然马克思坚决拒绝预言革命将在任何特定的国家发生的方式，他就只是在概述那些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的革命可能性。而且，他明确提到政治文化的不同因素值得考虑，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他绝不限于经济方面的机械分析的多元态度。马克思在同一时期与大不列颠社会民主党联盟的创始人海因德曼（H. M. Hyndman）的交谈时所作的类似陈述中，补充了一种有趣的保留态度。海因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马克思在70年代曾评价说：“英国是一个可能进行和平革命的国家；但——他在一个停顿之后补充说——历史并没有这样告诉我们。你们英国人在很多方面像罗马人，而最像罗马人的地方在于你们 [217] 对自己历史的无知。”^② 虽然在英国占支配地位的趋势是通过普选制形成的工人阶级权力，但未来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是开放的，这又是马克思写给海因德曼的一封信日期标为1880年12月8日的信的主题：“如果不可避免的演变转化为一场革命，这就不仅是统治阶级的错误，而且是工人

① 《第一国际：1872年海牙会议备忘录》（*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inutes of the Hague Congress of 1872*, Madison, 1958），格特（H. Gerth）编，页236。一个曾出席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讲话的第一国际的最后幸存者，在1932年已无法记起马克思在那里讲过话（库诺 [T. Cuno]：“往事”（*Reminiscences*），载《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页212）。这究竟要归于库诺这位亲苏维埃者的年老体迈，还是要归于他不情愿使自己为其提供佐证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面临尴尬，对此很难作出定论。

② 海因德曼：《冒险生活录》（*The Record of an Adventurous Life*, London, 1911），页273。

阶级的错误。”^①

这不一定意味着马克思逐步从“革命的”立场转变到“演变的”立场，^②因为普选制与国家的扬弃之间的联系体现在他的所有作品里。马克思即便在其早期作品中也从未想象过在英国进行一场暴力革命；不应忽视的是，他在阿姆斯特丹的讲话中明确说道，大陆的发展可能不全是和平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极少说道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暴力。在他的思想背景中，革命绝不是一种使用物质力量达到超越物质力量的目的的暴力行为。基于手段与目的之间这种关系的革命观，最终将用手段取代目的。可见，革命的困境对马克思而言不能被归结为后来人们熟知的“演变”观与“革命”观之争。从他的观点看，社会的转变总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意味着被决定的东西向决定性的东西转变，反之亦然。相应地，这种转变意味着人类思维、亦即人类实践的一场革命。因此，革命将得到实行的确切环境不可能是被预先决定的，因为否则这种断言就意味着人可以意愿未来。马克思在设想形形色色的可能性时，坚持一种切勿空谈的态度：渐进主义在 [218]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可能的，而相对激进的手段也许将不得不在大陆加以运用。《共产党宣言》的语言通篇犀利好斗，但唯独对革命将要发生的方式保持缄默。马克思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同时谈论民主斗争的胜利和“专制对财产权的侵犯”。甚至普选所支持的革命也将不

^① 海因德曼：《冒险生活录》，页 283。恩格斯在后期倾向于采取一种完全演变的态度。他在 1891 年对《埃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me*）的评论中设想在“像法国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国和像英国的君主制国家”、而不是在德国存在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著作集》第 22 卷，页 235—236）。在他 1895 年给《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论中，他对社会民主党在投票中获胜如此迷醉，以致将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他甚至还解释了现代技术和通信条件下壁垒战在军事上的无望（《选集》第 1 卷，页 132—136）。

^② 对此，最近利希特海姆在其《马克思主义》第 223—230 页有非常有力的论述。

得不征用某些形式的私有财产，尽管像十条制度里所暗示的那样是有选择性的征用。当然，征用就必需采用暴力或暴力的威胁，马克思意识到一种行为即使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对一个个体而言也可能是“专制的”。暴力革命相对和平革命谁占优势的问题就转变为如下这个问题，即诉诸于暴力是发生在大多数人决定它的合法性之前还是之后。对马克思而言，这个问题是无紧要的，因为它强调的是得到接受的资产阶级的合法化方式，并且将合法与社会实践分离开来。他设想革命通过普选制发生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不是因为他坚持一种民主的合法化形式，而是因为在普选制中看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冲突的解决途径。那些正当地指出马克思涉及普选制的文本的人，应当注意不要把这些文本与它们被赋予的民主价值混淆起来。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马克思对有形权力的态度也是受他把法国革命看作一场单纯政治革命的批判态度决定的。对他来说，权力的行使作为一种明显的政治手段已经承认环境（意识乃是其要素之一）对于变革来说尚未成熟。然而，在权力不通过一种明显的政治结构获得运用的地方，它通常都是多余的，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本身已经跟上了现在通过内部变革的辩证法正在得到实现的趋势。可见，社会行动的目的不是通过诉诸有形权力的威胁来实现的。可以这样总结马克思的立场，即有形权力对他而言要么失败，要么证明是多余的。有形权力仅凭自身会一无所获。

马克思将革命的机会与革命的地理状况联系起来。[219] 在此，其观点的强化造成重点的转移。我们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在其学术生涯之初把德国看作比任何民族都更适合一场激进的革命，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落后使生活现实与对于生活现实的理论反思之间的裂隙变得更加显著。他在1843年写道，“德国人反对政治现状的斗争就是反对现代民族的过去的斗争”，“德国人在

政治方面思考过其他民族做过的事情”。^①因此，他认为，德国人为一场激进的革命做好了准备，因为德国的落后与它怀有的理想形成了极其显著的对比，并且它发现自己无法跟上这一理想。进而言之，既然德国没有可以将自己与普遍意志等同起来的强大中产阶级，1789年革命在德国就是不可能的，并且会直接导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1847年观察到，德国的经济落后使德国资产阶级在完成反封建的战争之前就开始维护自己而反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它成功地作为一个阶级确立自身之前就在与无产阶级搏斗”。^②

德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弱势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得到探讨。虽然《共产党宣言》谈到了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但它并不指望革命在德国开始；相反：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③

后来的发展改变了德国的地位，1848年向马克思证明，德国资产阶级的弱点使之相较任何人而言都更容易与封建 [220] 阶级与绝对君主制达成协议。然而，他在1880年设想了一场可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的俄国革命，^④因为那时俄国正在经历德国二十年前已经经历的那种类型的迟到的工业加速

① 《早期作品集》，页47，页51。赫斯也觉得，德国人仅仅沉思西方民族实际做过的事情（赫斯1845年1月17日写给马克思的信，入赫斯：《书信集》，页105）。

② 1847年11月18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著作集》第4卷，页351）。

③ 《选集》第1卷，页65。

④ 《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前言（1882年），入《选集》第1卷，页24。

发展。

在普选制的采用意味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裂隙弥合的地方，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普选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在具有强大的极权主义传统、大量温顺的农民和迟到的工业发展的国家，普选制只具有有限的——如果不是全然错误的——意义。马克思意识到，在试图评估革命和变革的时机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经济发展是有用的。毋宁说，正是社会—政治结构较之经济背景的相对发展，才创造了变革的张力和机会。悖谬地看，这种历史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可能是最令人失望的因素。虽然它有助于将其思想从关于自动而普遍的进程的一种幼稚的、直线形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但它制造了另一种显著的复杂化。因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基于普遍性的标准，但它的实现却最终取决于生来因地制宜的历史环境。这种紧张关系赋予马克思的分析以犀利的、现实主义的锋芒，但另一方面可能会挫败实现他的普遍主义拟设的尝试。毕竟，历史的东西与哲学的东西不能如此恒久地统一。

8.2 社会主义阶段

已经频繁地有人指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草图是零星散杂的。除《法兰西内战》主要探讨向社会主义转型的政治方面以外，只有两个文本详细地探讨过社会主义社会。它们包括马克思的一部早期作品和一部晚期作品：这就是1844年《手稿》中的被称作“私有制与共产主义”的部分和《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两个文本都是没有完成的草图，不是意在出版的，因[221]而是片段性的。尽管如此，并且尽管两者之间有三十年的间隔期，但它们对于未来社会的描述和对细节问题的明显缄

默仍是相同的。

系统地看，重要的是即使在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也只字未谈转变将要发生的方式。这种局限是他自己的认识论前提加给他本人的。虽然这在有时候可能会惹恼任何在马克思那里寻求精确的末世论预言的人，但它是不能与其基本哲学分离开的。既然未来迄今为止仍不是一种现存的现实，任何关于未来的探讨就在讨论仅仅存在于思维主体的意识之中的对象时回复到唯心论哲学。因此，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探讨是最严苛和谨慎的。他从不试图与他称作空想家的解析共产主义社会详细蓝图的社会主义者竞争，因为对他来说，共产主义社会将根据它由以建立起来的具体条件决定，而这些条件不能预先加以断言。只能试图描绘未来社会的一些主导特征，即便如此也要持非常谨慎和试验性的态度。^①

既然马克思在《手稿》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尝试描述现存历史力量的展开，他就必须描述共产主义的作为一系列阶段的发展过程。他在两个文本中都区分了至少两个主要阶段。如果说这些阶段代表共产主义逐步完善的各个不同程度，它们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任意设置，只不过是在将一幅已经复杂的图像复杂化。但这些阶段对于现存社会的原则的辩证展开是必要的，每一阶段都代表了对这些原则的扬弃。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变成对于消逝的资产阶级世界的一种死后的分析：因此，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的历史性的描述强烈地得到强调，以反对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先天“体系”。在 [22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说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必须加以建立的事态，不

^①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我们在此必须探讨的东西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形成的，而是相反，只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选集》第2卷，页23）。相同的陈述出现在《法兰西内战》中：“[工人阶级]没有要实现的理想，而是释放将要垮台的旧资产阶级社会自身所孕育的新社会的因素”（《选集》第1卷，页523）。

是一种现实将不得不与之相适合的理想。我们把共产主义称作消灭事物当前状态的现实运动”，表达了这种思想。^① 或者，像他在《手稿》中提出的，“共产主义是直接未来的必要形式和动态原则，但它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类社会的形式”。^②

马克思在两部著作中采用的方法论路径是相同的：两者的描述都给予当前的现实以其最终的结论，并试图从现存社会的内部紧张关系中规划未来社会的形象，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会把那些可以在现存社会普遍化的因素完善化和普遍化。马克思在《手稿》中进一步补充了另一个维度，即使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共产主义观念的发展阶段相平行。共产主义的较少精巧的阶段，似乎也符合一种较少精巧和比较原始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使得马克思能够承认最初的和比较原始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论证了它们的彻底不足。他甚至指出这些社会主义理论对他自己的综合的充分出现具有辩证的必要性，但这也意味着它们本身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对马克思而言，这些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缺陷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阶段的主要缺陷在于，它们仅仅客观地看待私有制的废除。普鲁东提倡废除作为资本“本身”的私有财产，而其他批评家则建议仅仅废除某些形式的财产。沿袭重农主义的傅里叶仅仅把农业劳动看作是有用的和没有异化的，而圣西门把这些有用的和没有异化的特征唯独赋予工业劳动。每个人都只想保留与他所赞同的劳动和生产类型相关的财产种类。^③ 马克思认为，在这个阶段，财产的主观方面（即财产作为客观化的人类劳动的地位）还没有得到领会，因而不能加以超越和废除。

[223] 结果，社会主义在其最初阶段将表现如下：私有制将被废除，但只是通过把私有财产变成普遍财产，即所有人的财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47。

② 《早期作品集》，页 167。

③ 《早期作品集》，页 152。

产做到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将新社会的这个阶段称为“粗陋的共产主义”：它既是市民社会原则的最终实现，也是市民社会原则的最初废除。因此，这个阶段将保留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比较不幸的特征。在这个阶段，人从财产中的解放在于财产的国有化，亦即在于财产的普遍化，在于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的主人，在于工资的严格平等。这是一种粗陋的、粗俗的、俗气的和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专注于物质性的产品 and 价值，而没有意识到产品只是人类劳动的投射；这种共产主义忽视了所有不能成为共同所有权之对象的价值。这种社会尽管存在自身的超越资本主义的进步，但把文化野蛮化，并且它强调平等主义精神的做法基本上是狭隘的妒忌。找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表述，也许可以带来惊喜：

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开始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的，因而在它的最初形式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这样的共产主义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首先，物质性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如此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式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直接的物理占有是生存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与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反对私有财产的这个运动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成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公妻制这种思想暴露了这个完全粗陋的 and 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秘密，正像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与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关系转向它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卖

淫关系。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普遍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更加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个忌妒和这种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①

可见，这是一种分配共产主义，一种基于“最小化”的共产主义，仍然想象产品世界是有限的和被客观地决定的。它仍把它与财产的关系看作一种它与对象的关系。这种共产主义试图调整的是消费，而没有解决生产的谜团，没有理解生产无非是人类创造性潜能的无限展开。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共产主义必然被驱使着达到禁欲主义，达到使它的低等生活标准变成一种美德的程度。它将人类的需要归结为单纯生存的最小化。在这种社会，共产主义仅仅意味着工作和工资的共同性（community），而不是共同生活的互助性（mutuality）。人与作为一种占有对象的资本的关系依然是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系完全相同的，尽管占有现在是集体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社会作为一种普遍的资本家出现，不是废除而是普遍化工资制度。于是，为了工资而工作是这种粗陋共产主义的普遍原则，这种原则保留了异化的最显著因素：

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

^① 《早期作品集》，页152-153。参见《共产党宣言》，载《选集》第1卷，页61：“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绝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真正占有。

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和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 [225] 资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虚假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①

当然，这种描述在多大程度上为当前苏维埃社会的一些因素提供了一种见解，取决于个人对共产主义俄国的性质的看法；因此，详细的阐述将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之内。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未来社会第一阶段的描述与《手稿》所作的论述十分相似，尽管他的语言更加谨慎，并且其思想具有经济取向，而不是思辨取向。共产主义的这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又是将社会变成唯一主人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化。雇佣劳动继续存在；它成了唯一而普遍的劳动模式，尽管剩余价值被转移到经济增长的投资和社会服务、而不是私人消费上去。虽然工资不是平等主义的（在这个方面，这种描述不同于《手稿》），而是取决于生产，但奠定工资差别之基础的原则（“按劳分配”）仍然是平等主义的，保留了财产权的与作为消费对象的商品相关的资产阶级因素。因此，社会分配制度不可能考虑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和他的具体需求与需要。以下反复被人引用的段落，在这里也要 *in extensor* [详细地] 援引，以表明它如何接近于《手稿》的基本思想，表明理解它的含义多少取决于阅读早期的草图：

① 《早期作品集》，页 153 - 154。“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描述非常强烈地让人想到海涅（Heinrich Heine）在他的《卢台齐亚》（*Lutetia*）中对共产主义的责难。但海涅把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看作共产主义所能达到的最后阶段，而对马克思而言，它仅仅是向一个更好世界的发展所需要的辩证地看必然的步骤。参见维克托（W. Victor）：《马克思与海涅》（*Marx und Heine*, Berlin, 1953），页 78 - 91。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226〕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与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

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①

在这里，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又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的普遍化。

向第二阶段的转型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限制，而是从新社会的阵痛中摆脱出来。马克思对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许多批判可以被归结为如下论点，即它们通常把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看作是 [227] 最后和最终的阶段，把一种粗俗和野蛮的社会美化为人类的发展。对马克思来说，这个阶段——仅仅是暂时的——总括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缺点，只是为了将它们极端化并加以克服：“共产主义是直接未来的必要形式和动态原则，但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类社会的形式。”^②

1844年《手稿》主张，在未来社会第二阶段中财产的积极扬弃意味着人通过他所创造的客观力量达到的统治地位的终结。同样地，分裂和异化市民社会的人的生活的各种对立二分消失了。人与其同类的关系不再是竞争性的。人不再以其同类为代价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竞争是一个将自己的对象与产品的数量看作有限的和给定的世界的自然推论。在新的社会，人变得意识到产品是人工制品。产品本身的数量不是有限的，而是取决于人的创造能力的恰当组织。^③

在这种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由客观必然性决定的：人——现在意识到他对自己的自然的掌控——创造着自然。

① 《选集》第2卷，页23-24。

② 《选集》第1卷，页363。

③ 对此，见马克思在他关于密尔（James Mill）的笔记里的有趣评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辑，第3卷，页543-547。

最后，人的创造性的进程不再伴随着异化：对象的创造变成人的具体活动，不再局限于为了单纯的存活而进行创造的客观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把人的经济生存的解决之道看作是对哲学思辨的传统困境的解答：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性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28]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①

这种激进的转变，即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的本质内容，将能够使人发现财产不是以占有的方式、作为单纯外部的对象与人相关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将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占用关系，这种占用关系并不意味着一种对待世界的可归结为占有和消费的享乐主义态度。这种新的关系将增加人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类比性。由于从艺术作品中产生的愉悦为鉴赏者重新创造了愉悦，而没有减少另一个鉴赏者对愉悦的分享，所以人与其产物的多方面关系现在将产生人与人的一种多方面关系：

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

① 《早期作品集》，页155。

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所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与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处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之中的……是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与对象的关系乃是人的现实的确证。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①

意识的真正本性由此变成显然的。意识不仅决定着能认识的主体，而且决定着被认识的对象；可见，对象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对象，而是对人而言变 [229] 成主观能力的一种客观化。迄今为止将人与宇宙分隔起来的帷幕，可以通过宇宙的人化而被掀开。“自然的基质”没有消失，而是在它真正的光线下得到揭示，即它是从把它变成人类对象的相互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从异化世界的曲解与倒置中解放出来的新意识。因此，宇宙被设想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投射，并且辩证地看，唯心论哲学的说法可以最终通过一种其前提就是唯心论自身的扬弃的哲学加以实现。

① 《早期作品集》，页 159。

这种实现并不意味着人从世界向内在自我的一种隐退、舍弃和撤退。相反，这种实现以行动为取向，意识到人对他的世界的塑造：

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者，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因此，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到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①

因此，这种新的人类联合将能够有意识地控制人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允许人的意识被他的环境所决定，就好像这些环境是客观的、外部的强力一样。马克思关于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观点独特地体现在，这种社会主义在现实被理解为人类活动和创造

^① 《早期作品集》，页160-161。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页48-49。这些段落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是支配事物的制度、而不是支配人民的制度的评价没有把握到马克思的劳动分析的哲学意义，因为“事物”就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这种机械的态度也明显地体现在，恩格斯坚信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业的权威地位也将保留下来，因为这种权威地位是工业体制本身所固有的。当然，就马克思而言，问题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

能力的一种产物时，有意识地倒转现存的事实。〔230〕人被他的经济环境所决定是指人被他自己的历史产物所决定。人可以将自己从这个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既然这不可能由个体们独自地加以实现（因为他们只有通过使他人屈服于这个桎梏，才能以个体的方式将自己解放出来），人的这种解放就必须是社会性的。通过这种社会性的解放，人将会意识到自己就是历史以及历史产物的原动力：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①

可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场运动的共产主义和作为新社会的一种未来组织原则的共产主义是同一个原则的两种不同方式：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微观宇宙。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未来社会的第二阶段也被描述为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消失。^② 在《手稿》里，这个因素仅仅消极地表现在马克思对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就是将不同种类的劳动理性地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86—87；参见《早期著作集》，页 166：“然而，由于对社会主义的人而言，被称作世界历史的整体无非是人的通过人类劳动的创造和人化自然的形成，所以人拥有他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起源的显著而不可反驳的证据。”

^② 后来关于所谓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与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的区分，在马克思自己的作品中是没有根据的。

分配给已然彼此不同的人的理论所作的批判。马克思坚决主张，只有劳动分工才产生了在能力、才干和潜能方面各不相同的人的类型，只有这种体制的永久存在才造成了人在劳动分工出现以前就根本不同的观念。^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劳动分工的废除 [231] 第一次表现为未来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废除劳动分工，在马克思看来意味着废除人的从属于其劳动条件之下的地位。因此，它意味着人从异化劳动的条件强加给人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中的解放：

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②

① 《早期作品集》，页 181 - 182。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 44 - 45。

这些田园牧歌式的职业如何能够在复杂的工业社会成为废除劳动分工的模式，当然是人们期待回答的一个问题，但答案在马克思的这部或任何其他的作品中并非是随即就来的。马克思对这些田园劳作的选择，可以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论证与现代社会的相关性的内在困难。然而，如果接受马克思的人作为一种涉他性的存在者、一种 Gattungswesen [类存在] 的模式，就可以想象个体的职业如何能够在他人那里产生满足，因为每个人现在都被设想为他人的社会存在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被设想为一种外在的，甚至潜在地危险的竞争者。马克思在 [232] 《手稿》中运用的恋人的范式，可以说明人的涉他性的各种可能性，家庭团结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可见，即使劳动分工终究将是必要的，一个人也可以在他人的职业中找到乐趣和满足，假如社会结构以这样的可能性为取向的话。^①

有时候有人认为，马克思在其后期作品中不再把劳动看作是人类生活的积极内容，而是主张劳动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最小化。足够令人惊奇的是，有些相反的证据来自马克思后期那些探讨儿童劳动的作品的段落。这些段落表明，马克思仍然认为造就人的劳动是人格的主要要素。当然，他在强烈反对 19 世纪中叶不列颠的恶劣条件下实行的儿童劳动制度时，仍然认为通过劳作进行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呼吁废除“当前形式的”儿童劳动制度，但与此同时也呼吁教育与工业生产的结合。^②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这种观点变得更加明确：

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与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

① 《哲学的贫困》，页 161。

② 《选集》第 1 卷，页 54。

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①

因此，这种论证不是单纯功利主义的或历史主义的。生产与教育的结合对新型的人是根本性的。将儿童幽闭在无须生产的象牙塔学校里，可能就是儿童踏入现实生活所经历的迈向异化的第一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富有特色地指出，儿童劳动制度的这种教育方面已然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社会将必须完善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粗陋手段，把它们从自身的异化方面解放出来：

[233] 正如我们在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关于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②

通过劳作进行教育的重要性再次在马克思谈到全面的人、而

① 《选集》第2卷，页36。

② 《资本论》第1卷，页483，页488。这个部分包含教育社会学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洞见。

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的人的需要时的同一段落得到强调：未来社会将必须“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人”。^①可见，《资本论》与《手稿》的语言是一样的。

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被揭示出来：不仅劳动的形式将得到变革，而且劳动的地位在人类的实存中也将得到变革。这句 locus classicus [常被引用的名句] 只要在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的早期思想的语境中加以考虑，就能得到确切的理解。这些思想给予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的警句式描述以实质内容，在其中每个短语似乎都是早期作品的全部章节的压缩：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更高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 [234] 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

最后一句话（实际上来自圣西门）当然在很久以前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然而，它在马克思的理论前提范围内却有一种明确的含义：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一个由此将成为社会酬劳的最高调节者的核心权威先天地决定的数量。这种安排只会使政治制度以一种不同的名称永久存在。马克思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劳动将不断展现每个个体的潜能，每个人的贡献将符合他的能

① 《资本论》第1卷，页488。

② 《选集》第2卷，页24。

力，同样地，他的酬劳（它现在也包括劳动本身，即“生活的第一需要”）也将足以满足他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像在任何其他的社会一样，人的需要是由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历史地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第一个需要的满足将正好足以适合需要的生产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普遍的精神气质（ethos），创造着普遍的需要；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使它满足于那些仅仅涉及社会一些成员而不是所有成员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创造将同时也创造确保满足需要的手段。可见，李嘉图所拟设的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将最终在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实现，因为生产体制将不再与消费体制相分离。

这种探讨必然导致关于未来社会工作日长度的考虑，因为这不能自动地由劳动不再是单纯雇佣劳动的状况所决定。^① 马克思又提出了一种可能显得令人吃惊的观点：他说，不能保证未来社会的工作日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比现在的短。即便剩余价值被转移到投资和社会服务上，工作日的任何缩短 [235] 都意味着社会生活标准的明显降低，除非工作日的减少得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更好组织和更大扩张的补偿。既然未来社会的人的需要将得到增长——尽管存在更高级的生产力——工作日就得停留在某种像当前水平的程度，以确保能力符合不断增长的需要：

只有通过抑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作日的长度才能被归结为必要劳动时间。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必要劳动时间仍会延长自己的限度。一方面，因为“生活资料”的观念会极大地扩展，劳动者会要求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标准；另一方面，因为一部分现在作为剩余劳动的东西会被算作必要劳动。^②

① 这是马克思不仅在《手稿》中，而且在《纲要》（第506页）中所持的观点。

② 《资本论》第1卷，页530。

得到改进的技术当然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创造更多的物质产品，但马克思并未在任何地方说过，未来需求的增长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加以补偿。他的确暗示说，在未来社会“机器的运用将比在资产阶级社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范围”，^①但他并没有清楚说明这种转变的性质。

劳动纪律是马克思略微谈到的未来社会的另一个方面。恩格斯的一些后期作品把重点转向了别的地方。在反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期间，恩格斯说过，威权主义纪律是大规模工业的固有成分；它存在于生产关系的自治中，在生产的社会调控得到变革后也不会消失。恩格斯把它称作一种独立于社会组织形式的专制制度。^②当然，这种分析不同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社会组织形式的基本前提。而恩格斯关于技术权威与社会关系的观点，明显体现他的思想的技术偏好。这造成另一个问题：恩格斯把面对物质生产的自然对象的人看作好像是[236]完全外在于它们的，好像在现代工业的生产关系中有某种东西不能被归结为可指导的人类行为。既然马克思不把技术看作是一种客观外在的力量，他肯定会与此不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也在《资本论》第3卷中明确地说道，未来社会将不会需要威权主义的工业纪律。他认为，在当前社会，纪律是通过工人的操练和基本上通过资本家强迫劳动力遵守的纪律得到保障的。这种纪律“将在一种劳动者为他们自己的协议工作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成为多余的，就像它在计件工作中已经实际成为多余一样”。^③这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支付方式类似的做法可能再次令人吃惊，但马克思所想的是计件工作的内部结构，而不是其形式。他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现象中规划未来的可能性。这里的含义与恩格斯《论权威》中的明显不同。

① 《资本论》第1卷，页393。

② 恩格斯：《论权威》，载《选集》第1卷，页636-639。

③ 《资本论》第3卷，页83。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探讨导致如下推测，即他究竟是否改变了自己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发活动领域的观点：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①

[237] 仔细分析，这段话与马克思早期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并不矛盾。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只是强调了这一点而已。劳动需要掌握人类生存的“自然基质”是很难否认的，甚至马克思本人也无法否认。即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田园牧歌中，

^① 《资本论》第3卷，页799-800。参见拉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建立的未来的社会形式”，页104。

人的大多数自由活动（狩猎、钓鱼、养牛）也是以这些需要的满足为取向的。人绝不可能将自己从这种基本的生存需要中解放出来，但人可以将自己从使这些需要的满足变成一种丧失人性的苦役的进程中解放出来。

这可以给未来社会人类生活条件的转变提供进一步的洞见。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将不会把人作为人从外部限制中解放出来，而是将弥合现存的人与作为历史存在者的人的活动所固有的潜能之间的裂隙。实践意味着人与他的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因此，“在革命活动中，人自身的改变是与环境的改变一致的”。^①当然，这种观点倾向于限制各种规划未来的可能性，尽管一个人可以指出一些可能决定未来的一般轮廓的原则。马克思关于完善社会的说法绝不是静态的，在这里他的思想既不同于柏拉图传统，也不同于黑格尔传统。他从不否认未来的发展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因此他也从不相信对特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存在一幅静态的、绝对化的蓝图。他只是坚持主张，一旦废除显著的政治因素，进一步的发展以阶级的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能被抵消，以至社会生活的内容与其形式之间不会出现新的紧张关系：“只有在一种不存在更多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事物秩序中，社会演变才不再是政治革命。”^②

一个相关的问题成为劳工运动中一场漫长而拖沓的斗争的一部分。在1870年与巴枯宁主义者争论期间，马克思的追随者被反对者贴上了“威权主义者”的标签。这个术语源于马克思关于国际总委员会对隶属于它的各个不同联盟的权威地位的主张；后来它逐步地表示马克思 [238] 对未来社会的一般态度（恩格斯的《论权威》助长了这种理解）。然而，就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涉及未来社会性质的争论而言，马克思一贯地指出，巴枯宁的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页230。

② 《哲学的贫困》，页197。

策略和意识形态都将通向一种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我们今天称作极权主义（totalitarian）——方向。他厌恶巴枯宁和尼察也夫（Nechaev）形成的组织与恐吓方法，体现了他对于这样的方法可能影响到未来社会的担心。马克思的理论轻易地表明，这种革命将实质地决定未来社会的性质。一场基于恐怖、恐吓和敲诈的革命运动，最终将产生一个也基于这些方法的社会。

在1874~1875年，马克思针对巴枯宁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撰写了一篇流畅的书评。巴枯宁在这本书中加给马克思以起源于其思想的德国哲学背景的国家主义倾向。巴枯宁的书清楚地表明，他自己对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传统极不熟悉。当他说马克思的威权主义背景必须被追溯到他是一个德国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和一个犹太人时，这种论证的层次确实已偏离太远了。马克思对此书的评论不仅阐明其在哲学上的无知，而且阐明其思想中强烈的威权主义色彩。^①在同一时期反巴枯宁的一本小册子中，马克思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与巴枯宁关于未来社会强劲的社会控制的描述对立起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巴枯宁主义的中央集权将成为仍保留政治国家所有特征的政治组织手中的工具。可见，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政令消灭国家的做法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姿态。马克思广泛地引用巴枯宁关于未来社会秩序的基础的原则，并且补充说：

多么典型的军营式的共产主义！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如此：共用的锅碗和宿舍、监督委员和 *comptoirs* [账簿]、教育制度、生产制度、消费制度，一言以蔽之，关于一切社会活动的制度；更有甚者，我们的委员会——匿名的和不为人知的——是最高的领导机构。无疑，这是最纯粹的反威权

① 《著作集》第18卷，页601-602。

主义!^①

[239] 马克思在别的地方也作了反对孔德 (August Comte) 体系的同样批判。在一篇发表在美国报纸的访谈中, 马克思说孔德的理论用一种新的等级结构 (hierarchy) 取代了旧的等级结构。^② 马克思对巴枯宁和孔德的批判所共用的标准很简单: 对他来说, 两者都使一种与社会生活的普遍性不相等同的政治结构永久存在。马克思对巴枯宁主义行为方式的批判更多地瞄向它们的恐怖方面。他认为, 由于无政府主义对政治行动和工会活动的放弃, 巴枯宁主义的 *élitist* [精英] 进路将一小群工人与他们的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分离开来。无产阶级的精英被与无产阶级阻隔开来, 马克思将这种隔离看作是向早期各种社会主义宗派的特殊主义的倒退, 它无法思考无产阶级活动的普遍主义方面。^③

因此, 马克思对巴枯宁革命活动的批判直接来源于他关于政治权力与政治结构之间辩证紧张关系的观点。巴枯宁关于未来社会的观点由于忽视了隐藏在国家概念中的普遍性拟设, 所以从未从它的特殊主义和孤立的、明显政治性的组织中解放出来。无政府主义可以下令消灭国家, 但这仅仅是一种机械性的毁灭行为, 而不是一种辩证的灭亡—实现。因此, 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结果可能意味着, 国家将被毁灭, 而政治权力与制度仍存活在一架周密地监控社会每个方面的孤立的政治机器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巴枯宁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将始终是 *un communisme de caserne* [一个共产主义兵营]。

① 《文选》第2卷, 页445。

② 1871年8月12日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载《著作集》第17卷, 页643)。

③ 《文选》第2卷, 页445—446, 页284。

8.3 巴黎公社：必然的失败

马克思对待巴黎的公社建立以前、短命的存在期间和血腥的失败以后的态度如此复杂，以至有时候导致评论者得出如下结论，即他被环境裹挟着赞同他最初反对的立场，并且不止一次地改变过他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虽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勇敢地维护 [240] 公社的事迹，但他在 1870 年 9 月试图插足阻止一场暴动，他在 1881 年写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说道，公社成员“绝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可以区分马克思关于暴动本身的态度与他关于公社试图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的态度，这些矛盾就可能消失。虽然他在诸多层面都强烈地反对暴动的企图，但他仍认为公社——尽管注定要失败——引入了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些因素。因此，尽管公社在他看来没有机会存活下来，但它的历史意义可能超越了发起者们的主观愚笨，即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英勇却无用的努力是彻底无望的。因此，公社的有些政治安排可以被视为对未来社会的一些预期，尽管公社在历史上的失败限制了这种经验的意义。虽然马克思从未真正地把公社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这话是恩格斯在他 1891 年为《法兰西内战》的新版所写的导论中说出来的），^①但他仍把公社设想为政治组织的一种划时代的突破。因此，指示与分析在马克思关于公

① 《选集》第 1 卷，页 485：“最近以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再度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陈述是恩格斯在 90 年代为抨击国内社会民主党所写的，但它却变得与它所认为的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分不开了。

社的讨论中是互为补充的。

《法兰西内战》的文本批判将表明，马克思在作为未来的一种模式的公社中看到的不是它所制定的现实的、具体的任务，而是这些任务的各种潜在性在未来的一种投射。只有这种投射才赋予公社以其历史意义。于是，马克思并不讨论实际存在的公社，而是讨论可能存在的公社，不是 *in actu* [现实的] 公社，而是 *in potentia* [潜在的] 公社。他将公社的可能法令和潜在任务提高为未来社会的一种范式。不是 1871 年的巴黎公社为 [241] 未来社会提供了模式，而是马克思在其中看到的内在理性使它存活了下来（尽管他确信它不会存活下来）。只有这种投射才允许马克思在 1881 年的信中批判历史性的公社没有将法兰西银行国有化，并赞扬潜在性的公社意图消灭私有制。《法兰西内战》中大多数相关段落的表达都是有条件的：尽管这段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叙述公社的成就，但它实际上思考的是公社本来要做的事情的意义，如果它想要存活下来的话。以下由马克思最初用英语写的话，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特殊字体为我所加）：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负责的勤务

员来行使。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①

这种极其谨慎和精巧的语言使马克思表明，公社如何能够克服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同时又对公社自身的历史现象保留一种批判态度。可见，马克思论及公社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唯一一次是在一个强烈关涉未来的语境中出现的。^②他不是将共产主义称为 [242] 公社，而是将其称为各种隐藏在公社中并且有时候连公社拥护者自己也无法察觉的原则的展开。历史性的公社与公社的原则之间的这些细微差别，也可能导致马克思在一种困难的状况中以一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意味的语言阐述他自己的立场。

如果说马克思从两个不同的层面评价公社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他关于公社的私下和公开的各种不同陈述就没有矛盾。历史地看，具有不同的阐发重点和视角的整个问题，一经《法兰西内战》的出版就把国际——和马克思——推到探讨公社结果的文字斗争的最前沿。无疑，这种公开化助长了右翼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所形成的这样的印象永久存在，即公社是由国际和“红色博士”（Red Doctor）为首发起的。这种谣言的源头似乎可以追溯到极端右翼的凡尔赛报纸《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1871年3月19日发表的关于一则消息的文章，这则消息涉及一封声称是马克思写给他的巴黎支持者的信，详细地指示他们开始一场暴动。这一伪造可能是凡尔赛的德国顾问施蒂贝尔（Stieber）的

① 《选集》第1卷，页520。

② 《选集》第1卷，页523。Commune de Paris [巴黎公社] 的名称显然与共产主义（communism）或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没有任何关系，而碰巧是法国市政府的历史称呼。但Commune与Communism之间容易给人暗示的关联，在把公社的神话创造为共产主义暴动的过程中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一时头脑发热，他在两年前就是 1848 年以后普鲁士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告发者之一。这可能是对马克思的一种延期的、但有效的报复，马克思在 50 年代早期臭名昭著的科伦审判中挫败了施蒂贝尔的努力。大陆以及不列颠的大多数报刊都转载了这则消息，梯也尔的外交大臣法夫尔（Jules Favre）向所有权力机关刊发了一则公告，要求国际为公社的暴动负责。由于国际在这一时期非常积极地从财力上帮助公社流亡者并揭发法国政府对公社拥护者的可怕报复，所以两者的联系十分可信。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的名字不是通过他的著作和作品，而是在与他所反对的一场暴动的联系中才几乎一夜之间世界闻名的，这场暴动的垮掉是他已经预见和预言到的，它的发起者 [243] 不是他的弟子，根据他的观点，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在谣言指涉到他要为公社承担责任之后，给大陆和不列颠的众多报纸写了许多信，试图解释他的立场，但已很难卸下已然在公众意识中形成的形象。^①

把公社当作一种历史现象的评价与把公社当作内在于它之中的未来发展的潜在种子的评价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强调了国家的消亡（如果公社要想存活下去，就要向这个方向发展）与公社本身仍然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体现的事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马克思在上文援引的段落中以有条件的、未来主义的语言描述的未来公社，才是国家的积极扬弃，它创造了一种未经异化的社会团

① 关于马克思就此事写给报刊的众多信件，见《著作集》第 17 卷，页 295 - 302，页 366 - 405，页 474 - 482。但他似乎很欣赏授予他这免费的名望，他在 1871 年 6 月 18 日写给库格尔曼的信中写道：“我很荣幸在这一时刻成为伦敦最受中伤和胁迫的人。这对于深居简出二十年之久的我来说其实是件有益的事”（《写给库格尔曼的信》，页 126）。也有倾向于坚持马克思是公社发起者这种神话的人，可参见波斯特盖特（R. Postgate）：《1789 ~ 1906 年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906*, London, 1920），页 281；弗德斯（Jeanine Verdès）：“通过法国警察局而被关注的马克思（1871 ~ 1883）”（*Marx vu par la police française 1871 - 1883*），载《应用经济学研究所手册》，S 类第 10 期（1966 年 8 月），页 83 - 120。

结。现实地存在并被击败的具体的、历史性的公社，仅仅是一个开场白，仍然是一个政治机构。在这种意义上，片面的、“政治性的”公社试图完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扬的东西：普选制所支持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以达到普遍的目的，使国家成为一个真正普遍的机构，因而不是通过将国家活动最小化而是通过将可以自我异化的国家活动最大化来消灭国家。

马克思反对无产阶级的单纯政治暴动的背景，已经在本书第7章得到探讨。他在60年代后期积极争取将雅各宾派取向的法国周边组织对国际的影响最小化。他的尝试远远不算成功，因为这些传统深入到了法国左翼的历史神话里，并通过使法国左翼成为它自己的怀念革命和历史的囚徒，从而创造了关于未来的一种非历史性的形象。正是在这种 [244] 背景中，巴黎公社变成雅各宾派和巴枯宁派的一种战斗口号，马克思在1868年的一封信中提到这一点：“所谓 [国际] 法国人支部的十二名无赖星期二在皮阿主持下又在伦敦举行了公开的大会，会上听了皮阿的做戏一般的革命演说。…… [在各项观点中] 表决赞同了宣言，而宣言是皮阿宣读的，这是他自己以月球上的巴黎公社名义炮制出来的。……”^①

可见，马克思对于公社的观点大致上是由普法战争的环境和国际内部的对抗决定的。1870年7月23日，国际发表了它关于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马克思在《宣言》中解释说，无产阶级本身在战争中没有利害关系，但仍谴责战争。他在这次《宣言》中接受了分析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的德国说法，不是（像有时候有人提出的）因为他的德国背景，而是因为这也是当时在英国被

^① 马克思1868年10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141；英文词汇“无赖”（ragamuffins）也出现在德文版本中）。恩格斯在1869年7月6日（《书信集》第4卷，页244）的一封信中，质疑巴黎的孤立的革命专政的生存能力：“认为第一革命所建立的法国的巴黎专政可以像今天的专政无往而不胜一样被重复，实在是滑稽的看法。”

普遍接受的观点。似乎没有人怀疑，拿破仑三世要因战争受到谴责。尽管如此，《宣言》还是补充了两条保留意见：虽然战争是普鲁士在自卫中发动的，但俾斯麦的外交事务的行为使这样一个方向变得势在必行。普鲁士的另一项外交政策在早期阶段是本来可以驶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的。马克思希望普鲁士的胜利会粉碎拿破仑三世的混合政体并带来德国的统一，不是为了德国自身，而是因为只要德国被分裂，民族问题就会使所有的社会对抗黯然失色并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瘫痪下来。尽管如此，国际仍警告普鲁士不要把反对拿破仑三世的战争变成一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在这样一种发展的情况下，《宣言》意味着国际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①

数天以后，马克思补充了这一立场，他在一封写给他女儿劳拉（Laura）和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信中评价说，[245] 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垮台可以在法国为巨大的政治与社会进步开辟道路，而摇摇欲坠的俾斯麦带来的德国的失败将把普鲁士抛回到一种中世纪化的、等级性的浪漫主义状态。^② 马克思期望的不是在巴黎爆发一场革命，而是期望一种向共和主义的和平发展。巴黎的革命政权可能被外部战争和内部阶级对抗的双重压力压垮了。马克思在1870年8月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如果在巴黎爆发一场革命，我们就得问自己，它是否将拥有足够抵制普鲁士人的手段和领导者。不可否认，波拿巴闹剧的20年已经导致严重的士气低落了。不能指望革命的英雄主义。你怎么认为呢？”^③ 可见，马克思的质疑并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局势。法国社会和法国工人阶级的结构，使一次可能的革命尝试的结果对他来说显得没有希望。

① 《选集》第1卷，页486-490。

② 马克思1870年7月28日写给劳拉和拉法格的信（《编年史》（*Annali*），1958年，页177-178）。

③ 马克思1870年8月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430）。

马克思态度的内在连贯性，可以通过他在拿破仑三世的废黜和梯也尔临时政府的建立以后有关法国和德国在战争中各自的相对优势的观点的改变很好地得到说明。一旦拿破仑出局，普鲁士就再也不能宣称发动的是一场防卫战争了。对马克思而言，普鲁士的继续战争把这种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变成了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像在《第一篇宣言》中的观点一样，他在写于1870年9月9日的《第二篇宣言》中谴责俾斯麦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宣布国际反对德国占领阿尔萨斯—洛林的计划并呼吁法国工人支持临时政府。他告诫工人“不要被1792年的纪念品所迷惑”，敦促他们“镇定和坚决地为了他们自己阶级组织的工作而利用共和党自由派（Republican liberty）的机会”。^①

预测是清楚的：暴动表明罗伯斯庇尔派的革命 grandeur [壮阔] 的蛊惑。这样的尝试由于缺乏法国工人阶级的组织——这是波拿巴统治的遗产——而注定走向失败。在共和党自由派执政时期，短短几年耐心的组织工作，[246] 就可以帮助法国无产阶级弥补波拿巴统治二十年的道德败坏。

《第二篇宣言》的撰写反对的是在伦敦的法国极端流亡者中弥漫的陶醉和激情的背景。他们把皇帝的废黜看作是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标志。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九月初把他的一个法国支持者赛拉叶送到巴黎，去阻止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以国际的名义做各种各样的蠢事，……打垮临时政府，建立巴黎公社……”^② 梯也尔政府的投降去除了马克思在民族战争期间反对暴动的立场；但他反对暴动的基本立场源于他对法国工人阶级的

① 《选集》第1卷，页497。

② 马克思1870年9月6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453）。在此时的1870年9月，恩格斯在卖掉他在欧门（Ermen）那里的股份和在曼彻斯特的股权后搬到伦敦摄政公园的新家。这就终止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数卷之多的通信，因为两人现在在伦敦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对方。所以，我们缺乏在公社存在期间马克思观点的具体背景资料，这些观点到那时为止都是通过他与恩格斯的通信提供的。

社会结构的弱点的评估，这些考虑甚至在梯也尔的政策改变以后仍是息息相关的。^①

这种态度也可以解释——一旦暴动爆发——马克思关于公社社会结构的观点。1871年4月27日，公社的公共建设部门的委员弗兰克尔（Leo Fränckel）（公社领导中唯一的国际成员），写信给马克思咨询他在自己岗位上应当采取的步骤。什么能够比投入到社会规划和为一个新社会制作蓝图更加吸引人呢？然而，马克思没有做过这类事情。他的信直到5月13日都是非常冷静和保守的。他完全不关心提出关于公共建设和就业的建议的要求。相反，他训诫弗兰克尔提防公社面临的来自非[247]无产阶级因素的危险，因为这将会影响到公社自身的发展方向。^②他没有详细地回复向他提出的问题，因为他认为公社无论如何都会失败。他确信，公社的非无产阶级因素可能会使任何以普遍性为取向的政策成为不可能。

公社的社会成分——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这里的讨论而言不像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一样重要。这种观点，不论是错还是对，都决定了马克思对待公社的态度。《法兰西内战》的各种不同版本提供了明确证据，即马克思认为公社不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事件，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激进的暴乱。他从未明确地以论文的最终发表形式说明这一点，尽管他在这个方向上有所暗示。毕竟，颂扬不是尸检的正当环节。

① 马克思在1880年11月5日写给佐尔格（Sorge）的信（《通信选集》，页404-405）中，欢呼盖德（Guesde）和拉法格建立的法国社会主义党的成立标志着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诞生：“据我看来，这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在此以前只有一些宗派，它们的口号自然是来自宗派的创始人，而无产阶级群众却跟着激进的和伪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决定性关头为这些人战斗，而在第二天就遭到由他们捧上台的家伙的屠杀、放逐等等。”这段话的含义对马克思的公社观点而言是显然的。

② 马克思1871年3月13日写给弗兰克尔的信（《通信选集》，页321）。弗兰克尔写给马克思的信已在《新时代》（*Die Neue Zeit*）（1911年）上发表，页793。

公社阶级结构的分析在《法兰西内战》的草稿中是非常有趣的。在追溯暴动的源头时，马克思揭示说，暴动的有些社会背景在特性上是远离工人阶级的。他非常突出地谈到梯也尔政府1870年9月采取的延期偿付政策：这项法令延迟支付1870年9月以前所有未付的款项和租金直到1871年3月13日。梯也尔政府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巴黎小资产阶级零售商和小工匠的支持，他们是这种延期偿付政策的主要受惠者。当延期偿付政策行将到期的时候，巴黎中小阶级给凡尔赛施压要求继续延期，但梯也尔政府拒绝了。在3月13日至18日期间，超过15万个支付账单和租金的要求被提了出来，这对中小阶级是一次可怕的财政打击。3月18日公社的暴动——尽管它是由不同的问题直接导致的——由于在巴黎小资产阶级平民中间存在的对梯也尔的强烈不满而达到高潮。马克思指出，公社的典型措施结果就是继续延长政府的延期偿付政策。^①

想到公社的这种社会背景，马克思[248]就没有对公社的大多数立法不属工人阶级性质感到吃惊了。实际上，公社在社会立法方面除了取消面包师夜班烘烤外，根本不属于无产阶级性质。在探讨影响工人阶级的立法草案部分，马克思没有指出其中好些反对嫖娼和废除作为封建立法残余的相关款项的法律。另一方面，他耗费了大量篇幅致力于研究副标题“为了工人阶级、但大多为了中产阶级的措施”所涉及的相关内容。^②他继续阐明结论：“公社采取的原则性措施是为中产阶级获得好处。”^③

由于公社在其终结以后成了无产阶级团结的一种象征，所以马克思在最终的定稿中没有纳进这些段落，尽管他拐弯抹角地在非常典型的一段话里提到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观点，1848年6

① 《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3辑），页304，页342。也可参见《著作集》第17卷，页708，注释222。

② 《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3辑），页304。

③ 《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3辑），页342。

月的事件与公社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是中小阶级在行为上的转变。在1848年，中小阶级加入资产阶级并帮助屠杀工人。在公社期间，它们加入工人行列反对资产阶级。^① 这看来是一种充分的解释：马克思这里没有明确说出的是，公社的整个最初动因在源头上也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

对待公社的这种矛盾态度也是马克思后期观点的典型特征。在国际于1872年召开的海牙会议上，几乎没有讨论或提及公社。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讲话也局限于指出公社的溃败是因为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首府没有在随后爆发类似的革命。^②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他本可以补充说，这样的革命是不会有在特定环境下尾随而至的。因此，他写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也带有贬损的语气，他说，公社本来是可以与凡尔赛达成协议的。^③

可见，公社的失败并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失败或指导工人阶级的思想的失败。毋宁说，它的失败代表的是 [249] 公社运动的社会结构的失败。这场运动在成分上基本上是非无产阶级的，尽管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时候在有些领导者中间流行。这也是传统法国左翼试图再次上演1793年事件的幻想造成的。正像公社最终的发展本可以遵循社会主义路线一样，公社的革命实践也不可能从法国——曾经的社会进步的先锋民族——被拿破仑三世的Bas Empire [没落帝国] 抛入的社会与政治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因此，思想力求成为现实还是不够的，现实也必须力求趋向思想。^④

① 《选集》第1卷，页522—523。马克思在这里也拐弯抹角地提到公社工作的“利益多重性”。

② 《著作集》第17卷，页161。

③ 《通信选集》，页410。

④ 《早期作品集》，页54。

结语 当前的末世论

[250] 正是在马克思认为其理论已经向历史性的实现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其思想的学术成就似乎也是它的主要弱点。马克思通过将黑格尔哲学与它曾设法加以正当化和合法化的时代现实对峙起来从而获得了革命的哲学含义。这种战略将其革命理论与 19 世纪其他大多数革命理论区分开来，因为它们要么从各种其与现实的关系是基于对现实的单纯否定的先天原则中演绎出革命，要么局限于对时代现实的单纯经验性分析。马克思从哲学理论向一种拥有社会性的、历史性的主体——这种主体的合法性要按照理论加以辩护——的实践的突破，无疑是 19 世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相结合，赋予工人阶级的有意识的社会组织以历史含义。因此，无产阶级的命运不再是工人们自身的事务，而是迈进了世界历史领域。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思想的内部弱点也最明显。

把人类救赎的可能性变成此时此地即将得到实现的历史现象，就是将黑格尔的综合世俗化，黑格尔的综合看到，各种辩证的紧张关系消融在当前时代，并在历史进程由以达到自身最终高度的一种神化中找到它们的扬弃。黑格尔把这种行动称作历史的顶峰——这是非物质性的——而马克思把它看作是现实历史的开端；但含义都是一样的。从系统的观点看，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这方面的差别可以被归结为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拟设一种超历史的存在者，即绝对精神的存在，可以被归结为马克思主张，各种对立的扬弃过程即将发生，而黑格尔认为这种扬弃已经发生。赋予当前时代以这种末世论的 [251] 意义是他们所共有的，尽管黑格尔哲学有保守、寂静主义的含义，而马克思哲学有革命和积极的含义。黑格尔的激进因素，像马克思的消极主义、“客观主义”的含义一样，表明将末世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的体系的内部存在紧张关系。

马克思理论的内涵呼吁一种无产阶级运动。但其哲学的思想成就，如果不加修订，就不能为一种具有组织连续性并经历政治生活正常起伏的政治运动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因此，马克思理论的粗俗化，成为用他自己的哲学思辨与历史分析形成的历史运动的结构中的一个必然要素。因此，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不论是社会民主运动，还是共产主义运动——不得不将它们自己从马克思思想成就的诸多最杰出和最光辉部分中解放出来，并代之以简单性的粗俗化和对马克思主义运动之父的全然非批判的崇敬，这并非只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单纯的副作用。因此，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通俗化的阉割是与对马克思个人的神话形象的一种盲目崇拜齐头并进的。考茨基和倍倍尔对此要承担责任，而且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亚于列宁和斯大林，尽管他们的方法显然是不同的。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的理论可能因此会被它所预见的历史进程所否定。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就是

把马克思从他的弟子们的手中挽救出来，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派。

马克思的整个生涯都在揭示一种潜在的紧张关系，这就是一方面他确信革命即将来临，另一方面他厌恶被牵涉进试图以暴力的方式向千年王国进发的行动。末世论与辩证法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意味着，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看作是在创造有利于实现革命目标的各种条件，以便无产阶级在环境使这种实现不可避免时就万事俱备了。对马克思而言，这种有意识地干预历史进程的态度，是想要避免 [252] 主观主义的充满希望的思考和寂静主义的客观主义这种双重危险。这种态度的精巧性几乎是群众运动——无论是议会运动，还是革命运动——的领袖们所无法效仿的。

与有时候有人主张的见解相反，马克思并非只有在 1848 年以后才采纳了这种观点。在 1847 年 9 月，他在关于自由贸易的一篇演讲草稿中说，只有无限制的、全面的自由贸易才会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从而阐述了进一步变革和转变的可能性。^①甚至在 1848 年革命的前夜，他也没有期望暴力起义。《共产党宣言》有时候被说成是 1848 年事件的前奏，但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性章节非常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期待的是一个漫长的变革进程，而不是一场即将来临的暴力革命；他更多的是定位于组织性的政治工作，而不是革命密谋。^②1848 年 1 月 9 日，他告诉布鲁塞尔的民主联盟，自由贸易是变革的主要媒介。他把一些工人组织对反谷物法联盟的坚持看作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因为谷物法的废除给保护主义以致命的一击，因而为资本主义的内部变革铺平了道路：“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③

① 《著作集》第 4 卷，页 308。

② 《选集》第 1 卷，页 64-65。

③ 《著作集》第 4 卷，页 457-458。

这种观点在1848年以后的马克思思想中是普遍的。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存在1850年3月《宣言》中的激进语言，马克思在1850年9月仍坚持认为，工人们要花“15年、20年、50年”的时间才适合掌握政权。^①他在1850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说道：

随着所有这种普遍的繁荣，随着市民社会生产力以这样一种放纵的方式的发展，……一场真正的革命是没有机会的。……大陆政党的各个宗派的代表们所卷入的无数争论远远不会给予革命以新的推动力；相反，这些争论之所以[253]可能，仅仅是因为各种瞬间条件的基础如此可靠和（反动派并不知道的）如此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进攻这座堡垒，所有终止资产阶级的进步以及民主派的道德义愤和激情宣言的反动企图都将在那里被粉碎。^②

马克思超然于伦敦的由流亡者组成的各种不同的密谋组织和革命组织，就是这种态度的一个直接推论。他在1860年写信给弗赖利格拉特说：

我首先要指出，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我的提议于1852年11月解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八年了。在我的著作出版以后（1959年秋），我曾向某些先进工人，其中也包括以前的同盟成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但这种讲演与不公开的团体毫无共同之处。^③

① 《著作集》第8卷，页598。

② 《著作集》第7卷，页440。

③ 马克思1860年2月29日写给弗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的信（《通信选集》，页146-147）。

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方面，马克思 1848 年之前和之后的态度才是不同的。他在 1848 年以前觉得，资本主义社会很快就要达到成熟，但 1848 年的溃败可能使他相信，资本主义距离这种成熟仍很遥远。但《资本论》的序言表明，他认为至少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顶峰并且正在缓慢地从内部变革资本主义。

这些考虑促使马克思反对革命的任何尝试。1852 年他在一封写给移居美国的德国朋友克鲁斯（Adolph Cluss）的信中说，当前的经济繁荣阻止了革命的发生，在他看来这一经济繁荣必定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① 在同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他也痛苦地评价马志尼和科苏特（Kossuth）要上演另一次 1848 年事件的企图。这些革命人士并不理解，他们的尝试在当时的主导性局势下没有机会，因为他们对单纯政治革命的主观主义的雅各宾派态度使他们无法察觉他的态度。恩格斯以他的 [254] 典型蛮横的风格评论说，这些革命冒险者中策划他们的行动并再次失败的人，应当被逮捕和处决，如此这样的蠢事才会终止。^②

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增长源于他坚信，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欧洲革命的关键；他在 1848 年以前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指向的是同样的方向。由于资本主义的普遍性，革命的谜团不能单独在欧洲范围内解开，马克思将注意力转向非欧洲国家的变革进程。他甚至提出，这些非欧洲的条件可能最终会决定欧洲自身的革命机会：

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

① 马克思 1852 年 4 月 22 日写给克鲁斯的信（《著作集》第 28 卷，页 515）。

② 恩格斯 1852 年 5 月 7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书信集》第 1 卷，页 426：“真希望把带头的头领门全都抓起来并加以处决。”

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①

克里米亚战争对不列颠的影响促使马克思推测，在某些条件下英国业已建立的各种政治力量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如此细微的制衡，以致使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工人阶级有机可乘，开展独立的政治行动。^② 1855年有些暴力的工人阶级示威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想象到这些示威变成不可控制的骚乱的可能性。^③ 帕麦斯顿（Palmerston）的胜利和1857~1858年经济危机再次鼓励马克思，希望一场革命在可预见到的未来是可能的，因为扩张的周期和内部的繁荣可能完结。^④ 他在1858年写信给拉萨尔说：“总的说来，[255]目前是一个不坏的时期，历史显然将会出现新的起点，到处可以看到土崩瓦解的征兆，这使一切不愿意保持现状的人感到欢欣鼓舞。”^⑤

虽然危机在1858年年底前就结束了，但马克思从俄国的国内发展中得到了一些安慰。他写信给恩格斯说：“至少令人安慰的是，革命在俄国已经开始。”^⑥ 1862年德国政治场面的激进化再次使他产生革命可能在德国爆发的希望。他在一封写给库格尔

①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载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论殖民主义》[*On Colonialism*]，页15，页17）。

② 1855年4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著作集》第11卷，页178-183）。

③ 马克思1855年6月3日和26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114，页116）。

④ 马克思1857年3月3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222）。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又说道，在1857~1858年以前本来没有想到会有任何新的革命浪潮（《著作集》第14卷，页452）。

⑤ 马克思1858年3月31日写给拉萨尔的信（《著作集》第29卷，页561）。

⑥ 马克思1858年8月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通信选集》，页133）。

曼的信中说：“您若方便写信告诉我一些祖国的现状，那我一定很高兴。看来，我们正迎向一次革命，我从1850年起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第一幕将是绝对不令人愉快地重演1847~1849年间的那些蠢事。但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它是怎么样，就得怎么样。”^①

1863年普鲁士政治不断加深的危机促使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们很快就会有一场革命。”^②在同一年，他把波兰暴动看作是欧洲革命的序幕，而在这场暴动中“熔岩将有希望从东方流到西方”。^③在五年以后的1868年，他把西班牙的革命发展看作是一场普遍转变的标志：“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西班牙革命（它和1848年的那不勒斯革命具有同样的意义）会使欧洲的事变发生新的转折。……”^④

马克思最后一次直接期待革命发生是在1877年，即俄国在俄国—土耳其战争的一系列最初失败以后。他在一封写给佐尔格的信中解释了这些失败对俄国社会的影响：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官方材料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而我是由彼得堡的朋友们给弄到的）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256]不仅打击了俄国军队和俄国财政，而且打击了统率军队的王朝本身（沙皇、王位继承者和其他六个罗曼诺夫），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se-

① 马克思1862年12月28日写给库格尔曼的信（《写给库格尔曼的信》，页25）。

② 马克思1863年2月2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158）。

③ 马克思1863年2月1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151-152）。

④ 马克思1868年9月2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118）。

cundum artem [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et puis il y aura un beau tapage [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俄国大学生的愚蠢行为仅仅是一个预兆，本身毫无意义。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预兆。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道德和思想上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①

几周内，整幅画面就由于俄国在巴尔干的胜利和《圣斯特凡诺条约》（*the Treaty of San Stefano*）的回响而发生了激烈的变化，马克思的大胆断言看来变成了如意算盘。革命的确在俄国发生了，爆发的环境与他在这里所描述的环境几乎相同。但这却是40年以后的事；虽然想到马克思错在几周内、而对在40年后令人好笑，但时间的延迟毕竟是关键性的。任何要将他的各种断言加以系统整理的尝试，可能都是非常令人迷惑的，如果不是全然没有意义的话。马克思看到革命爆发在英国、西班牙、波兰和俄国。他把每一次似乎都在动摇业已建立的秩序的稳定性的危机规划为革命的一种前兆和序幕。他的哲学体系完全不能帮助他更好地辨别下一场革命爆发的准确地点。他的哲学体系连同其丰富性、洞察力、复杂性和学术光辉所能提供给他东西，都是这样的福音真理，即千年王国即将来临。马克思不能将他试图作的比较具体的断言与他的哲学前提联系起来。这些断言来自于他那普通的社会—政治直觉，而他的这种直觉并不能证明比他同时代人的直觉更加高明。

但革命1917年在俄国以类似于马克思1877年写给佐尔格的

① 马克思1877年9月27日写给佐尔格的信（《通信选集》，页374）。

信中所设想的那些条件的条件爆发时，列宁 [257] 任意使用了一种马克思总是反对并且在原则上一贯反对的政治武器，并且有一个由密谋性和进攻性权力机构组织起来的紧密政党。自 50 年代早期以来，马克思就一贯地将自己与任何政治组织撇开瓜葛。甚至在 1848 年，他也从未试图将共产主义者同盟变成任何诸如此类的组织。我们也已看到，他把国际设想为一个创造普遍的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机构。他在 1872 年将国际的总委员会转移到纽约的最初想法，无疑是基于如下动机，即他担心巴枯宁主义的影响会使国际变成一个密谋组织，试图上演另一次行动和建立另一个来路不正的公社。甚至在 1857 ~ 1858 年，即马克思想象到一种也许会导致革命的可能激进化时，他也没有试图通过形成或加入一个革命组织来为此作准备。完全相反，当他目睹风云际会时，他却将额外的精力专注于经济学研究，以至于他的政治经济学在革命一旦爆发的时候就会写好。^① 1866 年认为革命即将来临的恩格斯，催促马克思完成至少《资本论》的第一卷：“你的书将帮到我们什么呢，……如果在我们对事件感到惊异时，连你的书的第一卷都还没有准备出版的话？”^②

甚至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运动，马克思也从未把自己看作是它的任何组织的良师益友；随着《哥达纲领批判》的出版，他写给白拉克 (Bracke) 的信说道，他绝不把自己看作是爱森纳赫党 (the Eisenachers) 的领袖。^③

列宁没有经历过这种内在的困难。他关于革命活动的性质的观点之所以远远没有被困难所扰，正是因为它缺乏马克思

① 马克思 1853 年 9 月 15 日写给克鲁斯的信 (《著作集》第 28 卷，页 592)。

② 恩格斯 1866 年 2 月 10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 (《书信集》第 3 卷，页 368)。

③ 马克思 1875 年 5 月 5 日写给白拉克的信。(《选集》第 2 卷，页 15：“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

[258] 哲学思辨的辩证洞察力。它的直线型的、机械论的态度直截了当得多，它关于行动（尽管缺乏历史分析）的基本原则更像马克思本人严加批判的意志论雅各宾派的政治传统。于是，苏维埃共产主义可以被称为关于政治革命的雅各宾派主观主义观点与从马克思途径恩格斯的关于历史的一种有点机械论的诠释的结合物。结果可能会类似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称为“粗陋共产主义”的东西，这就不应当令人惊讶了。

然而必须承认，尽管马克思与苏维埃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大相径庭，但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仍是不可想象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马克思讨论俄国的那些信件中，他指出历史的发展总是向诸多可能性开放的。但他没有理会向他自己的理论开放的各种可能性；这里存在他的主要思想失误。尽管马克思认为各种开放的历史选择仍然是由可识别和可解释的原因决定的，但他忽视了这样的可能性，即他自己理论的未来发展向其开放的一种选择，可能是他的哲学和历史理论与单纯政治性的、主观主义的革命行动的雅各宾派传统的结合：列宁主义体现出这样一种结合。可见，如果说马克思的出发点是黑格尔哲学，他的盲点也是黑格尔哲学：像黑格尔本人一样，马克思没有使他自己的理论服从一种辩证的批判。

参 考 文 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Historisch –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MEGA*), ed. D. Rjazanov/V. Adoratskij. Frankfurt – Berlin, 1927 – 32.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vols, I – XXXIX. Berlin, 1956 – .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s. I – II. Moscow, 1962.
-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 T. B. Bottomore. London, 1963.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The Holy Family*, trans. R. Dixon. Moscow, 1956.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revised English trans. London, 1965.
- Karl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oscow, n. d.
- Karl Marx. *Capital*, vols. I – III. Moscow, n. d.
-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Grundrisse*) . Berlin, 1953.

- Karl Marx. *Pre - 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ed. E. Hobsbawm. London, 1964.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On Britain*. Moscow, 1962.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On Colonialism*. Moscow, n. d.
- Friedrich Engels. *Anti - Duhring*, 3rd English ed. Moscow, 1962.
- Friedrich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trans. C. Dutt. Moscow, 1954.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vols. I - IV. Berlin, 1949 - 50.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n. d.
- Karl Marx. *Letters to Kugelmann*. London, 1936.
-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Letters to Americans*. New York, 1953.
- Marx - Engels - Archiv*, ed. D. Rjazanov, vols. I - II. Frankfurt, 1927.
-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vols. I - III. Moscow, n. d.
-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Recueil de documents (Recueil)*, ed. J. Freymond, vols. I - II. Genève, 1962.
-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inutes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of 1872*, ed. H. Gerth. Madison, 1958.

其他著作

- Acton, Harry Burrow. *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 London, 1955.
- Adler, Georg. ‘Die Anfänge der Marxschen Sozialtheorie und ihre Beeinflussung durch Hegel, Feuerbach, Stein und Proudhon’, *Festgabe für Adolf Wagner*. Leipzig, 1905.
- Adler, Georg. *Die Grundlagen der Karl Marxschen Kritik der bestehenden Volkswirtschaft*. Tübingen, 1887.
- Avineri, Shlomo. ‘From Hoax to Dogma: A Footnote on Marx and Darwin’, *Encounter* (March 1967), pp. 30 - 2.

- ‘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VII, no. 2 (April – June 1967).
- Axelos, Kostas. *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Paris, 1961.
- Baader, Franz v. ‘Über das dermalige Misverhältnis der Vermögenlosen, oder Proletairs, zu den Vermögen besitzenden Klassen der Sozietät’, *Schriften zur Gesellschaftsphilosophie*, ed. J. Sauter. Jena, 1925.
- Barion, Jakob. *Hegel und die marxistische Staatslehre*. Bonn, 1963.
- Barzun, Jacques. *Darwin, Marx, Wagner*. Boston, 1946.
- Bauer, Bruno. *Di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Berlin, 1849.
- Berlin, Isaiah. *Karl Marx*, 2nd ed. London, 1952.
-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Moses Hess*. Cambridge, 1959.
- Bernstein, Eduard. *Evolutionary Socialism*, trans. E. C. Harvey. New York, 1909.
- Beyer, Wilhelm R. ‘Hegels Begriff der Praxis’,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6. Jhrg. (1958).
- Blanc, Louis.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866.
- Blumenberg, Werner. ‘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IX (1964), 81 – 121.
- Bober, M. M., *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ambridge, Mass., 1950.
- Böhm – Bawerk, E. v.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New York, 1949.
- Buber, Martin. *Paths in Utopia*. London, 1949.
- Calvez, Jean – Yves. *La Pensée de Karl Marx*. Paris, 1956.
- Cieszkowski, August v. *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phie*. Berlin, 1838.
- De la pairte et de l’aristocratie moderne*. Paris, 1844.

- Notre Père*, French edition. Paris, 1904.
- Collins, Henry and Abramsky, Chimen. *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London, 1965.
- Conze, Wilhelm.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deutschen Vormarz*. Stuttgart, 1962.
- Cornforth, 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vols. I – II. London, 1954.
- Cornu, Auguste.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leur vie et leur œuvre*, vols. 1 – 111. Paris, 1955 – 62.
- The Origins of Marxian Thought*. Springfield, Ia., 1957.
- Cunow, H.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lehre*. Berlin, 1920.
- de Vries, J. *Die Erkenntnistheorie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Salzburg/München, 1958.
- Dupré, Loui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New York, 1966.
- Easton, Loyd D. ‘August Willich, Marx and Left – Hegelian Socialism’, *Cahiers de l'ISEA*, série S, no. 9 (1965), pp. 101 – 37.
- Feuerbach, Ludwig.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ed. H. Schmidt. Leipzig, 1909.
- Klein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Leipzig, 1950.
-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 vol. II. Zürich/Winterthur, 1843.
- Briefwechsel*, ed. W. Schuffenhauer. Leipzig, 1963.
- Földes, B. *Das Problem Karl Marx – Lorenz Stein*. Jena, 1927.
- Fromm, Erich.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 (ed.) . *Socialist Humanism*. Garden City, 1965.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London, 1958.

Gebhardt, Jürgen. *Politik und Eschatologie*. München, 1963.

Gregor, A. James. *A Survey of Marxism*. New York, 1965.

Habermas, Jürgen. *Theorie und Praxis*. Neuwied am Rhein, 1963.

Hegel, G. F. W. *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 trans. T. M. Knox. Chicago, 1948.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trans. J. B. Baillie, 2nd ed. London, 1931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M. Knox. Oxford, 1942.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 ed. J. Hoffmeister. Hamburg, 1955.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ed. Nicolin and Pöggeler. Hamburg, 1959.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ed. J. Hoffmeister, vols. I – IV. Hamburg, 1952 – 60.

Hepner, Benoit P. 'History and the Future: The Vision of August Cieszkowski', *The Review of Politics*, XV, no. 3 (July 1953).

Hertz – Eichenrode, Dieter. 'Massenpsychologie bei den Junghegeliane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II, no. 2 (1962).

Hess, Moses. *Die europäische Triarchie*. Leipzig, 1841.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ed. A. Cornu and W. Mönke. Berlin, 1961.

Briefwechsel, ed. E. Silberner. Haag, 1959.

Heusel, A.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Erkenntnisobjekt bei Marx*. Jena, 1925.

Hilferding, Rudolf. *Böhm – 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ed. P. Sweezy. New York, 1949.

Hodges, Donald C. 'Engels'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London), pp. 297 – 310.

Hommes, Jakob. *Der technische Eros*. Freiburg, 1955.

- Hook, Sidney. *From Hegel to Marx*, new ed. Ann Arbor, 1962.
- Hyndman, H. M. *The Record of an Adventurous Life*. London, 1911.
- Hyppolite, Jean. *Études sur Marx et Hegel*. Paris, 1955.
- Kamenka, Eugene.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London, 1962.
- Kaufmann, Walter. *Hegel*. New York, 1965.
- Kautsky, Karl.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London, 1920.
- Kindersley, R.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Oxford, 1962.
- Kühne, W. *Graf August Cieszkowski, ein Schüler Hegels und des deutschen Geistes*. Leipzig, 1938.
- Künzli, Arnold. *Karl Marx; Eine Psychographie*. Wien, 1966.
- Labeledz, Leopold (ed.) . *Revisionism*. London, 1962.
- Lange, Oskar. *Problem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Calcutta, 1962.
- Leff, Gordon. *The Tyranny of Concepts*. London, 1961.
- Lenin, V. I. *Collected Works*, vols. I - . Moscow, 1960 - .
- Lessner, F. 'Before 1848 and After', *Reminiscences about Marx and Engels*. Moscow, n. d.
- Lewis, John.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1965.
- Lichtheim, George. *Marxism*. London, 1961.
- 'Marx and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t Antony's Papers*, XIV (1963), 86 - 112.
- 'Western Marxist Literature', *Survey*, no. 50 (January 1964), pp. 119 - 28.
- 'The Origins of Marx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II, no. 1 (April 1965), 96 - 105.
- Lindsay, A. D. *Karl Marx's 'Capital'* . London, 1925.
- Lobkowitz, Nicholas (ed.) .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Notre Dame, 1967.

- Lossky, N. O. *Three Polish Messianists: Sigmund Krasinski, August Cieszkowski, W. Lutoslawski*. Prague, 1937.
- Läwith, Karl. 'Max Weber und Karl Marx',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LXVII (1932).
-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New York, 1964.
- (ed.) . *Die Hegelsche Linke*. Stuttgart, 1962.
- Lukács, Georg.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1923.
- Lukács, Georg. *Moses Hess und die Probleme de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Leipzig, 1926.
- Der junge Hegel*. Wien, 1948.
- 'Zur philosophischen Entwicklung des jungen Marx',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II, no. 2 (1954), 288 f.
- Luxemburg, Rosa.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d. Bertram D. Wolfe. Ann Arbor, 1961.
-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2nd ed. New York, 1954.
- Marxismusstudien*, vols, I - IV, eds. E. Metzger and I. Fetscher. Tübingen, 1954 - 62.
- Masaryk, Thomas G. *Die philosophischen und soziologischen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Wien, 1899.
- Mehring, Franz. *Karl Marx*. London, 1936.
- Mengelberg, K. 'Lorenz v. Stein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I, no. 2 (1961).
- Mészáros, István. 'Collettività e alienazione', *Nuova Presenza*, no. 5 (1962).
- Meyer, Alfred G. *Marxism: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xis*. Cambridge, Mass., 1954.
- Miliband, Ralph, 'Marx and the State',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 (London), pp. 278 – 96.
- Morgan, Roger P.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ambridge, 1965.
- Müller, Adam. ‘Die heutige Wissenschaft der Nationalökonomie kurz und fasslich dargestellt’, *Ausgewählte Abhandlungen*, ed. J. Baxa. Jena, 1921.
- Gesammelte Schriften*. München, 1839.
- Na’aman, Shlomo. ‘Zur Geschich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in der zweiten Phase seines Bestehen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 (1965), 5 – 82.
- Nicolaevsky, Boris and Maenchen – Helfen, O. *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London, 1936.
- O’Malley, Joseph J. ‘History and Man’s “Nature” in Marx’, *The Review of Politics*, XXVII, no. 4 (October 1966), 508 – 27.
- Paul, G. A. ‘Lenin’s Theory of Perception’, *Analysis*, V, no. 5 (1938), 65 – 73
- Postgate, R.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906*. London, 1920.
- Plamenatz, John. *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 1954
- Popper, Karl.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1950.
- Riedel, Martin. *Theorie und Praxis im Denken Hegels*. Stuttgart, 1965.
- Rotenstreich, Nathan. *Basic Problems of Marx’s Philosophy*. Indianapolis/New York, 1965.
- Rubel, Maximilien. *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Paris, 1957.
- ‘Marx’s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New Politics*, I, no. 2 (1962), 78 – 90.
- Ruge, Arnold. *Werke*. Mannheim, 1847.

- Schmidt, Alfred.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 1962.
- Schuffenhauer, Werner. *Feuerbach und der junge Marx*. Berlin, 1965.
- Silberner, Edmund. 'Beiträge zur literarischen und politischen Tätigkeit von Moses Hess, 1841 – 1843', *Annali dell' I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VI (1963), 387 – 437.
- Sorel, Georges. *Les Polémiqu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u marxisme*. Paris, 1900.
- Stuke, Horst. *Philosophie der Tat*. Stuttgart, 1963.
- Talmon, J. L.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52.
- Tillich, Paul. *Der Mensch im Christentum und im Marxismus*. Stuttgart, 1952.
- Tucker, Robert C.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1961.
- Venable, V. *Human Nature; The Marxian View*. London, 1946.
- Verdès, Jeanine. 'Marx vu par la police française 1871 – 1883', *Cahiers de l'ISEA*, série S, no. 10 (August 1966), pp. 83 – 120.
- Vico, Giambattista. *The New Science*, trans. T. G. Bergin and M. H. Fisch. New York, 1961.
- Victor, W. *Marx und Heine*. Berlin, 1953.
- Vogel, Paul. *Hegels Gesellschaftsbegriff und seine geschichtliche Fortbildung durch Lorenz Stein, Marx, Engels and Lassalle*. Berlin, 1925.
- Weber, Max. '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s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XIX (1904), 22 – 87.
-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Gerth and Wright Mills. New

York, 1946.

Weiss, J. 'Dialectical Idealism and the Work of Lorenz v. Ste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II, no. 1 (1963).

Zóltowski, A. *Graf A. Cieszkowski's Philosophie der Tat*. Posen, 1904.

索 引

(页码均按英文原版标出)

- Abramsky, C. 阿布拉斯基 200
- absolutism 绝对主义 21, 49, 165, 183
- Adler, G. 阿德勒 55n.
- agriculture 农业 112 - 13, 156, 169
- alienation 异化 2, 10, 43 - 7, 86, 97, 105 ff., 133, 163, 165, 179; Hegel
黑格尔 96
- Alsace - Lorraine 阿尔萨斯—洛林 245
- Anarchists 无政府主义者 208, 235, 238 - 9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131
- Aufhebung* 扬弃 36 - 8, 84, 99, 105, 150, 160, 179, 186, 202 - 4, 208 - 12,
221, 243, 250
- Australia 澳大利亚 167
- Axelos, K. 阿克塞罗斯 24n.
- Baader, F. v. 巴德尔 55 - 6

- Baboeuf, F. N. 巴贝夫 186, 191
- Bagehot, W. 巴芝浩 42
- Bakunin, M. 巴枯宁 144, 174, 182, 184, 192, 208, 237 - 9, 257
- Balance of Power 权力平衡 43
- Barzun, J. 巴曾 66, 89
- Bauer, B. 鲍威尔 43, 54, 62, 132, 186; critical school 批判派 100 - 1
- Bebel, F. A. 倍倍尔 251
- Belgium 比利时 54
- Bismarck, O. 俾斯麦 184, 213, 244 - 5
- Blanc, Louis 路易·布朗 186, 196
- Blanquists 布朗基派 192, 194 - 6, 198, 200 - 1, 244, 246
- Blumenberg, W. 布卢门贝格 196
-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 144
- Bolte, F. 波尔特 145
- Bonapartism 波拿马主义 49 - 50, 245
- Buonarroti, P - M. 邦纳罗蒂 186
-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41, 44 - 5, 53, 60, 90 - 1, 159, 162 - 3, 174 - 5, 247; civilizing role 文明作用 165;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83; property 财产 83, 155; revolution 革命 186, 192
- Bracke, W. 白拉克 257
- bureaucracy 官僚阶级 23 - 4, 26, 37, 48 - 52, 209
-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市民社会 13 - 14, 17 - 22, 36 - 7, 155
- Burnham, J. 伯纳姆 179
-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167
- Calvez, J. - Y. 加尔文 68 n.
- Calvinism 加尔文教派 157
- Campanella, T. 康帕拉 43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50 - 6; change 变革、变化 174 - 84; civilizing nature 文明化性质 168; emergence 诞生、出现 114 - 15; labour and 劳动和 119 - 22; universality 普遍性 162 - 74
- cash nexus 金钱关系 164

- Chartists 基督徒 147, 214
- China 中国 167, 254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35 - 6, 44, 56
- Cieszkowski, August v. 奥古斯特·冯·齐茨考斯基 124 - 8
- 'citizen' 公民 44
- class 阶级 25 - 6, 145; abolition of 扬弃 59; lowermiddle 中低层 172, 247; relations 关系 164; rising and declining 上升和下降的 58
- classless society 无阶级的社会 31 - 40
- Cluseret 克吕泽烈 208
- Cluss, A. 克鲁斯 253, 257 n.
-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 92, 95
- Collins, H. 科林斯 200
- colonial expansion 殖民主义扩张 168
- commodities, fetishism of 商品拜物教 30, 49, 117 - 23
- Commune (Paris, 1871) 公社 (1871 年巴黎) 116, 193, 200, 209, 211 n., 239 - 49
- communism: crude 粗陋的共产主义 223, 258; defined 定义 61 - 2, 89, 222, 230, 234; distributive 分配的 224; practical 实践的 141; republicanism and 共和主义和 187
- Communists, League of 共产主义者同盟 63, 146, 242, 253, 257; address to (1850) 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50 年) 196; demands 要求 212; split 分裂 195; theoretical 理论 95
- Comte, A. 孔德 239
- concrete labour, class of 具体劳动的阶级 26
- Condorcet, Marquis de. 孔道西 4
-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99
- Considérant, V. P. 康德拉 54, 62
- co-operatives 合作社 174 - 84
- Copernicus, N. 哥白尼 43
- Cornforth, M. 康福思 66 n.
-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254
- cunning of Reason 理性的狡计 5

- Cuno, T. 库诺 216 n.
- Cunow, H. 库诺 209
- Dark Ages 黑暗时代 4
- Darwinism 达尔文主义 70
- democracy 民主制 20, 47, 217; battle of 斗争 204;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 144, 210; ture 真正的 31 - 8
- Democritus 德谟克利特 126
- demystification 祛魅 162 - 3
- despotism; military 军事独裁 47
- oriental 东方的专制 113, 168
- Domela - Nieuwenhuis, F. 多梅拉 - 纽文胡斯 200 n., 240, 248
- Easton, L. D. 伊斯顿 196 n.
- education through work 通过劳作进行教育 232 - 3
- Eisenachers 爱森纳赫党 257
- Engels, F. 恩格斯 13 n., 34 n., 39, 53, 77 n., 86, 93, 108 n., 125, 126 n., 143 - 4, 148 n., 164 n., 209 n., 167 n., 176, 193 n., 200 n., 209 n., 229 n., 244 n., 254 n., 255; background 背景 3;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专政 240; evolutionary 演变的 217 n.; influence 影响 2, 153; labour discipline 劳动纪律 235 - 6;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 6, 65 - 9; move to London 伦敦的行动 246 n.; state 'withering away' 国家“消亡” 202 - 3; 著作: *Anti - Dühring* 《反杜林论》 69, 202; *Dialectics of Nature* 《自然辩证法》 66; *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 《共产主义原理》 153 - 4
- England 英格兰 42, 256; Bank 银行 207; capitalism in 资本主义 159, 253; Corn Laws 谷物法 160 - 1, 167, 252; factories 工厂 160, 215, 233;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 156; Levellers 平均主义者 187;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物质论 67 - 8;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141; Reform Bill 改革法案 215; Settlement (1660) 财产法案 (1660 年) 156; social criticism 社会批判 138 - 9; social upheavel 社会变革 160; suffrage 投票 215; taxation 税制 207; take - over 接管 49;

- working - class 工人阶级 53, 55, 62, 214, 216; 亦可见 Chartists, India
- Enlightenment, the 启蒙运动 4
- entailed estates 限定继承的地产 27 - 9, 156
- Epicurus 伊壁鸠鲁 126
- epistemology; Hegel 黑格尔认识论 99; Marx 马克思 69, 136, 148
- exploitation 剥削 120, 163
- family, the 家庭 28 - 9, 89 - 91, 163
- Favre, J. 法夫尔 242
- Ferguson, A. 弗格森 4
- feudalism 封建制度、封建主义 20, 155 - 6, 162, 185
- Feuerbach, L. A. 费尔巴哈 98, 101., 128, 133, 137, 139, 140; Hegel and 黑格尔和 10 - 12;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 66 - 74; transformative method 转变性方法 11, 14, 30, 49, 86, 97; 亦可见 Marx; *Theses*
- Fichte, J. G. 费希特 8 n., 43, 125
- Földes, B. 弗尔德斯 53 n.
- Fourier, F. M. C. 傅立叶 54, 130
- France: bureaucracy 法国官僚阶级 49; Directoire 督政府 185, 189;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4; Franco - 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 244; International 国际 147 - 8; July Revolution (1830) 七月革命 (1830 年) 185;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 6, 66 - 8; Napoleon I 拿破仑一世 185; Orléanists 奥尔良党人 199; peasantry 农民 214; proletariat 无产者 141; Revolution of 革命 48, 194; Second Empire 第二帝国 50 - 1, 213; Second Republic 第二共和国 212; social criticism 社会批判论 138 - 9; socialism 社会主义 54, 246n; Workers 工人 199; 亦可见 Commune, French Revolution, Jacobinism, Napoleon III
- Fränckel, L. 弗兰克尔 246
-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163, 252
- freedom 自由 92, 93 n.
- Freiligrath, F. 弗赖利格拉特 253
- Franch Revolution (1789) 法国革命 (1789 年) 21, 32, 45, 129 n., 218, 185 - 201; 见 Jacobinism, Robespierre, terrorism

Friedrich Wilhelm IV 弗利德里希·威廉四世 43

Galbraith, J. K. 加尔布雷思 81 n.

Gattungswesen 类存在 84 - 5, 87 - 8, 231

Gebhardt, J. 格布哈特 124 n.

Gemeinwesen 共同体 34, 57, 112, 114

Germany 德意志 133, 151, 159, 255; call for republic 要求建立共和国 212; Empire 帝国 51; fit for revolution 适合革命 219; idealism 观念论 139; labourers 劳动者 141; League of Communists 共产主义者同盟 196;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37;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214; rising of 无产阶级的上升 48, 195, 219;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人 67, 83, 257; worker 工人 51, 63 n., 197

Goethe, J. W. 歌德 111

Graeco - Roman 希腊 - 罗马 19, 190

Gregor, A. J. 格雷戈尔 2

Grotius, H. 格劳修斯 43

ground rent 地租 207

Grün, K. 格林 54

Guesde, J. 盖德 246

Hecker, F. 黑克尔 195

Hegel, G. W. F. : Absolute Spirit 黑格尔: 绝对精神 128; alienation 异化 96 - 100; existence and actuality 实存和现实 106; freedom 自由 92, 129; Feuerbach and 费尔巴哈和 10 - 12; history, view of 历史观 4 - 5, 84, 250; idealism 观念论 102; identity 同一性、等同 149; influence on Marx 对马克思的影响 3 - 12; materialism 物质论 65; political philosophy 政治哲学 8 - 40; property 财产、所有制 109; role of philosophy 哲学的作用 135; *Stände* 阶层 21 - 6; universal class 普遍阶 57 - 8, 62; 著作: *Logic* 《逻辑学》70; *Phenomenology of Mind* 《精神现象学》68, 96, 98, 100, 170 n., 189 n. ; *Philosophy of History* 《历史哲学》19, 126; *Philosophy of Right* 《法哲学》5, 13, 16, 22 - 3, 26 n., 27, 29, 39, 106 n., 128, 132, 188; 引文: 7, 124, 135; 亦可见 Marx: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 Heine, H. 海涅 225 n.
Hepner, B. P. 赫普纳 125n.
Hertz - Eichenrode, D. 赫兹 - 艾兴罗德 62n.
Hess, Moses 摩西·赫斯 17 n., 109, 124 - 5, 133
Heusel, A. 霍伊泽尔 66n.
history, interpretation of 历史解释 4 - 5, 79, 84, 95, 99, 127 - 8; world 世界 166
Hobbes, T. 霍布斯 43
Hobhouse, J. C. 霍布豪斯 161 n.
Hodges, D. C. 霍奇斯 3
Holland 荷兰 49, 216
Hommes, J. 霍姆斯 68 n.
Hook, S. 胡克 54 n., 74 n., 105 n.
humanism 人道主义 100
Hyndman, H. M. 海因德曼 216 - 17
Hyppolite, J. 伊波利特 13n.

idealism 唯心论、唯心主义论 6, 12, 96, 102, 132, 139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50, 166, 171
India; Revolt (Mutiny) 印度的暴动 (叛乱) 63 n.; British rule in 不列颠的统治 168 - 71
individualism 个体主义 92, 95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154
industry: development 工业发展 116; modern 现代 92
International, The: American Federal Council 国际美国联邦委员会 145; Franco - 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 199; General Council 总委员会 237, 257; General Rules (1864) 《共同章程》(1864年) 62, inaugural address (1864) 《成立宣言》(1864年) 161, 173; report (1868) 《报告》(1868年) 198; second address (1870) 《第二篇宣言》(1870年) 199
Italy 意大利 47; republics 共和派 157

- Jacobinism 雅各宾派 49, 187 - 201, 243 - 4, 246, 258
- James, W. 詹姆士 75
- Japan 日本 167
- Jews 犹太人 3, 43 - 6, 238
- Just, League of the 正义者同盟 147
- Kant, I. 康德 8 - 9, 69, 137
- Kaufmann, W. 考夫曼 138
- Kautsky, K. 考茨基 66, 86, 188n., 193, 203, 251
- Kibbutzim* (Israeli) 合作农场 (以色列) 142
- Kossuth, L. 科苏特 253
- Kugelman 库格尔曼 41, 255
- Kühne, W. 屈内 125n.
- Künzli, A. 孔策利 4
- labour 劳动 77, 102 - 7; child 儿童 232; 定义: 81; discipline 纪律 235 - 6; division of 分工 55, 117 - 23, 172, 230, 232; hours of 小时 234 - 6
- Lafargue, P. 拉法格 244, 246 n.
- Lange, O. 朗格 181
- Lassalle, F. 拉萨尔 42 n., 77 n., 121, 167, 176, 182 - 4, 213, 254
- Leclerc, abbé 阿伯·勒克莱尔克 186
- Leisure 休闲 103 - 4
- Lenin, V. I. 列宁 1, 66, 70, 86, 171, 182, 188 n., 202 n., 203, 209 n., 212, 251, 256 - 8
- Leo XIII 利奥十三世 130 n.
- Leroux, P. 勒鲁 54
- Lessner, F. 莱斯纳 146 - 7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83
- Lichtheim, G. 利希特海姆 2 n., 169 n., 217
- Lindsay, A. D. 林赛 81 n.
- Lobkowitz, N. 罗布考维奇 125 n.

- Lossky, N. O. 洛斯基 124 n.
- Löwith, K. 洛维特 111 n., 131
- Lukács, G. 卢卡奇 69, 96, 125, 127, 148
- Lutheranism 路德教派 92, 129, 202
- Luxemburg, R. 卢森堡 193
- Machiavelli, N. 马基雅维利 43
- Malthusian theory 马尔萨斯理论 110
- managerial revolution 经理革命 51, 179
- market - economy 市场经济 161
- Marx, Karl: Works: *Civil War in France* 卡尔·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158, 200, 202, 210, 220, 240, 247 引文: 50, 116, 209, 211, 221 n., 241; *Class Struggle in France* 《法兰西阶级斗争》161 n. 引文: 194 - 5; *Comm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3, 34, 108 n., 123, 142, 149 n., 151, 153, 154 n., 159, 167 n., 191, 211 - 12, 232, 252 引文: 61 - 2, 91, 115, 1, 9 n., 162 - 3, 165 - 6, 174, 219;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0, 47, 52, 161, 176 引文: 39, 175;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哥达纲领批判》41, 120 n., 122 n., 150, 174, 204 n., 220, 230, 257 引文: 51, 221 n., 225 - 6, 232 - 4;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 3, 10, 12, 13, 31 - 4, 40, 41, 78, 92, 112, 204 引文: 58 - 9; *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经济学—哲学手稿》1, 55, 66, 87, 96, 109 - 10, 122, 220, 230, 233 引文: 89, 90, 99, 102 - 3, 118, 141, 223 - 4; *Eighteenth Brumaire* 《雾月十八日》49, 165 n., 171 n., 202 n.; *German Ideology* 《德意志意识形态》1, 3, 46, 49, 54, 94, 112, 115, 118 n., 137, 158, 172, 176, 204 n., 229 n., 237 引文: 58, 71, 77, 166 - 7, 222, 231; *Grundrisse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80, 176 引文: 72 - 4, 84, 91 n., 102, 104 - 5, 112; *Herry Vogt* 《福格特先生》146, 198; *Holy Family* 《神圣家族》3 n., 43 n., 44 n., 54, 101 n., 111, 138, 185 引文: 63, 100, 142, 191; *Introduction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39, 194; *Kapital* 《资本论》1, 30, 72, 23, 102,

- 104, 108 n., 137, 151, 154 n., 159, 172 n., 176 - 7, 202, 232 - 3, 236, 253 引文: 39 - 40, 81, 93, 116 - 19, 120 n., 159, 160, 177 - 8, 180 - 1; *Letters to Kugelmann* 《写给库格尔曼的信》引文: 243n.; *Notes about the New Prussian Censorship Regulations*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引文: 188; *On the Jewish Question* 《论犹太人问题》45, 185, 188; *Poverty of Philosophy* 《哲学的贫困》17 n., 83, 94, 101 n., 111, 146 n., 149 n., 154 n., 204 n., 232 引文: 237; *Pre - 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113 n. 引文: 117; *Theses of Feuerbach* 《论费尔巴哈的提纲》66, 71, 78, 128, 136, 144, 148 引文: 68, 94;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雇佣劳动与资本》108 n., 120 n. 引文: 80, 107, 119 n., 164 - 5, 173; *Wages, Price and Profit* 《工资、价格和利润》82, 122 n.
- Marx, Laura 劳拉·马克思 244
- Materialism 唯物论、唯物主义 11 - 12, 39, 66 - 71, 96; historical, dialectical 历史辩证 65
- Mazzini, G. 马志尼 47, 253
- Mehring, F. 梅林 54 n., 66 n., 140, 196 n.
- Mengelberg, K. 门格尔贝格 54 n.
- Meyer, A. G. 迈尔 144 n.
- Michelet, K. L. 米歇尔莱特 125
- Middle Ages 中世纪 4, 20, 22, 56; commodity demand 商品需求 154; communal movement 公社运动 155; towns 城镇 155, 157; 亦可见 feudalism 封建主义
- Mill, J. S. 密尔 179n
- Milliband, R. 米利班 203 n.
- monarchy 君主制 9, 14 - 16, 18 - 19, 36
- money 金钱 110 - 11
- More, Sir Thomas 托马斯·莫尔爵士 187
- Morgan, R. P. 摩根 183
- Müller, A. 米勒 引文: 55 - 6
- Na' aman, S. 纳门 196 n.
- Naples 那不勒斯 255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 213, 244 - 5, 249

nationalization 国有化 206, 223

Natural Law 自然法 18, 87

nature 自然、本性 70 - 2, 236

Nicolaevsky, B. 尼古拉夫斯基 147

objectification 对象化 97

O'Connor, Feargus 费格斯·奥康纳 160 n.

Oppenheimer, D. 奥本海默 137 n.

original sin 原罪 4

Owen, R. 欧文 180, 233

Palmerston, Lord 罗德·帕麦斯顿 254

parliamentarism 议会制度 18, 46, 165, 210

Paul, G. A. 保罗 66n

Physiocrats 重农派 222

Plekhanov, G. V. 普列汉诺夫 66, 86

Plato 柏拉图 187, 237

Poland 波兰 215, 255 - 6

polis, classical 古典城邦 19, 113

political economy classical 古典政治经济学 83, 158, 162

Portugal 葡萄牙 156

Postgate, R. 波斯特盖特 243 n.

poverty 贫困 63 - 4

praxis 实践 12, 133 - 49, 217, 237; 定义: 138

press, censorship of 出版审查制度 188; freedom of 出版自由 45

production 生产 93; means of 资料 225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25, 41 - 64, 146, 195, 198, 201; dictatorship of 专政 240; first mention 第一次提到 59; emergence of 出现、诞生 151; historical role 历史作用 140; movement 运动 250; rule of 统治 204 - 6

property 财产、所有权 20, 25 - 31, 82 - 3, 103, 109, 115 - 16, 122, 163; abolition of 扬弃、废除 34, 37, 60, 63, 109, 115; emancipation from 解放 44; entailed 限定继承的 27 - 31; India 印度 169; individual 个体

- 177; private 私有 91, 183, 223 - 4, 288; social 社会 180; tribal 部落 112 - 13
- Protestantism 新教 43, 157
- Proudhon, P. J. 蒲鲁东 54, 71, 80, 94, 101, 111, 146 n., 157, 182, 222;
on property 论财产 83
- Prussia 普鲁士 19, 42, 184, 213, 244 - 5, 255
- Pyat, F. 皮阿 198, 200, 244
- railways 铁路 207
- Ramm, T. 拉姆 202n.
- Ranke, L. 兰克 32
-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运动 43
- religion 宗教 10 - 11, 35, 43, 46, 52, 99, 125, 139, 230
- republicanism 共和主义 19, 20, 38, 47, 187
- revolution 革命 139, 149, 151, 215; Jacobin 雅各宾派 193; Puritan 清教 187; theory of 理论 250; 见 French Revolution
- Ricardo, D. 李嘉图 108, 158, 176, 234
- Robespierre, M. 罗伯斯庇尔 188, 190 - 2, 245
- Rome, ancient 古罗马 120, 152, 190
- Rotentstreich, N. 罗腾施特赖希 69 n., 74, 124 n.
- Rousseau, J. J. 卢梭 43, 211 n.
- Roux, J. 卢 186
- Rubel, M. 鲁贝 183
- Ruge, A. 卢格 9, 10, 14, 22, 132, 134 引文: 44, 133
- Russia 俄国 51, 169, 255 - 6; *mir* 公社 152 - 3; Populists 平民派 153;
revolution 革命 167; Soviet 苏联 255, 258
- Saint - Simon, C. H. 圣西门 182, 222, 234
- San Stefano, Treaty of 圣斯特凡诺条约 256
- Schmidt, Alfred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70
- Schweitzer 施魏策尔 111
- serfdom 奴役 54
- Serraillier 赛拉叶 200, 246

- sexual relations 性关系 89 - 91
- Shakespeare, W. 莎士比亚 111
- Silesian revolt 西里西亚暴动 143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55, 78, 87, 103, 162, 230
-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82
-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 167; stages of 的阶段 220 - 39
- socialists: true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52, 62, 85, 101, 123, 182; utopian 空想 67, 129 - 30, 149, 150, 221
- social man 社会人 86 - 95
- Sorel, G. 索雷尔 140 n.
- Sorge, R. J. 佐尔格 246, 255
- sovereignty 主权、统治权 14 - 16
- Spain 西班牙 255 - 6
- Spinoza, B. de. 斯宾诺莎 10, 43
- Stalin 斯大林 251
- Stände* 阶层 18, 20 - 1, 23, 26
- state; abolition of 国家的扬弃; 见 *Aufhebung*;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46
- Stein, L. v. 施泰因 53 - 6
- Stieber 施蒂贝尔 242
- Stirnre, M. 施蒂纳 45
- stock companies 股份公司 174 - 84
- strikes 罢工 121
- suffrage, universal 普选、普选制 36 - 7, 202 - 20
- Switzerland 瑞典 42
- Talmon, J. L. 塔尔蒙 189 n.
- technological change 技术变革 120 - 1, 153 - 4, 172 - 3, 235 - 6
- Ten Regulations 十条制度 205, 211 - 12
- terrorism 恐怖主义 187 - 91, 193
- Their, E. 蒂尔 222
- Thierry, J. N. A. 蒂瑞 53

- Thiers, A. 梯也尔 242, 245 - 7
- Tillich, P. 蒂利希 86
- trade unions 工会 121, 142, 146
- Tucker, R. C. 图克 53
- Turkey 土耳其 120, 255
- U. S. A. 美国 19, 216; Homestead Act 宅地法 182; poor whites 贫穷白人 152; take - over 接管 49
- value: exchange 交换价值 117; labour, theory of 劳动理论 108; surplus 剩余 2, 120, 234
- Venable, V. 维纳布尔 74 n.
- Verdès, J. 弗德斯 243 n.
- Vico, G. 维科 77
- Victor, W. 维克托 225 n.
- Vogel, P. 福格尔 53 n.
- Vogt, K. 福格特 197
- Vries, J. de. 德·弗里斯 66 n.
- wages: average 平均工资 164; equality of 平等的 223; iron law of 铁律 121
- Wagner, A. 瓦格纳 74, 93
- Weber, M. 韦伯 110, 157, 159, 160, 162
- Weil, E. 魏尔 44 n.
- Weiss, J. 韦斯 54 n.
- Weitling, W. 魏特琳 54, 63
- Weydemeyer, J. 魏得迈尔 53
- Willich, A. 维利希 196; - Schapper group 一沙佩尔派系 195, 201
- Workers 工人 60 - 2; association 工人联盟 93, 142; class 阶级 145
- Young Hegelians 青年黑格尔派 16, 45, 100, 125, 129, 131 - 4
- Zasulich, V. 查苏利奇 94, 153
- Zóltowski, A. 佐托斯基 124 n.